

# 20 世纪军政巨人百传

## 铁打硬汉 ——铁托自传

[南斯拉夫] 铁托 著  
王三水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世纪军政巨人百传/宋长琨主编,一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12

ISBN 7-5387-1629-7

I.20… II.宋… III.军政人物—列传—世界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1) 第080903号

20世纪军政巨人百传

铁打硬汉——铁托自传

---

主 编: 宋长琨  
责任编辑: 叶天洪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124号)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 吉林省委党校印刷厂  
北京市业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32开  
印 张: 14  
版 次: 2003年11月第2版  
印 次: 200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5000册

---

书 号: ISBN 7-5387-1629-7  
全套定价: 990元 单册定价: 19.80元



## 译 序

铁托(1892—1980),本名约瑟普·布罗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总统、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铁托于1892年5月26日生在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克罗地亚库罗韦茨村的一个贫农家庭,兄妹十五人,他排行第七。铁托的童年是很艰苦的。从十二岁起,他先后当过放牛娃、饭馆招待员学徒工,还在国内及捷克、奥地利和德国当过五金工人。

铁托自1920年参加共产党起,领导工人同资本主义剥削、压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铁托在1927年生平第一次在报纸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揭露了首都附近一家火车车厢厂压榨剥削工人的情况。铁托因为不断在工人中间组织革命运动,引起了反动政府的敌视,于1927年、1928年两次被捕。

1934年铁托刑满出狱后,潜回萨格勒布,化装改名为铁托从事革命活动,并被选为党省委委员,后去南共中央总部所在地维也纳。当时,南共中央机关流亡在维也纳和巴黎,派别斗争激烈。铁托在反对党内派别斗争,争取党的团结、统一方面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铁托主张把党的领导机关迁回国内,认为党的工作取得胜利,“必须了解本国情况”。但当时的南共总书记戈尔基奇等人反对他的建议。1934年12月,铁托当选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



1936年，铁托任南共中央组织书记。1937年底，铁托被任命为总书记，翌年他回国进行党的改组工作。

在反对法西斯侵略者，争取自由解放的斗争中，铁托领导南斯拉夫人民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1941年4月6日，德意法西斯侵略者以二十三个师的兵力占领了南斯拉夫。经过三个月的准备，在希特勒进攻苏联的当天——6月22日，以铁托为首的南共中央政治局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的会议中，铁托起草了一个告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宣言书，号召南斯拉夫人民拿起武器进行斗争。当晚，这个宣言被秘密印刷出来，火速散发至南斯拉夫各地。7月，建立了人民解放游击队最高司令部。铁托任南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人民解放游击队最高司令部司令。他制定了开展游击战争的战略，创建了人民武装，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领导这支人民的队伍独立抗战二十几个月。在斗争中，人民解放军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粉碎了敌人的七次进攻，解放了大片国土。

1943年11月29日在亚伊采召开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这次会议作出了如下重大决议：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是具有国会权力的最高立法和行政机关；以铁托为首的全国解放委员会行使临时政府的职能；剥夺流亡政府的一切权力，基础上的民主联邦国家；授予铁托以元帅的最高军衔等。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召开的那一天，即11月29日定为南斯拉夫国庆日。

1945年3月，南斯拉夫成立了“联合政府”，铁托任总理兼国防部长。同年5月15日，南斯拉夫全境解放，南斯拉夫人民取得了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性胜利。

1953年，铁托当选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总统(1963年4



月改国名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南斯拉夫的“全民防御”体系的建立，是铁托为首的南共联盟总结了反对外来侵略的历史经验而提出的重大战略措施。铁托一再强调，南斯拉夫处在“风口上”，帝国主义不会让南斯拉夫“太平”，因此，必须搞全民防御，对“任何敌人都应成为刺猬”，“准备迎接战争”。他还向人民发出警告：“我们要象一百年不发出战争那样劳动，要象明天可能爆发战争那样做好准备。”

根据铁托为首的南共联盟中央提出的全民防御的战略思想，1969年颁布了体现这一思想的《国防法》和《兵役法》，以后又载入宪法。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响应铁托总统的号召，从上到下建立起一套严密的全民防御和社会防御体系。

在西方，人们常常认为，南斯拉夫自从1948年以来一直在创造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路线，即所谓“铁托主义”。当有人向铁托提出这个问题时，他立即回答说：“铁托主义”作为一个单独的意识形态路线是不存在的。把它称作一种意识形态，那是愚蠢的。1931年3月，在铁托参与发起下，在贝尔格莱德召开了第一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铁托积极推行不结盟政策，“反对一切形形色色的政治和经济统治，反对国与国之间和人民与人民之间一切新旧形式的从属关系”。

铁托一贯重视中南两国人民的友谊。在世界联合国大会第一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他与与会国家首脑，积极倡议要求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他为增进中南两国党和人民的团结与合作，不顾八十五岁的高龄，于1977年8月至9月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1990年5月4日，铁托在卢布尔雅那市因逝世，终年八十八岁。



## 目 录

译序 ..... 1

### 与党在一起，投身于人民

基本传记资料 ..... 3  
童年、就学、学艺 ..... 8  
碰运气 ..... 15  
服兵役 ..... 19  
十月革命和内战时在俄国 ..... 22  
奔赴战场和当了俄国的俘虏 ..... 26  
在战俘中进行工作并同俄国的革命者接上了头 ..... 32  
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在赤卫队里和吉尔吉斯人中间 ..... 39  
加入共产党和返回祖国 ..... 49  
在萨格勒布建立反派别核心 ..... 52  
在萨格勒布党组织内 ..... 60  
萨格勒布共产党人第八次地方代表会议 ..... 64  
逮捕和审判(“炸弹案”) ..... 74  
按照《国家保卫法》受惩办 ..... 84  
对德尼索夫的谴责 ..... 89  
在莱波格拉瓦和马里博尔服刑 ..... 92



博日达尔·阿季亚博士事件 .....	99
赫布兰的儿子 .....	101
勇敢无畏和坚定不移的典范 .....	103
出狱后恢复党的生活 .....	111
文学家之间的争论 .....	116
农民问题 .....	120
工会的活动 .....	123
斯洛文尼亚的代表会议 .....	126
进入党的最高领导 .....	128
第一次到共产国际 .....	131
处于党的领导岗位上 .....	140
在巴黎的情况 .....	145
改组与巩固党 .....	148
在斯洛文尼亚的工作 .....	150
青年问题 .....	155
萨格勒布党组织的情况 .....	158
萨格勒布的文化工作 .....	161
建立斯洛文尼亚共产党和克罗地亚共产党 .....	165
解决南共内部的危机以及南共在共产国际的地位 .....	171
致季米特洛夫的信 .....	175
政治形势 .....	187
共产党 .....	191
再谈地下工作 .....	193
清洗问题 .....	198
再次上路返回祖国 .....	207



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 .....	209
-----------------	-----

### 在革命的烈火中

一九四一年四月南斯拉夫被占领 .....	217
一九四一年塞尔维亚人民起义 .....	222
同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谈判 .....	229
“乌日策共和国”结束 .....	236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前夕 .....	247
建立无产者第一旅 .....	251
建立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 .....	255
游击队的海军 .....	258
“比哈奇共和国” .....	260
奈雷特瓦之战 .....	262
苏捷斯卡之战 .....	269
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	273
敌人空降德尔瓦尔 .....	276
与盟国的关系 .....	281
南斯拉夫军队的最后几仗 .....	285
苏联的援助 .....	291
与巴尔干诸邻国的关系 .....	293
与保加利亚的关系 .....	297
战争的尾声 .....	300

### 新南斯拉夫时期

新南斯拉夫 .....	305
-------------	-----





资产阶级反对派 .....	308
一党制 .....	311
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 .....	315
同苏联的关系 .....	322
关于我国的真情实况 .....	335
实行自治 .....	358
自治十周年 .....	368
自治的根本问题 .....	373
米洛万·吉拉斯事件 .....	375
不结盟政策 .....	390

铁打硬汉—铁托



**与党在一起，投身于人民**



## 基本传记资料

### 从库姆罗韦茨到西伯利亚

我于一八九三年<sup>①</sup>出生在南斯拉夫克罗地亚的扎戈尔耶。我的父亲是一个中农，但在一九一三年由于欠了银行的债而几乎把全部田产都卖光了，因此，我的父亲成了雇工。家里除了我，还有兄弟四人，姐妹两人，他们都是工人。我上完了小学(五年)和中学(两年)。一九〇七年，我主动到锡萨克市的一家制锁机工工场当学徒。一九一〇年满师后，成了独立的制锁匠和机械工人。我一结束学艺就成了社会党工会的会员。开始时，我在萨格勒布的一家机器厂里做工。后来，我又在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的一家机器厂里做工。一九一一年年底，我前往捷克斯洛伐克。起初，我在伊内茨—琴科夫的一家生产金属的工厂里做工，后来又在比尔森的“斯可达”工厂里做工。接着，我又在德国的“本茨”(曼海姆)厂和奥地利的“戴姆勒”厂(汽车厂)里当工人。

<sup>①</sup> 手稿原件中误写为一八九三年，应为一八九二年。——原注



一九一三年秋天，我应召服役。我在萨格勒布的步兵第二十五团里服役。一九一四年八月初，部队开赴塞尔维亚前线，当时我任排长。在塞尔维亚战场上，我一直呆到奥地利军队一九一四年十二月第二次撤退时为止。一九一五年一月初，我被调到波兰的加利西亚，被调往俄国前线。一九一五年四月十二日，我被俄国人俘虏。我受了伤，又有病，在斯维亚日斯基的乌斯宾修道院里躺了十一个月。后来我被调到阿拉季尔市，那里集中着准备开赴多布罗加前线的塞尔维亚志愿军。我跟七十名伙伴一起拒绝上前线。我们被带到阿尔达托夫市，分派我们给农民干活。我在卡拉谢耶沃村干活，在一个富农的磨坊里照看机器。一九一六年秋天，我和其他战俘又被调到乌拉尔，我被分派在铁路上。我在孔古尔市的铁路上干活，充当翻译，还当上了战俘中的负责人。我在那里结识了一批铁路工人。一九一七年夏天，我逃跑了，因为我保护战俘的利益而受到严惩。六月份，我逃到列宁格勒，我想在普梯洛夫工厂就业，从事我的本行。但是，由于六月份举行了大示威游行，我也参加了，我决定逃到芬兰，打算越境。我在芬兰被捕，于是在列宁格勒蹲了三个礼拜的班房。从列宁格勒，我被押解回孔古尔，在途中我又逃跑了，我前往西伯利亚，绝大部分时间是靠步行。<sup>①</sup>

<sup>①</sup> 在手稿原件上，作者删掉了接下的一段话，这段话说：

“十一月，我来到鄂木斯克，我已经病得很重：吐血，还……伙伴们建议我到  
一个村庄里去干我的本行，用煮沸的马奶和牛奶来治病。于是我前往鄂木斯克县  
鲍戈柳普斯卡区的米哈伊洛夫卡村，我在那里管理蒸汽脱谷机。一九一八年春  
天……”——原注



我在一九一八年<sup>①</sup>十一月到达西伯利亚。当时苏维埃政权已经建立。由于身体不好，再是听了同伴们的忠告，我到草原上去干活。我前往鄂木斯克县鲍戈柳普斯卡区的米哈伊洛夫卡村。在米哈伊洛夫卡村，我给农民管理蒸汽脱谷机：我给S·什克利亚罗夫和D·塔巴切克干活，一直干到一九一八年八月。为了避免被捷克斯洛伐克或者塞尔维亚军动员入伍，我前往吉尔吉斯的一个村庄，在那里，我给吉尔吉斯人伊萨伊·贾克先巴耶夫管理磨坊，一直到一九二〇年九月。

一九一八年春天，我就提出过书面申请，要求加入苏联国籍和加入党。在高尔察克叛乱（捷克斯洛伐克军哗变）期间，我留在草原上，因为通往鄂木斯克的道路完全不能通行。在高尔察克政权时期，我在农民中间进行宣传鼓动，反对白军，因此那里的农民把我看成是共产党人。

一九一八年，我与女公民P·D·别洛乌索娃结婚，她是米哈伊洛夫卡村一个农民的女儿。我的妻子E·A·尼古拉耶娃<sup>②</sup>这时已是联共（布）党员，还是希洛夫区的指导员。

在征得鄂木斯克的同志们的同意之后，一九二〇年九月，我偕同妻子返回南斯拉夫。

我没有正式成为联共（布）党员，尽管我做了鼓动宣传，并且同鄂木斯克的一些党员保持联系，例如，同鄂木斯克发电厂的电工塔拉卡诺夫以及火车站的一些工人联系紧密。

① 手稿原件上误写为一九一八年，应为一九一七年。——原注

② 铁托夫人别洛乌索娃的化名，她当时住在苏联。——原注



一九二〇年，我加入了南共党。我到南斯拉夫后，在萨格勒布一家五金企业里干活。我已是革命工会的会员和地下的共产党的党员。一九二一年，党被禁止活动，我离开萨格勒布，在别洛瓦尔的一家蒸汽磨坊里当技工。我在那里一直干到一九二五年。

鉴于党已被查禁，我与一些同志组织了别洛瓦尔州的地下共产党组织，我担任州委委员。一九二三年，我因为从事共产主义宣传首次遭宪兵逮捕和毒打。一九二五年，我因为信仰共产主义而被解雇。此后，我就业于克拉列维察的造船厂。在我到达之前，造船厂里既没有工会组织，也没有党组织。我很快就建立起一个有十五名党员的支部，接着又建立起一个有一百五十名会员的工会组织。在这个党支部的帮助下，我们在州内各地，在赫雷林、巴卡尔、苏沙克等地，相继成立了支部。我们还建立了州委，我是委员。一九二六年秋天，我来到塞尔维亚，就业于斯梅德雷沃帕兰卡的车辆厂。在那里，我也建立了党支部和工会组织。跟在造船厂时一样，这里的工人也选我当工人总代表。然而，尽管如此，我不久就被逐出工厂，被视为危险的共产党人和鼓动家。我前往萨格勒布，在那里，先在一家工场干活，当地的五金工人工会组织选我当书记。一九二七年五月，我被推举为克罗地亚五金工人工会州委会书记，在一九二八年被捕之前，我一直任这一职务。

从一九二七年七月起，我任萨格勒布党的地方委员会书记。在一些同志的帮助下，一九二七年秋天，我开始同右的和左的派别进行斗争。一九二八年三月，在地方党组织的代表会议上，我们的这场斗争取得了胜利。早在这次代表会议之前，



地方委员会里就发生了分裂。地方委员会有五名委员。结果其中的三人是派别分子，因此我和赫布兰同志向代表会议提出我们的报告，他们三人也提出他们自己的报告。在代表会议上，我得了二十九票，而对手仅得到两票。这次代表会议决定请共产国际干预，并发表了告南共党员的《公开信》。

一九二七年六月，我被捕，遭到毒打，在普里莫尔耶的监狱里关了两个月。一九二七年秋天，我被判处监禁七个月，但是上级法院到一九二八年才就此案作出裁决。一九二八年五月一日，我又被捕并被判处关押三周。一九二八年六月，我再次被捕，但是我逃走了。一九二八年八月五日，我又一次被捕；在受审长达三个月时间后，我被判处五年徒刑。我一共服了六年徒刑。最初，我被关在莱波格拉瓦(两年半时间)，由于组织绝食，我从那里被调往马里博尔监狱。

一九三四年三月，我刑满获释后，立即从事地下工作，着手建立党的组织。一九三四年七月，南共中央要我离开国内，并把我选进南共中央政治局，而在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党的第四次代表会议上，我当选为南共中央委员。<sup>①</sup>

---

<sup>①</sup> 《约·布·铁托选集》，贝尔格莱德，一九七七年版。



## 童年、就学、学艺

### 我决心碰碰运气

父亲和母亲去参加别人的婚礼去了，要好几天才能回来。家里只剩下孩子们。有一天一位远亲来到家里，平常她总是嘲弄母亲，这次就嘲弄起我来了。她问道：

“约扎<sup>①</sup>，你给孩子们煮什么午饭吃？”

“煮面汤……”

“汤里放些什么？”

“放点面粉、做面疙瘩……”(我年稍大，负责照料弟弟妹妹，由我煮饭。我向母亲学了一点。)

厨房里，在熏肉的地方挂着一只猪头和一点肉。这个远亲指了指猪头和肉说：

“你不会切下猪头的下半部煮煮？这会煮成一锅味道不错的

---

<sup>①</sup> 约扎为约瑟普的昵称。——译注





汤……”

“妈妈会不高兴的……”

“不会的。他们在那里什么都有，又吃又喝，已经三天了，你尽管切好了。”

她把我鼓动起来就走了。

我知道，母亲舍不得吃这个猪头，她打算在家里有什么喜庆的时候才把它拿到桌子上来。我犹豫不决，最后才下了决心。切下一块猪头，放进锅里，煮了很久。弟妹们肚子饿了，等吃午饭等得不耐烦了。汤做好后，来不及做面疙瘩了。我只放了一点面粉。弟妹们争先恐后地吃起肉，喝起汤来，汤很油……汤面上飘着两三尺厚的一层油……

吃过午饭不到一个小时，弟妹们的肚子受不了了，都拉起肚子来。母亲回家了，带来了满满一篮子好吃的东西，弟妹们中间没有一个跑到她身边去。弟妹们像小鬼似的，脸色惨白，面容枯瘦，汤太油了，使他们受了罪。他们悄没声息地走到母亲身旁。

母亲不安地问道：“孩子们，你们怎么啦？”

“约扎，给我们煮了一锅汤……”

“仁慈的上帝，他给你们煮了什么汤？”

“婶子来家里，对约扎说，煮点猪头肉当午饭……”

母亲很快全明白了。母亲尽管很严厉，但这一次她认为没有必要惩我。她是一位十分正直和富有自豪感的妇女。她知道，她的孩子们是在多么艰难的条件下生活，因此她谅解、原谅了我这样一些小的过错。

我们的日子过得很艰难，连面包都不够吃。母亲把面包锁



起来。仅仅在过节的时候才能吃上面粉烤的面包，平时只吃玉米面烤的面包。她得把一点点玉米面烤的面包藏起来不让亲生子女看到，这对于她来说，一定是很痛心的事。然而，她只好把面包藏好，仔细地分配，使得人人有份。孩子们学会了利用邻居或亲戚来家里的机会，向母亲要一块面包。他们明白，这位自尊心强的妇女在客人面前是不会拒绝切下一块面包给他们的……而当客人离开后，他们往往挨骂，甚至为此而受到惩罚。

童年时，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斯洛文尼亚的外祖父那里度过的。上学前，我才回到家里。我的克罗地亚语讲得不太好。这使我在学校里感到为难。我常常听不懂向我提出的问题，也不能完全用克罗地亚语回答问题。主要由于这个原因和生病，一年级时我留级了。大约是在春天。我得了猩红热。

高烧使我变得枯瘦，脸无血色，眼大无神，大部分时间蜷缩着蹲在灶上。有一次，邻村来了个人。那一天正好村里有游行队伍：神甫、穿着一身白衣服的女孩子、妇女……。我缩着身子蹲在灶上，透过玻璃窗望着游行队伍，一边听着母亲和客人谈话。所有的妇女都去参加游行了，母亲没有，她留下照看我。

客人朝我蹲在那里的灶上望了望，说：“米察，你这个约扎留不住了……”

母亲马上转换话题。只留下我们母子两人时，她紧紧地抱着我。她如此做，好像是想告诉我：“你，我谁都不给。疾病也不能夺走我对你的关心和爱护……”

这样的时刻，我是忘不了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我从



俘虏营里回来，而母亲已经不在人世，这使我十分伤心……这个看上去粗暴，生活使她变得硬心肠的妇女，内心充满了全部母爱，这是我永远忘不掉的。

我小学毕业了。该决定下一步怎么办……有一回，教师维姆普舍克和在库姆罗韦茨开了一家杂货铺的商人斯坦契奇问我：

“约扎，你将来想干什么？”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当跑堂伙计”。

教师和商人都感到奇怪：“你干吗想当跑堂伙计？”

“跑堂伙计穿一身漂亮的黑衣服，我想穿得漂亮。”

这个想法和解释并不令他们高兴，于是开始说服我。最后，我让步了：

“好吧，那就当裁缝……”

“为什么想当裁缝？”

“假如我自己是裁缝，我就可以给自己缝一身漂亮的黑衣服……”

小学毕业后的第一年，我是在一位有钱的舅舅家里度过的。他有很大的庄园，有很多牲口，但是这位舅舅没有雇用仆人。有许多事情要做，其中不少事让我来承担。正如老百姓所说的，我从早干到晚。我给家里人捎口信说，这样长期下去，我可受不了。不过，我还是在那里呆了八个月，后来就回家了。

当时，恰好有一位也姓布罗兹的在司令部工作的军士回库姆罗韦茨探亲。跟他一起回来的有锡萨克的一位旅店老板，这名军士就在锡萨克服役。这位老板需要一名小伙计。家里的人想起我当年曾想当跑堂伙计，而这又是一个就业的机会，于是



就同意我去锡萨克的“施特里格尔”旅店做工。

那时，我第一次看到火车。我知道有火车，但是从来没有见到过。我想象中的火车是跑得很快的运载工具。但是第一次就使我感到失望。火车远不如我想象的那样。你可以下了火车，跟它并排走，而不用担心它会把你拉下！

在施特里格尔旅店中所干的活，又使我感到失望。根本就谈不上什么黑色的服装。给了我一把扫帚，还给了我一条围裙，我什么活都做，就是不跑堂。当然，我不会满意。我所认识和交往的一些小伙子劝我另找地方学手艺。军官们每天晚上到这家旅店来消磨时光，打地滚球，在这里是不可能学到什么手艺的。我下决心离开这里碰碰运气，找别的工作。

有一天，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就离开了施特里格尔旅店，到锡萨克市中心去找工匠卡拉斯，我听说有这么一个人。在我所找的那家作坊门前，我看到了一个胖子。我觉得他是这里的主人。

我说：“你好”。

那个人打了招呼，望着我，问我有什么事。

“我是来拜你为师的。”

卡拉斯打断我的话：“‘拜你为师’是怎么回事？你不问问我是否收你。你是什么地方人？”他显然对我的机灵感到吃惊，不过，他喜欢这样。

“扎戈尔耶人。”

“噢……好，你现在在哪里干活？”

“在施特里格尔旅店，在……”

“在那家小酒店里？……你在那里做些什么？”



“什么都干：扫地、整理滚木球、给客人递球……什么都干。”

“我明白了，所以你来找我。好吧，你明天来……你父亲还在吗？”

“还在，我母亲也在，我还有兄弟。”我高兴地、激动地一口气回答道……

第二天，我去卡拉斯那里之前，先去了一趟商店。我想，我是去学手艺，得有一条铁匠穿的那种围裙。用我那不多的一点积蓄，我买了一条围裙。我一到卡拉斯那里，就把围裙穿上。卡拉斯见我这身打扮就笑了起来：

“小伙子，别穿这玩意儿，你又不是当铁匠。”

卡拉斯对我的表现感到满意。我呢，也尽力学习手艺。他到锡萨克以外的地方干活，也把我带上。这种时候，他就给我钱买吃的。往往给得比较多，比我的需要还多。我用剩下的钱买书。侦探福尔摩斯的那些冒险经历使我兴奋。正是因为一本关于这位著名侦探的书，我还跟师傅吵了架。

我一边干活，一边给其他的工人念这本书。当时，我的弟弟斯特凡也跟我在一起，卡拉斯已经收他为徒弟。一不小心，我弄断了一个钻头。差不多在同一时候，卡拉斯骂开了娘，并给了我一耳光，因为他正好这时进入工场，看见发生了什么事并作出了反应。这记耳光使我觉得受了莫大污辱。再过三个月，我就满师了。但是，招呼没打我还是走了。

卡拉斯报告我失踪了。警察找到了我，并把我逮捕了。卡拉斯想法让他们立即释放我。过不久，我就满师了。我拿着铁匠徒工的证明，离开了锡萨克，我在这个城市里住了三年。当



学徒的这三年过得不坏。活很忙，这我不在乎。惟一使我感到遗憾的是，没有时间进行体育运动。

那时，所谓的古典式摔跤很时髦，我是在马戏团里看到的。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个理发师摔跤，小伙子比我高一个头。摔跤前，我们打了赌。每人往第三个小伙子的帽子里放了一个克朗，谁胜给谁。我把理发师摔倒了。由于获胜，我高兴得忘了那两个克朗。这场摔跤比赛的那位“中立的”裁判连同帽子和那两个克朗一起拿走了。

这两个克朗，我倒不怎么在乎。我得到了宝贵的生活锻炼。我有钱。有时，我避开工匠制做一两把钥匙，或者给人修锁。靠这样挣来的钱买书，或者用来支付其他一些满足自己需要的小笔开支。

离开锡萨克，我到了萨格勒布。我想被一个技师雇佣，以便能够学到点东西。我想到克纳乌斯工匠那里碰碰运气，他能修各种机器，从缝纫机直到自行车，甚至还会修汽车。他收留了我，这使我感到十分幸运。

克纳乌斯技艺非常高超，从他那里确实可以学到不少东西。不仅可以学到有关机器的知识，而且也可以学到有关机械学的知识……在他那里，我学会了开旋床。我在那里学到的许多知识，对我后来用处很大。



## 碰运气

### 小伙子，上哪里去？

克纳乌斯是一位杰出的工匠，也是一位大好人。他的专业知识是靠到处干活积累起来的。他有时候向我们这些在他的工场里干活的青年叙述他的这些经历，像父亲那样，而不是像老板那样向我们提出忠告，教我们很多知识。在他那里，我迎来了春天和萨格勒布的工人示威。我参加了五金工人的罢工。我担任纠察，防止警察袭击工人。从到萨格勒布的第一天起，我就是工会会员。罢工遭到了禁止。

有一天，我对克纳乌斯说：

“师傅，我想到外面去闯闯，见识见识，学点东西……”

“你到哪里呢？”

“到德国或者奥地利……”

“小伙子，你想得对。我当年也远走高飞过，你看，我并没有做错。”克纳乌斯打开了话匣子。他对我侃侃而谈，并向我提出忠告，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到了国外，在外国人中



间该怎么干。不久，我整理好行装就出发了。

靠着我的积蓄，我前往卢布尔雅那。我在卢布尔雅那市内花了整整五天时间来寻找工作。由于身边还有点钱，我没有太费心去找。我在一家兼旅馆的小酒店里过夜。钱越来越少。虽然快用完了，我还是下决心前往的里雅斯特。两只脚是惟一的交通工具。我花了三天时间，才走到当时亚得里亚海上这个最大的港口城市。

大海、式样新颖的房子、一座漂亮的大城市、轮船——在我看来，这一切既新鲜又美好。我在市内闲逛，观看着周围的一切，徒劳地寻找着工作。不多的那点钱也用光了。我决心往回走，当然还是步行。的里雅斯特已经远远地落在我的身后，黄昏时分，我听到车轮的辘辘声。一个农民驾着车赶上了我，并问道：

“小伙子，你上哪里？”

“回家。”我简捷地回答说。

“你是哪里人？家在哪里？”

“我是圣佩塔尔人”。我说了库姆罗韦茨附近苏特拉河岸斯洛文尼亚境内的一个较大的地方。

“那么遥远的地方？！”他感到吃惊，并请我上车。我欣然接受邀请。我躺在干草上，瞌睡得不行。这位农民还给我盖了盖……

经过几天步行，从比夫卡，经过茹姆贝卡和布雷日茨，我回到了家里……我突然赶回家时正好是晚上。

怎么回事？从哪里来？家里的人眼睛全盯着我。

“我没有找到工作。我得住到春天。”





家里嘴多饭少。我跟兄弟商量好，我帮他挣点钱，不给家里拮据的预算增添负担，这使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整个一冬，我都跟兄弟一起干活。他制造水泥构件。到了春天，我居然还有了一点积蓄。靠了这点钱，我又启程去找工作。这一回，我到了卡姆尼克。我听说，那里的一家工厂，就是今天的“巨人”厂，在招工人。消息是可靠的。我一到那里，就受雇了。厂里大约有二百五十名工人。

卡姆尼克的生活是安排得很好的。那里还有“鹰社”<sup>①</sup>跟其他青年工人一样，我参加了这一体育团体。我们天天锻炼，想在室内运动项目上超过“鸢社”的竞争对手。加入“鸢社”的都是当地有钱人家的子弟，该社受神甫的庇护。

好日子没有过多久。工厂面临着危机。后来事情已经变得很清楚，工厂关门的日子已临近了。这时有一位师傅邀集一批工人跟他走。他打听到，捷克斯洛伐克的伊内茨—琴科夫市在招工人。这一批人中也包括我，我们就一起走了……

在火车站上，有一大批工人迎接我们。那里在罢工。我们这些来自卡姆尼克的工人并不了解这一点，原来是要我们来充当破坏罢工的角色。但是，我们这批人立即同当地的工人站在一起，跟他们一起继续斗争，工厂主不得不接受工人提出的条件。给所有的工人增加了工资。甚至给从卡姆尼克来的我们这

---

<sup>①</sup> 为捷克人米罗斯拉夫·蒂尔什于一八六二年所创，原为一体育组织，后传至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及其他欧洲国家，参加者均为斯拉夫人。——译注。



批人也增加了工资，根据合同，我们这批人的工资本来就比厂里原来的工人要高。

我在伊内茨—琴科夫没有呆多久。我转到比尔森，进入了“斯可达”厂，稍后，我又前往德国。最初，我就业于曼海姆的铁锚厂，后来在“本茨”厂工作。在那里，我也没有干多久。过了一个月，我收拾好行装，前往维也纳。我就业于“格里德尔”厂，但是同样为时不长。不久，我转到维也纳诺沃梅斯托，进入了“戴姆勒”汽车厂。



## 服兵役

### 我希望跟同胞在一起

不久，我又动身了，是回家乡。那是在一九一三年秋天。我当时十九岁，我应征服役。我在维也纳穿上了奥匈军队的制服，由于我干过五金工人和技工，被分在炮兵的技术部门服役。

在那里，我的日子过得不坏，但是，我希望跟同胞在一起。在奥地利人和德国人中间，我感到孤独。我递了申请报告，要求调到第五十三团。

我被调到驻守萨格勒布的义勇军第二十五团。我在所有的新兵报到两周后，才赶到新部队。他们的头全被剃光，而我还留着头发。在维也纳不那么严格，没有把我们剃成光头。班长马上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操起理发推子在我的头的中央交叉推了两道，然后让军内的理发兵把我的头剃光，这使我感到失望，开始我几乎后悔不该要求调换部队。

我明显地感觉到，班长老是盯着我。很可能是有人给他下了这样的命令，因为我已经被证明是“社会主义者”。而这是



危险的。我的自由思想可能使周围“受到感染”。班长一有机会，就为难我。对此，我不予理会，不久我赢得了几位军官的好感，这主要归功于我当年在“鹰社”的锻炼，还由于我剑术相当好。

有个叫穆尔科维奇的上尉是个狂热的击剑爱好者，是全军马刀劈刺的佼佼者，他让我跟一批军人每天接受他的训练，后来又让我参加在布达佩斯举行的全军击剑比赛。部队一位上校首长不满意于这一选择，大概是因为我不是出身于名门，而是一个工人。穆尔科维奇上尉坚持自己的意见。他断言我会在比赛中拿到奖牌回来，这才说服了司令官。

比赛的第一天，我最出色，尽管差一点把我淘汰了。一度，我击中了对方，而裁判没有看见。我提出抗议。军官们跳了起来。一个士兵竟敢提意见？最后总算解决了。第二天，我得了第二名。因此，按总分计算，我得到了奖牌。证书和奖牌是由约瑟夫大公授予的。我，一个工人，一个没有土地的农民的儿子，一个惟一的资本是双手和手艺的人，居然接受大公的祝贺。一个普通工人居然同皇族成员握手！

返回时，军官们在兵营门口欢迎我。上校派了一名勤务兵来迎接我。在司令官的办公室里，我感觉到了，他用严厉的口吻，断断续续讲的话里流露出了满意的心情。

“不错呀，小伙子。”但是，即便在这种场合，上校仍然显得对穷人，对不是出身于名门的人难以容忍，对像我这样一个还是社会主义者的人，那就更加如此了。他嘲笑我，说：“我似乎觉得你并不魁伟，还没有发育成人”。

上校这番不怀好意的话，使我觉得受了伤害，我用带点傲



慢的口气回敬他说：“不可能人人都长得又高又大。的确，我不是什么大力士，但是我的肌肉发达，我又灵活顽强，最重要的是我有自信心。”

训练结束了。我当了排长，被调到正在塞尔维亚前线作战的一个师里。我作为奥皇的士兵，但是我却为塞尔维亚和黑山军队的英勇顽抗感到高兴，他们在占有优势的敌人面前也毫不退让。这是在一九一四年……<sup>①</sup>

---

<sup>①</sup> 《铁托回忆录》，一九八一年五月四日《解放报》。



## 十月革命和内战时在俄国

### 我当过工人、无产者，曾经无家可归

我曾经多次讲过，我参加俄国十月革命和内战是很微不足道的。由于一系列的原因，我没有长时间参加有组织的赤卫队或红军的国际支队，因此，我的参加不可能有很大意义。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没有直接经历第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革命——俄国工人和农民的宏伟事业，正是这场革命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时代。

俄国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给这场革命的全体参加者和同时代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因此，我很快就接受了革命的思想是可以理解的。我是社会主义者，我属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当时不存在共产主义运动，只有社会主义运动，也就是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工人运动叫做社会主义运动，我就属于这一运动。当我置身于俄国大革命这样的事件之中时，我完全卷进去，我自己又完全接受改变社会存在，改变社会制度的思想，就是显而易见的了，特别是，在此之前，我看到了沙皇制度是怎么一回事，专制的压迫制度是怎么一回事。我的思想和



行动同苏维埃俄罗斯工人阶级的思想和行动是完全一致的，虽然我是作为被俘的奥匈军队的士兵经历这一切的。

此外，随着十月革命的发生，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和结束后震撼全世界的革命形势的出现，与此相联系的是，欧洲当时各个腐朽的帝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当时，世界经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无谓的流血，特别是欧洲各国人民如陷深渊，在这场第一次帝国主义战争结束的时候，这种局面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危机和寻求摆脱这种大混乱的出路。

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作为沙皇俄国的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反对沙皇制度在这场非正义的战争中使他们遭受的苦难的造反行动，作为寻求摆脱这种无谓的相互战争较量的出路的愿望产生的，以使生灵免遭屠戮，使多少世纪以来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瑰宝免遭破坏。这场革命正是由于寻求创造一个新的、较美好和较公正的世界、仁爱与和平的世界来取代这样一个旧世界，而使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人心潮澎湃，立即赢得他们的好感。

一方面，十月革命受到数以百万计的人民群众，受到被投入欧洲战壕中的所有被剥夺了权利的劳动人民以及受到占领者铁蹄蹂躏的被压迫民族的赞扬、赞同和支持；另一方面，它却使统治阶级异常愤恨。因为这场革命带来了新的制度。受压迫的、被剥夺了权利的，也就是说，顺从的贱民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一举成了左右局势的主宰。因此十月革命推动和唤醒了人们的良知。就这一方面而言，十月革命立即成了我们的事业，成了我们自身的追求和愿望的一部分，向我们所有的人指明了摆脱当时的苦难和困境的出路。



当现在我们纪念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六十周年的时候，在我看来，当时发生的事件，尽管已经过去很久了，却变得意义更为重大。这些事件对我政治和思想上的抉择，总的来说，对我的意识的形成发生深刻而持久的影响。我是在十月革命期间最终地选择了共产主义和革命的道路。

正如我所说的那样，在此以前，我是一个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工人、无产者，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但是，在欧洲当时的气氛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占主导地位的那种情况下，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没有什么明确的前途，尤其是当战争已经成了严酷的现实的时候，我们中的每一个人要直接作出选择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也就是说，在各国社会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上和一些国际会议上，社会党人发出了清醒的呼声，提醒人们要反对甚嚣尘上的战争疯狂，社会党人、无产者不应该参加与其他国家的自己的阶级兄弟的战争，总的来说，工人不应该去为本国的剥削者和统治阶级出力。但是这些呼声湮没在煽动战争的宣传、民族主义的狂热、所谓祖国和民族利益受到威胁的假爱国主义的呼吁的汪洋大海中，因为这种种都是为有产阶级服务的，为的是维护他们自己的统治地位和既得特权，或者是用关于爱国主义和民族利益的花言巧语来掩饰他们自己对别国人民和别国的征服野心，掩饰他们自己主张重新瓜分世界的图谋。在这些自相冲突的利益、蓄意的欺骗、背信弃义的勾当的汪洋大海中，总的来说，一个人是很难作出选择，而我当时不过是一个青年工人，当时，我只有二十二岁，奥匈军队士兵的制服已穿了一年，在军营中，没有行动的自由。

因而，俄国工人和农民的革命活动以及成功地进行的革命





把我深深地卷进了革命的洪流之中，自那时起，我一直置身其中。

因此，当我回首往事时将比较详细地回顾战争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对我整个一生以及对我在那几年——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直到二十年代从苏联回到祖国的经历的影响。



## 奔赴战场和当了俄国的俘虏

###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奥匈军队中的第一天

我说过，战争爆发时，我是奥地利的一名士兵，更准确地说，我是正在驻防萨格勒布的义勇军第二十五团的一名年轻士兵。实际上，我是在一九一三年秋天在维也纳参军的，当时在炮兵的技术部门，但是根据我自己的要求，我被调到萨格勒布。

我不喜欢在奥匈军队里服役，这有几个原因。首先，这是一支压迫人的军队，它不仅奴役我国人民，而且充当奴役其他国家人民的工具。其次，作为军队，这是一支糟糕的军队。这支军队单讲操练，陈规戒律比比皆是；根本不允许士兵表现出一点主动精神。

我永远不会忘记在奥匈军队中的第一天。我刚参军时，跟所有年轻人一样，留着头发。我知道士兵必须剃光头，但是把我的头剃光的方式使我深感受了污辱。班长在门口等候我：“噢，社会党人先生，你也在这里！请你过来，我来给你的头发修理修理。”他拿起理发推子，在我的头上推了一个十字。



有许多事情让我们感到苦恼。我们必须立即记住哈布斯堡家族的家谱。我还记得我的一个同乡，他后来留在库姆罗韦茨当农民。他是一个普通农村青年，不能很快记住大公和王族其他成员的冗长的名字。于是，班长就惩罚他。可怜的小伙子不得不爬上我们寝室里烧得很热的大取暖炉子上，蹲在上面，不停地用手指敲打脑袋，大声地说：“我是个笨蛋，我是个笨蛋……”

奥匈军队里还用其他方式来虐待人，在这方面，尤其是班长们特别起劲，他们是些名副其实的恶棍。

然而，我既然已经到奥匈军队里来服役了，我就留心很好地学习军事技术。不久，我就有了机会。参军后过了几个月，我被指定去上军士学校，我于一九一三年年底进入该校。在学校里，我进步很快，不久就成了全团最年轻的中士。我是一个出色的击剑运动员，我还从事其他体育运动，我因此而受益匪浅。作为全团击剑冠军，一九一四年五月，我前往布达佩斯参加奥匈军队击剑锦标赛。在奥匈军队上百名最优秀的击剑运动员中，我当时得了第二名，获得了一枚银牌。（这块银牌我一直保留着，跟我度过了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我在大特罗伊斯特沃附近的一家磨坊里修马达时弄丢了。）

一九一四年，大战爆发了，我所在的团很快就被调到斯雷姆的塞尔维亚前线，最初是派往贝尔格莱德以北的贝扎尼亚，后来调到鲁马附近。

战争一爆发，一些非常法就立即生效，根据这些法律，宣传社会民主主义的所有报纸都被查禁，社会民主党的所有组织都被取缔。社会民主党的绝大部分干部都被应召入伍，被派往



前线,但是与在议会里投票反对战争的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不同的是,奥匈帝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没有对这些措施表示任何立场,而是保持沉默,听之任之,甚至对战争本身也默许了。另一方面,弗兰克派和天主教僧侣利用宣战来煽动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的仇恨。作为社会主义者,我是痛恨战争的,我是反对穷兵黩武的。但是,与大多数南斯拉夫士兵一样,我同时又把这场战争看成是最终摆脱布达佩斯和维也纳的统治的一个机会。我们的反战情绪也促使我这样看,一进入奥匈军队,在连和团的大多数军官身上,我们就感觉到了他们对塞尔维亚人有一种仇恨情绪,这使我们的反战情绪更为强烈。我也毫不掩饰自己的反战信念。

因为我向士兵们谈论反战,有一段时间我被关进了佩特罗瓦拉丁城堡。事情是这样的,有一天,我在第四十二师司令部里值勤,我这个排长得到司令部的一道命令,让我前往诺维萨德,到几个军官的家里把他们的东西拿来,因为他们没有准备好在前线呆较长的时间。我执行这项任务,抵达诺维萨德附近的马尤尔村,在那里的一家水果蔬菜店里过夜,女主人是塞尔维亚人。那里还有几名第三批应征入伍的后备兵,其中还有一名来自利卡的军士长。那位妇女请我们喝茶,我们就谈论起许多事情来了。那位妇女向我们提到,在佩特罗瓦拉丁城堡里,在上城,正在折磨塞尔维亚人,有的还被枪毙了。在谈话中,我说到我是社会主义者,我反对对塞尔维亚人的这种迫害,由于我知道我所在的团要调往波兰加利西亚,我说,我将向俄国人投降。

那位老军士长听了我这番话,立即冲着我大声叫骂,解除



了我的武装，捆住我的双手，把我关进了佩特罗瓦拉丁城堡。

我被投进佩特罗瓦拉丁城堡大门左边的一间囚室。这是名副其实的地下墓穴，没有窗户。

我一进入暗室，就开始触摸四周。

有一个躺在那里的德国人用德语向我嚷道：“到这里来，到这里来”。

我告诉他，我叫什么名字，我是个工人，他也告诉我，他是工人。他对我说，他已经关了两个星期了，没有人来提审他。

看守每天给这个德国人送一点汤和面包来，不给我送任何东西，他同我分享自己的这一份可怜的饭。

当我看到没有人来提审我，就立刻开始敲打囚室的门，要求去见城堡司令。这件事我到第四天才算办到。城堡司令是一个奥地利人，叫容格，领少校军衔。他先审问了控告我的那名老军士长，然后审问我。

“中士，军士长控告你议论反战，号召士兵暴动。”

我当然坚决否认，说这个军士长撒谎，他在这里以老大自居。我只是在师里服役的一名军士，我正有任务，让我去取已经上前线的军官们的东西。

然而，最重要的是，我们在那里过夜的那位女主人的证词对我有利。她认识那位少校，她对少校说，我没有说什么，我只是问了能不能过夜。这番话救了我。她知道这件事的利害，她说，是老军士长捏造了这件事，于是，我就与控告无关。这一控告对于我来说，可能是非常危险的。

少校最后对我说：“对不起，现在没事了，你可以去取那些东西了。”



那些东西，我一点也没能找到，我回师晚了，我表示歉意，并谈了我被关的遭遇。（几年以前，我从伏伊伏丁那的同志们那里获悉，马尤尔村的那位妇女叫科比茨尔，她的女儿现在加拿大。）

在塞尔维亚战场上，我一直呆到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奥地利军队第二次撤退为止。一九一五年一月初，我所在的部队开赴俄国战场，调往喀尔巴阡山的加利西亚。当时在喀尔巴阡山地区进行了激战。俄国人越过了喀尔巴阡山，挺进到马尔马罗什—锡格特。一九一五年的冬天降临了。我们的团参加了反击，把俄国人一直打退到斯坦尼斯拉沃夫。

喀尔巴阡之战伤亡惨重。战事十分激烈，军队的武器和装备很差。此外，在山区行军缓慢，双方经常发生战斗。严寒冻死的士兵跟子弹打死的一样多。那时，我十分痛恨这场战争。没有理由自相残杀，再说，在部队中，操练和各种各样不如意的事把士兵们搞得很累。在战争中，我惟一感兴趣的是侦察，因为侦察要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我指挥一个侦察排，经常去执行某些军事任务。

一九一五年春天，俄国在喀尔巴阡山发起了新的攻势。我们义勇军第二十五团分阶段逐步从加利西亚调往布科维纳。俄国人把许多大炮运到这一战场上来。有一天夜里，我带的排正在行进中，一枚俄国炮弹在身边爆炸了，把我抛上了天，我被严重震伤，接着被送进医院。我在医院里没有呆多久，在奥克诺与霍廷之间的战线上，离奥克诺不远处，我又归队了。

一九一五年四月初，一天早晨，俄国人突然发起进攻。在我的营所在的那一段战线上，俄国人被步枪火力所阻，但是在



我们的右翼，邻营顶不住了。俄国人在那里突破了防线，他们动用了“野蛮师”的契尔克斯骑兵。契尔克斯人包围了我们营，他们下了马，手持长矛从背后冲向我们的战壕。我们根本没有发现契尔克斯人的到来，他们可以说是直接冲进我们的战壕的。一个契尔克斯人手持两米长的长矛，朝我扑来，但是由于我手里拿着上了刺刀的步枪，我又是一名娴熟的击剑运动员，我挡开了这个契尔克斯人。正当我在抵挡这第一个契尔克斯人的进攻的时候，突然我感到背上受到重重的一击。我转过身看到，另一个契尔克斯人龇牙咧嘴的脸，鼓得大大的黑眼睛，满脸胡子。

这是在一九一五年四月四日。就这样，我成了俄国人的俘虏。我躺在斯维亚日斯克这个小城镇的医院里。

折磨我的不仅仅是伤口，还有其他疾病。我先是得了肺炎，后来又得了斑疹伤寒，当时在战俘中正流行着斑疹伤寒。一度，我在生与死之间徘徊。

我的病床上挂了一根红布条，这是医院里的标志，表明这个病人没有救了。我常常说梦话，在昏迷中责怪挂在我病床墙上圣像中的圣人偷了我的东西。我脱离病危期以后，其他伤员后来把我与圣人吵架的事告诉了我。多亏我年轻，我康复了。



## 在战俘中进行工作并同 俄国的革命者接上了头

### 我看到他们戴着五角星

从斯维亚日斯克，我被转移到苏密河上的阿拉季尔市(后来的楚瓦什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那里集中着许多塞尔维亚的志愿人员。我同七十名伙伴一起拒绝参加志愿军。当时志愿军中政治上出现了大动荡。一部分人，其中主要是这个军的领导，他们是按照塞尔维亚政府的命令行事的，把这个军看成是推行大塞尔维亚政策的工具，而不顾志愿兵中很大一部分人是来自尚在受奥匈帝国统治的地区：来自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利卡，来自达尔马提亚和克罗地亚其他地区以及来自斯洛文尼亚。另一部分人，其中包括南斯拉夫委员会<sup>①</sup>的个别代

---

<sup>①</sup> 南斯拉夫各地的一批资产阶级政治家一九一五年在伦敦建立“南斯拉夫委员会”，谋求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统一成一个国家，并向世界介绍南斯拉夫人的联合问题。——译注





表，则建议，这个军应当成为未来的南斯拉夫政治的一个机构。

我们社会主义者认为既不应去为大塞尔维亚卖命，也不应去为大克罗地亚、大斯洛文尼亚卖命，而是应该建立一个南斯拉夫各平等民族联合在一起的南斯拉夫而奋斗。在宣誓问题上发生了争论。我们拒绝向塞尔维亚国王宣誓。此外，在这个军的内部生活中也要求士兵必须绝对服从，特别是从萨洛尼卡前线来的个别塞尔维亚军官有这样的要求。他们跟奥匈军队一样虐待士兵。为此，我同七十名同伴一起拒绝在这个军里作战。从那里我们被送往位于西伯利亚省的一个小地方——阿尔达托夫的一座战俘营。

在战俘营里我没有呆多久，因为我报名到卡拉谢耶沃村的一座磨坊里去当技工。事实上，是当地农民来到战俘营，来找会开动“德维加捷利”(马达)的专家。尽管我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我还是报了名，因为我对自己的技能是有信心的。一到村里，我一看，原来是一台机器马达。在这个村里做工的还有许多战俘，他们被安排干各种各样的活计。我在卡拉谢耶沃村的这座磨坊里只干了几个月，随后在一九一六年夏末我被调到彼尔姆省叶卡捷琳堡(现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附近孔古尔的一座战俘营。

在这座战俘营里，俘虏们选举我当负责人，要我关心他们的权利、健康和饮食。我的任务是替他们保管证件，分发工资和经由红十字会寄来的包裹。这个战俘营里的俘虏跟我一样，都被利用来修建铁路。在这条铁路上干活期间，我结识了一位波兰老工程师，他是一位社会主义者。我把他的名字忘了，但



是历史学家们后来查清楚了，说他就是工程师卡茨。通过工程师卡茨，我同一些工人革命者有了接触，其中有些人是布尔什维克党的党员，这一点我在当时是不知道的。这位波兰工程师是副工段长，在他的家里我参加过这些工人的会议，会上宣读列宁的一些文章。

我履行战俘营负责人的职责，同孔古尔铁路工段长发生了冲突。冲突的主要原因是我断定这位工段长偷窃了国际红十字会寄给战俘的包裹。当时是一九一六年冬天，战俘穿得很单薄，食品也很少，死亡率很高。因此，对于战俘来说，国际红十字会定期寄来一点衣服和食品包裹来，帮了大忙。开始时，是美国红十字会代表国际红十字会办这件事，后来由瑞典红十字会接办。瑞典红十字会还向孔古尔派来了一位名叫萨尔韦的代表。我发现了这一偷盗事件之后，就报告了瑞典人萨尔韦。这件事使得人们特别愤怒。负责照料战俘的孔古尔红十字会里当时有一位伯爵夫人。我的这一告发使她感到深受侮辱。此后，偷盗事件再也没有发生。

但是，那位俄国工段长没有忘记这件事。他在寻找机会报复我，不久，他就有了这样一个机会。我负责登记战俘出工的情况。有一天早晨，三名罗马尼亚战俘没有出工，因为他们的毡靴穿坏了，留在营房里补鞋。然而，我给他们记了出工。工段长发现了这件事，他闯进营房，开始骂我，说我把这三个人的名字登记上了，好像他们出工了，事实上，他们坐在营房里。我解释说，这三个人得修补他们的毡靴，否则他们在严寒中会冻坏的。解释也无济于事。

尽管我再三解释，工段长还是嚷个不停，没过多久，来了



三名哥萨克，把我抓进了监狱。我一辈子也忘不了这座监狱。我刚跨过监狱的门槛，走进牢房，这三个哥萨克就操起鞭子，抽打我的背。

我被毒打了一顿之后，躺在牢房地上的干草上，牢房的门慢慢地打开了，看守进来了，竟是一个穿着俄式衬衫的俄国老头，他对我说：“奥地利人，奥地利人，跟我来！”

他告诉我，哥萨克已经走了，他把我带到监狱内的他的家里去，他跟三个女儿住在一起。她们唱歌得很好听，三弦琴弹得也很出色。

我在那里稍微休息了一下，恢复过来了，老人家把我送回牢房，给了我一床毯子，不然在这样的严寒天气下我会冻僵的。

我在这座监狱里呆了好几天。一天晚上，院子里突然传来不平常的吵闹声和叫喊声，我感到意外。我全神贯注地听着，想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从远处传到我耳边“打倒沙皇”的呼喊声。原来是孔古尔的武装工人得知沙皇在彼得格勒被推翻的消息后，前来监狱解救关在里面的人。原来是二月革命胜利了。

沙皇制度的垮台并没有使战俘的地位发生根本的变化。我仍然在孔古尔战俘营里继续干我原来的事。我继续通过卡茨工程师与工人们会面。列宁的《四月提纲》也传到了我们这里，我们学习了这一文件。

但是，工段长仍然没有忘记我的“罪过”。一九一七年五月，他又一次设法使我被捕，指控我同布尔什维克有联系。我被关在监狱里十四天。多亏卡茨工程师的干预，我才获释。



此后，我调到彼尔姆附近的一个小站耶尔加奇干活。尽管修铁路的活计很重，在休息的时候，我继续阅读革命书籍。我抓紧时间读书，扩大我对俄国工人运动的了解。

我在耶尔加奇铁路上干活期间，仍然同孔古尔的进步工人保持接触。但是，不久我就获悉，一些倾向于布尔什维克的工人在孔古尔被捕了，我也可能被捕。为了躲避再次被捕的危险，我决定逃跑，在这件事情上，卡茨工程师又帮了我大忙。他给我买了一身衣服，让我去找他的儿子——也是一位工程师，在彼得格勒工作。他把他儿子的地址给了我，我到达后去找他的儿子。

我乘运粮食的货车走了好几天才从西伯利亚赶到彼得格勒。卡茨的儿子就业于普梯洛夫工厂，我很快就找到了他。我向他转达了他父亲的问候，他把我留在他家里。在他的帮助下，我进入了普梯洛夫工厂。然而，我只干了几天活，就发生了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反对临时政府的著名的七月示威。几万工人涌上街头，其中也有我。工人们举着标语牌，上面写着：“打倒临时政府！全部政权归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

示威显示的力量和组织性使我兴奋，从示威中我看到了工人阶级是一股多么大的力量。但是，众所周知，反革命动用了武器来对付示威。反动派在二月一三月的革命中失败了，但是没有被消灭，反动派的势力（工业家、大地主、高级僧侣、军官、哥萨克等）很快就卷土重来。在七月示威中，反动派进入反攻。

当机关枪从一个大火车站顶上开火时，我跟示威工人一起正在这个火车站附近。一大批工人被打死。接着开始了大规模逮捕。卡茨的儿子也被捕了，我的处境也变得困难。我不敢回



他的家里，因为我担心被捕。我在涅瓦河的桥下躲藏了好几天，后来我下决心逃归祖国。我说我回家去，回南斯拉夫去搞革命。

我前往芬兰，当我走到芬兰北部乌莱奥博尔(现为奥卢)的时候，我落到警察手中。我什么都不想说，我不敢说我是奥地利战俘，因为我担心他们会把我枪毙。警察把我送回彼得格勒，我被关进彼得罗巴甫洛夫城堡。我被关在一间很小的牢房里，四周是石墙，里面有不少老鼠，涅瓦河就在附近流过。

我躺了三个星期，他们才把我带去受审，问我：“你是干什么的？”我发觉，魔鬼要想吵架。我就说，我是奥地利人，是战俘。“笨蛋，你不早说，不然我们早就把你放了。”他们原以为我是个危险的布尔什维克。

我从彼得罗巴甫洛夫城堡获释后，同其他战俘一起，在哥萨克的武装护送下，又被送到西伯利亚的战俘营。后来，他们让我往回走，回到逃离的地方。我同意了，但一路上我在想：我在那里已经尝够看守战俘的哥萨克的苦头了，那里我可不再去了。我乘坐的是“马克西姆·高尔基”列车，列车很长，开得很慢，我提前一站下了车，又步行了两三站。然后钻进开往西伯利亚的第二列列车。

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当时的叶卡捷琳堡，一位看守发现了我。当我正沿着通往车站的台阶走着，发现一名认识我的看守正朝我走来，我从他那把胡子看出他来了。他正押送我们的一名曾住院的战俘，因为那里有一座医院。当我走到他身旁时，他嚷道：“约什卡，你好呀，等一等！”他一嚷“等一等”，我就直往下奔，钻进列车。



在叶卡捷琳堡我非法地登上了开往鄂木斯克的另一列列车。那是一九一七年秋天，十一月初。在我第二次前往彼得格勒的途中，发生了社会主义革命，但我对此一无所知。在前往鄂木斯克的路上，在秋明火车站，当臂上带有标记的武装工人走进列车，寻找从彼得格勒逃跑的资产阶级时，我才感觉到俄国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这些武装的工人都是赤卫队员，都带有革命的标记。但是，我还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我抵达了鄂木斯克，从阿塔曼胡托尔车站前往城里。路上有两三个人拦住我。“站住！”我停下来。“你是什么人？”我说，我是奥地利战俘。“上哪里？”

“进城。”

“不用害怕。去吧！”我问，我该往哪里走，因为我不知道，我没有地方可去。

“你想往哪里去？”我想去有战俘的地方，有比较多的战俘的地方，去有战俘营的地方。

“现在那里是军营……小伙子们都武装起来了。去吧，不用害怕。”

我望着他们，发现他们帽子上别着五角星。我不能形容，我当时是多么兴奋……在这里，就这样在路上发生了意外的事情……前一天，当我们还在秋明的时候，革命的消息就传到了鄂木斯克，而在鄂木斯克，布尔什维克几乎已经夺取了全部政权。这项工作在那里组织得非常好。



## 十月革命取得胜利 在赤卫队里和吉尔吉斯人中间

### 我没有掩饰自己的同情

在鄂木斯克，我马上向由战俘组成的赤卫队报到。红军告诉我们，我们不必回战俘营，因为战俘现在已经自由了，可以加入赤卫队。

我参加的那支部队由波兰人、罗马尼亚人、捷克人、匈牙利人、德国人和南斯拉夫人组成。这是赤卫队的一支国际支队，可能还取了个名字，但是我想不起来了。在鄂木斯克的这支赤卫队中，我呆了几个月，完成了各种革命的军事任务。

在捷克军团暴动之前，我们的部队一直没有开赴前线，而是在鄂木斯克担任警戒任务，并在马尔扬诺夫斯克车站干活。我写了申请书，要求加入苏联国籍和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当时，都是这么做的。

不久就发生了捷克斯洛伐克军叛乱和高尔察克匪帮到来所引起的一系列事件，差不多不再有任何条件来正常地吸收入



党。

一九一八年春天，当捷克军得到列宁的允许经由远东回国，他们沿着西伯利亚大铁道行军时，西伯利亚发生了重大的事件。然而，这个捷克军的领导与反革命代表人物密谋，不是带领自己的军队离开俄国，而是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底在整个西伯利亚大铁道沿线举行叛乱。捷克军盘踞在整个西伯利亚大铁道沿线，这就使它的叛乱变得极为危险，而这场叛乱对于其他反革命也是一个信号。

捷克人的强大兵力还向鄂木斯克进攻，与他们一起的还有由哥萨克首领克拉西利尼科夫指挥的哥萨克。由乌斯宾斯基政委指挥的红军守卫着鄂木斯克市。我认识他，对他的印象很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他很固执，什么都听不进去，而对打仗几乎又一无所知。

红军抵达后，站在离车站两三百米的地方，下了列车都排成了纵队。捷克人则排成散兵线，他们是训练有素的军人。乌斯宾斯基随后前往捷克人的司令部——捷克人有整整一个团——要求捷克人放下武器。他说：“列宁发布了命令，苏维埃命令你们把武器留在这里，不准带武器回家。”

这时，哥萨克首领克拉西利尼科夫已从草原赶到。他们留在稍后的地方，这批哥萨克大概有八十到一百人。克拉西利尼科夫一到达捷克人的司令部，立即抽出手枪把乌斯宾斯基当场打死。

这时，红军士兵见白匪打死了政委乌斯宾斯基，没有散开准备战斗，由于混乱而胡乱开枪，因此白匪击溃了这个营，打死了许多人。接着，白匪派部队打我们。捷克人立即向前挺进，





哥萨克跟他们在一起。在翁格尔男爵的庄园——距离鄂木斯克大约二三十公里——我们接上了火，但是……白匪占压倒优势，他们把我们包围起来，打得我们七零八落……

这一切总共只用了三天时间。我逃往米哈伊洛夫卡村。我赶往大草原，到吉尔吉斯人那里去，但是即使在那里我也不得安宁，白匪在找我。他们到处寻找我们。那里后来也有许多人被杀害，因为白匪组织了讨伐队。但是，农民喜欢我，保护我。我在那里能派上用场，因为我懂技术，是个技工。在他们需要修理脱谷机和类似的机器时，我帮他们的忙，因此，农民把我藏起来，保护我，给我通风报信。

在距离鄂木斯克七十公里的米哈伊洛夫卡村，我受雇于一名富农，我替S·什克利亚罗夫管理蒸汽脱谷机，后来又给D·塔巴切克干活。

多亏农民的保护，到处搜寻红军战士的反革命讨伐队没能找到我。我在米哈伊洛夫卡村呆了五六个月。后来，我在多姆巴伊附近的一个吉尔吉斯村庄替有钱的吉尔吉斯人伊萨伊·贾克先巴耶夫管理磨坊。这个村庄是按照哥萨克习俗建立起来的，有帐篷，用泥抹房子。磨坊在草原深处，因此我在那里比较安全，可逃避白匪的搜捕。

伊萨伊·贾克先巴耶夫是从亚历山德罗夫卡的德国人手里买下这座磨坊的。那里有许多德国人。在西伯利亚有一个地方叫特鲁别茨科耶。过去，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把波兰伯爵特鲁别茨科伊发配到那里。德国人在那里有村庄，而且都是些富裕的村庄。是他们把磨坊卖给了贾克先巴耶夫。他在征得我意见之后才买下这座磨坊。他来到俄国人的村庄米哈伊洛夫卡



来找我，问我是否愿意到他那里去干活。我说：愿意。因为我到那里，在吉尔吉斯人中间，我会安全些。他说，他想购一座蒸汽磨坊。我表示同意后，他买下了那座磨坊，并运进了所需的机器。这是磨面粉的蒸汽磨坊。我就到那里去了。

一九一八年的那个冬天，鄂木斯克的铁路工场里发生了罢工。工人不愿修复蒸汽机车。于是哥萨克就来到那里，杀害工人。他们把一些工人带到伊尔季什河上，而伊尔季什河已经封冻。要知道，从伊尔季什河上可以过车，冰很厚，冬天可以过雪橇。

布尔什维克来到后，由于白匪破坏了桥，他们在河上铺设了铁轨，使列车从冰上通过。

白匪把一批工人带到那里，把他们枪杀了。屠杀是在黄昏时进行的。那个夜晚，有几个农民从集市回来经过那里，他们发现那里出事了，听到枪声，过去一看，见有一大批人，就是那批铁路工人，被打死了。他们发现有一个人还在动，就把他拉出来，用自己的皮大衣给他盖上，把他带走了。

由于农民不敢把这个人留在村里，就问我能否收留他。我说，我愿收留。于是，我就把他留下了。他是一名铁路工人，是一个锁匠，一个青年工人，名叫萨沙，只不过我忘了他姓什么。前不久，有同志告诉我，他叫萨沙·西佐年科。他吓傻了，后来也没有完全康复……

在事情稍稍平息以后，我让他到我那里养伤。他跟我一样，喝马奶，在我那里管生火。后来，当讨伐队来时，他也藏到我的磨坊里来。这座磨坊离居民点不远，离那个村庄有两公里远，在一片白桦林中间。这是一座很漂亮、很大的磨坊。我们



在白桦林中挖了很深的地洞，没有电，只好烧木炭。我们把烟囱装在外面，沿着白桦树，一直伸到树冠，这样烟容易散开。萨沙在那里一直等到布尔什维克到来……

我在吉尔吉斯人中间逗留期间，学会了很多他们的语言，了解了他们的生活和习惯。我发现，白匪不断的征用，特别是抢劫把他们弄得很穷，白匪强行征召青年人入伍。

我同吉尔吉斯人关系搞熟后，对他们说，把粮食藏起来，一点也不要留给高尔察克分子，因为那样就等于在帮助反革命。

在吉尔吉斯人中间，就如以往在米哈伊洛夫卡村一样，我并不掩饰自己对布尔什维克的好感，我相信革命必将获得胜利。我也跟伊萨伊交流过我的这些思想，让他不要向高尔察克提供粮食，因为布尔什维克会来的。<sup>①</sup>

## 着魔了，什么都不相信

我一边当技工，一边与工人保持联系。我需要重油，鄂木斯克火车站的工人私下出售重油。我常常以此为借口进城，在那里会晤铁路工人，因此对局势是了解的。我记得，一九一八年年底鄂木斯克的工人起来造反。这次起义被哥萨克镇压下去了。领导人被杀害了。

<sup>①</sup> 摘自回忆录集《十月革命中的南斯拉夫人》，贝尔格莱德，一九七七年版。



我见过外国武装干涉军——英国人、美国人、法国人——是如何进入鄂木斯克的。当时报纸的纸张很差，是黄色的。这些黄颜色报纸上用大字标题登着，今天是：《欢迎南意大利的子弟！》明天是：《欢迎英勇的法国》，后天又是：《欢迎崇高的阿尔比昂的子弟！》干涉军的军官挥舞着马刀在城里横冲直撞，把商店里最好的肉都买走了。我们利用这件事散发传单，宣传居民在挨饿，而外国征服者把城里的东西都吃光了。

革命和内战在人们的生活中和心理上是一件大事。看法在改变，世界观在改变。我还记得很清楚，西伯利亚的农民的情绪是怎样变化的。内战开始时，他们反对布尔什维克，甚至仇恨布尔什维克。这种情况可用下面这一点来解释：西伯利亚的农民土地很多，特别是老住户，甚至达到每人十五公顷，而高尔察克散布说，布尔什维克准备把他们的土地全部没收。因此，大多数农民跟着社会革命党人走，因为社会革命党人许愿说，将给他们以更多的土地。

但是，当高尔察克从农民那里拿走粮食，给他们毫无用处的纸币，后来又宣布动员入伍的时候，农民的情绪开始转变了。给高尔察克造成的损失之大莫过于动员入伍。

人们都讨厌打仗。农民逃跑了，藏起来了。甚至我还藏过好几个人。哥萨克到处征召青年人入伍，抢东西……就像切特尼克<sup>①</sup>在我们南斯拉夫干的一样。

---

<sup>①</sup> “切特尼克”原为“参加队伍的人”之意，最早出现于十九世纪后半叶，系非正规志愿武装人员，为摆脱土耳其奴役而斗争。后颇变成了反动组织。——译注



这惹怒了农民。对高尔察克的想法开始改变。

而在那里躲藏着不少我们这些以前的赤卫队战士，我们说服农民，叫他们相信布尔什维克不会没收土地，相反，会给穷人以更多的土地。

我在那里的一名有钱的吉尔吉斯人伊萨伊的磨坊里做活时，我对他说：

“伊萨伊，别把粮食给高尔察克。因为反正布尔什维克会来的。”

“约瑟普，他们会来吗？”

“肯定会来。”

布尔什维克后来来了，发现那里对他们很有利。许多农民自愿加入了赤卫队。

我逃到这个村庄时，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我是布尔什维克。我只说我是战俘。当时，由于高尔察克的宣传，要是我说是布尔什维克，按照农民的情绪，他们将会立即把我处死的。后来，情况就不这样了。

高尔察克犯下了滔天罪行！骇人听闻！他们在伊尔季什河上枪杀人。当时是冬天，冰冻得厚厚的。我乘坐雪橇，雪很厚，从雪层的下面露出人的脚。整个冬天都是这样，他们甚至都没有收尸。

一九一九年秋天，我当时在打谷场上干活，开始出现白匪的讨伐队。我们称它们为贵族讨伐队，因为它们基本上是由地主组成的。它们跟在高尔察克的军队后面，无恶不作。我们清楚，讨伐队一到。准是战场有变动，白匪在后撤。过不久，战



场果然挪到我们村庄里来了。

白匪逮捕了我，原因是我不像农民，很可疑，是技工，那就是工人，就是布尔什维克！他们把我关押在高尔察克一个师的司令部的一座房子里。在密探局的代理人中间有一个栗色头发的家伙。他是一个地主。他一直装作同前线通电话：

“那就是说，我军在前进？攻下了亚历山德罗夫斯卡？好极了！那就是说，明天我们将转入总反攻！”

在整个通话期间，他一直盯着我，看我有什么反应。我知道他想干什么，于是我就坐下，一无表示。对于战事，我当时已略有所知，我知道这全是骗局。现在什么都帮不上高尔察克，外国军队也罢。

前线越来越靠近。夜里，看守我的人逃跑了，而我并不知道。我坐在房间里。突然，进来三个人。

“里面有人吗？”

我说：“有人。”

“你是干什么的？”

“战俘。”

“点上灯。”

“我没有火柴。”

他们点上了灯。我一看，他们穿着赤卫队的制服。然而，我不吭声，因为我知道，白匪有时候在撤退前夕假扮赤卫队，到各家去拭探情绪。对于表示高兴的人，他们就统统枪毙。因此，我一声不吭地站着。

“你听着，你害怕什么？我们是红军！”

我说：“那好呀！”



“真的，我们是红色的布尔什维克。你没有看见制服？”

“我看到了。”

“请看我们的钱，真正的钱。你不相信？”

“干吗要我相信。”

“着魔了，什么都不相信！”他们气呼呼地走了。

到了天亮，我才知道这是真的：红军确实进了村。

后来，我就回到鄂木斯克。那里的州委书记是我去年在这里见过的一位同志，他随同电气工程师代表团来南斯拉夫访问。他叫彼得·伊凡诺维奇·沃耶沃金。这是一次很有意义的会见。

一九五六年我去苏联时，收到一九一六年我在阿尔达托夫县卡拉谢耶沃村干活时交上的一位朋友的信。他是一个很好的青年，名叫加拉伊。他如今是集体农庄主席。我老是没时间给他回信。再去看看所有那些地方，看看他们，那该多有意思……那些很久以前发生的事，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历历在目。

苏维埃国家曾经面临多么大的困难！我还记得我经由彼得格勒回国时，乘坐了三个星期的火车。在沿路各站，我下车跟农民交谈。当时在闹饥荒，经济崩溃。在西伯利亚有面包，而在这里，在俄罗斯中部却既没有面包，也没有食盐。只有经历过一九〇五年战斗考验的工人，才能克服这样的困难。因为农民常常会动摇的，而俄国的工人阶级同农民相比人数较少，但是工人还是领导农民，成了斗争的领导者。

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列宁和他的战友当时起着什么样的作用。他们增强了工人阶级对胜利的信念，在世界上任何一



个国家从未经历过的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发展、壮大了工人阶级。

列宁十分清楚地看到了所有这些困难并懂得该如何动手解决这些困难。列宁一刻也没有动摇，顽强地克服了一切障碍。当时，任何动摇都会导致失败。

布尔什维克给了人民以和平，让士兵回家，给了农民以土地。布尔什维克把大部分劳动人民群众都争取到自己一边来。真是英明的政策！<sup>①</sup>

---

<sup>①</sup> 摘自向苏联《星火》杂志记者发表的谈话(《约·布·铁托言论集》，萨格勒布，一九五九年十一月版)。





## 加入共产党和返回祖国

### 我的生活中的一段就这样结束了

我一得知鄂木斯克为红军所解放——我记得是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就下决心到那里去。

其实，我当时经常去鄂木斯克。当时，我积极参与革命工作。我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组织有联系，俄共(布)州委里有一个部负责该组织。州委设在鄂木斯克当时最大的一幢建筑物里，那就是银行大楼。南斯拉夫同志们吸收我入党，他们当时的代表是迪米特里耶·格奥尔吉耶维奇。他是奉俄共(布)南斯拉夫共产主义小组支部的命令来到鄂木斯克的，任务是在西伯利亚各城市的南斯拉夫人中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在他们中间展开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后来，我在莫斯科见过格奥尔吉耶维奇，当时我已经是南共总书记，而他刚从西班牙回来，那是在一九三九年秋天。我们重叙了鄂木斯克的友情。

我在鄂木斯克也没有停留多久，我想尽早返回祖国。当时，我们已经有条件来了解南斯拉夫的局势。那是在一九二〇年春天，从鄂木斯克出版的俄文报纸上，我了解到国内局势动荡。



以前也有过关于“绿林军”<sup>①</sup>的消息，我认为，在“绿林军”中可以感觉到十月革命的影响。农民也举行了起义。我还了解到一九一八年底和一九一九年初，义勇军的一个团在耶拉契奇广场发动兵变，然而遭到四周屋顶上的机枪的射击。参加兵变的许多士兵直接来自苏维埃俄罗斯。但是，当时没有党组织的领导，把起义进行到底，并发展到全国范围内。这一切都促使我尽早返回祖国。

有一天，战争还在进行，我打开鄂木斯克的报纸，上面有一个标题《克罗地亚农民举行起义》。

我是乘货车返回南斯拉夫的，从鄂木斯克出发，中间经过莫斯科和彼得格勒。

从彼得格勒，又经过爱沙尼亚，到达纳尔瓦，在那里，在苏俄和武装干涉者之间的边界上，在一座古老的城堡里设有所有回国战俘的隔离检疫站。我在纳尔瓦住了大约三个星期。从那里，我跟其他战俘一起，通过德国公使馆乘“莉莉·福耶曼号”轮船前往什切青港。轮船开出时，我被指定负责运输。到达什切青后，我们又被按照民族，也即按照国籍分队。我跟一批南斯拉夫人一起，经由德国和奥地利回到了祖国。在维也纳，我向南斯拉夫领事馆报到，我们被安排去马里博尔。到了马里博尔后，我们在检疫站被关了几天，在那里又把我列入

---

<sup>①</sup> “绿林军”是指一九一七——一九一八年间奥匈帝国军队中的逃兵和武装的农民，他们以森林和山区为基地，经常袭击宪兵，有时也袭击地主庄园。——译注



“可疑人物”名单，因为我来自苏维埃俄罗斯，而资产阶级已经开始防备布尔什维克的威胁，担心革命了。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初，我抵达萨格勒布，十一月三日我向萨格勒布地方指挥部报到，那里又让我立即向我故乡的区政府报到，而我自己也想尽早赶回故乡，因为对于双亲和其他亲属的情况，我已经有六年时间没有音信了。

回到家里，没有见到父母，我感到十分失望。我母亲已经去世，父亲搬家了。后来我在兹德尼奇纳附近的库宾纳茨村找到了他。他在那里当护林员。

这些事我在两三天内就办完了，十一月五日我就业于萨格勒布佩特里尼亚街三号的一家机械工场。我又继续过我的工人——无产者——无家可归者的生活。我立即参加了五金工人会萨格勒布分会，我还参加了南斯拉夫共产党。

我生活中的一段就这样结束了，但是在这一段时间里发生了多少变化，多大的变化……

接着是为议会选举(于一九二〇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举行)开展的竞选活动，我加入了自俄国返回者俱乐部，在萨格勒布无产阶级中积极进行工作，讲述伟大十月的国家的情况，与曾为十月的思想、列宁的思想而奋斗，并在这里继续为同一些思想进行斗争以在我们祖国也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许多人相会，总是令我非常亲切愉快。



## 在萨格勒布建立反派别核心

### 党丧失党员的信任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其他一些共产党一样，南斯拉夫共产党在组织和思想政治上逐步趋于成熟的过程中，面临领导的团结问题。实际上，在成立之初就进入了一场艰难的斗争，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观点与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作用的新观点是背道而驰的。在头七年中，领导层不团结。当时，党可以说是听天由命。我指的是全体党员，因为领导层的人热衷于相互较量。

对于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具体条件，党适应得非常缓慢。早在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间，就发生了思想上的最初争论，但是党还是较轻易地摆脱了工人运动中明显的机会主义流派。南共在《禁党通令》和《国家保卫法》实施后遭到沉重打击，此后党的领导层中开始出现了更为严重的争论和冲突，《禁党通令》和《国家保卫法》的实施使党不得不转入地下。

在一九二一—一九二四年间，党领导层中的斗争是围绕党的政策和策略的基本问题，围绕革命、无产阶级及其盟友的问



题，尤其是围绕民族问题、农民问题和工会问题进行的。在就这些原则性问题展开讨论的同时，党内出现了第一批小集团和派别。就思想倾向而言，有一批人主张采取革命的解决办法——他们是左翼。另一方面，右翼又持机会主义的观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批人变成了两派。

围绕这些基本问题，特别是围绕在地下条件下如何建设一个真正革命的党这样一个问题发生冲突是势所难免的。这是造成派别斗争的主要原因之一。与此同时，原因还在于围绕由谁来当党的领导、谁当书记或者政治局委员这个问题不断地展开了斗争。

左翼展开的斗争是想排除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遗产，因为它妨碍党明确地认清自己的基本任务。左翼看清了工人阶级团结的意义以及无产阶级盟友的重要性。左翼主张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建设党和在企业里建立支部，并主张加强独立工会，主张党更为直接地对工人阶级施加影响。

实际上，左翼认为基本任务在于把南共建设成为一个工人阶级的革命党，把独立工会建设成为南共的工人阶级的战斗组织，在于争取农民和被压迫民族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天然盟友以及在于加强党对广大劳动人民群众的影响。即令在实施《国家保卫法》的政权下，左翼还是找到了通过自己所建立的地下工人组织接近工人群众的途径。

你们都知道，我们于一九二三年成立了南斯拉夫独立工人党。尽管这个党的圈子很小，当局担心它发展成为群众性组织。因此，当局于一九二四年就查禁了这个党。然而，尽管存在恐怖统治，独立工人党在一九二五年的议会选举中还是取得



了比较好的成绩。例如，在某些州、像克里日夫齐州(我当时在别洛瓦尔工作)，党得到的选票甚至比克罗地亚农民党还多。左翼的领袖莫沙·皮雅杰、科斯塔·诺瓦科维奇、久罗·茨维伊奇、卡米洛·霍尔瓦廷、拉伊科·约万诺维奇等人，对关于民族问题以及与党的组织建设有关的问题做出了重大贡献。可见，当时，左翼是革命的，我们党员也接受了这种革命性。因此，左翼得到支持，在南共党员中间，首先是在我国各地的产业无产阶级中间有重要影响。

我可以这样说，我也被认为是左翼分子，而我当时并未认清这是两派，因为我当时说：我哪一派也不参加。

与左翼对立的是右翼，在无产阶级以及无产阶级的政党问题上，右翼基本上赞同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右翼轻视农民工作，在民族问题上持资产阶级观点。右翼抵制为把南共变成工人阶级的革命先锋队，把独立工会变成工人阶级斗争组织而采取的所有措施。右翼反对在企业里建立党支部，特别反对党在农民和被压迫民族中开展政治工作。在右翼中，为首的是西马·马尔科维奇博士、拉扎尔·斯特法诺维奇、米利沃耶·卡列维奇、柳巴·拉多瓦诺维奇等人。他们的活动给党的工作带来了严重后果。他们控制着独立工会的中央领导和行业工会领导机构中最重要的一些位置。正是由于持有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右翼一度没有得到广大党员的支持。我们大家都知道，右翼在民族问题和农民问题上的观点是错误的。

一九二四年一月召开了南共第三次全国代表会议。这是实施《禁党通令》后在国内举行的第一次代表会议。会议拒绝了右翼的机会主义观点，在党的建设和政策问题上采纳了左翼的



观点。后来，共产国际对此予以确认，委托左翼领导党。但是，左翼自己后来又陷入同右翼领导人的派别斗争。这样一种情况的出现，究其原因是由于共产国际坚持要选出一个折衷的领导，也即左翼和右翼都进入领导班子，而派别分子仍然留在领导班子里。因此在党的领导层中，派别斗争越来越尖锐。左翼领导人不是通过自己的工作，通过动员群众参加阶级斗争和政治活动来证明右翼的观点是错误的，而是在上层进行较量，自己陷进派别斗争。

因此，左翼不再是南斯拉夫共产党革命的一翼，为此，左翼相当一部分从前的追随者离开了左翼。左翼瓦解了，只剩下一小批纠缠于派别争论的左翼派别分子，这使得他们越来越脱离党的实际工作和党员。南共领导层的团结的危机变得日益深重。党的历次代表会议以及第三次代表大会作了种种尝试，共产国际也提供了帮助，也未能解决这场危机。直至后来，在萨格勒布举行的第八次代表会议上才算出现了解决危机的可能性。我前面已经说过，在这次代表会议上萨格勒布产业无产阶级的情绪得到了反映。

一九二四年，左翼和右翼之间的冲突尖锐化了，问题带到了独立工会和南斯拉夫独立工人党的领导机构中来了，到那时，党员才开始了解党的上层的争论。那时，在独立工会中展开了十分激烈的斗争，这给工人阶级一个沉重的打击，因为独立工会几乎四分五裂。

我在贝尔格莱德逗留期间，对于右翼的派别活动才有比较详细的了解。当时，在一次讨论工人运动当前的问题时，我同工会中央右翼的一名领导人发生了冲突。这一事件，以及我遭



责派别斗争，我哪一派也不参加，使我在贝尔格莱德工作期间难以参加任何一个党支部。派别活动猖獗到这样一种地步，致使正直的共产党人都无法进入党的组织，领导层中的派别分子因此得以保住自己的地位。当然，他们这样做最主要的是出于个人的利益，因为南共领导得到共产国际的援助，不仅是援助，而且每月得到固定的工资。支委会的委员有很高的收入，因此竞相争夺这些位置，双方都玩弄阴谋诡计。这件事情——而这样的事情很多——促使我投身于反对派别活动的斗争，当然也由于其他的认识促使我这样做。

我在大特罗伊斯特沃工作期间——你们都了解，我在那里的一座磨坊当了几乎四年的技工，当时我是别洛瓦尔—克里日夫齐州委委员——以及后来在克拉列维察和斯梅德雷沃帕兰卡工作期间，我看到，这种无原则的派别斗争引起党员不满，阻碍运动的发展。右翼得不到党员的支持，而当时左翼也丧失了这种支持，因为他们都陷入了派别斗争。的确，无产者的同情曾经在左翼一边，但不是把它当作从事派别活动的一翼，而是当作革命的一翼。左翼不再成为革命分子之后，就失去了党员信任。

当时，我在斯梅德雷沃帕兰卡工作，我在那里建立了党的组织和工会组织。我从那里被赶走后，听从几位同志的忠告，前往库马诺沃，想在那里找一家磨坊当个技工。但是，在路上我又犹豫了，我拿不定主意：干吗到那里去？那里的工资的确是比较高的，但是我还是自己跟自己斗争开了，我到底怎么办？在列车到达尼什之前的一个站时，我记不清楚是哪个站了，我还是下了车，等候开往另一方向，开往萨格勒布的另一列车。





我上了车，于一九二七年三月抵达萨格勒布，在那里，我成了党和工会的负责人。从同年四月起，我当上了地方委员会的委员，后来成了地方工人工会理事会执行委员会委员以及五金工人工会州理事会的书记。在那里，我有机会了解到党员和工会会员中的反派别斗争的思想。正是在工会运动问题上，党员能够最清楚地评价右翼的派别活动。这一切令我们心情沉重，因为我们看到，我们这样一个革命党的领导人是不团结的。

政治局里的左翼领导人试图利用这种思想来达到自己的派别目的。在他们的倡议下，召开了地方党组织积极分子会议，会议谴责右翼的行动，但是也指出了党中央左翼分子的软弱。

右翼在挑起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分裂之后，又继续采取行动，破坏独立工会的团结。他们拚命想保住对工人运动的领导权，试图把克罗地亚各工会对右翼政策和实践的正当抵制转移到一个十分敏感的领域——民族问题上，力图使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分裂。他们竭力在工会中挑起冲突，甚至分裂，当然前提是反克罗地亚的。

然而，站在反对右翼歪曲南共工会政策的斗争前列的克罗地亚省工会领导，不仅受到克罗地亚工人的援助，而且得到塞尔维亚，特别是贝尔格莱德工会联合会以及贝尔格莱德地方工人工会理事会的支持。此外，右翼试图在克罗地亚的工会中制造分裂，试图让斯洛文尼亚的工会运动退出克罗地亚的工会，加入塞尔维亚的工会。这就是他们的阴谋活动。

右翼的这一分裂活动开始于我一九二七年七月被捕前夕，在我于同年九月初从奥古林监狱获释回到萨格勒布后仍继续进行。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右翼的这一活动。党的积极分子久



罗·贾科维奇、布拉戈耶·帕罗维奇、约西普·克拉什、伊万·克尔恩德利等人同我一起研究了党和工会中的情况。我们探究了摆脱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运动所处的艰难局面的出路。我们认识到首先需要使党健全起来，争取实现党的团结。这是革命工会团结的条件。反对工会中的右翼错误是可以通过工会和工会报纸来进行，而反对党内派别活动的斗争，我们无法公开地进行，我们无法公开地说他们是有派别活动的人。可见，需要在党员中间进行坚持不懈的工作，来提高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只有通过这样的工作，才能防止萨格勒布的组织陷于派系斗争。

当时，除了贝尔格莱德、尼什、奥西耶克、苏博蒂察、诺维萨德等其他几个城市的几个较大的组织外，南共萨格勒布党组织是一支主要的力量。就组织机构和人数而言，萨格勒布党组织最强大。它团结了一大批产业工人，经受过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独立工会在萨格勒布和克罗地亚的会员最多，比社会民主党人还多。在女工中间的积极工作培养了一批有经验的共产主义战士。萨格勒布的党组织同青年组织，首先是同工业部门的青年工人保持联系。后来的南斯拉夫共青团书记米约·奥雷什基和约西普·德贝利亚克以及其他积极分子当时就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党当时得到左翼知识分子，特别是得到奥古斯特·采萨雷茨和米罗斯拉夫·克尔莱扎等人的支持。

萨格勒布组织通过一系列活动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反对派别活动的斗争十分艰巨，而且是要冒风险的。鉴于派别分子在党的上层担任职务，对于派别活动的任何反对都有可能被说成是批评和不赞成党的基本政策，有可能对提批评意见的人采用



最严厉的党纪制裁。对左翼或右翼提出批评的任何人，都有可能被当成反党分子。因此，在这个问题上，需要作充分的准备。我得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非常谨慎，因为我们有可能在投身于反对派别活动的斗争之前就被赶出党。<sup>①</sup>

---

<sup>①</sup> 摘自约·布·铁托：《两次大战之间的南共的斗争和发展》一书。这本书原系南共联盟主席约·布·铁托一九七七年三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七日向库姆罗韦茨政治学校学员作的报告（以下简称：《约·布·铁托的报告……》）。萨格勒布，一九七七年版。



## 在萨格勒布党组织内

### 广阔的工作天地

这里我想回顾一下萨格勒布党组织当时工作的主要内容。

萨格勒布组织是国内人数最多的一个党组织，这里的无产阶级加入独立工会的人也最多。在独立工会一九二八年时的二万七千名会员中，有一万多人在克罗地亚，而其中的大部分又在萨格勒布。当时，我们党的力量还小。今天，当我们谈论这一情况时，我们不应忘记，它的力量还在于独立工会。独立工会的会员是我党的同情者，独立工会是培养我党一切新党员的学校。在举行罢工、使产业工人革命化、组织他们的斗争以及开展向农村工作方面，正是这些独立工会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为什么恰恰是在萨格勒布揭开了反对两个派别的斗争？因为这里的条件最充分。我们得指出，假如我们公开地干，我们就会被赶出党，而来不及使萨格勒布组织投身于反对派别活动的坚决斗争，来不及向共产国际发出我们党需要整顿的信号。我们倘若那样干的话，我们这些党员和基层党组织就不可能清楚表明我们党的毛病在哪里，就不知道应当做些什么使我们党



成为南斯拉夫工人阶级真正强大的先锋队。

我们举行了许多各种各样的会议，但是我们没有形成派别和集团，而是在党组织内批评当时党内存在的各种现象，批评领导不积极，批评领导层中的派别斗争。

我想以我自身的例子最能说清楚当时党内的状况。我从克拉列维察来到贝尔格莱德之后，在一家工场干了几周活，我一个党组织也进不了。右翼不想接纳我，不让我参加任何一个组织，于是我就被拒之于组织之外。而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知道，不应让我了解他们的组织中的内幕。右翼当时占据领导岗位，他们不让我进入他们的组织，我的遭遇就是这样，有同样遭遇的还有许多人。当时是西马·马尔科维奇、柳巴·拉多瓦诺维奇等人担任领导。

我回到了萨格勒布，对于我来说，那里自然有广阔的工作天地。有许多理由使我个人对我所经历的那些事以及对党内的那些现象感到痛心。你们大家都很清楚，在出席党的第八次代表会议的三十一名代表中，有二十八人投票支持我的报告和我的提纲，会议通过了我的提纲。我不喜欢谈论自己，但是我谈论自己是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党员，有责任采取这样一个行动，而不论自己会有什么遭遇。共产国际接受了我们的信，作为复信送来了共产国际的公开信，我们当时如虎添翼，增添了革命之翼，我们满腔热忱地、精力充沛地开展团结工人的工作，罢工变得越来越频繁。萨格勒布的示威变成了筑起街垒战斗。还爆发了武装斗争，从这里我们看到了在萨格勒布市的工人阶级队伍中存在着多么巨大的革命力量。而这样的斗争激情也席卷了全国，包括贝尔格莱德以及全国其他城市。在这里，我得赞



扬我们的青年，他们跟我们的所有组织一样完全接受共产国际在肯定我们的信中提出的新路线。这在我们整个工人阶级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而通过独立工会的工作，首先比较充分地表现在那时开始组织的大规模的罢工上。资产阶级惊恐不安。一月六日专制政权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使无产阶级积极行动起来。当然，我们还必须考虑到另一方面情况：南斯拉夫资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危机。因为，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在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乃至斯洛文尼亚的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十分激烈的斗争，人们甚至开始谈论分解南斯拉夫。这是帕希奇的路线，后来也是其他一些人的路线。资产阶级想划分掠夺范围，对于我国人民来说，这将是一场最大的灾难。

在这一场政党危机中，我们党还没有成熟到能够充分利用这种局面的程度。在此之前，我们党在农村的工作特别滞后。如果我们今天回顾一下，在哪些地方当时有党的组织，在一九二四年<sup>①</sup>的选举中在哪些地方我们得到了选票，我们就会看到，我们的党组织和我们得到的选票是很少的，或者几乎没有。唯有在克里日夫齐州和别洛瓦尔州我们得票最多，因为党在这两个州做了一些工作。总的来说，各地的工作都很差。这意味着，对于当时的中央委员会领导人来说，农民问题具有次要的地位，而让我们的农民、农村贫民，特别是农业工人——当时南斯拉夫已经大约有三十万农业工人——听任各种政党，首先是

---

<sup>①</sup> 这里列举的年份有误，文内所指的是一九二五年二月召开的议会选举。  
——原注



拉迪奇的克罗地亚农民党摆布。该党通过自己的欺骗宣传，使农民越来越愚昧、消极。当时我们的领导的基本错误就在于此，从而他们留下了自己的烙印。<sup>①</sup>

---

<sup>①</sup> 摘自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日在萨格勒布举行的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二十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铁托：《为实现和平和国际合作而斗争》，贝尔格莱德，一九七二年版，第二十一卷)。



## 萨格勒布共产党人 第八次地方代表会议

### 并非万事顺利

萨格勒布共产党人第八次地方代表会议是在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晚至二十六日凌晨在萨格勒布郊区潘托夫查克秘密地召开的。出席这次代表会议的有四十多名代表和来宾，其中包括左翼的头面人物拉伊科·约万诺维奇·“伊利奇”(当时担任南共书记，因为久罗·茨维伊奇·“克雷希奇”到莫斯科去出席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议)和西马·斯特法诺维奇·“马尔盖蒂奇”(南斯拉夫共青团中央常委)以及右派的领袖西马·马尔科维奇·“塞米奇”博士。这些派别分子的出席清楚地表明，他们很重视这次代表会议、会议的决议以及对出席莫斯科会议的代表选举。出席这次代表会议的还有米尔科维奇，他是乌克兰人，是共产国际派到南斯拉夫来作为指导员的。

我们反派别斗争的决定性阶段正是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展开的。因此，通常的议程上的各项内容，甚至会议程序，都成了





采取不同的态度和立场的借口。在代表资格审查时就发生了冲突，以我们的胜利而告终。代表会议通过了我的建议——只承认选出的代表有表决权，从而打破了左翼想借助于负责人、自己的追随者的票来得到必要的多数的计划。

然而，围绕地方委员会工作报告进行了决定性的较量。多数派的报告列举了地方组织的弱点，但是没有对党的领导在解决这些弱点方面的工作作出批判性的分析。党组织的成绩归功于左翼领导，而失败则归咎于南共省委书记处。右的危险被放在首位，被认为是危及党的最大和基本的危险，并且要求最坚决地粉碎右的危险。同时，又掩饰这一多数派对于党内的困难状况所应负的部分责任，掩饰他们为发展自己的派别，把萨格勒布组织拖进派别斗争所作的尝试。

与杜尚·格尔科维奇报告中的这样一些立场截然相反，我在自己的报告中从工人阶级的日常斗争问题出发，分析了地方组织中的状况，我谈到地方委员会做了些什么，在业已提出的任务中哪些尚未完成，这给基层组织的实际工作造成了不利影响。我特别谈到党必须参与解决能使它成为国内的一个政治因素的那些问题。而要这么做，一个基本前提是消灭派别活动、宗派主义和小集团主义。我强调指出，首先应当在产业无产阶级队伍中通过实际工作和提高党员的思想水平来做到这一点。

对派别活动的批判为其他代表所接受，在长达四小时的讨论中，派别活动遭到更尖锐的谴责。代表们用具体的事例指出地方委员会没起到作用，强调指出，由于派别争吵，工人被置于一边，仅仅是被当作派别斗争的需要，充当表决大军而已。

由于在讨论过程中格尔科维奇指责地方委员会中的少数



派，也即责备我和赫布兰，说什么我们进行有利于工会官僚和机会主义的派别斗争，而这意味着对右翼有利，我再次要求发言。我谈到地方委员会无所作为和所犯的错误。我着重指出，我之所以提出专门的报告和工作计划，只是为了使萨格勒布组织摆脱各派的影响。

出席第八次代表会议的代表们谴责过去的做法和把党员拖进派别斗争的企图，拒绝了地方委员会“左翼”多数派的报告。代表会议几乎一致地通过(二十七票赞成、三票反对、一票弃权)我的报告为代表会议的正式报告，当然是在进行了激烈的和非常艰巨的讨论之后才通过的。

“左”派和右派领袖们的演说才能都未能动摇出席代表会议的代表们通过决议的决心，虽然他们比我们擅长演说。这些决议首先谴责右派和“左”派的有害活动，要求共产国际进行干预，以消灭派别活动和解除从事派别活动的领导。一句话，当时朝着党的团结和健康化迈出了勇敢的头几步。

代表会议选出了新领导，选上新领导的基本上是同生产和工会有直接联系的工人。他们是：德拉古廷·萨伊利、布拉戈耶·帕罗维奇、约西普·克拉什、科莱沙等人。这些活动分子以往的工作保证了他们将致力于推行党的新方针和为反对派别活动而斗争。正如你们所知道的，我当时被选为地方委员会的政治书记。

除了我的报告外，还通过了关于在莫斯科召开会议的决议，这次会议早在代表会议之前进行了准备。在莫斯科会议上需要谈谈南斯拉夫党及其健康化，谈谈如何整顿南斯拉夫党。代表会议还通过了关于非常任务的决议和我以委员会少数派的



名义提出的三个月工作计划。

在通过给出席共产国际会议的萨格勒布组织的代表的《指示》以及选举代表时，也商讨了派别斗争问题。就其内容而言，这个文件有深远的意义，超过了萨格勒布组织的范围。

《指示》的出发点是，应当让共产国际更加详细地了解党内的状况，以便共产国际能够采取措施来克服我们党所陷入的危机。《指示》叙述了南共党内自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八年的发展情况，分析了西马·马尔科维奇为首的右派、“左派”以及所谓的中派的立场，并对他们的活动作了评价。《指示》指出了右翼派别活动的表现，认为他们的错误具有机会主义的性质，右派及其活动是危害党的团结的主要危险。《指示》特别指出，右翼在自己的工作中力图摆脱党的领导，凌驾于党之上，只要他们认为有必要就竭力贬低党、无视党，尽管他们是它的成员。

左翼的缺点和错误也受到尖锐的批评。据我们看法，共产国际当时也是这样认为的，左翼维护了党的正确路线，并在各次中央全会上坚持了这条路线，但是他们在实际工作中犯了错误。尽管自四月全会以来，左翼在政治局中有决定性的影响，却没有什么作为，既没有使政治局的工作，也没有使党的工作活跃起来。我们指出，左翼低估了群众工作，没有能力来领导党。左翼不是到群众中去，到党员中去开展贯彻正确的政治路线斗争，而是把斗争局限于上层，也即局限于同右翼领袖们进行。

至于说中派(若尔加、萨拉伊等人)，我们指出，他们很不坚定，对于整顿党内关系没有表现出任何主动精神，而共产国



际和我们都认为，他们本来应当在南共中央政治局中在左翼和右翼这两派之间起到折衷作用。他们在领导机构中表现得不像共产党人，既不想责怪右翼，也不愿开罪左翼。

《指示》特别指出，把派别斗争从党的上层引到基层所造成的后果，这样做的结果是党员和工会会员意志消沉，忽视地下工作，而在党的活动处于非法的时候，地下工作具有特殊的意义。

为了使共产党能够克服党内的危机，胜任今后的工作，需要从组织上巩固党并使党积极起来，在工会中培养和动员党的积极分子，提高党员的思想政治水平和发挥党员的政治积极性。我们强调，应当通过在群众中展开工作、吸收产业工人入党等途径来克服派别活动和宗派主义。鉴于不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无法整顿党内的状况，我们要求组成不搞派别活动的党的中央领导机构。

萨格勒布第八次代表会议意味着整个党开始进行整顿。从当时的斗争条件出发，萨格勒布的共产党员要求南共成为一个干部党，处于高度的秘密状态下，由工人充当领导人并且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我们认为，在面临对国内的所有民主力量，特别是对共产党人的迫害加剧的情况下，除此而外，南斯拉夫共产党就无法进行整个运动，就无法成功地同劳动群众保持联系，完成党给自己提出的任务。这实际上是为建立列宁式的党的斗争的开始，这样一个党的任务将与当时的具体条件 and 政治形势相适应。

当然，在代表会议开过后，也并非万事顺利。你们都知道，后来出现了一月六日专制政权，共产党人惨遭杀害，许多人被



送去服苦役，等等。尽管派别活动分子在萨格勒布的共产党人中遭到了彻底失败，有些人仍然继续从事破坏活动。

在萨格勒布第八次代表会议上，我们给共产国际写了一封信，要求帮助我们，使我们党脱离派别活动。会上确定了派出一个代表团，其成员既有右翼，又有左翼，还有我们这些反对派别的人，这个代表团在边界被逮捕了并被关进了监狱。我曾到马里博尔监狱探视他们。

莫斯科会议于一九二八年上半年举行，我们的代表团未能出席。如果代表团携带我们的信到达了莫斯科，结果或许就会是另一副样子，当时，独立工会代表团正在莫斯科参加工会国际代表大会，代表团应邀出席了共产国际召开的会议。但是，他们不大了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不过，他们还是了解一些情况，因此他们能够说，南斯拉夫共产党在工人阶级中的工作很弱，威信不高，影响不大，似乎是不存在似的。后来，我们寄去的材料送到了。根据我们的材料，共产国际向南共党员发出呼吁书，对所谓健康的核心的工作表示赞同。这是指我们当时的情况。后来，对于他们来说，我们从来就不是什么健康的核心了。于是，我们才能开始工作。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好景不常。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共产国际的著名代表赫尔曼·雷梅莱、瓦西尔·科拉罗夫、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博胡米尔·什麦拉尔等人，有农民国际和共青国际代表，有在莫斯科的南共中央书记和南共积极分子，还包括我前面提到的正在莫斯科出席工会国际的独立工会的代表们。对造成南斯拉夫共产党内部危机的原因进行了五天讨论，在这一过程中，大部分代表要求制



止派别活动，把派别活动的代表人物清除出领导，把领导的责任委托给真正在为党的利益奋斗的那些干部。会上通过了共产国际执委会致南斯拉夫共产党员，首先是工人的一封公开信，信中他们起来反对来自左的和右的派别活动和小集团主义。共产国际举出了派别活动主要代表人物的错误，指出两派的头面人物负有同样的责任。

得到公开信赞颂的惟一的组织是萨格勒布的党组织。共产国际认为，萨格勒布的党组织表明，南共拥有健康的党员，他们懂得，“用工人的坚强有力的手来整顿党”。公开信说，惟有党认识到派别领导人的方针是错误的，才能用自己的力量来加以纠正，才能更新党的领导，把那些妨碍党进一步发展和壮大的人排除在外。这封信的最后写上了我们萨格勒布反派别阵线提出的口号：更加深入地到群众中去，为工人阶级和独立工会的团结，为工人、农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联盟而奋斗。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成立了临时领导机构——南共中央执行局，派别活动的代表人物被排除在外，而执行局中的主要人物是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菲利普·菲利波维奇。中央执行局的任务是贯彻执行公开信和准备党的代表大会。另外，几位在莫斯科受教育的党的积极分子以指导员的身份被派回国内，以帮助贯彻执行公开信，其中有久经考验的革命家久罗·贾科维奇。他越来越成为党的新领导的中心人物，尽管菲利普·菲利波维奇是政治书记。我认为菲利普·菲利波维奇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共产党员，但是就其天赋而言，不是在当时不正常的情况下能够领导党，能够同派别活动展开斗争的那种人，因此，在他的领导下，领导机构里的派别斗争继续发展。



国内的南共党员,绝大多数(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黑山、马其顿、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都接受共产国际的公开信,但是贯彻执行这封公开信并不是一场简单的斗争。久罗·贾科维奇还在共产国际会议上就指出,且不管公开信如何,党内的危机不会很快结束,我们决不能天真地以为国内的情况不经斗争就能解决。贾科维奇说:“不应当忘记,我们南斯拉夫人有一个坏毛病,那就是所有的决议和建议我们都是--一致通过的,但是做起来就难了。”久罗·贾科维奇这番话讲得很好,在会上受到欢迎。

左派和右派的领袖们各自从自己的立场出发,仅仅表面上接受共产国际对南共内部争论的干涉。由于共产国际对两派同样加以谴责,并把两派的领袖排除在领导机构之外,最后,两派都起来反对公开信。

在召开萨格勒布第八次代表会议时,我们只有一百三十四名党员(而这个萨格勒布组织却创造了奇迹)和九十名同情者,分布在五个区的二十二个支部和十八个同情者小组里。萨格勒布当时有三万多享受社会福利的工人和私人雇员。最大的企业是铁路企业,它的厂有一千七百多名工人,而机车库约有八百名工人。市内总共有四千名五金工人。我们的地方委员会向支部和党员提出的主要任务是,经常同工人保持联系,了解他们的日常问题。当时我在地方委员会中说过,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听够了空话,我们不能光说而不做,共产党员必须到有工人的地方去,跟工人一起投入行动并领导他们。

代表会议之后,虽然警方发布禁令并进行刁难,我们还是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绩。我们采取了一系列规模很大的行动。



我们当时在萨格勒布已能组织上万人上街抗议和示威。富有战斗精神的萨格勒布无产阶级在共产党员的领导下五月一日走上街头，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庆祝劳动节。数以千计的工人响应我们地方委员会的号召，走上街头，来到耶拉契奇广场、萨瓦河大街、伊利察、兹林涅瓦茨、大剧院、萨格勒布市议会等地方。这是《禁党通令》颁布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示威。在同警察的冲突中，我被捕了，被判处监禁两周。

过了不久，六月下旬，萨格勒布又发生了激烈的示威。这件事发生在斯捷潘·拉迪奇和克罗地亚农民党的另外几名议员被打死之后。参加这些示威的约有三万名工人、学生和市民。参加示威的人要求推翻反动的君主专制政权，建立共和国。我们地方委员会散发了传单，号召萨格勒布劳动人民在这危急的时刻尽可能紧密地团结在无产阶级周围，来反对以王室集团为首的资本家政府。当时发生了武装冲突。

这场斗争使我们自己得到了锻炼。看看我们是否能胜任采取更大的行动。事实证明，我们是胜任的。有五名工人牺牲了，五十来名工人受伤，一百多人被捕。宪兵和警察全都上了街。无轨电车被推倒。在伊利察，“科尔佐”咖啡馆的座椅全被扔了出来，堵死了街道。还建起了街垒。我夜间回家时，还不知道筑起了街垒。我在兹维耶兹达叫了一辆出租汽车，我告诉司机，把我送到维诺格勒大街。当时已是午夜过后两点钟光景。在“科尔佐”咖啡馆附近，我们遇到一批警察，我在想，他们中间会不会有人认出我来？幸运的是，没有人认识我。他们问司机到哪里去，他说：这位先生急着去火车站。我不知道他怎么会这么说，因为我告诉过他，把我送到维诺格勒大街。一名





警察走过来，朝我看了看，而我的口袋里带着手枪和炸弹。他望了一眼，阴沉着脸，说：走吧！我们就这样通过了。

这些事件表明，党是纪律严明的，是团结的。党有能力采取行动，领导罢工。后来，当局查禁独立工会的时候，萨格勒布无产阶级的回答是举行更加激烈的示威和总罢工。我当时写了一张传单，号召工人起来罢工，指出这是对统治者再次侵犯工人阶级基本权利的回击，无产阶级再也不是受压迫和奴役的对象。

我记得，当大批警察和军队走上街头镇压示威的时候，我又受到被捕的威胁，自那时以后，我就完全转入地下。警察曾多次来到我们的工会所在地，想逮捕我，可是，我总是设法逃跑。不过，我仍然在五金工人工会里履行自己所担任的书记职责。<sup>①</sup>

---

<sup>①</sup> 摘自在库姆罗韦茨政治学校的报告。



## 逮捕和审判(“炸弹案”)

### 在狱中受到折磨

我们准备庆祝“五一”节，但是游行没有被当局批准。群众仍然聚集起来了，于是我们一起出发，去参加社会民主党的群众大会。在那里，我被捕了。拉迪奇[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日]在议会被打死后，我们也组织了示威，后来变成了武装冲突。夜间，我在米罗戈伊和同志们开会。会上，地方委员会起草了致工人阶级呼吁书。从政治上来说，这份呼吁书的提法得当，当夜就发出去了。

散会后，我就回家。<sup>①</sup>我叫了一辆车送我，我告诉司机，送我到维诺格勒大街，但是没有告诉他门牌号码。我们就走了。汽车经过伊利察。

在“科尔佐”咖啡馆附近筑起了街垒，咖啡馆里的桌子椅子都搬出来了，把马路隔开了。但是，街垒中间有一个通道，

---

<sup>①</sup> 一九二八年八月四日。——原注



口子上有特务、暗探和警察。后退已不可能，我自己身带武器。

特务们嚷道：“到哪里去？什么人？”

司机说：“我送这位先生到旧火车站。”

一名特务走到汽车跟前仔细地瞧了瞧我。我平静地坐在后面。我衣服穿得很讲究。

“走吧……”

司机似乎是预感到什么，于是说送我到火车站。他把我送到我说的地方：维诺格勒大街街口，然后，我步行走向我所住的四十六号。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于是我走进院子。这时，有两个人从背后扑上来。他们抓住我的手，搜出了手枪。他们粗暴地把我捆绑起来并把我带走……

在警察局里，他们死死地盯着我，说：

“终于把你抓到了。你避开我们很久了。你带武器干什么？”

“自卫。”

“防谁？”

“防你们。就差一点儿时间，不然我把你们统统打死。”后来，我一口否认说过这番话。在法庭上我说：“警察撒谎。”

当时，无论谁被捕，都否认自己是共产党人。我不想那样做。我想：为什么要否认这样一种强大的思想呢？为了它，你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却又否认拥护这一思想。我和久罗·贾科维奇商量好，我在法庭上要说，我是共产党人，要让党的活动和我们为之奋斗的思想得到承认。”<sup>①</sup>

<sup>①</sup> 摘自《铁托回忆录》，一九八一年五月四日《解放报》。



……在警察局里我得知，星期六下午就对我所住的那幢房子进行了搜查，女房东和她的丈夫都被捕了。在这幢房子里，警察搜到了：二十六本《卡尔·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央委员会公报、九本《列宁主义》、四枚手榴弹、一支手枪和若干军用步枪子弹。因为这些，他们要追究我的责任。

在监狱里，他们折磨我：不让我找医生看病。从星期六(八月四日)起，我就进行绝食，我身体弱多了。

我听说，他们还逮捕了我的妻子。

其他被捕的人也受到虐待，不让外面给任何人送食品来。

他们想要我说出，除我之外，党的领导还有谁。

他们搜了我的身，搜出了几页笔记。他们威吓我，说要把我处死，还说要把我送进贝尔格莱德的“格拉夫尼亚查”监狱。

“你抗议……”

“我情愿死去，也不会[在警察面前承认假的控告和出卖自己的同志]……”

不久，我就晕倒了，因为我太弱了……<sup>①</sup>

## 为了自己的思想我愿牺牲生命

八月四日晚上，我与一位穿戴漂亮的陌生青年在佩亚切维奇广场或者是约西波瓦茨碰头，我在伊利察四十九号一层的工

<sup>①</sup> 摘自一九二八年八月十二日写自警察监狱的信(见《选集》第二卷)。



会见过他，他叫我去维诺格勒大街四十六号。<sup>①</sup>我要他找一个过夜的地方，他叫我去维诺格勒大街四十六号，由于那里可以过夜，我就去了。时间大约是在半夜十二点。房子在院子里，从东边和后面出入，我来到他叫我去的那幢房子跟前，就被警察逮捕了。

那个人大约二十三、四岁，中等身材，我记不清他的头发是什么颜色。他刮过脸，穿一身深色服装。

我被捕时，从我身上搜出了一支自动手枪，装满了子弹，还有一九二八年八月四日记录上列举的那些笔记和东西。在查封的收据上有我的笔迹。

在五张收据上有布罗兹的签名，我以五金工人工会书记处的名义向玛丽娅·西美昂、乌尔沙·菲利宾、格奥尔吉耶维奇支付了数目标明的救济费，日期也写明了。这几张收据上都有我的签名。

还找到了两张用铅笔写的证明，一张上是八十四加十六第纳尔，总共一百第纳尔，由帕尼奇签名。第二张由格奥尔吉耶维奇签名，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因为我记不得了。我不可能知道帕尼奇和格奥尔吉耶维奇是谁，因为作为书记，来找我的人很多。

我曾欠佩罗·库尔蒂奇钱，我把钱寄还给他了，因而有汇款收据。希蒙·胡贝特的地址：科普里夫尼察，卡尼什街。他是那里的工人代表。

<sup>①</sup> 这一小节摘自约瑟普·布罗兹对审讯机构的供词。——原注



今年八月四日记录中列举的在我身上搜出的笔记本记有各种数字和字母，那是我自己对国内外政治形势所作的记录。

自动手枪是我必要时作自卫用的，因为我作为工会干部经常出差。我没有持枪证，我申请的话，也不会得到。

我得强调指出，从本月一日起我就不当工会书记了，原因是警察在搜捕我。

我的工资是两千第纳尔。

关于维诺格勒大街四十六号那所房子，我所知道的情况已经说了，我想躲开不去佩塔尔大街的家里，因为我知道警察在找我。

我不清楚在我之前谁到过那所房子，也就是说，我在那里没有住过，我只是想在那里躲一两个晚上。

我不认识维诺格勒大街四十六号的那所房子的主人，我也不知道，面目可疑的人、共产党人会去那里，会在那里聚集一批活动分子，从事非法印刷活动。我不知道是谁把炸药、炸弹运到那所房子，也不清楚那里找到的步枪和手枪的子弹以及手枪的主人是谁，不知道我夜里走进那所房子被捕后，翌日清晨在那里发现了一些什么东西。

约瑟普·布罗兹看明白了起诉书，他说：

尽管我承认公诉人对我的指控，我不认为有罪，因为我以为这个法庭无权审理，只有党的法庭才有权。我承认，我是非法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党员，承认我散布共产主义思想和宣传共产主义，并一再指出资产阶级对待无产阶级是多么不公正，这一切我都是在各种会议和同人的谈话中这么做的。我说不清所有这些会议都是在哪里举行的。一九二一年，共产党被解



散，从合法变为非法，自那时以后，我就一直这么做。

主审人：你是否知道《国家保卫法》？是否知道《国家保卫法》禁止从事任何共产主义宣传？

约瑟普·布罗兹：我没有看过《国家保卫法》，不过，我明白，我的行为是触犯这一法律的。我认为，自然规律强于一个阶级为了压迫另一阶级而制订的法律。为了自己的理想，我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

主审人：关于炸弹和找到的那些书籍，你知道些什么？

约瑟普·布罗兹：我是在十个月以前通过库尔蒂奇介绍，认识安德里亚·博日奇科维奇的。我欠库尔蒂奇两千第纳尔，他要我把这笔钱交给博日奇科维奇，由博日奇科维奇把钱寄到达尔马提亚，寄给他 [库尔蒂奇]，他被流放到那里。一九二八年六月，我向博日奇科维奇租了一间房间，一半是我自己住，另一半供受警察迫害，来到萨格勒布的我的同志们住。六、七两月，我付给他三百第纳尔。我在这间房间里住过三四回。我把各种人送到他那里过夜，但是，这些人的名字我不想说。在那里找到的共产主义书籍，我知道是我的同志们带到那里去的，这些同志的名字我不想说，然而我并不知道这些书籍正好带到博日奇科维奇家里，我还以为，这些书籍带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警察在那里进行了搜查，发现了这些书籍，我才知道，这些书籍带到了博日奇科维奇家里。我不相信在同一间房间里还找到了炸弹，我没有带去过炸弹，我不知道，这些炸弹或许是故意放进去的。我和我的同志们在博日奇科维奇家里没有干过什么事，博日奇科维奇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在被捕前几天，我让弗拉尼亚·诺沃塞利奇去博日奇科维奇那里，这是真



的。我是偶然遇到诺沃塞利奇的，他告诉我，他从德国回来了，我就让他到博日奇科维奇那里。我承认，我的同志们通过可靠的途径、可靠的人送去了共产主义书籍，而由我负责转送这批材料。

主审人：你的笔记本上的一些记录是什么意思，例如 R I .25B？

约瑟普·布罗兹：这是运送共产主义书籍的代号。我承认，找到的书籍只是我和我的同志们为进行共产主义宣传而散发的书籍中的一部分，这些书籍的包装和警察发现的那些书籍的包装是一样的。

公诉人：26L，80L 是什么意思？

约瑟普·布罗兹：这是《列宁主义基础》一书的代号。这本书发往各地，但是是从哪里送来的，我不清楚。

公诉人：R I、R II、B 是什么意思？

约瑟普·布罗兹：我不能说。

公诉人：关于南斯拉夫共青团中央执行局决议，你知道什么情况吗？

约瑟普·布罗兹：关于南斯拉夫共青团，我一无所知，尽管南斯拉夫共青团是与党有联系的。我知道，南斯拉夫共青团也得到南共中央的《公报》。

公诉人：从你身上搜出的收据是什么收据？

约瑟普·布罗兹：我当过五金工人工会的书记，从我身上搜到的收据跟工会有关，要么是我收会费的收据，要么是工会给被关进监狱的人的家庭的救济金收据。

主审人：你是如何被抓到的？





约瑟普·布罗兹：我被捕的那个晚上，有人告诉我，让我去维诺格勒大街四十六号。我现在认为他是警察的密探。我去了那里，就被捕了。说警察在我身上搜出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这是假的，是警察强加给我的。

公诉人：你的笔记中写有“党的领导对事件和SDU的政治态度的立场”、“改组支部和区”等字样，这是什么意思？

约瑟普·布罗兹：这是关于我要在南共代表会议上发表的讲话的笔记。

主审人：你上过什么学校？

约瑟普·布罗兹：我上过四年小学和两年平民中学，后来我去学手艺。学完手艺，我就到国外，后来参加了战争，被俄国俘获，成为俘虏。我于一九一九年回国，在别洛瓦尔当了四年机械工人。后来到克拉列维察造船厂，到贝尔格莱德和萨格勒布干活，但是由于参加工人运动，往往被解雇。我是共产党人，因此我宣传共产主义思想。我宣传：如果资产阶级继续掠夺人民，那就要用武力来夺取政权。只有用武力来打碎武力。我认为，炸弹是警察有意放的。

主审人：南共同莫斯科是否有书信联系？

约瑟普·布罗兹：有。我们同莫斯科有书信联系，因为我们是他们的组织。

主审人：你是否知道今年六月二十日以后散发的传单？这些传单号召人民举行暴动。

约瑟普·布罗兹：我知道这些传单，但是谁起草了这些传单，我不想说。我没有起草这些传单。

公诉人：你曾遭到殴打吗？



约瑟普·布罗兹：我早已对预审法官说过，暗探安祖洛维奇把我捆得很紧，我的双手都发紫了。

公诉人：你为什么带着手枪？

约瑟普·布罗兹：我带着上了子弹的手枪是为了自卫，我没有持枪证。在警察局里，里马伊用拳打我的头，又用椅子打我的胸部，把我打伤了，我要求医生来治疗，他们不同意。

主审人：你是否对博日奇科维奇说过，你将自首？

约瑟普·布罗兹：是的。

辩护人：警察是否也追捕拥护资产阶级政党的那些工会成员？

约瑟普·布罗兹：是的，警察也追捕他们。

辩护人：警察是否也追捕仅仅有共产主义嫌疑的工人？

约瑟普·布罗兹：是的。

辩护人：你是否也让受警察追捕而又不是共产党人的工人去博日奇科维奇的住所？

约瑟普·布罗兹：是的。

辩护人：博日奇科维奇那里有没有胶版印刷机和打字机？

约瑟普·布罗兹：没有。

辩护人：对你的搜查是怎样进行的？

约瑟普·布罗兹：是在没有证人的情况下进行的，也没有提醒我可以反对搜查。

主审人：博日奇科维奇和埃娃·科普里夫尼亚克是否知道搜出来的材料？

约瑟普·布罗兹：他们不知道。

主审人决定在警察和预审法官的面前宣读约瑟普·布罗兹



的口供。<sup>①</sup>

---

<sup>①</sup> 摘自法院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六日对约瑟普·布罗兹及其同志们的主审会的记录(《选集》，第二卷)。



## 按照《国家保卫法》受惩办

### 这个社会对我是不公正的

我放弃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十七日提出的关于判决无效的申诉，只要求撤销原判决，我仍坚持当时提出的，现在仍坚持的上诉。鉴于这一上诉是针对已经作出的判刑，我谨宣布，我仍将开始服刑。

刑法第六十一条具体地规定了减刑及其最大限度。这一条并没有像克罗地亚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九十二条要求的那样对特殊减刑情节作这样的减刑规定条件，而只是说“找到可从轻发落的情节”。可见，这样的情节的多少与量刑是不相干的，特别是没有必要使从轻发落的情节压倒从严处置的情节。

作出判决的法庭没有尊重这两个法律之间的这一差别，因为如果尊重这一差别的话，就会从轻量刑判处两年，而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判处五年徒刑。法庭只尊重一个从轻发落的情节，那就是部分承认。然而，我是全部承认的，对于像我这样一个真诚地、公开地出庭的人，是没有理由再指责他只承认一部分，又隐瞒一部分的。我绝对地全部都承认了。此外，法庭



还忘记了尊重另一个从轻发落的情节，即没有前科。诚然我曾  
被奥古林法庭判处，但是在作出现在的判决时，奥古林的判决  
尚未生效，因此我没有犯前科。我是在十二月份，在奥古林法  
庭判决暂停生效，也就是在现在的判决之后才得知王室高级法  
院七人合议庭基本上批准奥古林的判决，从七个月减为五个月  
的。因此，在宣布现在的判决时，我没有前科。

我认为，我给法庭的印象是，我不是堕落胡闹的人，至少  
没有任何根据可以证明我是那样一种人(对立的政治和社会信  
念并不使人堕落胡闹)。根据第五十九条第四款，这也是从轻发  
落的情节，法庭未予考虑。

具体来说，本案涉及反国家、反社会罪。我认为，这个社  
会对我和工人阶级是不公正的。我所犯的案是由于我有强烈  
的人性感，由于我对这个社会的侮辱和行动感到愤慨，我认为，  
这个社会是建立在不公正的基础上的。这是第五十九条第五款  
规定的应予从轻惩处的情节，作出判决的法庭又未予考虑。

倘若像法庭证明的那样，维诺格勒大街的那间房间长期来  
一直受警察监视，至少在这一段时间内，房间内的共产主义书  
籍未予使用，也就是说，我没有用这些书来进行我本来可以进  
行的宣传，那么根据刑法第五十九条第五和第六款，这又是从  
轻发落的情节。如果法庭认为有证据证明是我放了炸弹，而我  
又未能使用这些炸弹，那么，又出现上述从轻发落的情节，法  
庭从未给予考虑。

所有这些从轻发落的情节使法庭能够更加充分地使用刑法  
第六十一条的权利。

我是按照《公共安全和国家秩序保卫法》受惩处的。众所



周知，这是一项特殊法律，并正是作为这样一项法律才得到承认的：它是在特定条件下通过的，众所周知的公开意图是仅仅在一个短时期内有效。所以我要为法律规定的某些徒刑特别严厉这一点辩护。但是，这项法律已经实行第八个年头了（前不久才予废除，被新的《公共安全和国家秩序保卫法》取代），可见，它既不是特定的，也不是短时间的。于是，这就产生了这项法律如此严厉和在实践中严格实施是否有理的问题。如果没有这项法律，我的案子根本不可能受惩处。仅仅是根据这样一种特定的法律，我的案子才获得了予以惩处的性质。根据这样的法律判我五年徒刑是过严了，因此也是不公正的。世界上和我国的情况有可能变化，以至于不再需要这样的特殊法律。也就是说，在三四年内这项特殊法律很可能在我国不再生效。而我届时还在监狱里，法律已被废除。被公认为多余和不合现代精神的这样一项法律，那会是一副什么样的情景呢？因此，即使根据惩处的预防性目的，像现在这样惩处我也是不合适的。

我谨请崇高的王国巴昂<sup>①</sup>高级法庭考虑以下因素：我有十分充分的理由提出关于判决无效的申诉。我放弃这样做仅仅是因为从宣布判决到送达判决我需等了两个半月，如果我再等这样长或更长的时间来等待七人合议庭作出裁决和进行新的讨论，我就得在预审监狱里白白浪费那么多时间。我既然已在监狱里，我希望把我在押时间算作徒刑。仅仅出于这个原因，我

---

<sup>①</sup> 旧南斯拉夫的地方行政单位为“巴昂辖区”，相当于省，其长官称为“巴昂”，相当于省长或总督。——译注



没有提出原来说过要提出的关于判决无效的申诉,假使我坚持申诉的话,我想,我是会成功的。理由是:诉讼和判决的根据是在维诺格勒大街的房间里发现了宣传共产主义的文章和武器。只有在这个事实得到证明,只有在那时,加中其他的条件,我们才能判处。而这一事实并未得到证实。法庭把警察的搜查作为证据,但是,警察的搜查是在没有证人或者说没有男性证人的情况下进行(判决书本身承认,搜查时在场的有两名妇女,其中一名是农村来的十五岁女佣),显然,是完全违法的和违反当时的维多夫节宪法的。<sup>①</sup>未履行这样一些手续的搜查不仅不能有效,而且不应有效。正因为如此,法律才规定了这些手续,作为对警察这样一个非司法机构的防范措施(法律甚至对于法院的调查也规定这样的防范措施!)因此,似乎没有或者说就是没有进行过搜查,没有证据可证明上述基本事实。既然法庭根据这样的搜查认为上述事实是有效的,这就成了诉讼无效的重要依据。还有一个重要依据:我是因为炸弹和武器而被判处的。根据法律准则,必须在最后审判时向犯人出示每一个犯罪物证。但是,在最后审判时却没有拿出炸弹(空炸弹!),也没有拿出武器。判决书本身也承认这一点,或者说没有提出相反的说法。没有任何人,根本就没有人见到我被指控判刑的那些炸弹和武器!这难道不是判决无效的根据吗?王国巴昂最高法院将很快看到这一点和其他的根据,肯定会考虑不能处以这样长的

<sup>①</sup> 摘自一九三五年三月所写关于共产党人服刑时的生活一文(《选集》,第二卷)。



徒刑。

我谨请求庄严的法庭将这份要求撤销原判决的上诉连同有关卷宗送交崇高的王国巴昂最高法院，我要求最高法院给我减刑。<sup>①</sup>

---

<sup>①</sup> 摘自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四日约瑟普·布罗兹向萨格勒布的王国法院的申诉(《选集》，第二卷)。





## 对德尼索夫的谴责

### 愤怒地拒绝接受金钱

这里我只谈一下我一九二八年被关押期间的某些事实，我认为，这些事实已足够对这里所谈到的一位同志作出肯定的鉴定。

我本人是在一九二八年认识德尼索夫同志的，在此之前我就知道，他尽管在国家机关里工作，但却以各种方式为我们的一些被捕的同志效力。警察把我关进预审监狱后，德尼索夫趁第一次在我所在的那一排牢房值勤时就来到我的牢房，他说出自己的名字并问道：“有什么需要我传到外面去？”我当时需要把一些材料紧急送给在外面的同志们，这些材料与揭露著名的内奸、共青团员“农民”[尼古拉·佩特科维奇]有关，他当时占据重要位置。我把这些材料写成信，经由德尼索夫同志送出，他很认真地完成了这项工作。后来，在宣判了对我的判决之后，他十分积极地帮助我准备越狱；德尼索夫同志给了我一把钢锉，来锯掉铁栅栏，我锯时，他替我看守。一九二八年，[安德烈·]赫布兰同志被捕了，从他身上搜出了对他不利的



材料。德尼索夫同志后来从审查员的写字台里取走了这份材料。

这里，作为例子，我只列举了一些事实，但是，除此以外，德尼索夫同志还帮了大忙。帮助我们这些被关在监狱里的犯人相互保持联系，帮助我们这些犯人同在外面的同志们保持联系。

有人指责德尼索夫同志是为了金钱才这么干的，这不符合事实。有一次我给了他一笔钱，借口是给他买香烟抽。他愤怒地拒绝接受，这使我相信他不是为了金钱而这么做。他从外面的同志们那里拿到一笔给我的钱，以用来收买监狱里的一些职员。他想把这笔钱全部交给我，但我只拿了一部分，而把其余部分都留在他那里，因为钱放在我身边有被发现的危险。他根据我的指示，把这笔钱用来办收买监狱里职员的事。

德尼索夫同志当时就对工人运动有兴趣。有时候，在夜里值勤时，他站在我的牢房前几个小时，听我给他解释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按照我的指示，他开始很出色地在监狱的其他宪兵中间展开工作，以便建立同情者小组。

他常常向我叙述他早年当宪兵的事；另外，他还告诉我，他曾被人怀疑是共产党人，因此而受到迫害，最后还被解雇了。他也想放弃现在的工作，并且已经找到了替私人干活的工作，但是，应我的要求，他决定留下来：我向他指出他可以给党做工作，因为他可在被捕的同志们和党之间保持联系。

因此，关行德尼索夫同志，我能说的，都是一些最好的话。他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给个人谋取好处，而是出于对工人运动的同情。对于这一点，我本人是相信的。在我逃出的时候，



德尼索夫同志政治上完全不成熟，这一点是确凿无疑的。他生活的环境限制了他的发展。只是同被捕的同志们的联系才唤起了他身上的无产者觉悟和参加工作的愿望。我认为，应该吸收他入党，并使他能够工作。<sup>①</sup>

---

<sup>①</sup> 摘自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关于德尼索夫同志的材料(《选集》，第二卷)。



## 在莱波格拉瓦和马里博尔服刑

### 我们迅速建立了组织

我必须在这里强调指出，对于我们这些在服刑的共产党员来说，不存在真空，那里有一大批共产党员、名副其实的积极分子、工人和知识分子。我们懂得把牢房变为学校，变为党校。我们开展了斗争，斗争很艰巨，但我们得到了权利：让我们好几个共产党员关在一起，而不是关在单人牢房里。我们不得不绝食，如果他们不让步的话，我们宁愿死去。当局不得不妥协。当我们有可能聚集在一起，也即我们有好几个人关在一起时，我们立即开始组织小组。我们抓紧时间学习马克思主义。活动很困难。我们得设法偷到自己的书。我们通过刑事犯人从仓库里把书偷出来，对他们的协助用香烟作为酬报。

我们就这样建立起自己的图书馆。为了进行伪装，在一本马克思主义书本的前面附上几页常见的小说，例如《基督山伯爵》。如果有哪个看守来翻看，他看到的是《基督山伯爵》，没有别的什么。即使他看到有的地方谈到马克思和经济问题，他也会以为，这是某个基督山伯爵写的。我们就这样保存了自己



的图书馆，尽管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搜查。我们想方设法，把牢房真正变成学校。我们人人制定了自己的计划。

例如，我自己就学习语言。最初，我学习世界语，后来，我转为学习英语。在一起学习的时候，我们轮流当教员。我们自己需要作充分的准备。我们个个自封为学者，但要讲课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例如，我的任务是讲关于宇宙起源的学说。我承认，这个问题使我很吃力。你们都看到了，这一工作对我们有很大好处。当服刑期满应当出狱时，我甚至感到遗憾，因为我没有完成计划。我要再一次强调指出，我们就是这样，懂得把牢房变成学校。这对于我们大家从事日后的斗争，完成向我们提出的任务十分有用。

这里我简单地谈一下政治犯的状况以及同志们之间的关系，不谈细节。我一九二九年二月来到莱波格拉瓦时，在那里只碰到两名政治犯：舒马诺瓦茨和洛潘迪奇，也就是说，加上我的两个同犯，我们一共是五名。舒马诺瓦茨一九二九年四月出狱了，我们就剩下了四个人，一直到一九三〇年二月或三月，莫·皮雅杰、查基、格鲁博尔和契普契奇来到。我们都被关在单人牢房里，然而我们每天可以碰头，因为我们被安排在几个工场里干活，特别是我可以同每一个人联系，因为我是监狱发电厂的电工。皮雅杰来后，我们就开始阅读和探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因为皮雅杰在翻译《资本论》，他有这些理论书籍。夏天，我记得是在一九三〇年六月或七月，从米特罗维察解来了两批犯人，其中有我们的三四十名同志。他们的到来，使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我们得想方设法改善我们的生活，因为在新来的同志们中间有一大批人是被开除出党的或者



因为在警察局或在法庭上的表现而在受审查的。由于新来的同志们大部分被安排在新楼里，我们要求他们通过书面或口头的报告要求安排到旧楼里来，因为我们想集中在一起。除七个人以外，其余的人都这么做了，这七个人要么是不想这么做，要么是监狱当局不想放他们。人集中起来后，我们就准备建立组织，由于来自米特罗维察的同志们的情况很复杂，这样做是极其必要的。选举了由三个人组成的地方委员会，其中有我。地方委员会进行了审查，吸收一些同志加入组织。在米特罗维察被开除的那些同志依然留在组织之外。此外，地方委员会还通过举办训练班组织了教育工作。在组织之外的大约有五名同志。在这里，重要的是提一下，在被开除出党的人中有乔洛维奇：在米特罗维察，他被临时开除出党半年，原因是他搞阴谋，即不服从地方委员会(关于下跪问题)的一项决定，此外，他还写了一封不保密的信(在这种情况下，也是挑衅性的信)，落到了监狱当局的手中。后来，又有几个同志被开除，原因是他们反对地方委员会的一项决定，即未经地方委员会同意，任何人无权组织越狱，而他们暗中仍在组织越狱。地方委员会了解到这种情况，把有关人员开除出党。在被开除的人中，有一人是地方委员会的成员米洛拉德·佩特罗维奇，因为他老是同被开除的人[如乔洛维奇]保持联系，并受他们的影响，还把地方委员会的决定泄露给他们。在此，我要纠正一个事实：开除这些人都是在会议上决定的。会上选出了新的地方委员会，因为前届地方委员会是临时的，新选的地方委员会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来维护党纪。会议的决定使一些同志，例如乔洛维奇和博列维奇，极为生气，他们辱骂党，自愿到新楼去。我得强调指



出，当时乔洛维奇受处分的期限满了，应该让他重新回到党内来，但是根据他对党的攻击，他终于被开除出党。

一九三一年春天之前，没有发生任何特别的事情。由于党组织采取了巧妙的策略，没有同监狱当局发生任何冲突。教育工作在很顺利地展开，同志们之间的关系也很和谐。我得提醒一下，我从一九三〇年夏天起就能够不受约束地离开监狱外出，也就是说我在服刑一年多之后就可以外出，而这完全是特殊情况，因为犯人在服满一半徒刑后才有权利转到“间接服刑部”。我能外出是因为我作为电工有这样做的必要，因为监狱还向私人住宅等供应电力。当时的监狱长博哈切克是我的战友，我们一起被俘，因此对我很关照。我可以充分利用外出的机会为党组织办事，在监狱外还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一九三一年四月，我们同监狱当局发生了第一次比较重大的冲突。事情的经过是，莱波格拉瓦来了一名看守长，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官吏，他想实行某种新改革，也即整顿秩序，因为据他讲以及据当局安排在监狱里的密探教员科斯蒂奇所说，监狱里存在着名副其实的无政府状态，犯人，特别是政治犯有过多的“自由”。有一天，这个家伙把我们的一个同志关进了地下室，这个同志当时有病，但是监狱里的医生拒绝承认他有病，尽管他发烧三十八度五，为此，我们举行绝食，以示抗议，而刑事犯也声援我们，以示团结，因为他们也有几个人因同样的事情被关进地下室。大约有一千二百名刑事犯参加，大概占百分之九十八。这件事把监狱当局吓怕了，他们立即把莫·皮雅杰和米亚科维奇找去谈判，很快就达成了



协议，也即把那位同志和其他犯人从地下室放出来，不许从贝尔格莱德来的那个家伙殴打犯人。这时，刑事犯也提出了一些要求，我们也表示支持。监狱当局这时请皮雅杰出面让旧楼里的人平静下来，要我去新楼，让那里的犯人平静下来，因为除非我亲自向他们宣布已停止绝食，否则新楼里的犯人是不会相信绝食停止的。这件事后来自然产生了影响，促使司法部下令把我弄到马里博尔监狱去服刑。这次绝食结束后的十四天，司法部来了一名司长，要求对我和皮雅杰两人进行搜查，又过了十四天，我被突然送往马里博尔，同去的还有三个人：莱维、特拉伊科维奇和乔洛维奇，因为他们在新楼里经常与看守发生冲突。

我们来到马里博尔时，遇到了那里的四名同志：武约维奇、乔拉科维奇、科茨曼和布塔拉。当然，我们也被分别送进单人牢房，因为前面提到的四个人在单人牢房里已被关了十七个月了，他们曾进行长达十天的绝食，但无济于事。虽然受到严密的监视和彼此隔绝，最后我们还是商定，团结一致地和不断地提出抗议，要求把我们关在一起，过了一个月，我们的要求实现了，因为监狱当局担心这一回不像第一次绝食那样了，现在比较难对付我们。我们关在一起后，立即建立了组织，着手开展教育工作、组织讲习班等。根据我的建议和莱维同志的建议，过了两个月，特拉伊科维奇同志和乔洛维奇同志重新被吸收加入组织，当然，条件是先得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保证今后不再重犯。不久，乔洛维奇又出现许多麻烦事，曾经想过各种办法让他改正。在这件事情上，特别是武约维奇同志费了心，但是一无结果。乔洛维奇看到，他又将在党的会议上被开除，





干脆发表了一项书面声明，宣布退出组织。从他以前和后来的声明来看，他不承认监狱中的党组织是党组织。

马里博尔监狱里后来的生活和工作，我认为，能够从武约维奇和乔拉科维奇的报告中了解到。

武约维奇和乔拉科维奇两位同志出狱后以及科茨曼和布塔拉同志出狱后，又有四位同志进了监狱，先是两名采矿工人：一个被判两年，另一个被判三年。一、两个月后，又来了赫拉斯特尼克的两名玻璃工人。同先来的两人不同，这两名玻璃工人是很优秀的产业工人，满腔热情地学习理论。

大约在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九日，他们突然被带走，遣往米特罗维察，所有的政治犯都被关在那里，而我则又呆了五天，五天之后被送往奥古林，在那里又被关押了四个月。

我出狱后，见到了维达科维奇同志，他对我说，米特罗维察的情况很紧张。存在两派：工人和知识分子。工人以克拉什为首，而知识分子则以奥格宁·普里察为首。看来，基本上不存在什么原则性的意识形态的分歧，而是个人的较量，而且是由于克拉什同志做法不妥当引起的。克拉什是领导成员，大家都说，他不断地写一些“指示信”，往往由于措词不当而引起知识分子的不满。现在这种情况彻底改观了，因为有五十名同志被转移到莱波格拉瓦，其中大部分为知识分子和水平较高的工人。

在服刑期间，我们始终认为，监狱里的组织是外面的党组织的一个组成部分，应当同监狱里的组织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应当设法为在监狱里的同志们和组织送去秘密材料，党的决议、各种决议和书籍。这将对改善狱中同志间的关系有极大帮



助，此外，特别重要的是，有助于培养同志，一旦他们出狱，就对外面的情况很了解，便于工作。我跟莱波格拉瓦建立了良好的联系，可以把材料送到那里，送到同志们手中。



## 博日达尔·阿季亚博士事件

### 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他是一个正派人

三个月以前，我在一号报[《文学家》]编辑部里偶然会见了博日达尔·阿季亚博士，他后来说，他想跟我谈一谈。我就去找他，他向我谈了自己的经历以及现在向左转的原因。他过去是社会民主党人，是社会民主党人办的[《自由》]杂志的主编，这家杂志现已停刊。他认为，第二国际和第二个半国际已经最终地被消灭了，或者说已经破产了。而共产党的斗争手段和方法是正确的。他说，他同南斯拉夫社会党的领袖们不会再有任何共同点。他已经与他们断绝关系，他们对他也不再信任。他说，谁也想象不出那里有多少卑鄙齷齪的事。我向他问起米尔科·库斯·尼古拉耶夫，他说，尼古拉耶夫在被解职以后，穷困潦倒，最后终于被社会爱国主义者收买过去。

他向我抱怨，说我们的合法书籍还在攻击他，而现在没有任何理由攻击他。我认为，他这番话是想说：我们可没有攻击你。他说，他没有什么野心，他只是想在可能的范围内通过发表各种演说做点有益的事。我则对他说，现在不必说大话，他



还在尽可能同他以往的社会爱国主义机关里的同伙们保持联系。不过，我还是作了安排，让我们的杂志不再攻击他。他可能对我们很有用，不过我们对他的讲究策略。他给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个正派人，他而且十分乐于助人。



## 赫布兰的儿子

### 找工作做

早在莱波格拉瓦时，我就采取措施，要尽可能把赫布兰的儿子送出国。赫布兰同志的最大愿望是不要让他的儿子也遭殃，而是希望把他的儿子培养成革命者。三个月以前，我曾去过赫布兰同志的姐姐那里，当时，他的儿子在萨格勒布，在找工作做，但是到处都找不到工作，于是他不得不返回斯洛文尼亚。赫布兰同志的姐姐对我说，她同意让他出国，她求我尽早把他带走，由于他生活很困难，有可能成为流氓无产者。他有十七、八岁。我想，可以把他送去上学。

### 关于格尔日蒂奇同志的爱人

我还会见了格尔日蒂奇同志的爱人，她在萨格勒布，离我很近，随时可以去找她。她处境很困难，没有工作，没有维持生计的手段，警察不许她在城里找工作。她希望无论如何把她



送出国去，但是萨格勒布的同志们不知道具体地对她说些什么好，此后，她几乎就绝望了。我想，得把她尽早送走，也就是说，得通过同志们告诉她，不久将送她出国，免得她做出些荒唐的事来。

## 奥雷什基的家庭

同样有必要为奥雷什基同志的爱人和孩子采取措施。她现在在斯雷姆当护士，但是她的孩子生活条件很差。孩子放在酗酒的祖母那里，没人能很好地照看他。



## 勇敢无畏和坚定 不移的典范

### 往返于莱波格拉瓦和米特罗维察之间

这里我简短地谈一谈我同莫·皮雅杰和莱波格拉瓦监狱中的其他几位同志见面的情景，以及跟他们在一起的一些经历。我是想比较详细地谈谈某些同志，特别是莫·皮雅杰同志，他在南斯拉夫各地的监狱里已经关了十年。我说各地的监狱，是因为皮雅杰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已经两度从米特罗维察被送往莱波格拉瓦，又从莱波格拉瓦被解往米特罗维察。当局之所以经常采取把犯人从一个监狱解往另一监狱这种做法，是因为当局认为，如果他们在一个地方呆久了的话，这些人会搅乱监狱中的秩序。其间要遭受惨无人道的折磨，宪兵在途中逞凶，同志们新到的监狱的当局也肆虐。兹拉特科·什纳伊德尔就是由于这种换监和遭受虐待而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请看在换监时，他们是如何虐待我们的同志们的！皮雅杰同志第一次来到莱波格拉瓦时对我说：“在米特罗维察，宪兵把我们带到监



狱的院子里，开始威胁我们，说如果我们想在路上逃走的话，他们将像打死兔子那样把我们打死。监狱长——米特罗维察屠杀共产党人的著名刽子手普希奇怂恿宪兵这么干。一路上，宪兵不停地威胁我们，辱骂我们。我和我的三位同志感觉到，宪兵确实打算以我们想逃跑的借口杀害我们。一九二九年和一九三〇年时，这种做法很‘流行’。我们到达莱波格拉瓦警察局时，已经是深夜了，离监狱大约有八百步。宪兵跟在我们后面，威胁说，只要看到有什么可疑的动作，他们就立即开枪。因此，我们是抱着被判处死刑的人的心情走完这一段路的，随时等着身后响起枪声或者背上挨一刀。”宪兵是遵照残暴的当局的奴仆们的命令这么做的，让工人阶级的战士们体验体验临死的味道。莫·皮雅杰是同查基、格鲁博尔和契普契奇三位同志一起来到莱波格拉瓦的。而在此之前，我们在莱波格拉瓦总共只有三名共产党员，因为我们是在军人法西斯独裁政权上台之前被判刑的，而后来的国家法庭把所有的犯人都送到米特罗维察。

莫·皮雅杰同志的到来使我们，特别是使我感到非常高兴。我设法让他在监狱的发电厂里找到一份差事，我自己在那里当电工。在那里，我们在一起一直呆到我受罚被调往马里博尔监狱为止。在那里，我有机会了解我们这位同志的性格和生活，一九二五年，他被判二十年徒刑，而这全是由于当局有个怪念头，当时当局认为这一判刑就会把斯捷潘·拉迪奇吓坏了，拉迪奇当时在周游欧洲，甚至还去了俄国，皮雅杰同志的徒刑后来减为十二年(去年，他由于唱革命歌曲而被判两年徒刑，因此，他总共得服刑十四年)。皮雅杰同志现在大约四十八岁，但是在监狱遭受的折磨使他看上去要老得多。早在大战前，皮雅





杰同志曾在慕尼黑美术学院学习。后来，他在巴黎当艺术家，但也经常挨饿。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在马其顿，在一家中学里当美术教员，一度代理过校长职务。大战一结束，他就放弃了公职，放弃了绘画，作为共产党人，从事起新闻来了。一九二〇年，在萨拉热窝举行的南斯拉夫第一届记者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记者协会的第一书记，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建立了“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全境的记者协会。他用那支犀利的笔经常抨击“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内部的阶级敌人。他编辑报刊并且不倦地为各家共产党报刊撰稿。党和革命报刊被查封以后，他继续工作，直到最后于一九二五年被捕为止，他因出版非法的党报而被判处二十年徒刑。他来服刑时，并没有意气消沉，积极从事各项工作。他明白，南斯拉夫的工人阶级缺少什么，他看到有必要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需要对南斯拉夫的工人阶级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这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最锐利的武器。他一心放在工作上。在另一位同志的帮助下，他把《资本论》这本马克思的巨著译成我国文字，接着又译了《哲学的贫困》和其他一些作品。他的这些作品极大地帮助了我国的无产阶级。一直到现在，他始终忠实地履行自己共产党人的职责。

皮雅杰同志在服刑时也画画。监狱四周是高墙，我们设法让他到发电厂平坦的屋顶上去画画。他画了几张秀丽的风景画。从屋顶上没有什么好画了，他就画云。他画的云表明他的确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这些画是他杰出的作品。在发电厂里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机器运转时，他很爱惜机器。他常常表示想当一名工人，一名五金工人。他始终是一名久经考验的战



士。对于监狱当局的一切不公正的行为，他都会大发雷霆，而置等待着他的纪律处分于不顾。有一次，监狱里的教员——他本是当局的密探，在监狱里负责检查信件——虐待一位年轻的同志，原因是这位同志在信里写了些不符合这位教员心意的话。皮雅杰就去向这位教员交涉，两人发生了冲突，因为教员骂共产党员为匪徒。教员把两人都告发了。监狱长发觉教员没有理，但他只想责备那个工人。皮雅杰提出异议，要求也惩罚他。当然，他这种要求得到了满足，教员也被关进单人牢房。

在监狱中，有几位同志已被关了十四年。其中的两人是查基同志和斯帕索耶·斯特伊奇同志。由于一九二一年企图行刺国王，查基被判无期徒刑，斯特伊奇被判绞刑，但斯特伊奇后又被减免为无期徒刑。当局想通过惨无人道的折磨，首先是在警察局里，在“格拉夫尼亚查”野蛮地折磨他们，后来又在监狱里折磨他们，从精神上将两人打垮。在米特罗维察监狱里，两人戴了七年的重镣，严格地被关在单人牢房里，由于在监狱里继续受到折磨和虐待，这两位工人阶级的英雄精神上受了创伤。然而他们毕竟是充满激情的老战士，随时准备继续斗争。当局最骇人听闻的折磨也未能把两人打垮。查基同志大约六十岁。在进监狱之前他就是伏伊伏丁那无产阶级受人爱戴的著名领袖和战士。监狱里每一次举行绝食时，查基同志总是坚持到底。一九二七年，在米特罗维察进行了十五天绝食。一九三一年，在莱波格拉瓦举行了短时间的成功的绝食，第二次又举行了十六天绝食。这位年迈的无产者尽管体力上和精神上受尽折磨，情愿在斗争中死去，而不愿破坏绝食，他甚至拒不听从同志们要他进食的劝告，同志们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要他停止



参加绝食斗争。

斯特伊奇同志在米特罗维察已经关了十四年，当局不把他关到别的监狱里，因为当局认为，经过多年的骇人听闻的折磨，已经使斯特伊奇的精神崩溃。斯特伊奇在经受了无法忍受的种种折磨之后，也确实变得精神错乱。例如，他老是想说服人人相信，他发明了一种专利，可以用雪来生炉子，这样人在房间里会感到暖和，除了这一发明外，他说，他还发明了另外几种专利，都是用雪和冰。为什么斯特伊奇老是对雪和冰产生一些古怪念头？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七年中他遭了多大的罪？戴着重镣，关在最寒冷的天气里也不生火的冰冷的单人牢房中，他的双脚残废了。种种折磨和寒冷使他成了半疯子，致使他有病的脑子里老是出现一种假想：可以用雪和冰取暖。斯特伊奇同志最终还是活下来了，因为他原先体力充沛。当然，现在他的身体也垮了，得了淋巴结核等病。自从许多党员同志被关押在这里之后，他的脑子又慢慢活跃起来，特别是在同志们设法使他跟大家关在一起之后。在与同志们的不断交往中，从智力和体力上，他都开始慢慢恢复，但是在同志们举行了几次绝食斗争以后，当局又把他同刑事犯人关押在一起。让精神错乱的共产党人变成健康人，对于这种事，当局当然没有兴趣。当局希望所有的共产党人都精神错乱，因此才通过精神和体力上的折磨，使同志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苦。

一九三一年夏天，从米特罗维察监狱一次就把七十名犯人押送到莱波格拉瓦来，其中有三十五名政治犯，也即共产党人。把他们转移到米特罗维察是因为他们闹事，抗议发臭的菜和坏了的面包。许多人因为吃了这种食物而生了重病。监狱当



局经与内政部商量，把它认为最危险的一部分犯人挑出来，送往莱波格拉瓦。这批同志被关进运牲口的闷罐车里，戴着镣铐，串在一起，但是一路上他们不停地唱革命歌曲。在每一个较大的市镇，特别是在火车停的时间较长的萨格勒布，从紧锁着的车厢里传出无产阶级最美好的歌曲：《国际歌》。铁路上的工人们停下步，露出兴奋的表情听着这首歌，听着被判了刑、戴着镣铐的无产阶级战士无畏地唱着的这首歌，而当时正是军人法西斯独裁政权最猖獗的时期，仅仅因为唱这样一首歌，当局就杀害了数以十计的英勇战士或者把他们判处长期徒刑。宪兵们气得发疯，扬言要开枪，拔出刀来威胁戴着镣铐的同志们，但是他们遇到的是戴着镣铐的普罗米修斯们的威严的目光，而不得不后退。

这批同志从米特罗维察来到后，只有七个同志的我们这一小批人十分高兴，当时在莱波格拉瓦我们只有这么些人。老朋友和在监外工作和斗争中的老熟人又聚在一起了。他们尽管都同外界隔绝，但是还是都希望能听到点新闻。首先提出的问题上：在外面，党是否还在活动？党是否经受住了军人法西斯独裁政权这一次的严重打击？当你了解到，党依然存在，仍在活动，没有被战胜，也即没有被消灭，你就会觉得长期徒刑和折磨并不难熬，几乎觉得不难忍受。后来的几位同志，几乎全被判长期徒刑。赫布兰同志被判十二年，耶拉维奇被判十年，博列维什十二年，索拉里奇十年，佩特罗维奇十二年，格鲁博尔十二年，莱维十年，特拉伊科维奇十二年，达多维奇十五年，奥托卡尔·凯尔绍瓦尼十年，阿莱克西奇十年，乔尔杰维奇十二年，久·普察尔八年，一九三二年绝食斗争期间牺牲的费斯



蒂尼同志被判了八年，他的死亡主要要归咎于监狱医生。其他的同志们至少都被判了五年徒刑。判这样重的刑完全是警方说了算，最能说明问题的例证是赫布兰同志的案件。早在一九二八年九月，赫布兰同志就在街头被捕了。但是，鉴于从他身上没有搜到什么东西，他在警察局里什么都没有承认，警方把他一直关到一九二九年春天，才把他移交给国家法院。警方指控说，赫布兰同志是一个危险的共产党人，对于国家法院来说，这一说法足够了，法院判他十二年徒刑。诚然，赫布兰同志在萨格勒布无产阶级的队伍中确实是一名不倦的和真诚的战士。作为私人的一名雇员，他把自己的全部业余时间都献给了工人运动。他英勇无畏，在萨格勒布的工人运动中深得好感。在有人身自由的时候，他在自己的工作中是毫不畏惧的和不知疲倦的，在警察面前，在法院面前，在服刑的时候，他同样如此。他在法院面前表现出布尔什维克的那种自豪的气概，主要是这个原因他才被判了重刑。由于他在服刑时也表现出布尔什维克的那种自豪的气概，为此，他被戴了三个月的重镣。赫布兰同志是我们党能够引以为自豪的党员之一。今天，正在为我们党培养这样的战士。

在监狱里还有许多优秀的同志，他们将能对工人阶级作出许多贡献。在工人阶级的敌人面前无所畏惧的另一个榜样是制鞋工格鲁博尔同志。尽管受到折磨，他在警察面前表现得异常坚强。尽管他什么都没有承认，法院还是判他三年徒刑。格鲁博尔同志发觉，法院简直是在做戏，是事先奉命作出判决的，于是他开始愤慨地高呼共产党的革命口号，为此法院又加判他九年徒刑，因此他总共得服十二年徒刑。我们的同志在服刑中



多次表现了布尔什维克的勇敢和坚定。我将在别的场合再列举一些例子，再来谈谈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服刑生活中的一些事件。<sup>①</sup>

---

<sup>①</sup> 摘自一九三五年三月谈共产党员在服刑时的生活的谈话。



## 出狱后恢复党的生活

### 同志们高兴地听取我的报告

我出狱以后，同萨格勒布的一些同志联系上了，他们告诉我，有一个决议，要我前往国外，在走之前，我安心地到内地找个地方等着。我认为，时间不会长，利用这机会我至少可以了解一下农村的情况。我就前往克罗地亚扎戈尔耶，在那里，我确实能够看到所能想象的最骇人听闻的贫穷。后来我回到萨格勒布，在萨莫博尔定居下来(由于迫害，我无法在萨格勒布定居)，在那里，我可以经常到萨格勒布去治病，并尽可能了解党的组织状况和工作情况。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觉，党作为一个组织根本就不存在，而是只存在彼此间没有联系的各个小组。有些同志一再说服我，说党“在活动”，他们主要是知识分子，而工人同志们则一再说服我，说党根本就不活动。从监狱出来的一些同志，他们想投身于工作，但是有人告诉他们，出于地下工作的原因，他们应当留在组织外面，不然组织(根本不存在的组织)就会遭到破坏。当然，说这样一些话的通常是这些同志所找的知识分子。同我有联系的第三类“党员”是我的



一些老熟人。他们过去跟我一起在党内工作过，当时是积极的，而如今却消极了，他们为了掩饰这种消极态度就批评一切，既批评领导机关，也批评个别知识分子。他们说，坐在领导机关里的是一些知识分子，是工作在中央的知识分子使得全国的党组织遭到破坏。因此，他们声明，在这样的条件下，他们不想工作，因为他们立即会被捕。几乎所有的同志，包括现在组成各个领导机关的那些同志或多或少都认为，在中央或者中央周围有内奸。开始的时候，我也有这种看法，后来我从一位同志那里了解到，在中央工作的是一些你可以充分给予信任的工人，但是我跟一起服刑的几个同志决心查核一下这种谣传，弄清楚党组织遭到破坏的原因。最后，我确信，有些纯粹是偶然的，而有人却说是自上而下地被破坏的，只是其他一些党组织遭到破坏一事，对于我们萨格勒布的同志来说，至今都无法解释清楚。

有些同志认为有必要建立组织和领导机关，但是只有在弄清楚党组织遭到破坏不是来自上面，或者只有把内奸挖出来之后，才能同中央保持联系。不过，我设法使他们认识到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因为只要在国内是按地下工作的规矩去办的，就不大可能从外面破坏组织。

“五一”一过，我们五个同志(都刚出狱)<sup>①</sup>会面研究建立组

---

<sup>①</sup> 从种种情况来判断，这五个人除约·布罗兹外，其余为：弗拉尼奥·克拉利、德拉古廷·佩特罗维奇、德拉古廷·马鲁希奇和斯尔贾·普里察。——原注





织和领导机关的问题，还有萨格勒布的混乱状况的原因，关于“红色救援会”<sup>①</sup>，关于文学争论，关于以前的组织的弱点以及原因（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期间，存在两派：T和B）等等。

在这次会议上选举产生了临时地方委员会，临时地方委员会的任务是立即着手把各个小组联系在一起并整顿地方组织。会上还谈到建立临时省书记处的必要，并且立即指定了两位同志，后来又找到了第三位同志来负责这一工作。地方委员会和省书记处中各有两位正在服刑的同志。

在这次会议上，我向同志们报告说，中央委员会是由可以给予充分信任的工人组成的，必须粉碎制造各种谣传和破坏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的威信的做法，因为如果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没有威信——自下而上也是可以破坏这种威信的——就不可能建立起健康强大的党组织。同志们高兴地听取了我的报告以及我对中央的看法，并且同意我的看法，因为在此以前他们都不了解情况并且受各种谣传的影响。当然，有些同志批判地看待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有同志批评中央在作决议和发指示时不考虑国内实际情况，不考虑有些事情能否贯彻执行，一句话，不大了解国内工作的难度。而这是因为中央即便派人到国内来的话，他得到的也是曲解的报告，因为他找的往往是不从事实际工作的一些人，通常是找一些知识分子。此外，同志们指责

---

<sup>①</sup> “南斯拉夫红色救援会”成立于一九二三年十二月，是作为南共领导下的地下组织建立的。它是“国际援助革命战士组织”的组成单位，职责是向遭受反动派迫害的人提供物质和道义上的支持。——原注



中央支持国内的受权代表，<sup>①</sup>因为这样一来等于对党的下级领导机关的工作表示异议。同志们认为，中央应当通过国内现有的领导机关来贯彻执行党的全部指示和工作。说到党的工作，应当考虑到，现在确实像是中央同一大批个人，主要是知识分子保持联系，因为经常发生的情况是，有的这样的“受权代表”动不动抬出某个“上级机关”，而置当地的机关于不顾。

## 萨格勒布组织内的现状

把各种各样自行组织起来的小组联系在一起的工作进展非常顺利。一个月以前，党组织有十九个支部，而在十四天以前找到了一个有五十名党员的自行组织的组织并同它接上了头，这个组织在纯粹的工人中心特雷什涅夫卡。当然，必须十分谨慎，并进行改组，因为同志们考虑到这样做有可能钻进个别奸细，这样一个小组有可能是警察组织的。最困难的是铁路工场，因为老党员不干了，理由是上面有奸细，不过我们还是撇开了这些人，打进了这个工场，将建立由新人组成的组织。

最大的困难是缺少能够在各个下级领导机关里担任职务的能干的同志，要经过一段时间才能培养出年轻的新同志。

---

<sup>①</sup> “受权代表”是指中央委员会往往从国外派往国内各地的南共领导人。当时，在克罗地亚是由斯尔贾·普里察充任“受权代表”。——译注



## 省 委

省委真正开始工作大约在六月中。省委遇到很大的困难，主要是缺少经费，因为没有经费，省委不能开展工作，因为不论是去恢复组织和联系，还是去整顿现有的组织都需要到各地去。据同志们反映，党或者说中央提供给省委的两千第纳尔的预算太少了，省委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我也这样看)。应当设法搞到必要的经费。省委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面临十分艰巨的任务，因为它已长期不存在，而恢复联系和建立新组织的工作也将难于进行。



## 文学家之间的争论<sup>①</sup>

### 制订明确的决议

我在服刑时就受同志们委托，同我们的文学家们进行联系，向他们转达服刑的同志们对于我们的社会文学界的争论感到不满的意见。此外，他们要我居中调停，以平息这种争论。我在前面谈到的那次会议上讲了我的意图，地方委员会后来通知我，让我代表地方组织去找这些文学家。我首先去找一号报纸主编[《文学家》主编米兰·杜尔曼]，把正在服刑的同志们的意见和地方组织的要求告诉他：立即中止这种非同志式的论战，也即报上再也不登可能向围绕二号报<sup>②</sup>或者说二号杂志

---

① 社会文学家之间的争论是一九三二年围绕艺术的含义和作用问题爆发的。一九三四年初，这场冲突达到了新的规模，当时克尔莱扎在《今天》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对我的无聊作品的最新诅咒》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把反动派和反动报刊对他的围攻同A.B.C.(博戈米尔·赫尔曼的笔名)的意图和左翼文学(所谓的社会文学)从政治上和文学上对他的人格的抨击等同起来。——原注

② 一号，铁托指的是《文学》杂志，而二号，指的是《今天》杂志。——原注



[米罗斯拉夫·克尔莱扎，《今天》杂志主编]的那批同志挑战的文章(我得同时指出，一号报主编杜尔曼自己要求我去找克尔莱扎调停，说他停止在自己的杂志上发表攻击文章)，不论克尔莱扎是否在自己的杂志上继续这场论战。此后，我去找克尔莱扎，他向我详细地说明了是怎样导致彼此的攻击的。他认为，他根本没有责任，因为是一号报纸周围的人开了头，发表了《克尔莱扎往何处去?》的文章，这是诺维萨德巴昂辖区报纸<sup>①</sup>撰稿人(博戈米尔·赫尔曼)写的。他说，与一号报纸合作的“这些人”在文学上都是文盲，是一些没有能耐、没有气节的人，他们今天来了，过了一阵子，就可能滚到反动派的队伍中去。他认为，这样一些人没有权利指责他是叛徒或是坏蛋，他从事社会文学已经有十六年以上的的时间。使他愤慨的是，这些人现在卑劣地抽出他一九一九年写的一些诗，说成是他现在写的。他对于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是否有才干，是否懂得马克思主义提出怀疑，说他们只是给我们的文学制造混乱。我把在监狱中的同志们以及在狱外的同志们的意见告诉了他，并要求他不要再写文章回击一号报纸，尽管一号报纸最近又写了一篇文章，形式是向克尔莱扎呼吁，但是据我认为，文章的结果并不好，因为从文章中看出来，攻击的目标仍是克尔莱扎。他回答我说，别的东西他不写，但是要写导致这场论战的经过，并且不加评论。但是，我要求他，在党就此作出决议之前，这也不要发表。后来，

<sup>①</sup> 很可能是指《塞尔维亚马蒂察之声》。——原注



我又把一号报纸的几个人找来，到会的有杜尔曼、伊韦科维奇和容。我向他们谈了克尔莱扎的观点，谈了他为什么大发雷霆。他们承认，A.B.C. [博戈米尔·赫尔曼]的那篇文章《克尔莱扎往何处去?》很不妥当，尽管写的都是事实，而且是在经党同意后发表的。我问，他们是否将服从党就这件事作出的决定，他们回答说，将服从，他们愿意同克尔莱扎合作，他们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包括克尔莱扎在内的编辑委员会，争论双方中谁参加，由他选择，党的代表也参加该委员会。我又再次去见克尔莱扎，在此之前他曾答应我，他将邀请几个自己的合作者，但是我去时只见他一个人在，经过几个小时的谈话和争论，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他不愿跟这些人合作，不相信他们会服从党的决定。我对他说，我想最后弄明白，他到底想什么，是否要求道歉，他间接地让我明白，他不反对在一号报纸上发表一个声明。我向双方都表明了，党将最坚决地反对有人——不论他是谁——继续在我们的文学界搞这样的攻击。没有就此事作出具体的决定，也没有公布，因为如果作出并公布这样的决定，就必须讲清楚对违反这一决定的人将采取什么样的惩罚。我反对作出这样的决定，我认为应该由中央来作决定。

在我看来，中央应该就这件事尽早以决议的形式作出明确的决定，制止今后在文学界出现这样的紧张关系，这样的关系对运动十分有害，因为敌人，特别是教权派在利用这一情况。他们在小册子中，在自己的报纸上已经在利用这一情况。我们在内地的同情者和同志们感到愤愤不平，他们问道：正当敌人的所有力量都联合起来对付我们的时候，为什么现在偏偏出现



这样的争吵呢？<sup>①</sup>

---

<sup>①</sup> 见萨格勒布组织的代表一九三四年八月的第一次报告的补充(《选集》，第二卷)。



## 农民问题

### 不要光停留在许诺上

在扎戈尔耶我就看出，克罗地亚农民党作为一个组织根本就不存在。农民听天由命，为了对抗当局，加入了“十字军”。<sup>①</sup>神父们在农民中间大力宣传，把自己装扮成民族英雄。农民和农村青年参加“十字军”并不是由于他们喜欢神父、信任神父，而是出于仇恨贝尔格莱德的对抗心理而被迫加入“南方鹰社”。因为谁不参加“十字军”或“鹰社”，那就意味着他是反国家分子；农民受神父的影响，比受克罗地亚革命者或者共产党人的影响，令当局高兴得多。我同参加“十字军”的农民和农村青年交谈，发现他们不是出于信念参加的。到处都有人问我：“什么时候开始行动？俄国是否会不

---

<sup>①</sup> “十字军”是教权组织的成员，是在亚历山大国王独裁统治的第一年组织起来的，是作为“天主教行动会”的一个组成部分组织起来的，在萨格勒布出版《十字架》报。





久就开战，来拯救我们？”贫困达到可怕的程度，令人难以置信。除了扎戈尔耶，我还到过别洛瓦尔附近。我去那里是同前农民党的上层人物接触。我过去就认识这些人。他们认为，有必要建立地下的农民革命运动。把农民团结起来，采取各种行动，由年轻的左派组成新的领导，而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承认，只有在我们共产党人的帮助下才能做到这一切，他们认为，这个克罗地亚革命党必须同共产党相结合，进行共同的斗争，来反对塞尔维亚帝国主义，也即反对贝尔格莱德。他们要求我向有关方面转达他们的这一愿望。他们要求我们党能允许他们派几个领导人去俄国，以便确切地交换对各种问题的看法并达成协议。他们不承认以《进化》杂志为中心的所谓领导，但是认为对待马切克博士应当注意讲究策略，要使他从特鲁姆比奇的影响下解脱出来，因为他在农民中间始终还是一个有威信的人物。莱博维奇和别洛瓦尔的其他人向我谈了对马切克的同样的看法。姆拉登·伊韦科维奇博士和萨格勒布的其他左派也向我谈了这样的看法。别洛瓦尔的几位多次说，希望我们真正有所行动，不要光停留在许诺上，因为我曾表示，我一定会让我们党接受他们的观点，在这件事情上，他们不久就会得到消息。我当时还不知道党已经朝着这一方向在开展工作的。后来我才会见了派回国内工作的德拉戈·贝德克。当然，我立即把他派到别洛瓦尔，同那些人建立联系。

在萨格勒布，我会见姆拉登·伊韦科维奇，主要是与他谈建立农民总委员会的事。他表示同意，并答应我，他将与他认为是可靠的革命分子谈谈此事。第二次见面时，他说，他跟一些人谈过了，他们同意建立地下组织，但是他们不知道怎样能



够采取各种合法的形式来团结农民，他们认为这不可能办到，重点应放在建立地下组织上。<sup>①</sup>

---

<sup>①</sup> 见萨格勒布组织的代表一九三四年七月的报告(《选集》，第二卷)。



## 工会的活动

### 有一件事使我感到意外

我来到卢布尔雅那，与特科人员接了头，但在商定的时间里他没有来到商定的地点。我在他安排的那幢房子里等候了两天，我觉得事情不对头，就去他的老家，在那里我获悉他被捕了。我还有一个接头地点，但是我没有去，因为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当时认为逮捕的面比较广。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去萨格勒布，寄希望于利用那里的同志能接上头并了解到卢布尔雅那的被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在萨格勒布，我会见了比斯特罗〔斯尔贾·普里察〕和亚奈克〔马尔科·佐夫科〕，地方委员会书记和省党委委员以及青年团书记。我同地方委员会书记详细地谈到中央和萨格勒布组织的关系。这一次，我口头上比较详细地谈了我在书面上已经向萨格勒布的同志们谈过的那些事。这位同志对我说，他们写了一封很尖锐的信给中央，我要求他们不要以这样的形式发出这封信，应该修改，他立即表示同意。我要求让我看一下这封信，但是他对我说，无法很快拿给我，而我又急于返回斯洛文尼亚。我是在几天以前，即九



月十九日在斯洛文尼亚看到这封信和中央的复信的。

我第二次到萨格勒布跟代表会议有关,但是遗憾的是我晚到了。责任不在于我,因为我一接到通知就启程了。

同一天晚上我会见了一名工会代表。据其他同志说,他在会上作了一个精彩的口头报告,关于工会的报告。我跟他从晚上十点一直谈到凌晨三点,谈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在我们谈话的最后一个小时还有一名党员加入,他在私人雇员工会工作。从这位工会代表的报告来看,只有纺织工业的“行情”较好,但是那里参加工会的有组织的工人却最少,同样,党的影响也弱,因为除了奥罗斯拉夫列以外,尚未打进这些企业。大部分工业部门的情况变糟了。

奥罗斯拉夫列的罢工是由我们的人领导的,并取得了胜利。斗争是从一个车间开始的,正当工人似乎要屈服的时候,其他车间也举行了罢工。厂方一开始就逮捕罢工委员会的人,并拒绝进行任何谈判。后来,其他车间投身于斗争后,厂方又同意谈判并要工人派来代表。工人拒绝了,表示只要他们的同志们仍关在监狱里就不谈判,厂方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投降。

有一件事令我感到意外,而这是很值得注意的。这位工会代表说,工人罢工胜利后,大多数人对组织抱消极态度。许多人干脆就离开组织。他对这一现象的解释是,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有大批失业工人的城市里,失业工人经常威胁着在企业里的工人。因此,这些工人一旦在罢工中取得某些胜利之后,就拚命保住自己的饭碗,甚至不惜以脱离工会组织为代价,只求不触怒厂主。另一方面,工人的这种态度的结果是,厂主慢慢地又把他们在斗争中取得的成果夺回去。这意味着,工人并未



意识到自己组织起来的力量。不过，在我看来，工会应负有很大的责任，罢工后，工会也变得不关心起来了，没有充分地利用罢工的胜利来达到在有关企业的工人中进一步鼓动的目的。

他还向我谈到五金工人工会萨格勒布分会的事：这个分会召开了大会，选举了分会新的领导，差不多是一致选出的，新领导是由最优秀的工人，也就是说由斗争性最强的工人组成的。但是，贝尔格莱德的工会中央严厉批评了这次选举，宣布这次大会无效，取消了分会的领导，重新任命了一个委员会，甚至还要把分会领导的一个成员开除出工会。对此，工人们感到非常的愤慨。这位同志问我，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有些同志的意见是设法同贝尔格莱德求得妥协，把那位同志保留在工会内就行了。这位同志认为，倘若达成这样的妥协，工人们会感到失望，他担心许多人会因此而脱离工会组织。我给他下达了这样的指示：在这件事情上，不要跟贝尔格莱德的工会中央进行妥协，即便他们把那位同志开除了也罢。在这件事情上，中央粗暴地违反了工会的纪律，践踏了会员的权利，置会员的意见和愿望于不顾，而想安插自己的人。其次，立即散发工会合法的传单，在传单上要最强烈地抨击中央，要求他们尊重会员的权利。不要去限制工人反对工会官僚的斗争热情，而是要加强这种热情。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同志们会赞同我的意见，因为在我看来，寻求同工会的官僚们和解，而不考虑会员的情绪，是错误的。



## 斯洛文尼亚的代表会议

### 党内的团结是真正彻底的

我第一次去萨格勒布回来之后，马上同贝夫茨 [爱德华·卡德尔] 直接接上了头，他向我报告了代表会议的准备情况。在代表会议召开之前，我总共同贝夫茨本人见过两次面，同贝夫茨和科斯 [鲍里斯·基德里奇] 两人一起见过一次面。我努力从他们的报告和各种声明来了解他们两人和斯洛文尼亚党的状况。我发觉，这两个同志虽然是知识分子，但却十分能干、积极而又忠于事业。他们能够正确地理解提出的各种问题。科斯对工会政策和企业里的工作的了解简直使我吃惊。这两个人缺点是——而这也是知识分子的通病——稍有成绩就过于兴奋，就过高地估计自己；看不到可以利用来吸收新党员的各种可能性；到目前为止，他们把大部分时间用于写传单，而这意味着他们努力以此来弥补他们实际工作中的欠缺：在工人中间特色新人，在组织中造就工人骨干，特别是在卢布尔雅那，这是最弱的一面。他们两人身上有一个特点是我特别喜欢的，而这在知识分子身上并不多见，这个特点就是，他们有自我批



评精神，能够接受批评，在他们身上没有那种病态的敏感。

尽管有这些缺点，他们还是做了许多工作，今天在斯洛文尼亚已经奠定了在所有比较重要的地方加强和建立组织的基础，会议作了充分的准备。我认为，这次代表会议对于斯洛文尼亚党组织今后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意义。

这里我不想作详细的论说，因为你们会得到全部材料和同志们有关会议的报告，我只想谈一谈我在会上得到的印象，关于斯洛文尼亚党组织今后工作和发展前景的印象。考虑到筹备这次会议的条件，会议开得非常成功。代表们对所有的问题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他们在会上说，这次会议对他们有很大好处。讨论过程中向他们解释了在此以前他们所弄不清楚的许多事情。

按照代表们自己的说法，中央在斯洛文尼亚有很高的威信，省委也是如此。在整个会议期间，没有人对中央提出任何攻击或者批评，尽管我要求同志们畅所欲言。斯洛文尼亚党内的团结是真正彻底的。<sup>①</sup>

---

<sup>①</sup> 摘自铁托一九三四年九月的报告（《选集》，第二卷）。



## 进入党的最高领导

### 了解国内局势

虽然在一九二八年的萨格勒布会议之后，派别斗争，也即左的和右的派别，遭到了严厉的谴责，但是在国外，在与国内脱离的领导层中，派别斗争仍在继续。我不想谈到底围绕哪些问题展开了派别斗争；主要的是，一九三四年以前，政治局就更换了三次。我只能说，在最初几年，这一斗争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原则的，当时涉及到各种争论以及民族问题，但是后来就成了完全无原则的了。由于派别斗争给国内的党组织带来了混乱，党组织和工人阶级建设性的工作和斗争在很大程度上陷于瘫痪。一九三六年，我在共产国际担任南斯拉夫党的问题的政治报告员时，我就一再要求党的领导回国，要求共产国际不再对他们提供任何财政援助。因为这是造成派别摩擦的一个原因，因为这些资金主要用于支付领导成员，也即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工资。当时的南共中央委员会，以第一书记戈尔基奇为首，大多数人坚决反对政治领导回国。特别反对这样做的是戈尔基奇，因为他清楚，党的领导回国的话，他就不能继续





担任南斯拉夫共产党的领导人了。中央委员会，也即它的政治局的所在地大多是在维也纳。

南共中央政治局是怎样工作的？我于一九三四年被遴选进政治局，我记得，政治局同国内的联系很少，因为党的组织丧失了对中央的信任，它们认为，党组织之所以遭到破坏是由于在中央周围有内奸，而这在某种程度上或许是对的。有一件事情可以最清楚地说明当时的局势。我一九三四年出狱以后，看到由于对南共中央普遍不信任，形势很不好。克罗地亚省委不想同设在维也纳的中央委员会保持联系。因此决定让我去维也纳，看看身居我党领导岗位的是些什么人。我很快就回来了，我说服同志们，应当同南共中央建立联系，因为我认识的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是一些可靠的同志。

在斯洛文尼亚，我也觉察到对中央委员会的不信任，那是在一九三四年秋天，我被派到卢布尔雅那去筹备第四次全国代表会议。在我之前回国的一些同志采取不正确的态度，助长了这种不信任。

党的领导机关由于同党的组织缺乏联系，不可能了解国内的形势。因此就围绕形形色色的虚拟情况展开抽象的讨论，而这种假设跟国内的实际情况毫不相干。例如，一九三五年，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内部就当时南斯拉夫正准备举行的议会选举发生了越来越尖锐的冲突。当时的领导由于不了解国内的形势，当然就不可能对大选的筹备工作采取符合实际的态度。有几位政治局委员主张同所谓的联合反对派一起行动，另一些同志则主张南共独自行动，打出劳动人民党的旗号。联合反对派是由一些资产阶级政党组成的：马切克和拉迪奇的党、民主



党、农夫党和南斯拉夫穆斯林组织。南共某些领导人想同这样一个联盟一起参加大选，但是领导这个联盟的马切克拒绝同南共在大选中进行任何合作。党的领导看到不可能同联合反对派采取联合行动，就向党员下达指示，让他们投联合反对派的票。这样一项决定产生了很严重的后果。黑山和国内其他一些地区的党组织拒绝接受让它们投联合反对派的票的指示。由于从身处国外的领导机关发来了自相矛盾的指示，引起了南斯拉夫各地的党组织的混乱。

这引起了共产国际的极大不满，这一错误的政策和不明确的表态遭到季米特洛夫和共产国际其他领导人的严厉批评。<sup>①</sup>

---

<sup>①</sup> 摘自《在贝尔格莱德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十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为实现和平和国际合作而斗争》，第二十卷）。



## 第一次到共产国际

### 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和 斯大林的路线

一九三五年一月中，中央委员会决定让我前往莫斯科，到共产国际巴尔干书记处工作。这改变了原先要我去工会红色国际工作的决定。于是，在经过了十五年之后，我又到了俄国。这是我第一次到莫斯科，因为十月革命时我没有机会去莫斯科，当年我路经列宁格勒。这次，我作为共产国际的干部被安排住在普希金广场附近高尔基大街上的“豪华”饭店里。我的办公地点在离红场不远的马霍瓦伊大街的共产国际总部。<sup>①</sup>

我一到，才知道怎么回事。在共产国际里，给我的指示不是有关国内的工作，而是让我在皮克领导下的书记处里立即负责南斯拉夫……

当时在共产国际里的有经过莱比锡审讯之后来到俄国的季米特洛夫，有马努伊尔斯基和另外一些人。我列席讨论一般问

<sup>①</sup> 摘自在库姆罗韦茨政治学校的报告。



题的共产国际的会议，因为在讨论各国党的问题时，出席的只有这些党的书记或代表。那时我发觉，对待我们的态度不大对劲。其中必定有什么名堂。有一天，季米特洛夫问我：“瓦尔特，你说，你们那里到底有没有党组织？”我告诉他有。对此，他说，他得到的报告使他觉得在我们国内不存在党组织。原来，他们是通过在维也纳的领导来看待我们党的。而在维也纳，我们的领导人彼此相争，互相指责，说来叫人感到害臊。那时我对他说：“季米特洛夫同志，你不能根据维也纳的领导来判断我们党。在我们国内，在基层，有党的组织，党员在不遗余力地进行斗争，甚至牺牲了生命。我收到了报告，我知道这些人，他们是工人。但是，我得告诉你，我们国内的党组织对领导完全丧失了信任，因为他们认为，国外去人之后不久就有许多人被捕或者有的人一到国内就被捕，责任在于领导。国外回去的人在警察面前表现很差，因为他们的缘故，一系列组织遭到破坏。由于发生这样一系列事件，党组织对现在身居领导岗位的那些人失去了信任，认为他们是内奸”。我的这番话使他大吃一惊，他感慨地摇了摇头。

不久，全体领导人都来到俄国，要解决南斯拉夫党的问题。来莫斯科的有：戈尔基奇、霍尔瓦廷（他马上被送到了学院去了）、洛夫罗·库哈尔——“理查德”、乔皮奇以及由陶器工人德拉戈·佩特罗维奇和贝尔格莱德的一名五金工人组成的国内代表团。<sup>①</sup>

---

<sup>①</sup> 摘自与《共产主义者》周报代表的谈话（《为实现和平和国际合作而斗争》，第十二卷）。



属于巴尔干国家书记处管辖的有南斯拉夫、希腊、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阿尔巴亚等国的党。为了更好地、更直接地进行领导，共产国际有好几个这样的按国家划分的书记处。问题开始在这些书记处中讨论，接着再拿到共产国际会议上讨论。领导每一个书记处的是一名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巴尔干书记处的领导人是威廉·皮克，我跟他很投缘。我列席巴尔干书记处的会议，有两次讨论南斯拉夫问题时，我还列席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我结识了许多著名领导人，例如：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帕尔米罗·陶里亚蒂、奥托·库西宁、莫里斯·多列士、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何塞·迪亚斯等。

除去日常工作之外，我有时去给列宁学校和西方少数民族共产主义大学的学员讲课，那里有一个班是培养南斯拉夫共产党人的。我们的共产党人在那里斗争得最厉害，当时的名声很差。

希特勒在德国上台以及开始危及许多国家和人民的法西斯危险，使得全世界的进步力量，特别是各国共产党，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和自己的政治路线。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对此作出了有力的贡献，最初是通过在莱比锡审讯时的光辉表现，唤起人们警惕法西斯的危险，随后是通过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他在大会上力主工人阶级建立统一战线，力主建立人民阵线。

我得说，在这个问题上，法国人走在了前面，因为是他们提出了人民阵线的问题，尔后这为共产国际所接受。我有机会从近处观察季米特洛夫的工作并目睹他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



所享有的威望。在巴尔干国家书记处和各种委员会的会议上，我掌握了巴尔干各国共产党的状况。我了解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筹备工作的性质，了解为了克服共产党和社会党之间的分裂，建立尽可能广泛的工人阶级统一战线所做的努力，这件事情是至关重要的。

问题在于要让以反法西斯为宗旨的力量组成的统一和强大的运动成为建立人民阵线的核心和支柱，作为团结和联合一切进步民主力量来与法西斯作斗争的一种形式。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我仔细地留意代表大会的工作。我出席这次代表大会是作为南共代表团的成员和秘书。我特别记得季米特洛夫的报告、他的闭幕词，还记得陶里亚蒂、西班牙共产党人、多列士以及其他法国共产党人的发言。法国共产党人当时是人民阵线主张的倡导者。这次代表大会开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在代表大会期间，我们党的代表团经常开会并讨论许多问题，其中包括干部问题、在苏联和其他国家的我国侨民的一些个人问题。代表团得到中央委员会的授权，可以以南共的名义解决许多问题。

第七次代表大会给我留下特殊印象的有两件事，这两件事在某种程度上阐明了共产国际的性质和作用以及在共产国际中所占的统治地位。

首先，斯大林只露了一两次面，坐在一根大理石柱子后面，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我们称他为老板。当时是这么叫的。

我还清楚地记得共产国际执行机构的候选委员是怎样选举产生的。我们党的代表团提名我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而且是一致通过的。然而，几天以后，我们党驻共产国际的代表



弗拉迪米尔·乔皮奇要求代表团召开紧急会议，在会上向我们通报，共产国际对我们提名的候选人不满意。乔皮奇说，这被认为是对戈尔基奇的不信任——尽管戈尔基奇是投票赞成我的，被认为是对共产国际不信任，而共产国际对戈尔基奇是很信任的。会上决定，我们得改变这个决定，以便显示我们是一致的，瓦尔特，也即我，与戈尔基奇不存在任何矛盾。这个场面是令人难堪的，尤其是对我来说，尽管我没有做任何事情促成这样一个场面。

事情很清楚，共产国际里存在派别，一些有影响的人物想使某个党内的这一方或那一方占据有利地位。这一次牵涉到戈尔基奇，很可能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马努伊尔斯基施加了影响，是他要求作这一变动的。我得说，这并非因为马努伊尔斯基有什么原因要反对我，我们后来熟悉了，关系很深。但是，当时我却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在共产国际里没有什么声望。而当时共产国际对戈尔基奇却比较了解。

共产国际对我们党是有一定的看法的，这表现在我们的干部中没有一个人被选进共产国际的执委会。惟有戈尔基奇当选为候补委员。这实际上表明南共在共产国际里站得并不很稳，而这是确凿的。那里的各种各样党的训练班、学校、大学里的党员之间的派系斗争肯定对此是有影响的。共产国际认为，南斯拉夫共产党是一个很弱小的党。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很可能是由于国内没有传来我们党正成功地展开活动的消息，尽管当时工人阶级的活动开始活跃起来，举行了规模越来越大的罢工，特别是在斯洛文尼亚，并且展开了广泛的群众性民主运动。

在一九三五年五月的议会选举期间，人民自由阵线成功地



展开了活动。越来越多的工业部门参加罢工，并扩展到南斯拉夫各地。共青团开始脱离宗派主义影响，除了学生，越来越多地吸收其他阶层的青年，特别是青年工人参加。

对于我们以及对于整个共产主义运动来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次代表大会大大改变了当时的政策，提出了新的斗争纲领。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贯彻执行得怎样？向我们的运动提供的可能性利用得如何？我得说，这些可能性利用得不够，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从国内来参加代表大会的代表没有立即回国投身于工作。即便后来有些代表回去了，也不能完全理解代表大会所提出的主张的重要意义，更谈不上本着这一精神进行活动了。布拉戈耶·帕罗维奇是例外，代表大会一结束，他就回国，进行了一个月的工作，可惜，这是他最后一次去南斯拉夫，因为那年年底，由于共产国际的干涉，也由于南共领导层内部的矛盾，他被排除出领导机构，再度被召回莫斯科。后来，他去了西班牙，在马德里牺牲了。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八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南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曾经作出决定，让我也回到中央国内局工作。但是，这项决议未能贯彻执行，因为国内的组织遭到大破坏，共产党员遭到大逮捕，要我推迟回国。于是我就留在莫斯科。从一九三五年年底到一九三六年三月，国内逮捕了大约一千名共产党人。七十五个地方的大部分领导干部落到警方的手中。党的各个省委的几乎全体委员以及共青团中央的许多领导人都被逮捕了，党的特科被破坏。当局对我们运动的这次新进攻也使得贯彻执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工作延缓了。





在这一切情况中，最严重的是逮捕影响了南共中央的态度，南共中央当时设在维也纳。中央委员会中的斗争尖锐化了，重新出现了小集团活动，甚至派别活动。党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又回到了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前时期的立场，重新出现了宗派活动等等，这清楚地表明，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真正意图未被理解。这特别表现在一九三六年四月召开的南共中央全会的决议中。那时，共产国际再次进行了干预，废除了这次全会的决议并决定改换南共领导。一九三六年八月底，在莫斯科举行了党的领导干部会议，会上对南共中央的工作进行了分析，还变动了领导班子。

征得共产国际领导的同意，会议通过决议，决定让我回国，在国内为组成领导班子创造条件，由我接管直接领导，并负责国内党的工作。关于一部分领导转回国内的决定是我党最优秀的干部的一项重大胜利，很早以前他们就提出过这个建议，他们一贯致力于完全摆脱宗派活动。主张加强南共的团结和使南共独立。当然，回国的只是一部分人，我作为组织书记，在党内的工作最多，我回国了，而政治书记戈尔基奇和两名委员则留在巴黎，从国外进行领导。

当然，我们致力于制订南斯拉夫革命工人运动自己的政治纲领。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着手采取某些实际步骤。我们感觉到，要把党建成为工人阶级革命的先锋队，新的战略策略主张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采取实际步骤。我清楚：第一，我们必须让整个中央委员会从国外回来；第二，我们必须摆脱共产国际的庇护，必须不再盲目地、不加批判地接受某个控制一切的共产主义中心的指示并加以贯彻执行；第三，我们必须摆脱外



界的金钱上的资助。在这一点上，我取得季米特洛夫的谅解。当然，要是我去问斯大林的话，他是不会同意的，因为他想用不多一点钱把我们套住。

我坚信，领导必须同党员和劳动群众保持直接接触。因此，我公开地说，我们不再需要津贴，我们党自己会努力做这件事，也即我们在国内可以得到金钱方面的支持。做到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因此使一个运动情绪低落的原因莫过于从外界得到钱。这样的援助只会使干部堕落，更不用说使干部依赖于给钱的一方了。

你们看，这一点对于我们来说，后来从来不成问题。我们有钱来从事我们需要做的事情，用来出版报刊。我们从前得到的钱是产生派别活动的原因之一，因为钱在上层分掉了，并未用于出版活动，没有用于出版我们的书籍，而是用于支付工资，而工资又相当高。我还记得，我进入中央委员会后，我的工资相当高，我以前当工人时从来没有拿过这样高的工资。如果以此作为标准来衡量的话，身居国外，又拿高工资就划得来了，同时又不冒被警察逮捕的风险。

然而，我们坚决终止了接受外界的援助，终于让党的领导回到了国内。我们让党的领导回到党员、工人和青年中去，去参加他们的斗争，了解他们的愿望。我认为，走这一步是完全走对了。我们不仅以此来表示反对从国外进行机械的领导，反对教条和宗派主义的方法，而且我们使南共面对实际生活问题，面对本国各族人民和本国工人阶级。我认为，在当时，这是南共健康的核心作出的关键性决定之一，因为它意味着我们摆脱了对共产国际的依赖。第七次代表大会之后，官僚主义的



工作方法和斯大林的路线在共产国际中很快占据了上风。国际无产阶级的这个领导机构变成了苏联政策的辅助机关。

事实上，自三十年代起，共产国际的工作中就存在宗派主义的成分，这对各国共产党，也包括对我们党的工作和政策起了消极作用，特别是对侨居国外的中央委员会所通过的个别政治文件起了消极作用。这些文件常常是一些抽象的宣言，脱离实际，因此不可能起到动员作用，不可能指导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斗争。当时已经很清楚，工人阶级的斗争不能从外面，从一个总的中心来指挥。这实际上是我们同斯大林的冲突的开始，应该这么来看待。因为我们当时就致力于使我们的党独立，实际上进行了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而且不仅是在国际上，在自身的队伍中也是进行这种斗争的。<sup>①</sup>

---

<sup>①</sup> 摘自在库姆罗韦茨政治学校的报告。



## 处于党的领导岗位上

### 返回国内

我是在一九三六年深秋自苏联回国的，此前，我参加了共产国际的一次会议，会上提出并解决了撤换旧的领导和组成新的领导的问题。同时，我提出了一项建议：如果我们想取得成绩的话，南共政治局不应再呆在国外，而应在国内。主持这次会议的季米特洛夫赞成我的建议，但是其他成员，马努伊尔斯基和其他一些人反对完全接受这一建议。建议只有部分地被采纳，也即政治局的一半成员在国内，而以政治书记戈尔基奇为首的另一半留在国外。我当选为我们党的组织书记，我可以在国内工作。

我经过波兰先到了布拉格。一路上没有冒什么风险，因为我很容易就到了那里。在布拉格，我首先要整顿老的领导，把工作得很好的一些同志派到西班牙去，而把另一些人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后来，我前往维也纳，在那里停留了一个短时期，一九三七年春我来到萨格勒布。

在萨格勒布，当时我的接头人通常是斯特凡·加洛加扎。



通过加洛加扎，我跟萨格勒布的同志们，跟拉德·康查尔和其他一些人接上了头，而通过他们，又跟贝尔格莱德的同志们联系上了。在那里，我认为可以依靠的第一批同志中，在贝尔格莱德的有贝尔格莱德大学学生、共青团书记洛拉·里巴尔，而在萨格勒布，则有拉德·康查尔。我还跟斯洛文尼亚的一些同志们接上了头。我记不起来，跟我接上头的斯洛文尼亚的头一批同志是哪些人……卡德尔同志当时还在国外。

特别重要的是，在最初一个时期，领导要呆在萨格勒布，因为萨格勒布比起贝尔格莱德来是警察难以打进共产党人队伍的一个中心，贝尔格莱德有能干的警察，他们懂得派内奸打进共产党人的队伍，因此，早在一九二八年，在我们党内就发现了由贝尔格莱德警方派进来的一系列人。我之所以呆在萨格勒布，还由于在那里我可以安全无虞，因为我了解那里的人，他们对我是无条件忠诚的，我可以化装后秘密地走动。这使我可以比在南斯拉夫任何一个地方更加有效得多地工作。

关于整顿党，把形形色色的分子清除出党的问题，当然，我不可能都在萨格勒布解决。这项工作，我主要是在巴黎进行的，因为我在萨格勒布呆得时间不长，马上往回走，到国外去，到巴黎去。我主要是在巴黎跟其他领导成员一起工作。在巴黎，我可以更多地从事考察出狱的人的工作，从事清除形形色色的内奸和派别分子的工作，我在去巴黎之前就已经有了一个核心。这个核心是：兰科维奇、洛拉·里巴尔、拉德·康查尔、约西普·克拉什、弗朗茨·莱斯科舍克等人，有一些同志可以根据我的指示继续在国内做工作。我经常在国外，我多次从萨格勒布去巴黎，又从巴黎回到南斯拉夫。一九三七年，我三次



返回南斯拉夫，随后又离开。一九三八年和一九三九年同样如此。我可以这样说，从一九三七年起，自从我们开始对党加以整顿，自从我们开始在工人中间展开有力的宣传，很快就显示了明显的成绩。<sup>①</sup>

## 我采取另一种策略

一九三六年十月，共产国际派我回国工作。我的任务是先去维也纳，然后回国，在国内领导党的工作，同时由我在新领导中承担主要责任。

在维也纳，在原来的领导机构中只剩下了塞尼科[弗拉迪米尔·乔皮奇]、安德烈[斯捷潘·茨维伊奇]和穆克。在我抵达维也纳之前，其他成员都遭警察逮捕：奥斯卡[卡尔·胡多马利]、瓦利奇[沃朗茨·普雷日霍夫]、日列扎尔[伊万·马里奇]、比斯特里[斯尔贾·普里察]、马鲁希奇、共青团书记多布里奇[鲍里斯·基德里奇]以及共青团中央委员弗拉达[卡尔·卢特尔]。根据共产国际给我的指示，我免除了塞尼科和安德烈的职务，派他们去布拉格。

一个月过去了，戈尔基奇到了，他向我们宣布已任命了以他为首的新领导：戈尔基奇、瓦尔特[铁托]、罗任科[罗·乔

---

<sup>①</sup> 摘自对战前地下工作的回忆(《言论集》、萨格勒布，一九五九年版，第八卷)。



拉科维奇]、里赫特[斯·茹约维奇]，而在国内则有斯洛文尼亚工会领导人莱斯科舍克同志。戈尔基奇说，他自己被任命为书记，拥有否决权。我表示同意，但是我感到奇怪和难理解的是，他怎么享有否决权？

根据戈尔基奇的指示，十二月初，我短期回国，任务是准备发动志愿人员去西班牙，并消除与斯洛文尼亚同志们的冲突。

斯洛文尼亚有省的领导，很多地方存在党组织，但是斯洛文尼亚的同志们中断了与南共中央的联系，原因是由于中央政治局委员奥斯卡的错误，地下组织遭到破坏。奥斯卡作为中央组织书记把一位十六岁的联络员姑娘叫到维也纳去，回国时她在边界被捕了，由于害怕，她全部招认了。在她身上搜出了有关青年合法工作和党的秘密工作的指示。为此，党和青年团的许多同志被捕了。合法的青年报纸《青年信使报》也遭查封。

这件事使得斯洛文尼亚的同志们非常愤怒。形形色色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其他不健康分子利用了这种情绪，来反对中央和党，要求斯洛文尼亚共产党与南共断绝关系。

我到达斯洛文尼亚后，即与领导人开会，在这次会议上彻底消除了冲突。我向同志们谈了，他们哪些地方是对的，哪些地方不对。

在萨格勒布，我发现警察把党的组织和领导完全搞垮了。

我没有像以往那样下决心重新建立新的领导，而是决定等一等，等把警察可以利用来找到新领导的线索全部中断之后再谈。虽然我有可能建立新的省委，我还是采用了另一种策略：我为每一个部门规定了合法的工作形式，指定一位或几位同志



充当这项工作的领导人，而他们必须同我进行直接联系。例如，我为工会指定了工会委员会，在工人党里指定了一个发起委员会。

我完成了在萨格勒布的工作之后，前往达尔马提亚。在达尔马提亚，我同丘利奇和特雷乌尔西奇同志会了面。从达尔马提亚我直接到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我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底抵达布拉格的。我向戈尔基奇汇报了工作完成的情况。

八天之后，我肩负着领导党的工作的任务回国。我还须筹备克罗地亚共产党和斯洛文尼亚共产党代表大会。三月份，我又被叫到巴黎汇报情况。我在巴黎逗留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在此期间，我曾被派到维也纳和布拉格，去整顿特科。完成这项工作后，我又到了巴黎，汇报工作后，我又回国，在国内一直停留到一九三七年八月。一九三七年，我在国内总共逗留了七个月。





## 在巴黎的情况

### 我没有把任何人遴选进政治局

一九三七年八月，我接到通知，让我立即前往巴黎。在那里，我得知，戈尔基奇被紧急召回共产国际，由我担任党的书记的职务。当时在巴黎的全体同志都表同意。戈尔基奇离开巴黎时，他把所有的工作都交给了罗任科[罗·乔拉科维奇]同志。罗任科同志开始时出任组织书记的职务。后来，戈尔基奇指定是赫特[斯·茹约维奇]为组织书记，而罗任科任《无产者报》的主编，同时又是戈尔基奇的助手。至于我，我负责国内的工作。戈尔基奇把工作交给了罗任科，说他对罗任科最信任。开始时，我有点犹豫，是否接管这一负责职务，但是，当我看到，许多同志对罗任科不信任，而且罗任科本人也建议我接任这一职务，于是我就担负起这一职务。

在巴黎，除了中央委员罗任科和里赫特之外，还有下列同志：佩特罗夫[伊万·克尔恩德利]，他是侨民报纸《移民信使报》的主编。此外，还有获释后从维也纳来到巴黎的一些同志：南共中央委员瓦利奇、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南共中央委员日



列扎尔、南共中央委员奥斯卡、共青团中央委员弗拉多。除了这些同志外，还有比斯特里〔斯尔贾·普里察〕同志、中央打字员伊冯〔哈布林〕同志以及管理我们在巴黎的书店的弗拉多〔日沃因·帕夫洛维奇〕同志。

我要求在巴黎的其他同志严守纪律，等候共产国际解决我们的问题，因为已经知道戈尔基奇被捕了。

我没有把任何人遴选进政治局，因为我知道，在出现这些事情之后，我没有权利这么做，但是有必要的话，我总是邀请其他同志列席领导机构的会议。

罗任科严守纪律，但是他不能忍受我对他的不信任。里赫特一直是严守纪律的，佩特罗夫也是这样，但是对我帮助最大的是瓦利奇，他全身心地致力于工作。多布里奇〔鲍·基德里奇〕同样严守纪律。

一九三七年秋天，我犯了一个大错误，我没有等共产国际回复，就把罗任科派回国工作。等我接到回复，说不能把罗任科派回国，我又立即把他从国内召回，他在国内只呆了十四天。

在财务问题上，需要采取措施，因为自从一九三七年八月起，我们就没有从共产国际得到任何资助。我于一九三七年秋天给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我们的同志们写了呼吁信，吁请他们组织对我们党的支援。过了几个月之后，我曾几次收到那里寄来的两百至两百五十美元，然而这一切实在太少了。在巴黎，连我自己都无法维持生活。

我跟巴黎的同志们取得了一致意见，决定取消领导机构。我自己承担了这件事的全部责任，我启程回国，以便在共产国际解决我们的问题之前建立起一个临时领导班子。



我在国内逗留了两个半月，接到共产国际指示我才离开国内。在这两个半月时间内，我做了以下工作：

我是在联合工人工会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一个月返回的。我跟工会委员会的同志们一起准备了在代表大会上的发言以及我们的整个策略和路线。四月二十日<sup>①</sup>，我参加了斯洛文尼亚的党代表大会。我改组了克罗地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因为有两名中央委员——戈罗娃及格雷戈里奇——被捕了。我跟工人党发起委员会的同志们一起筹备了工人党代表会议，这次会议于六月十六日举行。<sup>②</sup>我跟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同志们一起准备恢复那里的党组织和召开党的代表会议，会议于七月份举行。我曾前往塞尔维亚，与同志们商谈我们反对德拉戈柳布·约万诺维奇和联合反对派的分裂主义活动的路线和策略。我组织召开了由一些同志、斯洛文尼亚的几名中央委员、克罗地亚的几名中央委员、塞尔维亚党的领导中的两名成员参加的会议。我从这三个地方的领导机构中，组成了主持日常问题的临时领导。

尽管国内存在种种困难，我们党的工作还是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我并不认为这是自己的功劳，而是在于我们的基层领导干部表现出了巨大的创造精神。我对同志们说，不要每一件小事情都等待中央作出指示，他们必须自己大胆地去处理各种问题，尽管在这么做的时候，有时候会犯错误。<sup>③</sup>

① 应为四月十七日。——原注

② 这次代表会议是在一个月之前举行的。——原注

③ 摘自瓦尔特一九三八年九月二日致南共的报告（《选集》，第四卷）。



## 改组与巩固党

### 人人互不信任

我第二次回国[一九三六年底]要完成的任务主要有如下几项：

一、征求负责领导工作的党的积极分子的意见，即举行全国会议，讨论改组党组织的问题，按照我们发给你们的建议的精神及本着我们党一月决议和宣言的精神最大限度地利用合法工作的可能性；

二、消除和纠正斯洛文尼亚党组织对党中央委员会的不正常态度；

三、调查青年组织的状况，并尽可能地在国内成立青年的领导机构；

四、尽可能地调查我们在各个领域的工作情况和工作，至少是调查三个主要省的情况和工作；

五、帮助和监督“出国旅游”[志愿人员去西班牙]。

尽管我在国内不是像最初打算的那样呆一个月，而是呆了整整三个月，但是，我仍未完全按照我回国前的设想全部完成



任务。我要马上提醒一下，“旅游”<sup>①</sup>花费了我许多时间。恰巧在这时，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随着特科主要负责人的被捕，萨格勒布党组织也逐渐地遭到了破坏，这种状况持续了整整四个月，即直到今年三月才结束，除省委遭破坏外，整个地方委员会和两个区委也垮了。由于不仅在萨格勒布，而且也在贝尔格莱德，某些具有合法身份的积极分子通过党的非法机构而使党组遭到了破坏，我们党陷入了十分艰难的境地，也就是说，普遍相互不信任，特别是对我们党的中央委员会不信任，有抱怨情绪，许多党员，尤其是斯洛文尼亚以及萨格勒布等地的党员认为，中央委员会要对党组织遭到破坏承担主要责任。而某些不健康分子又助长了这样一种趋势，他们在我们党内几乎在所有比较大的地方都有，这些人通常是些进行政治投机的知识分子。在斯洛文尼亚，在一定程度上还有达尔马提亚的一些党员，在他们还不了解我是干什么的时候，竟然把我本人当作内奸。甚至一些同我有私交的非常有名的和杰出的同志断言我是个信得过的人，居然还不相信我。自然，这种情况是由那些不健康分子制造的某种倾向造成的，这些人在我们党内开始搞阴谋，因而害怕监督，害怕追究。

由于存在这样的情况 and 缺少特科机关，以及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我没有（除斯洛文尼亚外）能召开有组织的会议，而是根据我自己的判断，请来一至三个同志，征询他们的意见。我一共与全国各地负责领导工作的大约三十名积极分子谈了话。

<sup>①</sup> “旅游”是指派遣去西班牙的志愿人员。——原注



## 在斯洛文尼亚的工作

### 消除一切分歧

我一到斯洛文尼亚，就马上同斯洛文尼亚的同志取得了联系，去斯洛文尼亚，首先是为了组织“旅游”[派遣志愿人员去西班牙]为由，到那时他们在这方面尚未做任何工作。会议的筹备工作进行得相当艰难，相当慢。最后，我担心整个事情告吹，决定自己负起全部责任来，亲自召开了会议，会议进展顺利。出席会议的有省委委员和我们的新政治局委员。

我过去在同斯洛文尼亚的个别同志交谈中就已发现，他们自己已开始认识到，他们走错了路，在这次会议上，这一点尤为突出，他们在会上拒绝为卡塔琳娜[玛丽娅·维尔芳]写给共产国际的信承担责任，因为他们说，他们并没有写这封信，也没有怂恿写这封信。我具体问他们对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有什么意见？他们认为中央委员会犯了什么错误？他们对这个问题所能作出的全部回答是：①中央委员会对斯洛文尼亚党组织的最近遭破坏具有责任，因为一位中央委员(奥斯卡)[卡尔洛·胡多马利]把一位少女叫到维也纳，叫到他身边去，而这位少女



在回来的路上被捕了，于是把她知道的情况全都招供出来了，在她身上搜出了合法和非法的材料，此后党组织的合法工作也遭到了破坏；②中央委员会派来传达指示的很多的特派员对党的决议或共产国际七大的路线作出了不同的解释，因此，在党的干部和青年当中造成了混乱。斯洛文尼亚的同志主要是对奥斯卡、弗拉多和弗朗策克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我问他们是否了解：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我们党最艰难的日子里，正是中央委员会在各个方面给了斯洛文尼亚党的组织以最大的帮助，他们在回答我的这个问题时表示对此有所了解，但是只是对一九三六年的工作方法有意见。我向他们解释了卡塔琳娜那封反党信的意图以及那封信在共产国际造成的恶劣印象，他们感到很难堪，说他们与此信无关。

我向他们简要地说明了新决议和宣言的内容、我们在组织方面的建议、领导方式以及关于党的领导机构今后将设在国内的决定，他们对这一切都表示同意，举双手欢迎。我得到的印象，他们希望尽快消除这种令人不快的局面，尽快在他们同南共中央委员会之间建立起正常的关系。他们表明，他们认为一切分歧业已消除，今后再也不会发生类似的事情了。自然，我当即作了自我批评，谈到了中央委员会所犯的错误以及中央委员会对其成员的行动所承担的责任。

平民阵线。平民阵线的领导班子由四人组成，我们的人占据了其中的两个席位。在盟友当中，库科瓦茨特别受到大家的赞扬，都说他聪明，而且事实证明他确实是如此，而大家说隆查尔高傲自大，有当领袖的强烈欲望。平民阵线的工作是，在小镇和农村不断召开各种各样的追随者会议，这种会大多是在



星期日和节假日召开的。我们通常从大学生和知识界把支持我们的人派去参加这些会议，作报告，因为盟友没有这样的人。支持平民阵线的人不断增加。从科罗舍茨的党(现在叫南斯拉夫激进会)加入平民阵线的人尤其多，因为大部分人不同意科罗舍茨的政策，特别是不同意当局在斯洛文尼亚最近的市镇选举时所采用的方法。

在此期间平民阵线的机关报《大地》仍未出版，但是他们承诺在一个月之内复刊。马里博尔出版了人民阵线的机关报……[《独立报》]，为资助该报出版，一位赞助者捐给该报六万第纳尔。

在克罗地亚运动的领导机构和斯洛文尼亚平民阵线的领导机构之间关系不是太好。马切克周围的反革命领导人，也许还有马切克本人，不希望斯洛文尼亚存在一个独立的平民阵线，而希望出现一个将成为马切克运动组成部分的运动。因此他们反对平民阵线，因为工人阶级是作为平等的政治因素参加到这个阵线之中的。同志们说，萨格勒布印了大约一万张准备在斯洛文尼亚散发的传单，其中对共产党人作了最激烈的攻击。斯洛文尼亚人把大部分传单都销毁了，并回应说，在斯洛文尼亚没有工人，就没有平民阵线，因为没有工人，平民阵线就毫无意义了。然而，马切克运动的领导这时采取了另外一种策略：他们把自己的代表派到斯洛文尼亚的农村去，派到贝拉克拉伊纳和梅久穆尔耶去，在那里企图避开平民阵线建立自己的独立的组织。但是，斯洛文尼亚平民阵线将予以抵制，因为斯洛文尼亚跟克罗地亚一样，有自己民族和文化的需要；斯洛文尼亚同样必须把本民族所有民主力量组成一个阵线，为争取斯洛文





尼亚的民族解放，为争取斯洛文尼亚人民的民主和权利而斗争。尽管如此，斯洛文尼亚平民阵线仍希望在争取民族解放、争取民主和自由的斗争中作为代表斯洛文尼亚全体人民利益的一个平等的政治力量同克罗地亚运动进行最密切的合作。

斯洛文尼亚的工会运动搞得相当好。特别是在去年罢工取得胜利后，工人对工会组织的兴趣更大了，阶级工会的影响增大了，这一点在今年选举工人代表的活动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因为几乎在各地我们的人都当选了。斯洛文尼亚行动上的一致十分牢固。斯洛文尼亚全国一致行动委员会仍然存在并在活动。例如，在耶塞尼察，一月份工人和厂方发生了争端，原因是厂方想往劳资合同中加一条，即一旦发生罢工，劳资合同不再有效。在这个工会里有三个工会组织的会员，尽管其中大部分是我们的会员，但是我们的人还是决定这么办：召开一次全体职工大会，由我们的组织领导，再召开一次全体职工大会，由另一个组织领导，召开第三次全体职工大会，由第三个组织领导，但是每次职工大会所有工会组织的会员和负责人都参加。

社会民主党的某些领导人仍一直对以下事实耿耿于怀，即我们的一些同志在群众中享有越来越高的威信。例如，他们想强行把L[莱斯科舍克]开除出社会民主党。他们想开除他是因为他违犯纪律。原因是这样的：他们从贝尔格莱德向各地方组织散发了一份传单，传单激烈攻击共产党人，要求身为主席的[莱斯科舍克]在这份传单上签字，但是他没有签，因此他们对他恨得要死。

可见，从我得到的上述情报中可以看出，斯洛文尼亚的情



况毕竟还是最好的。党组织是完整的，同地方保持着联系，省委完好无损等等。在他们那里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依然相当模糊，例如，把统一工人党同平民阵线混为一谈，反之亦然。应当帮助他们，我相信，到他们那里去的同志会很好地完成这一任务。

至于说为斯洛[文尼亚]共产党的建立举行盛大“婚礼”[代表大会]的事，我当时就同他们商量好了：在两个月内举行，但是我认为，必须审慎行事，以免出差错，因为对党和中央委员会的信任只有用这样的办法才能恢复，即避免因中央委员会或者个别中央委员的责任而可能出大漏子。人们有理由相信我们使安全得到最大限度的保证，特别是就方针而言就更是如此了。不过，他们说，他们知道，就是从事合法活动，也可能被逮捕，但是，他们说，如果不能证明他们同党的某个非法机构有联系，那么他们在警察局，在法庭上的表现将会是另外的样子。<sup>①</sup>

---

<sup>①</sup> 摘自铁托一九三七年四月九日报告(《选集》，第三卷)。



## 青年问题

### 改组势在必行

我为了“旅游”[派遣志愿人员去西班牙]事宜第一次在国内逗留时就已看到青年当中存在相当大的混乱。我第二次去国内时给我的任务是研究青年问题，可能的话，加以整顿。人们纷纷埋怨，特别是就萨格勒布的青年组织而言，说在改组青年组织的过程中产生了混乱，谁也不再听谁的。菲利普[斯特凡·米特罗维奇]在改组工作刚刚开始时就被捕了，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上述情况的产生，但是，据我得到的情况，菲利普也操之过急了。他们解散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团，青年团解散之后，这些被解散的青年人无所适从。

萨格勒布解散了共青团地方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把拥护党的人吸收入党了，而其余的青年则任其自流，纪律很涣散。有的人说，“我再也不听别人的话了”，“干吗要让那些自封的人命令我干点什么？”等等。对那些已被吸收入党的青年采取了如下办法：例如，在医学院，青年党员选举了三名党员作为支部委员，这样做是对的，可是，其余的青年党员就不知道该



怎么办了；没有让他们分头加入某个群众组织。

的确，改组的工作必须进行，应当进行，但是为此需要进行各种准备，也即应当知道，我们的这些青年将在什么地方找到工作。克罗地亚农民党在萨格勒布大学里或许有二十名左右成员。他们对团结青年丝毫未表现出任何主动性。教权主义者和弗兰克分子则在农村和城市拉拢青年。遗憾的是，我们仍然不得不指出，左翼青年的大多数是由青年学生组成的，而大多数青年农民和青年工人还没有被争取过来。

我们同莱奥·马特斯和伊沃·洛拉·里巴尔商定：青年的合法领导由领导各群众组织的青年组成，无论是大学的，还是其他地方的。《青年之声》仍然是指导克罗地亚青年的报纸，在各地建立《青年之声》分支机构，它将同时是有关地方的青年运动的领导机构。

为了清除教权主义分子和法西斯分子的影响，应当努力在所有的乡村和地方建立克罗地亚工人工会的青年组织，而且这应当成为我们的青年同志发挥作用主要场所。

由于在贝尔格莱德，在大学里建立了反法西斯青年阵线（根据共同行动纲领，加入这一阵线的有两千多名青年，包括左派人士、民主人士、农夫党人和激进党人，等等），因此，我们在萨格勒布也达成了协议：同所有民主青年组织也建立这样一个团体。

由于我在萨格勒布建立了青年学生的合法领导机构，我还组织了完全合法地进行工作的临时中央领导机构，参加这个机构的有：莱奥·马特斯、伊沃·洛拉·里巴尔和鲍里斯·克拉伊格尔。斯洛文尼亚人和达尔马提亚人应当各自确定派一人参



加。我下达了明确的工作指示，同莱奥·马特斯和伊沃·洛拉·里巴尔就避免进行任何非法的工作进行了广泛的商谈。<sup>①</sup>

---

<sup>①</sup> 摘自铁托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二日报告（《选集》，第三卷）。



## 萨格勒布党组织的情况

### 人们没有睡大觉，而是在干工作

我发现萨格勒布党组织的情况很糟。上面我已提过，恰恰此时萨格勒布党组织遭到了破坏。尽管党的基层组织几乎大部分仍然是完好的，因为警察只破坏了省委、地方委员会和第二区委的领导机构，但是，为了慎重起见，我仍不想建立新的委员会，因为无法弄清，谁是警察留下来的“种子”，其次，因为我认为，这次应当在挑选和考验干部方面更加小心谨慎地开展这项工作。

我在萨格勒布总共同大约十四名积极分子谈了话。这些人的情绪非常坏，特别是在十一月组织遭到破坏之后，发起委员会的有合法身份的人也牵扯进去了。人们对党的领导的信任发生了十分严重的动摇；有人指责说，具有合法身份的和非法身份的积极分子的命运全都掌握在几个不成熟的，未经过考验的“学生”手中。我有机会同来自帕克拉茨的一位党员同志谈话，他非常详细地向我讲述了他们那里的工作情况。他们有地委，然而他们把全部工作都置于合法的基础上。他们不仅在地方上



有统一工人党的委员会，乡村也有。他们同拉迪奇分子一起参加选举。在区政府里有三个我们的同志，他们在区里和在选民当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们通过区得到了资金援助，建立工人图书馆。他们在工会里的工作做得很好。一句话，人们没有睡大觉，而是在干工作。他们自觉地和尽力地工作，但是我得提一提，我对他们对各种问题的正确理解简直感到惊讶，虽然他们手头并没有任何指示；他们对问题的理解比在大城市的那些人要正确，正确得多，而大城市里的人高谈阔论，没有多大用处。

工会的情况要好得多。主要是因为工会里确实有一批人多多少少在独立地工作。克罗地亚的工会组织又发展起来了。那股转入克罗地亚工人工会的带有威胁性的浪潮在颇大程度上削弱了。在工人们已加入克罗地亚工人工会的许多地方，他们对克罗地亚工人工会领袖的工会政策感到失望，于是回过头来参加自己的阶级组织，或者违背领导的意愿，与统一工人工会的工人合作。特别是在“蒂瓦尔”电车制造厂的工人当中，以及其他大企业选举工人代表时，对克罗地亚工人工会领导的工会政策的不满表现得尤其强烈。萨格勒布的电车工人曾向克罗地亚工人工会及其领导建议，在选举中联合行动，但是他们对此连听都不想听；于是我们的人单独提出了一份名单，这是出于以下考虑：这份名单可以争取所有的工人以及那些可能既不投票支持克罗地亚工人工会，也不投票支持统一工人工会的人。倘若考虑到克罗地亚工人工会的宣传运动以及各种各样的威胁，那么，这确实是很大的胜利，因为我们只差两票就得到了半数的票。



据我们的某些领导同志讲，估计工会今年夏天要举行较大规模的罢工。他们的想法是，有可能动员十二万多工人参加罢工，也就是说，不是零零星星地罢工，而是采取比较大规模的行动，因此，需要外来的物质援助，因为国内不可能筹集能使这样一次大规模的罢工取得成功的大量资金。自然，我没有向他们作出任何许诺，而是向他们建议，现在就为全国范围的联合行动进行准备，确保这一行动取得成功，并借此机会争取向他们提供的一切可能，而去年的斗争和相互声援的例子部分地表明，是有这样的可能的。只是这次需要组织得更好并且扩大到全国。选出一个领导全国的中央行动委员会。为此我们已商量好：在复活节举行一次来自萨格勒布、贝尔格莱德、卢布尔雅那以及斯普利特的领导人的小型会议，就各种问题，例如工会内部的关系达成一致意见。





## 萨格勒布的文化工作

### 我最喜欢斯特万·加洛加日

萨格勒布有一个教育委员会，围绕这个委员会大约五十个文学和知识界的各方面的青年。到现在为止他们尚未有组织地进行工作。我得到了他们送来的一份报告，报告中对我们党，即党的领导根本不注重这个领域的工作，不向这个领域的工作提供物质援助等等表示不满。在这份报告中，他们简要地阐述了应当怎样在这一领域开展工作的意见，后来我们就此具体地进行了讨论。他们建议：①根据工作门类多的需要扩大这个委员会（委员会现总共有四人）；②明确规定各个委员负责各项工作的职责。这些工作是：

出版书报和杂志：1)政论文章；2)纯文学作品；3)经济文章和作品；4)各种专业性的文章及作品。

团结各种自由职业者：1)建筑师；2)医师；3)律师等等。

该委员会迄今主要是出版各种小册子和书籍。最近定期出版反法西斯报纸《世界大事》。他们需要物质援助，以便能出版一份文学杂志，这样通过这份杂志可以团结青年作家，要不



然，这些青年作家就会在教权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报刊上发表文章和作品。另外，他们提出，保证使他们能定期从国外得到最新和现实性最强的作品，这样他们就可以立即把这些作品翻译出来，由自己的出版企业“新书”出版社出版。

《农民思想报》也是在他们的控制下出版的，而出版这份报纸的是一些年轻的拉迪奇分子，他们曾同我们的人一起蹲过牢，例如鲁普契奇、弗朗内基奇等等。这确实是一份极好的农民报纸，同时也是一份反法西斯的报纸，在农村有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这份报纸。

我还找一个人谈了话。在我向他说明了我们改组整个工作和领导机构的原因之后，他同意开展合作，可是在他的身上还可以看到一种老毛病：不管你问到谁，他都说不行。

我最喜欢斯特万·加洛加日，尽管他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我听说他工作很积极，尤其是要出版什么小册子，或者什么书时，他更是办事机灵。他出版了曼[奥古斯特·采萨雷茨]写的书，总共有六千册，他得在警察的鼻子底下一印张一印张地把印好的书偷走，然后换个地方装订。警察局气急败坏，这本书在萨格勒布竟然到处都是。

## 不要怕承担责任

凡是听取我阐明这次改组的实质和领导机构体制的人都同意这么做。大家都认为，这在今天的情况下确实是最好的办法。我注意到，这个消息对他们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人们又开



始恢复信心了。由于这一消息在萨格勒布，在我们的干部当中普遍地流传开了，因此我听到了各方面的反响。

我同来自贝尔格莱德的三位领导同志谈过话，他们是米洛万·吉拉斯、久罗·斯特鲁加尔以及武基察·米特罗维奇。我最先见到米·吉拉斯，他告诉了我几个情况，从这些情况中我难以对他们的工作得出某种印象深刻的概念，这也许是因为那里恰恰没有开展什么特别的活动从而工作也就没有做出成绩的缘故吧。

有过一个发起委员会，但是人员不全，因为有些人被捕了，例如，泽姆里奇 [米尔科·托米奇]，而帕夫莱·帕夫洛维奇则采取完全消极的态度，什么也不想干。

吉拉斯建议，吸收年轻人参加委员会，因为工作要取得更大的成效，就需要新生力量，年轻人腿脚勤。他说，出版政治性杂志，绝对不可能，因为他说，书报检查机构甚至把民主党派的报纸《回声报》也给查封了。我们最后取得一致意见：出版一份杂志，因为这毕竟容易通过些。

人民阵线的工作进展缓慢。我们的人同日夫科·托帕洛维奇的接触中断了，他们以怀疑的眼光来看待托帕洛维奇的行动，即吸收工人参加民主的反对派，即联合反对派。他们反对日夫科在联合反对派中代表联合劳动人民党，“因为他想戏弄我们”。我们取得一致意见，很快同日夫科和其他同志重新建立联系，并进行谈判，一月声明可以作为谈判的基础。我还在国内时就得到消息说，谈判已重新开始。

几乎我们所有的人都患有一种不可治愈的通病，这在塞尔维亚的同志们身上尤为明显，这就是，他们总是断言，社会党



人“确实一点不起作用，因此从他们那里什么好处也得不到”。我看到，我们的同志只是出于纪律性才迫不得已去接近社会民主党人，而不是出于信念，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

米洛万·吉拉斯同志对违反纪律的情况感到十分恼火，不守纪律给工作造成许多损失。他要求严厉惩处那些不守纪律的人，以便树立担任领导职务的人的威信。总的来说大家都对威信这个问题感到头痛。

关于改组的方案，三个人都认为很好。他们说，应当立即把合法工作同地下工作分开。米洛万·吉拉斯要求，党的下级组织不得发号施令，而是仅对执行党的路线进行监督。为此领导工作和指示应由固定的人口头传达。

久罗·斯特鲁加尔和武基察·米特罗维奇实际上在此期间主持党的工作。无论是省委，还是地方委员会人员都不全，省委和地方委员会都各自只有两位同志，但是合法工作仍在继续。因为人们是独自进行工作的。我的态度跟在萨格勒布一样，等到时机成熟时再建立省委和地方委员会。

我同达尔马提亚的省委书记谈过几次：那里的情况相对而言是较好的。那里对待领导的态度也是最好的。省委的人员齐备，同自己在达尔马提亚的组织有着密切的联系。



## 建立斯洛文尼亚共产党 和克罗地亚共产党

### 我们明白，我们将达到目的

我在不同的场合曾多次谈过召开克罗地亚共产党成立代表大会的事。今天我愿意也许略为详细地谈谈这个问题。

当时的情况怎样呢？你们知道，那时是极为困难的。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之间的民族仇视日益严重。拉迪奇分子开始同大塞尔维亚资产阶级称兄道弟，于是，自然在农民群众的队伍里出现了波动，他们失去了对领导的信任。但是，同时，在议会里发生了众所周知的不幸事件，拉迪奇以及克罗地亚农民党的某些领导人被打死。

事后，群情激愤，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之间，尤其是克罗地亚农民和塞尔维亚农民之间的冲突和仇恨进一步加剧了。共产党那时刚开始恢复和发展。但是，党仍然发出了最强烈的抗议声。一九二八年，共产党员的鲜血洒在萨格勒布的大街上。工人阶级比较弱小，而且迷失了方向。在工会里，在统一工人



工会和各个独立工会之间也普遍出现了分裂。事实上，南斯拉夫在政治上分成了许多派别。共产党尽管当时遭到了各种各样的大屠杀，遭到亚历山大国王以及大塞尔维亚霸权主义者的大屠杀，还是存在下来了，并且得到了加强。

我们那时就建立斯洛文尼亚共产党和克罗地亚共产党的问题开始进行磋商，因为情况表明，假如共产党忽视正确地解决民族问题的工作，那么它也会失去群众的信任。在我出狱后，我们在维也纳也讨论过这个问题。那时我们坚信，是该我们有所作为的时候了，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建立斯洛文尼亚共产党和克罗地亚共产党，使党接近工农群众，我们必须致力于工人阶级的团结。为了确保达到这种团结，我们决定参加统一工人工会取消独立工会，尽可能地壮大党的队伍。我们很清楚，只有我们正确地处理好民族问题，上述目的才能达到。

在维也纳，我们商定：在卢布尔雅那召开的党的第四次代表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代表会议作出了决定：建立斯洛文尼亚共产党和克罗地亚共产党。为此，我亲自在中央委员会开展这方面的工作。你们看，我们现在取得了什么样的成绩，这就是在那些关系重大的日子里我们努力的结果。<sup>①</sup>

一九三七年，实现了关于在南斯拉夫共产党的范围内建立斯洛文尼亚共产党和克罗地亚共产党的决定，这一决定早在一

---

<sup>①</sup> 摘自庆祝克罗地亚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的讲话（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八日《战斗报》）。



九三四年十二月就作出了。这一决定是在多年的派别斗争，特别是党的领导机构中的派别斗争已被消除，以及南共相当迅速地不断巩固的时候实现的。党不断巩固使我们党在即将发生的对于工人阶级和全国关系重大的事件中能够起革命先锋队的作用。党的不断巩固是因为从党的组织中消除了派别分子、奸细、动摇分子以及一切可疑分子。曾使党组织的工作处于瘫痪状态，党组织的团结遭到破坏，工人阶段同其先锋队的联系被切断的思想上的混乱消除了。我没有必要特别强调把党的领导机构迁回国内同基层组织建立直接联系以及在党员的队伍中恢复对中央委员会的信任，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遭到破坏的组织重新恢复起来了，并不断壮大，而且建立了新的组织。与此同时，党展开了有力的政治活动，揭露反动政权的内外政策，利用当时关系到工人阶级以及各民族和社会上受压迫的各个阶层的切身利益的问题，动员所有进步力量。

克罗地亚共产党、斯洛文尼亚共产党以及稍后马其顿共产党的建立，是南共在民族问题上执行正确路线的必然产物。

当时我们非常清楚，南共能否完全巩固在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这些党能否尽快地建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使党不仅成为工人阶段的先锋队，才能领导各族人民争取实现民族平等的斗争并尽量获得各族人民群众的信任。

因此，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理由是民族方面的，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共产党人就不可能在群众中产生什么较大的影响。群众受到各种民族小资产阶级政党领袖的蛊惑人心的宣传的影响，这些政党利用所谓争取实现民族平等的斗争



来同贝尔格莱德的霸权主义政权讨价还价。

第二，这几个共产党的建立更迅速地培养和教育出了民族干部，民族干部更了解本民族的特殊情况和问题，更了解本民族的人的心理。

第三，在反动派对工人运动，特别是对共产党人的进攻越来越厉害的时候，情况表明，由一个中心是不可能成功地进行领导的，需要各地的领导尽可能地独立行事。这在国家被占领时期，在解放战争期间，特别有好处，而且是行之有效的。

情况很快就表明，这一决定是多么正确，多么有道理。党的组织表现出了很高的革命热情，而且不断壮大。从反对当局的残酷恐怖统治和对工人的剥削，以及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中所表现的英雄业绩来看，克罗地亚共产党已向克罗地亚人民表明，它是自由和各族人民平等的捍卫者，是主张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团结友爱，因此也主张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团结友爱的倡导者。克罗地亚共产党不断重申必须解决民族问题，因此对克罗地亚具有民主思想的公民，对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的农民群众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的农民群众在共产党人的影响下越来越同各种进行蛊惑宣传的政党领袖们疏远了，而共产党越来越多地赢得他们的好感。这是当时克罗地亚共产党的一项最重要的任务。

由于这一切，克罗地亚共产党的建立称得上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实际上称得上是克罗地亚，乃至南斯拉夫全国工人革命运动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克罗地亚工人运动在思想上更加成熟，组织上更加巩固，政治上更加强大，为在我国生死存亡的





日子里发挥巨大作用作好了准备。<sup>①</sup>

在克罗地亚共产党成立代表大会上，我作了关于克罗地亚共产党建立的意义的报告。这次代表大会是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和二日在萨莫博尔附近召开的。我在宣布克罗地亚共产党建立的宣言中强调指出，克罗地亚共产党的建立是南斯拉夫共产党长期斗争的结果，南共不仅捍卫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也在自己的旗帜上始终明确写上主张民族自由以及各族人民平等和友爱的思想。宣言强调指出，工人的利益和克罗地亚人民的利益之间是不会相互矛盾的，因为工人是本民族的一部分，工人的宗旨始终是使人民得到自由，确保人民得到发展，人民的传统和文化中一切美好的和先进的东西受到尊重。我接着强调指出，我们在为实现这些理想而斗争的同时，还要同民族狂热和沙文主义开展斗争，因为我们懂得，只有同南斯拉夫其他各族人民友爱相处，进行合作，才能确保克罗地亚人民取得真正的进步和自由。

这一年中，我建立了以洛拉·里巴尔为首的南共中央青年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任务是，对南斯拉夫共青团和青年运动进行组织整顿。当时我还制定了南斯拉夫共青团工作计划，指出了共青团发展成为青年运动的战斗核心的途径。

八月上旬我收到乔拉科维奇和茹约维奇两位同志从巴黎的来信，要我立刻动身去巴黎，巴黎当时是中央委员会的驻地。

---

<sup>①</sup> 摘自在克罗地亚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七年九月三十日举行的庆祝会上的讲话(《为实现和平和国际合作而斗争》，第二十卷)



我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七日抵达巴黎。他们对我说，戈尔基奇应召已前往莫斯科，不久便在那里被捕了。共产国际已将此情况通知了我，同时委任我领导政治书记处。因此我实际上成了总书记，承担起负责全党工作的全部责任。<sup>①</sup>

---

<sup>①</sup> 摘自在库姆罗韦茨政治学校的报告。



## 解决南共内部的危机以及 南共在共产国际的地位

### 我变得身无分文

我几次向威廉·皮克写信，还发去电报，请求他支持我们，并就各种问题<sup>①</sup>向我们提出建议。我还请求他设法使我们的问题尽早解决。<sup>②</sup>他们总是答复说，要我们等等，我们的问题总会解决的，我们会得知全部情况的。我不断要求他们同意让我本人回国一趟，或者至少同意我派别人回去，因为国内的情况已到了这样一种程度，迫不急待要求有一个有权威的知心人回去，况且国内的人也十分坚决地要求有一位这样的人回去。

---

① 这里指的是解决巴黎流亡共产党人当中以及斯雷姆米特罗维察监狱里的共产党人当中的派别活动问题。

② 在铁托这封信的第一页左上角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批了一句：“请皮克同志和科拉罗夫同志阅，以就所提问题即速作出决定。三八年，四月八日。格·季·”。



自从去年八月我离开国内之后，尚无一个人去过那里，因此，十二月，由于我老是得不到通过电报发给共产国际的问题的回答，我便派好友罗任科[罗多柳布·乔拉科维奇]去国内，但我又不得不马上把他召回来，因为威廉要求这么做。

尽管八个月我没有得到任何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但是我仍然想方设法，力图使国内的公司[党]不受各种冲击的影响。我从政治上提出忠告，送去了仅有的资金，只是想使公司不致于受到威胁。现在我留在这里，身边没有经费。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同国内保持联系越来越困难，也不能及时地提出忠告，给予帮助。

由于所有这些原因，特别是由于有发生战争的危险，我决定取消这里的中心，留下一个代表处。我把斯塔诺耶[斯雷滕·茹约维奇]派到西班牙去工作，把瓦利奇[沃朗茨·普雷日霍夫]留在这里作为代表处负责人。必要时，由佩特罗夫[伊万·克尔恩德利]和罗任科协助他。但是，这不是有权作决定的机构。我则亲自去国内，我想把国内的负责人组成一个临时的中心。除我以外，当时国内还有两名中央委员和一名候补中央委员。另外，国内有克罗地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斯洛文尼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借助这些人的合作，我将成立一个临时领导班子，其任务将是，在目前困难的日子里就地领导我们公司的业务，直到你把我们的问题解决为止。

我想告诉季[米特洛夫]朋友，我们大家，尤其是我(现在我要在现场工作)意识到我们作出这一决定所承担的责任。但是，立即执行这一决定是符合我们公司和KI(共产国际——译



者)的利益的。可以预料,南斯拉夫将发生重大政治事件。我们公司的信誉已极大地提高,公司的业务大大地扩大了。公司的人员增加了很多,因此,出于所有这些原因,人们越来越坚决地要求把公司领导机构设在国内。遗憾的是,我们没有资金,所以我只好把中央机关报停止出版了。同样,我们国内的某些合法报纸也不得不停止出版,因为我再也帮不了它们的忙。这些报纸财政拮据的主要原因往往是书报检查机构采取的措施。我想在国内为中央机关报的出版筹措必要的资金,这份报纸将在国内出版,自然,销路肯定非常好。

季[米特洛夫]同志,我希望你也会同意这些措施。我将竭尽全力把中央迁回国内去,我之所以能够确定这一方针,是因为我了解你的观点,你早在一九三六年秋就提出应当把领导机构迁回国内。这是你在解决我们的问题时说的。当时国外的中央出现了不健康的现象,小集团斗争的现象,这一点也起了重要作用。而现在更加有必要如此了,因为存在严重的政治局势和有爆发战争的危险。

我们的问题长时间迟迟不解决导致了我常常向朋友威廉预告过的那种情况。现在我的担心应验了:某些急不可耐的和不健康的分子将利用这一困难的局面,虽然我一再呼吁,要他们遵守纪律,等待问题的解决。遗憾的是,这样的人这里就有两个,这就是日列扎尔[伊万·马里奇]和奥巴罗夫[拉布德·库索瓦茨],他们发表了不符合党的原则的言论并采取了违反党的原则的行动,应当受到最严厉的惩处。他们还向国内发出指示,从而造成了混乱,可能给公司带来严重后果。

同时,我得强调指出,他们的这一态度是得到法国朋友[法



共中央]的某种支持的,法国朋友采取的保留态度增加了采取必要的措施以孤立这些人的困难。日列扎尔是负责流亡分子工作的领导人,但是由于他的所作所为我把他撤职了。奥巴罗夫负责“旅游者”[去西班牙的志愿人员]的工作,由于他利用职权给公司造成损失,我也只好把他撤换。

季[米特洛夫]同志,我已几次就重要政治问题征询您的意见,但是没有回音。你从我们公司就奥地利被占领发表的公报和声明中可以看出我们现在所执行的方针,这一方针包含有相当多的新精神。我们之所以采取这一立场是因为希特勒军队出现在我们的边界上,也由于斯托亚迪诺维奇政府所起的作用及其亲希特勒的政策在我国所造成的形势。

我再次强调指出,我充分意识到我所作出的决定以及在你的面前所承担的责任的重要意义。因此我请求火速给我答复:是否同意我采取的措施和我作出的决定。我还请求你采取紧急措施,因为这关系到拯救我的家庭[党]。<sup>①</sup>

---

<sup>①</sup> 摘自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三日自巴黎致季米特洛夫的信(《选集》,第四卷)。



## 致季米特洛夫的信

### 只有我去现场

在我动身来这里前，我曾从巴黎写过一封信，信里我阐述了我们对某些问题的观点。出发前，我曾就德国并吞奥地利发表过声明。因此我也必须赶紧到现场去，因为那里有许多非常重要的事需要处理。我从巴黎写给你的那封信中主要提出了最重要的一件事：把中央迁回国内。在你解决我们的问题之前，在国内建立临时领导班子。在巴黎只留一名代表，即瓦利奇[沃朗茨·普雷日霍夫]。什瓦尔茨[斯雷滕·茹约维奇]到安德烈耶夫[博日达尔·马斯拉里奇]那里去，而罗任科[罗多柳布·乔拉科维奇]则留在巴黎等候你的决定。

只我一人去现场。我将设法采取最必要的措施，使公司[党]内不致于出现混乱，对于公司来说当前是艰难的时刻，我将尽力保护公司，使之不受某些不健康分子的各种冲击和企图的影响，这些人已发展成搞派别和集团。你是了解的，在这样的情况下通常出现各种所谓的好心人，他们自认为是“救世主”，而正是他们为了实现个人的病态野心，会给公司带来巨



大的损失。这在今天尤其危险，因为必须[十分]小心，以免各种托洛[茨基]分子和公司的其他敌人打入公司，进行活动。

国内虽然有种种困难，我们的工作和公司[党]的威望还是得到了很大发展和提高。最近在建立工会的团结等等方面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成绩。在塞尔维亚以及其他地区的许多地方同民主党派建立了十分密切的合作。我们有优秀的干部，他们是根据七大的路线在各部门的工作中培养起来的。宗派病越来越失去市场，人们越来越理解今天的任务和需要。公司[党]的干部并没有被烦恼的事缠住。我请求你全力使我们的问题尽快得到解决。没有来自你的任何道义的、政治的和物质的帮助，要在这动乱的时刻进行工作，是很困难的。我完全清楚局势，正因为如此，我要坚持到最后，作出一切努力来拯救公司，完成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

季[米特洛夫]同志，鉴于不能排除我可能遇到不测，我想在这封信里提出我的某些观点，哪怕是简要地谈一谈也行，本来我想，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将口头向你阐述。

第一，我认为，领导机构设在现场，是目前惟一正确的解决办法。因此，企图使中央留在国外的任何建议或想法对于我们公司[党]都没有什么好处，或者说没有任何好处。第二，我认为，应当考虑由国内的人建立一个中央。但是，鉴于国内我们的人政治经验太少，应当吸收国外的两个，或者最多三个人参加中央，他们要作好准备，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进行工作，而且能够运用自己的威望确实为公司谋利。第三，我认为，中央应当由大多数忠诚的工人组成。在国外的知识分子中，我可以推荐的只有两个人，即塞尼科[弗拉迪米尔·乔皮奇]和





安德烈耶夫 [博日达尔·马斯拉里奇]，他们已决心为公司而献身。

对于干部领导才能的考验，我认为应当考虑到每个人的各种情况，如果某人有意识地帮助并参与了那个人的有害活动，我认为，迄今为止此人给我的公司造成的损失最大。应当对所谓的“安全监视员”和野心家保持警惕。这些人已经经常出现，指责所有的人都是“戈尔基奇分子”，尽管他们过去自己就围着戈尔基奇转，拥戴戈尔基奇。我认为，真正的戈尔基奇分子极少，可以很容易地把他们孤立起来，而不会对公司造成较大的损失。具体谈到一九三六年秋被任命参加以戈尔基奇为首的领导班子的那些人，我认为，总的来说，任命这些人参加领导班子是错误的。例如，罗任科 [罗多柳布·乔拉科维奇]，我认为，他担任这一职务太早了。尽管他坐了十二年左右的牢，他毕竟没有在外面工作的任何经验，虽然从理论上来说他本来是一位非常有才能的人。我认为，罗任科曾受到戈尔基奇的影响，不过更多是无意识的，关于这一点应当让他本人谈谈。我认为，在将来的班子里，根本不予考虑乔拉科维奇，但是如果把他干掉，不让他在家 [党] 里干点工作，那将是一个损失，如果你那里不反对他的话。<sup>①</sup>

---

<sup>①</sup> 在米·戈尔基奇被召到莫斯科去之后，我应乔拉科维奇和茹约维奇的要求，于一九三七年八月从国内来到巴黎。在我作了初步的交谈之后，我就注意到了领导班子中存在的健康的现象，特别是伊·马里奇身上的不健康现象。他伙同另一个集团很快开始进行派别活动，逐步建立起一个派别中心，企图控制党的领导机构。不仅如此，一九三八年，我们在共产国际中的处境变得更为复杂，我



什瓦尔茨〔斯雷滕·茹约维奇〕是一位非常出色的群众宣传员，为人谦逊，随时准备开展任何工作，但是他也过早地走上了这一岗位。尽管他不像罗任科那样受到戈尔基奇那么大的影响，但是他毕竟没有抵制。本来他对戈尔基奇了解得最少，因此如果把他看成是戈尔基奇的人，那是不公平的。但是，恰恰由于他过分盲目地相信这个人，所以他有可能变成戈尔基奇的人。自然，现在他本人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第四个领导成员经常在国内，他从未见过戈尔基奇；他就是斯洛文尼亚人莱斯科舍克，是一位很得人心的，忠诚的工人战士。

第五个人就是我。关于我自己，我这次什么都不愿谈，最好是让别人去谈吧。我只能说一点：我从来不属于任何人，而只是公司〔党〕的人，今后我也仍然是这样。

---

们党的领导班子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伊·马里奇竟然自封为党的书记。他那一伙人开始指责前领导机构所有的成员，特别是指责乔拉科维奇和茹约维奇，说他们两人是戈尔基奇分子，还怪罪我同戈尔基奇分子合作，庇护他们。我们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初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商议了监狱里的情况，并作出撤销P·米莱蒂奇职务的决定，马里奇向我和共产国际写信，再次谴责乔拉科维奇、茹约维奇和克尔恩德利。同时，他表示只要上述同志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他就拒绝会后在中央委员会合作共事。而当我在共产国际作出决定（见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底的信）之后仍让乔拉科维奇和茹约维奇留在南共中央政治局工作时，马里奇又向格·季米特洛夫写信。马里奇就是这样搞派别活动，使我们党在共产国际的地位变得更糟的。

至于说乔拉科维奇和茹约维奇，我让他们二人留在南共中央政治局里工作，直到一九三八年三月底，直至我决定取消在国外的领导机构，在国内建立临时领导机构为止。（约·布·铁托注，见《选集》。）



如今在巴黎担任负责工作的人有：瓦利奇[沃朗茨·普雷日霍夫]，不是戈尔基奇的人，他是公司[党]的一位忠诚可靠，勇于牺牲精神的干部。在当前困难的时刻，他给我以很大帮助。

奥巴罗夫[拉布德·库索瓦茨]是位相当勤奋的人，如果在一个获得你支持的领导机构的领导下，他会十分出色地完成某项工作，但是不能独立处事，而是要在一个坚强的领导机构的指导下才行。而他在目前情况下表现得很不好，特别是在涉及派别倾向和小集团倾向时更是如此。关于这一点，我已写信告诉过你。他在国内名声很不好，因此不能考虑让他担任领导职务，尽管他有这样的欲望。

日列扎尔[伊万·马里奇]，在达尔马提亚很有名，政治和理论修养都很差。他更多地是个带有大量小市民残余思想的“乡巴佬”，但是，据我看，他对公司特别忠诚。

赫尔内特(奥斯卡)[卡尔·胡多马利]由于四月全会上的冲突于一九三六年被停职，从奥地利监狱放出来一年之后受到了预防性的严重警告处分。他非常能干，也很勤奋。他是个工人，应当帮助他改正错误。到现在为止他的表现不错。他过去经常反对戈尔基奇的阴谋诡计。

我再次强调指出，假若又成立由原班人马组成的领导班子，那将是件麻烦的事。应当建立由国内经过考验的忠诚可靠的工人组成的领导班子，再加上一、两个经过考验的知识分子。<sup>①</sup>

<sup>①</sup> 摘自一九三八年四月一日致季米特洛夫的信(《选集》，第四卷)。



## 我们党采取非常积极的行动

我在巴黎这里已逗留了一个月了，是应你的要求来巴黎的，以便接着上路，到你那里去。尽管我一到这里后不久就报告了，好让人给我准备好途中所需要的一切，可是，直到今天我仍在枉费心机地等待准许入境的通知。我们家〔党〕里的情况要求尽早尽快地解决我们的问题。因此，我请求你竭尽全力使我得到入境许可。

我在现场现对于我们家庭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因为现在必须实施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措施，无论是与国内总的政治形势有关的，还是与我们家庭目前情况有关的措施。我在现场呆了两个半月，走访了所有比较重要的地区，但是根据你的要求，我必须迅速前来这里，因此未能完成最重要的任务。

我在现场逗留期间办了下列几件事：

①举行了统一工人工会各阶级工会的代表大会，会上工会在对待社会民主党人的问题上表现了完全的一致。一致通过各项决议。选入统一工人工会新的中央理事会的有工人阶级左翼的八名支持者，即三名选入执行委员会，五名选入全会。详细情况我将面告。大会在对待没有阶级性的工会（克罗地亚工人工会等等）的态度上取得了一致意见，即认为应当同他们取得行动上的一致。（与此相反的是，社会民主党人的领导人在举行代表大会之前采取了相反的立场。）工人工会的报纸——社会民



主党的和左派的报纸——应被看成是正式的报纸，不允许再相互攻击，而应进行同志式的，讲原则的讨论。社会民主党的报纸不许再攻击苏联。大会作出决定，反对把左派人士开除出工会，过去已被开除的人必须重新被接纳入工会等等。在具有阶级性的工会运动中之所以取得非常出色的成绩是由于我们的同志工作做得好，关于这方面的情况的其他细节我将面告。

②代表大会开后，社会民主党领导人马上与我们的同志举行了联席会议，就在政治方面采取统一行动的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双方达成协议：统一采取政治行动，以及共同对付联合反对派等等，但是应社会民主党人的要求，不得把这一协议公诸于众。请你注意这一点！

③在我所在的城市里（合法地）召开了工人党发起委员会全国代表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来自塞尔维亚、马其顿、黑山、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的代表。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今后工作的若干重要决议。这个工人党应当代表谁这个问题最后得到了澄清。会议选举了由三人组成的中央领导机构，并确定了省的领导机构。关于这个重要问题的详细情况我将面告。

④四月份召开了斯洛文尼亚共产党代表会议，我参加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首先是因“德国吞并奥地利”而举行的，会议作出了关于同希特勒及其对斯洛文尼亚的蚕食作斗争的若干重要决定。到目前为止，我们的斯洛文尼亚党出版了两本小册子并发表了声明，告诫人民警惕希特勒侵略的危险。在团结斯洛文尼亚各社会阶层反对希特勒方面，斯洛文尼亚党已经取得了很好的结果。

⑤根据南共中央今年三月声明的精神，我们党在团结所有



爱国力量反对希特勒侵略南斯拉夫方面采取了非常积极的行动，这一渗透活动由于斯托亚迪诺维奇的罪恶政策而加强了。为了团结所有爱国力量反对希特勒的渗透，我们特地为克罗地亚和伏伊伏丁那的农民出版了一本小册子。

## 情况是正常的，健康的

斯洛文尼亚由于有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和相当好的领导干部，党内情况从而得到整顿。今天，斯洛文尼亚党同各地建立了联系，也就是说，在所有比较重要的地方都有党的组织。

在克罗地亚有中央委员会，这是在去年克罗地亚共产党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的。我们现在对领导实行了改组。

在塞尔维亚，有省的领导机构，但是参加领导机构的是一些年轻人。这一地区非常需要有能力和干部。不管怎样，在塞尔维亚内地各地都有党的组织，同其他地区相比，党的威信以及党同其他党派的合作是最出色的。

黑山有省委会，但那里的情况并不是最好的，因为有一些不健康分子在里面活动。

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终于在比较重要的地方建立了党的组织。本来要召开一次代表会议，以便最后选出波斯尼亚的领导机构。然而，由于我的出走，代表会议推迟了。

在伏伊伏丁那，有省的领导机构，几乎在所有地方都有党的组织。就党的工作而言，那里的党组织属于工作做得最出色的组织。



最近一年来，除去年秋天在塞尔维亚尼什的那一次之外，党组织没有遭受什么大的破坏。萨格勒布的党组织今年三月遭到的那次破坏是当局寻衅所致，遭到破坏的只是负责组织志愿人员去西班牙的特科机关。该机关的领导人是一个被雇佣的奸细，他是由佩特科·米莱蒂奇从监牢里作为可靠的人推荐来的。此人现在已经被彻底揭露，目前正在这里的南斯拉夫“密探局”<sup>①</sup>里卖命。今年六月，斯洛文尼亚的党组织遭到破坏，对此负有罪责的是一位前政治犯，此人出于派别的原故给佩特科·米莱蒂奇写了一封信，谈党的代表会议，举出了六个人的名字。这六个人因此而被捕，但党组织遭到的破坏没有进一步扩大。比尔克[爱德华·卡德尔]又被捕了，比尔克被捕前已取得合法身份。

除达尔马提亚的党组织外，全部党组织里的情况都是正常的，健康的。达尔马提亚的党组织里存在着两派，挑起两派争斗的是日列扎尔[伊万·马里奇]。

斯雷姆米特罗维察监狱里的情况仍很混乱。以皮雅杰为首的三分之二的人是守纪律的，服从决定的。三分之一的人(其中大多数是因在阶级敌人面前表现差而被清除出党的，还有几个知识分子，为首的是佩特科·米莱蒂奇)干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蠢事，并对党进行攻击。莫沙·皮雅杰把这帮人称为罪恶昭彰之徒等等。这帮人在巴黎受到日列扎尔和奥巴罗夫[拉布德·库索瓦茨]的支持。我已使狱中的斗争范围不再扩大，不使其

<sup>①</sup> 指效法俄国“密探局”的南斯拉夫政治警察。——原注



波及监狱外面的党组织，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的党组织都发表了措词极为尖锐的声明，谴责佩特科·米莱蒂奇集团企图破坏我们党的团结。关于狱中情况的材料，我早已送给你们了，而这件事的全部情况，我也将面谈。

## 我仍然坚持认为我们必须 依靠国内的干部

我在国内组织了一个临时领导机构，负责处理当前的工作，这个领导班子由斯洛文尼亚的几名中央委员、克罗地亚的几名中央委员以及塞尔维亚的几个党员组成。临时领导机构中有三名南共中央委员，他们是在一九三四年召开的党的代表会议上选出来的。我同这个领导班子开了一次会。领导成员都在自己的省里。在这次会议上通过了许多重大的决定，这些决定在你解决我们的家庭问题之前将一直有效。会议决定：在国内出版《无产者报》，不过由于我的出走，这件事推迟办了。在完成所有这些任务的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因为缺乏资金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从你处已整整一年未得到任何帮助，而以前不是采取自筹资金这样的方针的。

季[米特洛夫]同志，迄今为止，我们不仅使党未受到更大的震动，而且还在工作中取得了出色的成绩。我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国内有忠于党和共产国际的健康分子。但是，如果让目前的情况继续下去，那将是危险的。在侨民当中





情况十分不妙。我回国时，撤销了罗伯尔特[库索瓦茨]和日列扎尔的职务，原因是他们搞派别活动。然而，在我走后，这里的兄弟党却把日列扎尔请去，授权他在我们的流亡者当中开展工作。他利用这一情况，到处说他得到共产国际的信任，说什么不存在领导机构，因为他谁也不承认。他在这里的南斯拉夫留学生中所作的工作完全是破坏性的，宗派性的，会对国内产生很坏的影响，因为这些学生常回国。是谁让他重新做这项工作的？也许是博格丹诺夫吧？他去南方时曾同日列扎尔和罗伯尔特谈过话。为什么他当时没有同我商量？因为我那时还在这里。假若做不了什么工作，那么至少也不该制造混乱。在你把问题解决之前，我不会干预这里的侨民的事。我让这里原有的领导机构不要管这件事，大家都同意这么办。现在大家等待着你的决定。关于所有政治问题以及其他重要问题(这些问题，这里非常之多)，我将向你作口头汇报，或者，如有必要，我将就此提交一份详细的书面报告。

季[米特洛夫]同志，请你表明态度，以使我们的问题尽早得到解决。如果没有必要让我到你那里去，那么请你让我回国内，以便尽我所能给予帮助。如果不相信我的话，那么必须任命另一个人，并向他提供道义上的支持。但是，不应该从这批腐败的流亡者当中任命其他人。我感到对国内的党负有巨大的责任，我再也不能在这里闲着无事了。

我继续坚持必须依靠国内的干部，领导机构必须下基层，必须设在国内，接受党的监督。

不久前我曾通过瓦尔德斯[约西普·科皮尼奇]送去了有关国内情况的几份简短材料，主要是谈党的工作和发展情况。



现在我进一步提供有关政治形势以及各政党之间力量对比的资料。<sup>①</sup>

---

<sup>①</sup> 摘自一九三八年七月自巴黎致季米特洛夫的信(《选集》，第四卷)。



## 政治形势

### 起主要作用的是我们党

在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后,以及在斯托亚迪诺维奇及其大臣们越来越频繁地访问柏林和罗马之后,在各个方面都可以感到斯托亚迪诺维奇政权正在执行日益反动的政策。最明显地感受到这一压力的主要是工人阶级。由于斯托亚迪诺维奇政权执行反动方针,不久前《工人报》(克罗地亚统一工人工会的报纸)被查禁,这份报纸已发行近三年,发行量达一万四千份。《工人报》查封后,代之而起的是另一份报纸。但当局不准发行。被查禁的还有左派工人的其他报纸。在斯洛文尼亚接连查禁了三家左派工人的报纸。在萨格勒布,《文化》杂志被查禁。当局禁止报刊发表谈论现政权的对外政策的文章。全部反对派的报刊只能刊登《阿瓦拉报》发表的东西,即只准援引政府报刊上的东西。在野党的报纸不准对斯托亚迪诺维奇的盟国,即希特勒政府和墨索里尼政府作反面的报道。

同亲法西斯主义对外政策的斗争主要是通过口头途径以及利用半合法和秘密的小册子进行的。



人民群众反对这样的政策的运动首先是在德国并吞奥地利之后日益壮大起来的。今年三月我们的告人民书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这一运动的发展。我们的口号是：“紧密团结所有民主和爱国人士，同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进攻，同希特勒的同盟者斯托亚迪诺维奇进行斗争”，这一口号不仅在整个工人阶级当中，而且也在大多数在野党当中，甚至还在南斯拉夫激进会（斯托亚迪诺维奇的党）一部分会员当中以及南斯拉夫民族党（耶夫蒂奇的党）的部分党员当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于是在斯洛文尼亚，在普图伊成立了反希特勒宣传的统一委员会。南斯拉夫民族党、南斯拉夫激进会的成员、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在这个委员会里合作共事。负责该委员会的是普图伊市市长。此外，还在其他各地建立了保卫斯洛文尼亚不受希特勒宣传影响的各派统一委员会。青年在这一工作中特别积极，他们几乎全都围绕这个问题团结起来了。在这一运动中起主要作用的是我们党，党把同希特勒所代表的危险进行斗争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斯洛文尼亚共产党针对希特勒的宣传迄今为止已在斯洛文尼亚发行了三本小册子以及许多传单。开始时内政大臣科罗舍茨试图阻止这一运动，妨碍我们党的主动行动。然而，他不仅遭到了工人阶级和在野党人士的抵制，而且还有支持自己的人的抵制。迫于斯洛文尼亚人民的压力，当局不得不在斯洛文尼亚采取某些措施，反对在斯洛文尼亚搞希特勒式的无耻的名堂——悬挂德国的卐字旗，反对法西斯式的致意方式等等。

我们党的声明也在塞尔维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在塞尔维亚散发了五千多份声明，成了工人阶级与在野党派进行统一合作的基础。



在克罗地亚有人指责我们声明中指出的方针，指责我们没有把首先解决克罗地亚问题作为在保卫南斯拉夫方面进行合作的先决条件。此外，有人认为，向南斯拉夫激进会和南斯拉夫民族党中的正直成员发出呼吁，是不对的。这种宗派主义的观点甚至在我们党的某些党员和克罗地亚的某些负责人中也存在。

我们党除了同希特勒的宣传和希特勒在南斯拉夫的影响进行斗争外，还主动行动，动员舆论声援捷克斯洛伐克。同时我们党要求南斯拉夫政府在捷克斯洛伐克一旦遭到进攻时公开表示准备援助捷克斯洛伐克。我们组织示威游行，并举办讲座，声援捷克斯洛伐克。参加这些活动的不但有工人阶级的代表和民主反对派的代表，而且还有支持执政党和南斯拉夫民族党的许多人。

在德国吞并奥地利之后，形形色色的法西斯特务就涌向斯洛文尼亚。他们首先在农民——不仅在边境地区，而且还在内地的农民当中，散布各种各样的荒诞说法，声称今天在德国，以及在被德国吞并的奥地利，应有尽有，东西全都很便宜，再也没有失业的人等等，说什么今天在德国工作有的是，而且愿意离开斯洛文尼亚的人也容易找到工作。德国银行在斯洛文尼亚设立的分行掌握一笔现金。这些分行现在发放低息贷款。德国人借助这种贷款从斯洛文尼亚农民那里购买土地，特别是向住在边境地区的农民购买土地。马里博尔周围和科切夫耶的德意志族农民被招募到德国去工作。过了几个月他们穿得笔挺地回来了，以此来扩大法西斯在当地的影响。一开始斯洛文尼亚农民对这一宣传信以为真。他们说：“要是现在希特勒到我们



这儿来，那么从普图伊到汉堡将通行无阻，就像战前那样，我们又可以出去工作了，挣很多的钱。”由于斯洛文尼亚所有爱国志士都动员起来揭露这样的宣传，所以这样的幻想逐渐消失了。

在伏伊伏丁那和斯拉沃尼亚同样可以感觉到希特勒在德意志族人当中开展的声势浩大的运动和宣传。



# 共产党

## 必须十分警觉

关于共产党的工作上次我已写信谈过了。这次我只报告几个新情况。几天前举行了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党的代表会议。会上选出了这个省的党的领导机构。经过了也许是十五年多的时间,这个重要省份今天第一次有了自己的领导机构和重新建立的组织。该省是南斯拉夫重工业最发达的省份。此外,黑山也召开了党的代表会议。从报告来看,在这次会议上P·米莱蒂奇的破坏活动和派系活动受到了谴责。

这样一来,南斯拉夫各省都有了党的组织,都与领导机构有了联系。只是在马其顿,这件事尚未办妥,尽管那里有地方组织,然而,相互之间没有联系,同省的领导机构也没有联系。那里的条件不错,但是没有马其顿土生土长的领导干部。必须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一个月前召开了克罗地亚共产党中央全会。在全会上同达尔马提亚的中央委员产生了分歧。我没得到克罗地亚共产党中央全会的书面报告,但是我得提醒一个情况:在达尔马提亚的



一些比较年长的同志身上存在着相当不健康的倾向。例如根据到这里来的一位青年代表的报告,这些达尔马提亚的同志几乎把党取消了,把整个工作全部让给“工人党”去做,他们认为工人党将取代共产党。

达尔马提亚的领导同志完全忽视纪律,这是个众所周知的老问题。但是最近情况更糟了,原因是个别人,诸如日列扎尔[伊万·马里奇],从这里向国内散布了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他们号召党员不要服从南共中央的任何决定,因为南共中央里的人全不可靠等等。日列扎尔通过他家里的种种关系,向国内发指令,声称他受共产党国际的委托来领导党。我采取坚决的措施来制止这种有害的做法,尽管这种做法在党的组织里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从我们党近一年来所处的这一困难局面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有的人身为党员给党造成了多么大的损害,因此我必须强调指出,必须好好地整顿一下我们的党,把那些混进党内的各种异己分子从我们党内清除出去。

由于我们党的积极分子完全忠于共产国际,南斯拉夫的形形色色的托派分子的活动,没有一次能成大气候。不过,还是必须十分警觉,他们企图通过各种各样的不健康分子从内部来瓦解我们党。





## 再谈地下工作

### 我觉得整个事情令人可疑

我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底回到国内。我同党的领导干部进行了磋商，于五月初组成南共临时领导。

进入领导班子的有：爱德华·卡德尔、弗兰茨·莱斯科舍克、米哈·马林科、约西普·克拉什、亚历山大·兰科维奇和米洛万·吉拉斯，以后还有伊万·米卢蒂诺维奇、拉德·康查尔、莫沙·皮雅杰等人。在国内建立南共新领导意味着在党内巩固党和消除派别活动一切残余的道路上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新领导很快同各省的领导和全国其他下级领导建立直接联系。新领导成立了党的特科机关和党校，以进行马克思主义教育。

当时，青年问题也处于关注的中心。我们致力于使共青团成为南斯拉夫全国广泛的青年运动的核心。在这件事情上，中央青年委员会书记、一九三八年任共青团书记的伊沃·洛拉·里巴尔干得很成功。洛拉是一位很有才华的青年人，是一个成长迅速的革命家。在工作中，他帮了我很大的忙。



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澄清关在米特罗维察监狱中的共产党员之间的事情。这里牵涉到的是米莱蒂奇的严重的派别活动，这种活动为我们党的队伍制造了分裂。佩特科·米莱蒂奇是黑山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很狡猾的宗派分子，他在服刑期间，通过种种手法，把一大批犯人，其中大部分是青年党员拉到了自己一边。他制造了一种局面，使这些青年人起来与老同志作对。

他当时很出名。在西班牙，甚至有一个连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美国进步报纸在谈到他时，把他说成是共产党的著名英雄。我觉得整个这件事令人可疑。我之所以怀疑他，是因为他想要把老革命家莫沙·皮雅杰这样一些我们最优秀最有功劳的同志干掉。

后来，我也被召到莫斯科。戈尔基奇走了，在莫斯科被捕，几乎所有南斯拉夫人都被捕了，因此，当我到那里时，除了乔皮奇和塞尔维亚的一名教员外，找不到其他人。我在莫斯科心情十分沉重，因为他们什么人都怀疑。我在莫斯科生活期间，不跟任何人交往；我学习并在共产国际工作，往返于共产国际和“豪华”饭店，别的地方，哪里也不去。可以说，这是我出于自愿与世隔绝。我想尽量利用机会，因为在那里我有许多书可阅读，以弥补在服刑时所短缺的东西。我同任何人，包括我们的人在内，没有什么特殊的联系，这一点恰恰救了我，使我没有被列入陆续被捕的那些人的名单。

在莫斯科，我领受了一项任务：翻译《联共(布)党史》。乔皮奇、我和另外一人共三人组成一个编辑小组。但是，在完成了一章之后，他们两个被捕了，只剩下我一人来译这本党



史。我夜以继日地足足干了三个月。排字的时候，我得去印刷厂。这件事完成之前，他们不让我走。我完成这项工作后，于一九三九年经由土耳其回南斯拉夫了。

我在莫斯科时，以后来的保加利亚国防部长，当时的监察委员会巴尔干分部主任达米扬诺夫为首的一批保加利亚人，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设法把佩特科·米莱蒂奇从南斯拉夫叫到莫斯科。这件事使我感到奇怪。米莱蒂奇到时，我并不知道，而是俄国党的一些同志后来告诉我的，他们说，他在写报告反对我，说我是托洛茨基分子。有一天我在公共汽车上遇到了米莱蒂奇，我本人并不认识他。<sup>①</sup>

公共汽车里坐的都是共产国际的工作人员和干部，行驶过程中，我看见一个身材瘦削、脸庞细长的人，他的一只手握着吊把，手掌上滴着血。我觉得有些面熟，但是我想不起来他是谁。我当时想：用受伤的手指去握吊把，有血不擦去，这算什么样的“英雄”！我到干部处去见那个保加利亚人，他才告诉我，佩特科·米莱蒂奇在莫斯科。我立即想起了公共汽车里的那个人。

翌日清晨，我去共产国际，在走廊上遇到了干部处处长，一个俄国人。他留住我，对我说，佩特科正在写东西反对我，说我是托洛茨基分子，不过我不用担心，他还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又去找那个保加利亚人，他装成是我的好朋友，却蓄意谋害我。我见他十分高兴。他对我说，待佩特科·米莱蒂奇交

<sup>①</sup> 摘自对战前地下工作的回忆(《言论集》，第八卷)。



了自己的报告，要对整个这件事加以讨论，我可以参加。我说：“我当然要出席！”第二天，我到后，那个俄国人立即告诉我，佩特科·米莱蒂奇已被捕。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内务人民委员部早就掌握了米莱蒂奇向警方谈的一切，让他有几天时间来写，看看他写些什么。那个俄国人知道这一情况，因此当我们第一次在走廊里相遇时才那样对着我微笑。我问他：“米莱蒂奇的报告呢？”他挥了一下手，说：“逮走了他，也拿走了他的报告！”我心满意足地马上去见那个保加利亚人，我见他又是很高兴。我望着他，而他一无所知，根本不知道佩特科已经被捕。我告诉他：“米莱蒂奇被带走了”。听了这句话，他跳了起来，脸色煞白，吓得有半个小时说不出话来。因为他是把米莱蒂奇弄到莫斯科来的那些人中间的一个。<sup>①</sup>

后来，兰科维奇同志当内务部长接管了所有档案时，才发现米莱蒂奇实际上已被警方收买，他全都出卖了，使许多人受了害，警方设法把他打扮成共产党的英雄，这样使他更便于为警方效劳。<sup>②</sup>

当时，我们的许多人（在莫斯科）都被捕了，几乎没有什么人能够幸免。我也差一点遭了殃。

在这一切过去之后，我去见季米特洛夫。我向他提出，领导最终应当留在国内，再不能留在巴黎。季米特洛夫问我：“什

---

<sup>①</sup> 摘自与《《共产主义者》周报代表的谈话《为实现和平和国际合作而斗争》，第十二卷）。

<sup>②</sup> 摘自对战前地下工作的回忆（《言论集》，第八卷）。



么领导?瓦尔特,只剩下你了,你应当回国。你是幸运的,对党来说也是幸运的,至少你留下了,因为已经在谈论解散南共。”当时,波兰党已经解散。<sup>①</sup>

---

<sup>①</sup> 摘自与《共产主义者》周报代表的谈话(《为实现和平和国际合作而奋斗》,第二十二卷)。



## 清洗问题

### 我也受到指控

我想谈一谈斯大林主义的清洗。我已经提过，在那里，南斯拉夫共产党一系列领导人被捕了，他们被指控是帝国主义的间谍和叛徒。在清洗中被捕、被审判并被处死，或者在监狱中销声匿迹的有：菲利普·菲利波维奇、卡米洛·霍尔瓦延、科斯塔·诺瓦科维奇、久卡·茨维伊奇和斯捷潘·茨维伊奇、拉德·武约维奇和格尔古尔·武约维奇、姆拉登·乔尼奇、安东·马夫拉克等人。他们的悲剧尤其令人痛心的是，他们是在被指控犯了从未犯下的罪行这种骇人听闻的情况下被赶向死亡的。当时的形势是极其严峻的。甚至我们整个党受到指责。所有被处决的同志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都已被苏联司法机关恢复了名誉。我们共产主义者联盟在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以及在我党成立五十周年时召开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向他们表示了应有的敬意。

当时，连我都不清楚，有朝一日他们是否也会把我抓起来。他们之所以没有逮捕我，我只能感谢季米特洛夫，他以前就信



任我，认为我身为总书记，应该对南共担负起全部责任来。进行这些清洗的原因当时不像现在这样清楚。我在共产国际及其机构里，为许多同志说了情。我对他们说，某某同志是个优秀共产党员，而他们却厉声地回答我说，他是托派、间谍、帝国主义分子，等等。他们几乎疑心每一个南斯拉夫人，认为都是托派。

有人向监察委员会指控我是托派。我的所谓属于托派这件事有所翻译的《联共(布)党史》中的一句话可作“证明”。控告我的是一个年轻人，南斯拉夫奥西耶克的德意志族人，他不跟我们一道工作，而是在德国党里工作，但老是插手我们的事情。当时，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主席弗洛林帮了我很大的忙。我们是很要好的朋友，他对我说，一切都会弄明白，他们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博扎·马斯拉里奇也作了很大努力，因为我们一起反复解释，我的译法不是托派的提法。最后，我终于为自己解脱了。

一九三八年九月中，我被要求向共产国际书记处会议作汇报。我谈了整个形势，其中援引了我写的报告中的内容。当时总的形势，欧洲的形势和世界形势，非常严重。当时正值慕尼黑投降事件时期，这意味着西方列强在希特勒的要求面前作了妥协。捷克斯洛伐克的独立被践踏了。帝国主义殖民势力鼓动希特勒反苏。同时，斯托亚迪诺维奇政府破坏了小协约国联盟。希特勒无耻地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而欧洲却保持沉默。然而，在南斯拉夫，对于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人们举行强大的示威，在党的领导下采取了广泛的行动。贝尔格莱德大学学生的抗议是你们都知道的，而这样的抗议，在萨格勒布也有。



数以千计的学生报名援助捷克斯洛伐克，抗击希特勒。遗憾的是，捷克人自己不想打。

鉴于这样的国际局势和法西斯发起了越来越明显的攻势，可以感觉到，共产国际对南共的态度有所改变。从我的一些报告以及从每天的报纸上可以看出，一场受党的决定性影响的民主和强大的反法西斯运动正在南斯拉夫展开。这是令人鼓舞的，同时使人相信，共产国际最终也不得不承认这一运动。对于我来说，尤为重要的是，我从各种渠道得到的报告中，从国内送来的报告中看到，南斯拉夫国内党的临时领导是团结的，他们不断发表宣言，正在充分展开活动。这是有巨大意义的。共产国际对我们党的态度确实逐步开始改变，十月间我已能断定，南共被解散的危险已经消除。这时我已有把握不会将我们解散，正在恢复对我们党的信任。十月中，我在致季米特洛夫的一封信中表达了这一看法，并表示希望尽快回国。然而，他们始终没有放我走。我同季米特洛夫谈了话，但是我一直得到十二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开会讨论关于我们党的几个文件。

一九三九年一月初，以季米特洛夫为首的政治书记处开会。那时，我在国内组成的南共领导才最终得到确认，所做的工作才得到承认。我得到委托，从这个领导班子来组织中央委员会，制订把一切派别活动残余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驱逐出党的措施，以及还要办其他一些事。我们商定，过三四个月，我再到共产国际来。

我可以说，在这段时间里，伊万·卡拉伊万诺夫帮了我很大的忙。他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同时他负责莫斯科的出版企业、外国报刊等。他除了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之





外，还在共产国际的机构里工作。我向他抱怨，正当我应当留在国内的时候，他们这样长时间让我呆在这里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一天，他建议我给斯大林写一封信。我说，不写，他不知道我这个人更好。因此，我没有给斯大林写信。

当我看到对南共的信任已经恢复，我就在给爱德华·卡德尔、沃朗茨·普雷日霍夫、洛拉·里巴尔的信中对他们说，我们的事情已经在“祖父”——当时我们是这么称呼共产国际的——那里得到有利的解决。我估计不久就能回到南斯拉夫。然而，我在莫斯科又足足工作了两个月。后来，我到了巴黎才知道，我在共产国际的这么长时间在巴黎和在南斯拉夫国内都出现了相当大的混乱。形形色色的派别主义的流言又开始出现。

继续有人在散布一些令人恐怖的消息，谈论我的失踪，谈论共产国际还没有任命领导机构，说什么实质上并不存在南共。这些流言甚至使得当时在巴黎的一些好同志，一些优秀的革命家也开始动摇。然而，正在这时，我们获得胜利了，季米特洛夫给法国共产党写信，要他们支持我们实施消灭派别活动和加强新领导的措施。这是因为在此以前，我们和法国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几乎已经中断。

我们在西班牙的同志们也感觉到了这种情况，因此情绪很低沉，在那里，把他们看成是面临被取消的一个党的派别分子。有一些文件里甚至谈到，我们党已被取消，因此在共产国际正式确认我们党还存在并已经巩固之前，不愿跟我们建立联系。我从尼古拉·科瓦切维奇寄自加拿大（他在加拿大共产党中央工作）的来信中，看到了这种情况。他在回复我的一封信时说，不信任依然存在。



一九三九年一月，我离开莫斯科，经斯德哥尔摩抵达哥本哈根，又从那里乘飞机到巴黎。在我回来以后，我们就更坚定地继续为党的团结和把派别分子清洗出去，巩固党的队伍以及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保持联系。在巴黎，我遇到了从布拉格来的鲍里斯·基德里奇，他对于戈尔基奇所奉行的政策感到非常失望。基德里奇成功地致力于粉碎派别集团的工作，特别是在南斯拉夫的留学生中间，在巴黎有许多南斯拉夫留学生。在这方面，他给了我很大支持。他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他所接受的一切任务，他都完成得很好。在巴黎，我又遇到了韦利科·弗拉霍维奇，他自西班牙来，他在那里失去了一条腿。我在共产国际里向季米特洛夫和其他同志打了招呼，让弗拉霍维奇当南斯拉夫共青团驻少共国际的代表。

我在巴黎办完了事，就可以启程回国了。我先把党的材料和南共中央决议草案送回国。我在莫斯科起草的决议草案已经共产国际书记处会议通过。这个文件对我们党内的情况作了分析，确定了今后的任务。现在得由我们中央委员会来通过，因为我们中央委员会也有权。应当把它交给党员，以此来加快巩固党的工作。共产国际还决定，由我们发表一封致南共党员的公开信。在这封信中，我们将向党员介绍领导班子中所发生的事情，并号召他们进行坚决的斗争，争取党的团结，并在一切群众组织中，特别是在工会和青年中，展开活动。

我们当时提出的中心任务之一是尽力强化马克思主义教育和一般的政治教育。特别是考虑到我们党是一个骨干党，是由革命者和战士组成的，他们以自己的觉悟和实际活动站在前列，并成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榜样。这些基本上就是我回



国后立即写成的公开信的实质。采取训练党的措施是必要的。当时很清楚，战争已迫近，我国革命运动的命运取决于党在多大程度上是作好准备的，取决于党员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独立活动，实现党的路线和任务。

三月，我抵达国内。中央委员会立即开会，会议开了整整四天。我作了报告，汇报了在莫斯科，在共产国际，关于我们党的问题解决的经过。我们通过了决议和公开信以及就捷克斯洛伐克被占领发表的宣言。同时，我们商定，巩固党的主要办法之一是举行一次全国各地党的领导干部的会议。我立即投身于筹备这次会议的工作。我得去贝尔格莱德，去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以完成我们所面临的任务。

同时，我们致力于推进《无产者报》的正常出版，该报停刊已有几年了。重要的是加强思想工作，要让每一个党员和同情党的人都了解形势、问题和任务。我们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之所以提高，特别是由于我们党在捍卫国家这件事上采取了明确的立场，是因为我们党继续大力反对法西斯主义，对民族问题的解决采取了正确的观点。那就是始终一贯坚持各民族享有自决权，要求各民族平等，而这是各民族把南斯拉夫看作自己共同的祖国并准备捍卫它，使之不受咄咄逼人的法西斯威胁之害的关键。

三月会议之后，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之前，我们还举行了三次中央委员会会议。六月初，在斯洛文尼亚的什马尔纳山麓举行了一次全国会议，到会的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三十来位同志。我们还采取了措施来恢复和巩固全国各地的领导。在什马尔纳山麓召开的会议具有巨大的意义。会上，各地的领导人坚决谴



责任何派别活动和小集团活动。

会议强调了扩大党的队伍和为党的团结而斗争的意义。会议特别强调需要吸引尽可能多的工人、农民和进步知识分子以及其他正直的和有名望的人。我们力争使党首先依靠无产阶级和有民主思想的人，他们愿意把自己的前途同党的政策和党的性质、同人民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一句话，首先要依靠确实把党看成是自己的组织的那些人。于是，党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和力量，党的力量比党员的人数大得多。正如你们知道的，我们最初有六千党员，后来有了八千党员，而大战爆发时，我们已经有一万两千名党员。在一年时间内，党员的人数翻了一番。

一九三九年五月，我再次接到通知，让我去莫斯科，这是以前商量好的，但是考虑到任务繁多，局势严重和战争临近，我要求推迟前往莫斯科。因此，我于一九三九年八月初才出发。八月底，我经过巴黎抵达法国勒阿弗尔港，在那里，我登上了去列宁格勒的西伯利亚号轮船。

我在赴苏途中，在西伯利亚号轮船上碰到两件大事！我获悉苏联和德国之间订立了条约，后来又获悉围绕波兰的革但斯克走廊局势紧张，最后获悉希特勒进攻波兰，这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我于九月初抵达苏联。我一到莫斯科，就前往共产国际。现在情况变了。头两天我就见到了威廉·皮克，我得到了写一份报告的任务。时局是敏感和微妙的，这样一个问题被提出：既然苏联同德国签订了协议，我们应当奉行什么样的政策？情况是，一方面，战争爆发了，而另一方面，在一个社会主义国



家和一个法西斯国家之间存在条约。这使许多人感到迷惑不解。

我记得一个插曲。马努伊尔斯基把若干国家共产党的代表召集在一起，给我们一项任务，让我们根据当时的局势，各人为本国写一份宣言，规定活动的方向。我的出发点是一些非常明确的原则。我认为，希特勒想通过签订条约，使苏联在他行将在欧洲进行的侵略中保持中立，而苏联则希望能为自己确保较长时期的和平。我认为，这不应当对各国共产党的政策产生大的影响。

我的出发点是，对于进步人类来说，法西斯主义仍然是主要危险，我按照这一想法一夜之间就把宣言写好了。第二天，当我们到共产国际去见马努伊尔斯基时，惟有我带着写好了的稿子。其他人不是空着手就是只提出了一些论点。谁也不知道对于签署条约一事如何进行措词。有些人不知所措，不知道现在该做些什么。我念了我所准备的宣言，马努伊尔斯基感到高兴，说我做得很好。大家都担心犯错误，而当时犯错误意味着进卢边卡监狱。我看到，我们现在在宣言中不必提到苏联，这是马努伊尔斯基对我们讲的，他同时强调：写你们国家人民所面临的危险，准备法西斯发动的进攻，因为你们应当斗争，而不是现在去做苏联所做的事。

我认为，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有正确的立场是十分有益的。为使我们了解情况，马努伊尔斯基又说，苏联和德国之间的协议是政策和策略的问题，我们中每一个人都向本国人民承担责任，必须采取一切步骤使人民准备好进行抵抗，如果法西斯一旦发动进攻。



耐人寻味的是，当时共产国际并不要求各国党都必须认真地奉行苏联同希特勒达成协议的政策。对于我来说，这是最好的一个标志，表明苏联有理由签订这样的协议，寄希望于能够比较长久地排除威胁着它的危险，而事实证明这是幻想。然而，稍后，当局势进一步紧张——对芬战争，与英法这两个西方大国的关系发生危机——苏联党的领导、斯大林以及共产国际的观点改变了。

那时，在评价国际局势时，又反映出斯大林的陈旧观点：主要的不是反法西斯，而是应当回到所谓的阶级对抗，回到“阶级对阶级”的斗争，回到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正当希特勒的军队在改变欧洲的版图，法西斯正猖狂进攻的时候，我认为，奉行无视民族利益和无视捍卫独立这样的政策，可能是致命的。



## 再次上路返回祖国

### 斯皮里敦·梅卡斯的护照

我在共产国际办完事后，本应立即回国，但是我未能成行。我得了感冒，发高烧，只好躺在病床上。病刚好，一九三九年底，我就动身返回祖国。我乘火车到敖德萨，然后乘轮船去察里格勒。由于战争，我无法按原路回西方，我决定经由土耳其回去。<sup>①</sup>

我从俄国回国时，乘的是一艘土耳其船。有意思的是，我在船上是惟一的一个外国人。我有一张加拿大护照：工程师斯皮里敦·梅卡斯。船一到伊斯坦布尔，自称是土耳其记者的几个人就围上了我。他们对我说，从俄国来的人可以对这个国家提供很有意思的材料，他们请我谈谈自己的印象。我说，我不是俄国人，而是住在加拿大的南斯拉夫人，是作为负责兴建工厂的一家加拿大公司的代表访问俄国的。土耳其记者对此不满

---

<sup>①</sup> 摘自在库姆罗韦茨政治学校的报告。



足，他们向我提了一些问题：俄国工人的工资有多少？生活水平怎样？生活条件如何？我对他们说，我是专家，对这些事没有注意，我自己得到的钱不少，是用美元支付的。记者们表示谢意后就走了。此后，事情就变得更有意思了。

我已经说过，我拿的是加拿大护照，我买了去纽约的船票。由于船是从那不勒斯启航的，我得走陆路。事实上，我是要在南斯拉夫下车，但是我需要保加利亚的签证。保加利亚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里的人对我说，我首先得获得南斯拉夫的过境签证，然后，才能得到保加利亚的签证。我离开领事馆时，听到保加利亚官员们在议论：“从名字上看，这个家伙不是加拿大人，而是波罗的海地区的人，谁知道负有什么复杂的使命。”

由于办理签证手续遇到未料到的困难，我只好在伊斯坦布尔停留了三个月。我得到签证后就动身去南斯拉夫，并在萨格勒布下了车。几天以后，我在萨格勒布一家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说：“雷克斯号轮船（我本应乘这条船走）在直布罗陀被英国当局所扣留，因为船上有一个名叫斯皮里敦·梅卡斯的可疑人物。美国乘客对这一行动提出抗议，因为船可能因此而晚点。”而我那时已在南斯拉夫……<sup>①</sup>

---

<sup>①</sup> 摘自向安那托里亚通讯社编辑发表的谈话（《言论集》，第八卷）。





## 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

### 我们使党准备好迎接伟大的事件

党的第五次代表会议于一九四〇年召开，在此以前我国各地都召开了党的一系列会议，因此，我认为，第五次代表会议是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参加这次代表会议的有一百零五名代表，加上工作人员，总共为一百一十人。这次代表会议可以说是在警察的鼻子底下举行的，这证明了我们党已经把形形色色的奸细和代理人都清除了。会议开了几个白天和晚上，通过了一些影响深远的决定，这些决定不仅对动员党员，而且对于使广大民众准备好迎接行将发生的事件，都具有巨大的意义。这一次会议充分显示了南共队伍的团结。这是我们党第一次举行一次具有代表大会性质的代表会议，而没有发生任何摩擦、小集团活动和派别斗争。同样，这是武科瓦尔代表大会之后，第一次有那么多的代表出席一次会议。简言之，这次代表会议标志着一个阶段——巩固党、消灭派别和集团的时期结束了。最后，这还意味着一个革命组织的独立，这个组织当然同共产国际保持紧密的联系，同时又摆脱了妨碍南斯拉夫工人阶级革命



斗争发展的所有坏分子。

关于在萨格勒布郊区举行的这次代表会议，还有一点值得一提：不论是在开会期间，还是在回去以后，没有一个参加者落到警察手中。还值得一提的是，在举行党的代表会议的另一幢房子里，会后即举办了为期三周的党的训练班。但是，警察根本就不知道那里在干些什么。警察想都没有想到，来自南斯拉夫各地，包括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的几十名共产党领导人竟然在这幢房子里开会和学习。

正如我已经说过的，党的第五次代表会议表明，党的巩固已告完成，党已做好准备迎接后来发生的事情。第五次代表会议以后，党越来越壮大，向外扩展，特别加强了在青年和妇女中的影响。同时我们很成功地加强了人民阵线，发展了反法西斯斗争。<sup>①</sup>

我在波德斯雷达我姑母家里的牲口棚里写报告，我呆在棚顶的小楼上，躺在干草上作笔记。忽然，我看见有一条蛇直向我游来。我设法躲开了，但是，从此我再也不到顶楼去了。请看，我们当时不得不在这样的环境下写报告！<sup>②</sup>

在经过了那么多年之后，要在国内第一次举行代表会议，又有那么多人参加，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亲自负责整个

---

<sup>①</sup> 摘自在贝尔格莱德共产主义者联盟第十次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为实现和平和国际合作而斗争》，第二十卷)。

<sup>②</sup> 摘自与库姆罗韦茨政治学校代表的谈话(一九七六年八月二日《战斗报》)。



这件事。我的主要助手是拉德·康查尔和萨格勒布的其他一些同志。代表会议应当在萨格勒布举行，因为在我看来，在那里最容易组织。我自己查看了周围，找一幢开会的房子。我曾去斯洛文尼亚，在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交界处，租了一个葡萄园和房子，我本以为可在那里开会，但是后来我转到别的地方，因为那里房子太少，来那么多人，不好掩护。最后，我决定在萨格勒布的杜布拉瓦租一幢房子。这幢房子现在已变成了博物馆。我们在那里工作，我、卡德尔和其他同志为会议作准备。<sup>①</sup>

## 依靠青年人

一九二七和一九二八年，南斯拉夫共青团中大约有二千五百名青年人，主要是青年工人和青年学生。共青团组织的大多数领导人是党员。

就党的工作而言，我作为萨格勒布地方组织的书记，对于青年是很满意的。青年承受了最大的重担。不是指思想工作的重担，而是指日常工作的重担：散发传单、承担通讯联络以及完成各种各样的任务。

你们问我，是否认识南斯拉夫共青团先后七任书记？我大概都认识，都见过，但是我印象最深的是米希奇、奥雷什基和

---

<sup>①</sup> 摘自一九五三年五月与萨格勒布电台编辑的谈话（《言论集》，第八卷）。



德贝利亚克，他们都在工会里工作过。他们都是有觉悟的共产党人，他们从不屈服。

如果我们看一看战前的共青团，我们就会看到，共青团充满了革命精神。共青团所考虑的只是同现存制度，同阶级敌人展开斗争。有时，青年人在这方面显得缺乏耐心。他们力图成为非团员的榜样，因此在自己个人生活中往往奉行禁欲主义。他们从不干不道德的事情，他们很注意学习，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他们准备作出牺牲，准备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工作。我还得补充一点，对于当时的青年来说，不存在“干不了”这几个字。无论有什么样的任务，他一定去完成，而不论他本人会遇到什么不测。<sup>①</sup>

## 她派了儿子来找我

在工会工作中，妇女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战前的南斯拉夫，妇女得到的工资比男子少。在我当南斯拉夫制革工人工会书记的时候，我走遍了各种各样的成衣厂，男女工人工资差别之大给我留下极差的印象。例如，就我所记得的，杜加雷萨纺织厂的女工，每小时拿到两个第纳尔，连男工的工资的一半都不到。总之，在资本主义的南斯拉夫，妇女不仅不平等，而

---

<sup>①</sup> 摘自一九五九年五月八日与《青春报》代表的谈话(《为实现和平和国际合作而斗争》，第十二卷)。



且受到骇人听闻的剥削。

我还记得当时的很多事情，记得妇女是如何积极参加示威游行、罢工和其他形式的斗争的，特别积极的是还没有成家的青年妇女，但是有家庭的妇女也帮助我们。比如，她们为受警察追捕的同志找房子住。我在萨格勒布就不得不住在五个不同的地方。我有可能藏在已成家的党员家里。

一九四一年，当乌斯塔沙<sup>①</sup>同德国人一起来到克罗地亚，我几乎落到他们手里。一位妇女派她的小儿子来找我，通知我别回家，因为乌斯塔沙正在家里等我。他四处找我，最后在萨莫博尔车站找到了我，我当时已买票上了车。我认出了这个孩子，跳下车来。他对我说：“你别回去，那里不干净。”我听后，就大声地说：“我明天去！”<sup>②</sup>

---

① “乌斯塔沙”(又称“乌斯塔什)，原为“揭竿而起者”之意。是克罗地亚右翼民族主义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建立的反动组织，鼓吹克罗地亚独立，主张从克罗地亚赶走塞尔维亚人和其他民族成员。——译注

② 摘自对《今日妇女》杂志主编提问的答复(《言论集》，第十二卷)。

**在革命的烈火中**



## 一九四一年四月南斯拉夫被占领

### 人民已看到他们面临的局势

在维也纳作了短暂逗留之后，我便起身去莫斯科。当时已很清楚，战争将在西方爆发。如前所述，奥地利已被并入第三帝国。某些西方国家的政治家始终还在投机，竭力使法西斯主义的攻击矛头转向苏联。遗憾的是，许多进步人士，乃至某些共产党人，尚未意识到局势的严重性以及威胁世界的各种危险。

苏联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时，我正好在莫斯科。当时我们在共产国际举行各个书记处会议，会上商讨了在这种情况下应当采取的措施。自然，我们认为这是苏联的策略，为的是争取尽量多的时间。我认为，斯大林本人当时也认为可以把这样的危险推迟一段日子，而使苏联能够比较充分地作好准备和得到加强。遗憾的是，事实表明，这是幻想。法西斯分子是不可信赖的。

我们当时在共产国际讨论当时这种情况下各党应当干什么。马努伊尔斯基主持了这次会议，他希望我们每个人以本党



和本国的名义写一项宣言，然后提交下次会议讨论。

我当时的处境相当艰难。我的许多同志已在那里被捕，可以说，我是孤军奋战。不过，我还是写了这样一个宣言。这是一九三九年夏末的事。

那时我们在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黑山等举行了一系列党的代表会议。这些会议讨论的主题是，在一旦遭到法西斯侵略和占领的情况下，我们将同法西斯主义展开斗争，准备武装斗争，与此有关，进一步加强党，建立人民阵线等等。

我可以说，我国的革命热情早就表现在支援共和西班牙上，我国大批志愿人员去西班牙，而现在则进一步高涨。在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期间，我国成千上万青年表示准备作为志愿人员帮助这个国家。当法西斯主义危险也笼罩在南斯拉夫上空时，我国的大学自愿组织了军训，大批学生参加了军训。广大群众的这种高涨的革命热情一九四〇年在许多地方，特别是在萨格勒布举行的五一庆祝活动中表现了出来。这一切都是党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团坚持不懈和有组织地开展工作的结果。

我们做这些准备工作是从未停止的，而且具有明确的目的。因此，说什么我们的武装斗争是自发兴起的，一切都始于苏联遭到进攻的那一天，所有这些说法——后来散布的，战后还在散布——完全是不正确的。我们早在此之前很久就作好了应付我们深信会发生的事变的准备。因此，我们党是有准备地迎接后来所发生的一切的。

早在大约一九四〇年冬，我们就决定，必须尽可能同军队





建立联系，在军队里，特别是在军官当中物色人。我作为党的总书记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米塔尔·巴基奇，因为他同军队中的某些军官有联系，让他充当这一角色，使这些人同党取得联系，尽可能地从军队内部开展工作。

(一九四一年)四月战争(只持续了十天)爆发前夕，我们正在萨格勒布，我们采取了步骤来同军队建立联系。我们两次派以约西普·克拉什为首的代表团到兹林斯基的兵营，要求提供武器来武装工人，抵抗进犯南斯拉夫的敌人。集团军——我记得是第四集团军——参谋长奥尔洛维奇拒绝提供武器。几乎把代表团团员抓了起来。只过了几天，德国人就开进了南斯拉夫，接着乌斯塔沙上台了。

正是在一九四一年四月十日，德国人开进萨格勒布的那一天，我们召开了会议，讨论军事问题。我在会上作了报告，谈了到当时为止我们已取得的成绩。会上决定成立军事委员会，并决定由我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参加军事委员会的有全国各地的同志。我记得，例如，军事委员会里来自贝尔格莱德的是布兰科·克尔斯曼诺维奇。此后，在全国所有党的领导机构里都建立了军事委员会。

此间，党壮大了力量。同年七月，党已有一万两千名纪律严明的好党员。还有大约四万名组织严密的，以伊沃·洛拉·里巴尔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我们努力吸收尽量多的新成员来加强党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青年团。

当时我们还进行了广泛的活动，努力把所有进步人士，所有爱国同胞都争取过来。我们同反对党的某些领导人进行了接触，商谈联合抗击敌人和进行共同斗争的问题。例如，同所谓



反对派集团<sup>①</sup>的代表伊万·里巴尔，同独立的民主党人以及其他他人建立了接触。

从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七日发生的大规模示威中得出的经验也促使我们这样做，那一天贝尔格莱德和全国其他许多地方的群众走上街头，欢呼茨韦特科维奇——马切克政府的垮台。当时的情况已表明：大多数人民是坚决反对投降政策的。

如上所述，南斯拉夫共产党早在南斯拉夫被占领之前就已看到了濒临的危险，并采取了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以便有准备地迎接事变的降临。

南斯拉夫被占领后我们即开始牵制活动——破坏各种设施、烧毁军用小汽车和运输弹药的卡车、转换德国人设在十字路口的路标，德国人通常因此而迷路。这些活动阻碍他们东进。可见，在德国进攻苏联之前我们就已进行这样一些牵制活动了，我们明白，然后就会轮到苏联了。因为，德国军队从巴尔干，越过罗马尼亚，不断向苏联推进。

我们也提醒过苏联。比如，我曾同苏联武官会晤过，告诉他，德军在向他们的边界推进，我可以肯定德军将进攻苏联。我是从萨格勒布的一些“共济会会员”那里得知这一情报的，他们知道这一情况。我把所有的情况都告诉了他，我说，应当对此认真对待。武官告诉我，德国人要他离开南斯拉夫，他们赶他回国。我说，您还需要什么！这就是进攻苏联的前奏。

我们认为，由于希特勒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进攻苏

---

<sup>①</sup> 伊·里巴尔博士是所谓民主党左派的代表。——原注



联，举行全国起义最有利的时机来到了。当时政治局在贝尔格莱德召开会议，决定：立即号召南斯拉夫各族人民起义，抗击占领者。在这之前，希特勒已把其主力部队从南斯拉夫和希腊调走。实际上，意大利人在南斯拉夫尚有主力部队。当时在南斯拉夫的还有鲍里斯的保加利亚军队和霍尔蒂的匈牙利军队。更不用说卖国贼了，他们开始犯下骇人听闻的暴行。人民已看到所面临的局势。这是号召起义的合适时机。起义扩大到全国，我们很快就建立了游击队。<sup>①</sup>

---

<sup>①</sup> 摘自文章《在战胜法西斯三十周年之际的回忆与展望》，贝尔格莱德，一九七五年五月七日（铁托：《军事著作》，第五卷）。



## 一九四一年塞尔维亚人民起义

### 英雄奇迹

南斯拉夫被占领时，我和同志们正在萨格勒布，我们目睹德国人开进萨格勒布，乌斯塔沙追捕爱国人士和其他一些事。自然，我们也目睹了南斯拉夫军队的溃败。但是，正是由于在德国人和乌斯塔沙开进萨格勒布之后我们不可能留在这里并从这里领导我们党今后的行动，同占领者进行斗争，因此，我们迁往贝尔格莱德，虽然贝尔格莱德遭受了严重的创伤，破坏得很厉害。当时我们在贝尔格莱德进行活动的可能性较大，因为贝尔格莱德暂时受到了削弱，我说暂时，是因为那里尚未建立某种政权。南斯拉夫政府逃走了，而占领者还没有建立起一个有组织的伪政权，能够起镇压同占领者作斗争的人的宪兵的作用。

我们于五月初迁往贝尔格莱德。一部分同志，拉德·康查尔等人仍留在萨格勒布。于是我们立即着手进行准备。我负责联络——当时同我联系的有伊万·里巴尔博士以及一些来自所谓反对派集团的人（独立的民主党人以及其他一些人），以便了解他们对同占领者斗争的看法。他们同意我们对整个局势的观



点。出于形式上的种种考虑，对于我们来说十分重要的是，我们不要以共产党员的面貌出现，而是立即着手争取尽可能多的非党人士，即进步的民主人士，尽管我们知道，斗争正是由最优秀的部分——共产党人开始进行的，他们已对此作好了准备。但是，从长远来看，我们已考虑到，斗争的重担不能只是由共产党人来承担，而是我们必须动员尽量广大的人民群众。我们当时在贝尔格莱德散发了告人民书，尽管当时全世界所有的共产党都没有违背对苏联的义务，那时苏联还同德国人订有互不侵犯友好条约。我们发表告人民书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反对斯大林领导下的共产国际的路线。但是，早在一九三八年初，奥地利沦陷时，在同法西斯主义作斗争这个问题上，我们就第一个表明了立场。我们第一个发出警告：法西斯主义力量将进一步扩张，将继续进行侵略。我们还在共产国际内部主张把所有的力量集中起来，投入今后不可避免将会到来的斗争。但是，欧洲，乃至全世界，竟没有一个党在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站出来讲话，原因是所有这些党都对共产国际俯首贴耳。除非共产国际发出指示，否则它们是不会采取任何行动的。而苏联领导人则又小心翼翼，不愿采取任何可能激怒德国人的行动，因为他们还总是以为在他们同德国人签订条约以后德国人是不可能进攻他们的。我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因为我在德国进攻前几天，我不记得是哪一天了，在贝尔格莱德会见过苏联一位参赞，即武官，我对他说，我认为目前从塞尔维亚撤走，向匈牙利边界进发的军队将开赴苏联。他说，他很难相信这一点。在德国人进攻大约十四天前他们仍不相信德国会进攻他们！也许他们认为这只不过是德国人为了安全而采取的战略行动。



我们当时发表的告人民书是同我党的路线一致的，我们将无条件地抵抗占领者，不论它有多么强大，我们决不屈服，我们决不让我们的国家束手任人宰割。

我们把一九四一年四月南共中央的决定通知了莫斯科。莫斯科对此颇为怀疑，因为它不相信我们的力量，因为它不相信我国共产党在人民当中有着某种特殊的影响。莫斯科认为我们的这份告人民书对苏德关系不会造成很大的危害，虽然看来，德国人曾向莫斯科抱怨过南斯拉夫人的不屈服态度。他们援引了我们告人民书中的一句话……

七月四日，我们又商谈了局势。但是，准备工作还没有全部完成。如上所述，我们同里巴尔的前反对派集团就采取联合行动问题还在举行会谈。我们共产党人没有想单独采取一些冒险行动，因为，如果采取这样的行动，几个月之内就会失败，只会给人民带来损失。我们的路线是：一开始就建立——哪怕是慢慢地，然而却是稳妥地建立——长期抵抗占领者的基地。我得说，我们并没有像南斯拉夫许多人那样抱有幻想，他们以为德国人对苏联的进攻一个月内就会结束，俄国人将摧毁他们。我们没有这样的幻想。后来，秋天，我们就已看到，这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因此，我们一开始就采取了与占领者进行一场长期斗争的方针。

在六月二十二日我们发表了告人民书之后，以及在召开了又一次中央委员会会议之后，我们派了几个同志到各地去。他们去了舒马迪亚、塞尔维亚东部等地。我记得，我们派了罗多柳布·乔拉科维奇、格鲁洛维奇、茨尔尼[斯雷滕·茹约维奇]以及另外几个同志去……科查·波波维奇去马契瓦，组织游击



队……总之，我们马上把人派出去了，在地方组织和当地同志的协助下，着手组织武工队和游击队……

幸好，一开始我们就采用了把人派出去的方针，而不同于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做法，这些国家认为，应当把主要斗争放在城市，而不是放在农村进行。面向农民，面向内地，这是我们的路线。这样可以打持久战。当时这种局势在我们这里已成熟了，所以，幸好我们把我们的人派出去，而这样做使我们后来得以使游击队迅速发展，并且，使我们能够把那些来自城市的人，思想上有准备的人，以及经过考验的战士等等不断派到那些缺乏政治上经过充分锻炼的人的地方去。

我们在沃日多瓦茨后面的那个房子里决定，我们全部转移到解放区去。我们是在那里从贝尔格莱德领导斗争的，外面的消息一直定期地传到贝尔格莱德。那时我们已把兰科维奇救了出来……他又在严酷的地下环境中，通过留在贝尔格莱德的同志开展工作。他们得到情报之后，就派人把情报交给我，而我在奈纳多维奇的家里第一次开始发布最高统帅部的公报。

塞尔维亚全境的特别通行证，我都有。我研究了，我们将在什么地方发起我们的主要攻势。我查看了塞尔维亚的地形图，发现对于我们最有利的地形是塞尔维亚西部，不论是对于确定我们斗争力量的方向，还是组织我们的游击队和建立某些解放区来说，都是极其有利的。的确，开始我们并没有想到，我们会这么快就建立起这么大规模的解放区。我之所以选择塞尔维亚西部，首先是因为那里山峦起伏，森林茂密，其次是，那里有斗争的传统，众所周知，那一地区的人对任何占领者都给过强有力的反抗。在贝尔格莱德，我们发布了最高统帅部的几



份公报，最高统帅部是由我们几个人组成的。说实话，我在奈纳多维奇的别墅里是孤单单的一个人，既没有任何设备，也没有任何东西。

但是那一小张纸，开本很小的最高统帅部公报却令人难以置信地迅速地受到大家的欢迎，因为人们看到，我们南斯拉夫的斗争一开始就是有组织的，而且是由中央指挥的统一行动。

后来，我们决定到瓦列沃周围的已由游击队解放了的地区去，因为游击队在贝拉茨尔克瓦<sup>①</sup>打响了第一枪之后已迅速地壮大了。我们当时有几个人。我记得，有我、兰科维奇、洛拉·里巴尔以及伊万·米卢蒂诺维奇。

我们通知了所有的同志，并决定召开会议，即在斯托利策的克鲁帕尼召开军事和游击队会议之后，我们就前往斯托利策，在那里我们住在一所房子里，等着所有的同志都到来。我得说，出乎我的预料，能够来参加会议的竟有斯洛文尼亚的同志，这令人极为高兴。

我认为，在斯托利策举行的军事和党的会议<sup>②</sup>是我们举行

---

① 这是指一九四一年七月七日塞尔维亚起义开始。——原注

② 斯托利策会议是在一九四一年九月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总司令部成员(亚历山大·兰科维奇、伊万·米卢蒂诺维奇和伊沃·洛拉·里巴尔)以及各民族的军事和党的领导机构的代表(塞尔维亚为斯雷滕·茹约维奇、菲利普·克利亚伊奇和罗多柳布·乔拉科维奇；克罗地亚为拉德·康查尔和弗拉迪米尔·波波维奇；斯洛文尼亚为弗兰茨·莱斯科舍克和米哈·马林科；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为斯韦托扎尔·伏克曼诺维奇·泰波和斯洛博丹·普林齐普·塞利奥)，以及塞尔维亚西部一些游击队的司令(科查·波波维奇、兹德拉夫科·约万诺维奇、德拉戈伊洛·杜迪奇和奈博伊沙·耶尔科维奇)。——原注





的意义最为重大的会议之一，在这次会议上还作出了一些意义极其重大的决定。在这次会议上，我们决定成立最高统帅部。我们还决定建立克罗地亚总司令部、斯洛文尼亚总司令部，等等。会上，我们还分析了整个国内政治形势，而且还就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分析了国际形势。会议还就战争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展开了充分的讨论。大多数人当时就认为，战争将进行较长的时间，这一点为大家所接受。

最高统帅部决定，向乌日策进发(乌日策已落入我们的手中)，并把最高统帅部设在乌日策，以便使乌日策成为政治的和军事的领导中心，因为那时已有了大片解放区。我们乘坐一辆小汽车前往，也就是说，我得到了一辆汽车，是科查·波波维奇送给我的，是从德国人那里缴获的一辆高级轿车。有些人乘卡车，我们大家都经过柳博维伊的猫石峰，向乌日策方向前进。自然，我们在乌日策很容易地就安顿下来了，因为，该市破坏得不太厉害。我们在国民银行的大楼里安顿下来。这家银行当时存有大约六千万第纳尔，其中约有一千二百万银币，四千八百万纸币。那时第纳尔仍通用，于是，我们可以用这笔钱来支付应当支付的费用和战争费用。

在乌日策，我们管理一些工厂，有皮革厂和纺织厂，这样，我们就可以向人们提供一点衣服。我们还有一家兵工厂。的确，德国人把兵工厂炸坏了，但是，我们很快就把那些尚未炸坏的(而大多数机器都未炸坏)机器搬到银行里，搬进地下金库里，在那里我们装配了一座设备齐全的兵工厂。兵工厂开工了，任务繁重。每天生产大约四百支至四百五十支步枪，还生产弹药。



当我们在乌日策安顿下来之后，便开始认真考虑建立人民政权的问题。我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消灭全部旧政权。对旧政权的摧毁是如此彻底，以致给我们也带来了损失，因为，很多档案和地籍都烧毁了，而本来是不该把什么都销毁的。

在乌日策发生了对于我们全国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乌日策和整个这片解放区被称作“乌日策共和国”。我认为，这不无缘故。这一切都是确切的。因为，的确，在乌日策建立了人民政权，诞生了革命军队，在这里我们的游击队也已不再是普通的游击小队，而是经过良好军事训练的营、连和排了，配备有机枪，还有一、两门火炮和其他武器。

乌日策对于全国进行的斗争具有巨大的意义，因为它鼓舞了人们的士气。在旧南斯拉夫瓦解后，出现了到那时为止曾是潜伏的力量，而这股力量在迅速地发展壮大。直到今天，人们也未能对一九四一年那段乌日策时期的重大意义给予充分的评价。<sup>①</sup>

---

<sup>①</sup> 摘自一九五三年七月铁托就七月七日塞尔维亚人民起义日之际同贝尔格莱德电台主编的谈话(《言论集》，第八卷)。



## 同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谈判

### 他们出卖了我们

在此期间，德国人开始在塞尔维亚发动攻势。他们开来了新的部队，并同卖国势力<sup>①</sup>一起，从沙巴茨地区向我们解放区的部队发起进攻。我们的部队边打边撤，从策尔、亚达尔后撤，然后撤到克鲁帕尼。我们在克鲁帕尼一直坚持到德国人离我们很近为止。战斗在沙巴茨、上米拉诺瓦茨至克拉列沃长达一百公里的地区进行。

当时我们想，我们将在佩茨卡地区坚持较长的时期，于是我号召马契瓦的人民，把牲口和粮食往这个方向转移，因为我们当时需要粮食。我得说，我对农民用牛驮和马拉井然有序地把粮食送进这些山区感到惊讶。

这表明，全体人民，这些农民给我们的斗争给予多么重要的支持。切特尼克的宣传家们到老百姓中间去劝他们不要参加

---

<sup>①</sup> 指塞尔维亚卖国政府的头目米兰·奈迪奇将军指挥的军队。——原注



斗争，不要跟共产党人走，因为，战争结束后，共产党人要干这干那。他们散布了有关我们的各种流言蜚语，目的是让人民仇恨我们。但是，他们的阴谋失败了。

十月二十六日，斯托利策会议之后一个月，我到拉夫纳山的布拉伊切去了，同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再次进行会谈。我试图再次劝说他同我们一起进行斗争。然而，德拉扎顽固地认为，进行斗争的时候还没有到来。那天夜里整夜的谈判都很紧张。会谈过程中，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要我们向他提供武器，枪支，一旦需要，他们好进行抵抗。我当时答应从乌日策给他们送去一千二百支新枪，我们向波斯尼亚和其他要求枪支地区提供的枪支都是从乌日策送去的。他还要五百万第纳尔。枪，我是给他了，是五百支；钱，我没有给，因为没有机会给，原因是，他们首先向我们发起了进攻。

实际上，我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同德拉扎举行这次会谈的。跟我同去的有斯雷滕·茹约维奇和米塔尔·巴基奇。

当时，除了奈迪奇分子和廖蒂奇分子外，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切特尼克分子已开始与占领者勾结。因此，我们去进行这次谈判，是十分危险的。但是，我还是去了，目的是为了防止流血，因为，我们已同切特尼克发生了几次冲突。我的出发点是，即使他不愿同我们一起进行斗争，那至少他也不要向我们进攻。因为，德军已沿着广阔的战线向乌日策挺进了。

当我还在同他们会谈时，他们就对我设置好了圈套。我事先对此也有一些准备。我带了大约三十名游击队员，分乘两辆卡车。尽管所有的人都全副武装，携带着机关枪和自动步枪，但毕竟只有三十来个人。而在那里，在布拉伊切，却有许多切



特尼克。乌日策波热加已在切特尼克之手。几天前，在那里我们的舒马迪亚第一游击支队司令米兰·布拉戈耶维奇被他们打死了。

当我们在返回的路上，抵达乌日策波热加的桥头时，在那里等待我们是一些切特尼克和宪兵，他们喊道：“站住！”我们停了下来。于是他们对我们说，我们不能过桥，必须返回原路，因为没有得到上校的许可。我们回到了一个兵营，里面住满了切特尼克，个个也都全副武装。我们只好等在那里，不知道等什么，等谁。我自己更是恼火，想下车，提抗议。这时，茹约维奇从车里跳下来，说：“你们在干什么？我们要直接找德拉扎上校，他同我们已达成了协议。你们的司令官在哪里。让他来这里。”过了半小时，来了一位少校，表示歉意。他说：“先生，对不起，我同上校谈了很长时间的话，没事了，你们可以走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原来，在我们等过桥的时候，他们把安在桥上的地雷拆除了，我们顺利地过了桥。

然而，仅仅几天后，更确切地说，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日，切特尼克就向我们发动了全面进攻。一路，从科谢里奇进攻，另一路，从特雷什尼察进攻。从两面向我们夹击。在特雷什尼察，由青年打了一场大仗，击败了切特尼克。我们首先打死了切特尼克的头目拉契奇。接着，当切特尼克从四面八方进攻时，一场主要的战斗便在乌日策波热加展开了，我们把他们打得大败而逃。他们的兵力肯定五倍于我们。因为，我自己只有两百名青年战士，还有一些工人。我难以确切地说出我们的人数，但是，比他们少得多。不过，我们的武器不少，还有火炮和机关枪，所以我们把他们打得很惨。他们再也没有重整旗



鼓。在乌日策波热加，我们的人接着转入向布拉伊切方向进攻。当时我们已接近拉夫纳山，已走了一半多路程。但是，我得到了情报，说德国坦克已攻入布科夫。

德拉扎不知道德国人已攻入了布科夫，否则，他不会苦苦哀求。他被我们的三支队伍包围了，他派来了一个军官，即米洛拉德·米蒂奇，来请求停火，要求我们别再前进，要同我们达成协议。我第一次拒绝了。但是，当传来有关瓦列沃形势的消息，说德国人离我们越来越近，那位军官第二次来到，哀求我们停火时，我同意了停火。我很清楚，切特尼克当时为什么感到走投无路，因为，我们从腹背向他们猛烈进攻，把他们狠狠地打了一顿。我命令停止向布拉伊切射击，同时通知我们的部队和各级指挥员：德国人已攻入布科夫，现在部队要向乌日策方向前进，我们不能两面受敌，我们必须把我们的部队调去打德国人。情况就是这样。停火了，切特尼克后撤了。我把部队的主力调往科谢里奇、布科夫，而一部分调向巴伊纳巴什塔。

十一月十八日，我们的代表同切特尼克的代表又进行了谈判。当时我们尽管形式上达成了停止敌对行动并合作的协议。但是，协议达成之后，切特尼克并没有遵守过协议的任何条款。在达成协议之前，他们就已出卖了我们。例如，在克拉列沃，他们放弃了自己那部分阵地。因此，同切特尼克的这一合作失败了。<sup>①</sup>

---

<sup>①</sup> 摘自一九七五年五月七日在贝尔格莱德发表的文章《在战胜法西斯三十周年之际的回忆与展望》（《军事著作》，第五卷）。



## 我说：不应等待

我们的力量来自人民。我们的力量不仅仅存在于一批人，而是恰恰存在于全体人民。这就是我们取之不竭的力量，这就是使我们得以坚持下来的力量，使我们充满不可战胜的信心的力量。

一九四一年，在南斯拉夫，在塞尔维亚，有些人想轻而易举地就取得荣誉，于是钻进森林，在那里坐待战争结束，然后再以解放者的面目出现。在那个所谓的英雄的时代，为首的就是臭名昭著的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我在一九四一年曾同他举行过会谈。我是在我们已在塞尔维亚西部广大地区向占领者的大股力量展开大规模的战斗的时候到他那里去的。他当时在我们的解放区自由行动，不受限制，建立了自己的切特尼克部队。我们那时把我们和切特尼克同等看待。我们说：谁愿意参加切特尼克，就让他去好了；谁愿意参加游击队，就让他到我们这里来。然而，他们却说：谁参加切特尼克，就用不着打仗；谁想参加游击队，那就得勒紧裤带打仗。我从斯特鲁加尼克想向他伸出和解之手，我们谈了很长时间，但是，我未能把他争取过来，未能使他同意采取行动。甚至在今天，国外有些人还在说什么是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首先进入森林的。的确，是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首先逃进森林的，而我们留在了城市，当时在城市里住有大量的居民和德军。我们在城里制定了今后



作战的计划。我们之间的差别在于：米哈伊洛维奇首先躲进森林藏了起来；而我们是带着已拟定好的计划进入森林的，我们决心以森林为基地开始作战。我对米哈伊洛维奇说：“不要等了，因为，占领者会把我们消灭的”。他回答说：“不要去同一夜之间打垮了法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以及其他国家的那样一支军队打仗。假如我们抵抗的话，那塞尔维亚全体人民都会被消灭”。我对他说：“塞尔维亚人民只有斗争，才能得救。”我们没有取得一致意见。而在我们会谈前几天，正如米哈伊洛维奇的人在法庭上所说的<sup>①</sup>，有一个盖世太保分子，德军司令部的代表到了米哈伊洛维奇那里。我当时不了解此事，否则我就不去同他会谈了。我们继续战斗，解放了克鲁帕尼、洛兹尼察、乌日策波热加、乌日策、恰恰克、上米拉诺瓦茨以及其他地方，一直到桑贾克的大片地区。然后，我又想与德拉扎会晤。我为了举行这次会晤邀请他走近一点，到他地盘的边上举行，德拉扎的地盘包括三至四个村庄以及拉夫纳山。他的人声称，德拉扎病了。而我们的同志反对我到 he 那里，因为当时切特尼克已开始杀害我们的同志了。我说，“我要到那边去，因为我必须去，再试试能否制止自相残杀，不让德拉扎跑到奈迪奇那里去。”当时我并不清楚他已经投靠奈迪奇了。会谈时，我答应向他提供我们的乌日策工厂生产的两万五千发子弹和五百支

---

<sup>①</sup> 这里指的是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六日，南斯拉夫军队最高军事法院在贝尔格莱德审讯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在拉夫纳山组织的政治和军事领导机构的成员。——原注





枪。这些东西他都得到了。可是他不想接受我们提出的各项要求，这些要求你们肯定都知道。他只想得到枪、弹药和钱。我们达成互不进攻的协议。哪知，我们谈判完回来，切特尼克就向我们公开发起了进攻。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在乌日策波热加把他们的胡子兵打得落花流水，把德拉扎赶进拉夫纳山。若不是他的代表米蒂奇当时来到司令部向我们苦苦哀求，我们那时就把德拉扎的军队消灭了。当时我们没消灭他们，是一个错误。<sup>①</sup>

---

<sup>①</sup> 摘自一九四五年十月十六日在泽蒙举行的被俘的前现役军官大会上的讲话(《言论集》，第二卷)。



## “乌日策共和国”结束

### 我们的预感应验了

临近十一月底，形势越来越坏。十一月二十五日，德军开始向乌日策、波热加和恰恰克广大的解放区发动进攻。即开始实施德军司令部所谓的“乌日策方案”。这实际上是，德军在卖国贼军队的配合下，两个月来在塞尔维亚西部和舒马迪亚地区发动的大规模进攻的继续和最后阶段。德军在飞机和坦克的配合下，以极其强大的兵力从好几个方面向乌日策进攻，以便占领解放区和消灭解放区的游击队。

虽然我们的部队在四面八方对德国的摩托化部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但是，却不断传来令人不安的消息，一个比一个叫人难受的消息。我们获悉：留博维亚失陷，德军呈半圆形，从留博维亚、瓦列沃、上米拉诺瓦茨和克拉列沃地区向“乌日策共和国”腹地，向乌日策、波热加和恰恰克进攻。

今天，德军发动攻势的第三天，前线向我们报告：德国人已从克拉列沃突破，向恰恰克挺进，随后我们又获得消息说，从瓦列沃进攻的德军已占领了瓦列沃——乌日策这条道路上的



重要山口——布科维并向科谢里奇进攻。对德国人来说，从那里到乌日策就很近了。我们的部队(大约有来自舒马迪亚第二支队、瓦列沃支队和乌日策支队的六个连)无法守住阵地，无法阻止在飞机、火炮和坦克的配合下，发起进攻的力量要强大得多的德军。在对于我们来说十分重要的方向上，防线被突破了，而我们没有充分的把握，我们的部队是否有组织地撤退了，并在新的阵地上建立了防线。我们担心，德国人可能会继续使用屡试不爽的楔形队形进攻，继续迅速地推进，直逼乌日策。

我们的处境变得困难了，因为切特尼克放弃了阵地，而且大部分加入了德军和卖国贼的军队，他们就是这样公开叛变的。当天晚上，十八点，我们怀着满腔愤怒的心情收听了伦敦电台的广播，广播员以娓娓动听的声音说，在南斯拉夫“德拉扎·米哈伊洛夫的英雄部队”如何“同敌人展开不断斗争”，英国人民如何“钦佩这一斗争”。

我对局势进行了分析，得出结论：乌日策十之八九坚持不了多久了，不久，也许三四天内就会失陷。因此，必须赶紧继续把武器、弹药、粮食、装备、现金、印刷厂、宣传材料全部撤走。撤退工作大部分是沿着通向兹拉蒂博尔方向的公路进行的，因为如有必要的话，可以继续往后撤到桑贾克，据我们估计，在桑贾克已有黑山的强大游击队。按照我们以前的命令，黑山和博卡游击队总司令部应当把这批黑山游击队调往塞尔维亚。

撤退伤员的工作，我们早就开始了，可是，局势表明，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可能使这项工作难以顺利地进行。我们早在



十月底就下命令：在乌日策四周的兹拉蒂博尔山上作好准备，安置伤员，因为山上有不少旅游设施。然而，十一月二十一日才开始从乌日策开始撤走重伤员，在此期间，乌日策的兵工厂发生了一次大爆炸，许多工人被炸死炸伤。必须尽快把负伤的工人撤走。由于从前线每天都送来几十名伤员，情况就更加困难了。因此，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怎样把如此大量的伤员全部转移到兹拉蒂博尔山上。我们只有三辆卡车，一辆大轿车和一辆救护车，加上几辆普通的马车和四轮大马车，这大体上就是我们可以用来运载重伤员和重病号的全部运输工具。我们很快就损失了那辆大轿车，因此困难就更大了，因为在从兹拉蒂博尔回来的途中，大轿车掉下了山坡。

多亏医务人员(戈伊科·尼科利什、德扬·波波维奇、久罗和尤尔卡·梅什特罗维奇等大夫)和驾驶员的杰出努力，撤退工作尽管遇到了种种困难，但还是顺利地展开了。由于天气严寒，伤员们往往没有衣服，就只裹着被单或者毯子，用卡车和马车运走，然后安置在帕利萨德和克拉列沃沃达的一些住户、别墅和咖啡馆里。我们当时相信，要是我们把伤员转移到兹拉蒂博尔山上，那他们就保险了。我们当时以为德国人是不会来到那里的。不幸的是，事态很快就表明，我们估计错了。

从乌日策撤退的工作是由米塔尔·巴基奇领导，在人民解放政权的全力支持下进行的。大量的粮食、装备和其他物资分藏在山村里和山里的羊圈里，以免落入德国人之手，一旦我们失去了这一地区，老百姓也可以享用。我们手头有大量缴获的现金(五千五百万第纳尔，其中有一千万银币)，因此我们决定，把现金全部撤走。这么多钱装了一卡车，总共一百零三箱，每



箱重六十公斤，转移到帕利萨德去了。

我们怀着痛苦的心情等待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看来形势没有任何希望变好，就这样度过了一夜。尽管我们事先采取了措施，在乌日策近郊阵地上组织抵抗，但是，我们并不抱幻想，并不认为乌策这个我们仍在塞尔维亚土地上坚守的最后一个城市还能长期地坚守下去。

我们的预感应验了。十一月二十八日清晨我就得到了新的情报，使人毫不怀疑，乌日策就要沦陷了。德国人从四面八方不断地进攻，接连不断地打败沿路分散后撤的游击队不那么特别有组织的抵抗。这一天恰恰克也失陷了。

科谢里奇方面的战事发展不利的消息使我尤为不安，我原以为，我们阻击那个方向敌军的部队能够阻止敌人的进攻，因为他们在布科维山脊上的防御阵地非常坚固。然而，经过激烈的战斗，从清晨一直打到十四点钟，德军突破了我们的防线，占领了布科维，开进了科谢里奇，从而打通了通向波热加和乌日策的道路。

当我们获悉，从留博维亚开出的德军纵队，通过罗加契察，向巴伊纳巴什塔和乌策进发时，我们更加感到不安了。在这个方向，我们没有足够的兵力，因此，德国人有迅速地，也许天黑时就攻入乌日策的危险。必须赶快进行阻止。由于没有其他部队，我们派了由乌日策的工人和手工业者组成的一个工人营，去阻击德军纵队，工人营同波萨瓦支队的几个连一起，占领了卡迪尼亚查山上的阵地，还给这支队伍配备了一门山炮。

与此同时，我们继续加快撤退工作。这样，最后一批伤员在一天一夜的时间里撤离了乌日策，我们还撤走了我们的印刷



厂，以及已印好而尚未装订的《联共（布）党史》。

设在国民银行金库里的最高统帅部，这一天工作照旧进行，没有停顿。几乎随时都有传递消息的通讯员、当地部队和指挥部的首长以及政权机关的代表到我们这里来，请求指示，请求增援。我们还通过电话同尚未落入德国人之手的地方取得了联系。有一次，从科谢里奇有人打电话来说：“没事了，部队可以返回营地了”，因为，据说“危险已过去了”。这个人很可能是个德国人或切特尼克，他企图让我们上当，以便德国军队长驱直入乌日策，弄得我们措手不及，这个阴谋不会使我们上当。

黄昏时，佩拉·斯坦鲍利奇<sup>①</sup>和科查·波波维奇<sup>②</sup>到达了最高统帅部，他们曾同切特尼克谈判。与他们同来的还有英国少校赫德森<sup>③</sup>，如他所说，他来是为了取走自己的电台，然后返回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司令部。正如所料，这次会谈，像前几次会谈一样，没有取得任何积极的结果。这次，切特尼克也拒绝握住我们伸给他们的合作之手。其实，再也没有什么可指望他们的了，他们的首领最终地无可挽回地走上背叛的道路。

十一月二十八日晚上是在乌日策解放区度过的最后一个夜

① 佩塔尔·斯坦鲍利奇：塞尔维亚游击队总司令部司令。——译注

② 科查·波波维奇游击队支队司令。——译注

③ 杜安·赫德森系英国情报员。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〇年作为矿山工程师曾在南斯拉夫工作过。从一九四一年九月至一九四四年初在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司令部里工作。一九四四年三月从游击队的解放区前往英国。——原注



晚。我一夜未眠，守候在电话机旁。

十一月二十九日，天亮了。清晨天空灰蒙蒙的，预示着这一天将是非常严峻的一天。飞机几乎不停地在城市上空盘旋，扔炸弹，用机关枪扫射。我们的高射机枪向飞机开火，但一架飞机也未打下来。于是我，还有几个同志用自动步枪打飞机。我们站在最高统帅部后面的小土岗上的混凝土掩体旁，把自动步枪贴近墙，朝低空飞过我们头顶的飞机射击。

传来消息说，德国摩托化纵队已开向乌日策。在乌日策市前面的阵地上，在茨尔诺科萨和卡迪尼亚查的山顶上，进行了有组织的抵抗。这是设在乌日策市前面的最后一道防线了，能否守住？能守多久？我们心中没底。我们毫不怀疑，我们的战士决心勇敢战斗，全力以赴牵制敌人，不让敌人迅速攻入乌日策。可是，这是否能够阻止在飞机和火炮的全力支援下发动猛烈进攻的摩托化纵队呢？

乌日策守不住，对此我没有抱幻想。但是，我仍然认为，德军不会这么轻而易举地就攻进来，因为我认为，我的命令将得到执行：在公路、沟渠和桥梁布雷并进行破坏，从而阻止德国摩托化部队前进。我在此之前就命令一位军官，一位几天前到我们乌日策这里来的中校在通向乌日策市的所有入口处，特别是从科谢里奇通向乌日策的那条公路上布雷，这是条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通向乌日策市的北部。

我们期待着从阵地上传来新的消息，怀着这样的心情度过了上午头几个小时。大约十一点钟，我得到消息说，科谢里奇上面的茨尔诺科萨山上的阵地失守了，德军已攻入卢日尼策河谷，从那里继续进攻，部分队伍开向波热加，主力部队开往乌



日策。我得承认，我们未料到这方面的敌人如此迅速地攻破了防线。遗憾的是，情况表明，茨尔诺科萨的守卫者，二百至二百五十名战士没能守住自己的阵地。

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作了估计，认为是撤离乌日策的最后时刻了。在我之前，卡德尔、兰科维奇、吉拉斯、里巴尔以及最高统帅部的其他一些同志都走了。奉命守卫乌日策市以南阵地的部队也撤走了。

几乎是在最后的关头，当德军已经接近乌日策的时候，我才离开这个城市，坐上一辆汽车，开往兹拉蒂博尔。同我一起乘坐这辆车的有赫德森、乌日策支队政委米林科·库希奇、报务员韦利科·德拉吉切维奇和我的警卫员博什科·乔利奇。我们在一家咖啡馆前停了车，下车后遇到一些战士，其中有洛拉·里巴尔。我突然转向赫德森，并对他说：

“你听着，你说说，现在是谁在同德国人战斗？是我们还是切特尼克？”

我没有得到答复。他看上去很平静、漠不关心的样子，似乎他四周发生的一切与他毫无关系。

我们沿着一个山脊走，看到在我们脚下的公路上，德军步兵下了卡车，立即排成射击队形，从公路两侧往山上爬。局势变得越来越严峻。而更严重的是，飞得很低的飞机无情地扫射这片地区，常常迫使我们躲起来。

我心想，飞机已经发现我们，不断地用机枪扫射我们所在的这条乡间小道。

突然，德拉吉切维奇发现德军士兵扛着机枪正朝我们走来。他们很近，距离我们一百米左右。德拉吉切维奇惊恐地提





醒我们，跳起来，开始穿过矮树丛逃跑，我们三人也跟着他飞奔起来。赫德森跑得很快，我也跑得不慢，尽管我穿了很重的皮上衣，挂着望远镜，还佩着一支大毛瑟枪和别着一枚反坦克手榴弹。为了跑起来轻松些、快些，德拉吉切维奇甚至把斗篷和手枪都扔了。

我们的出现或许令德国人感到意外，他们没有立即开火。我们跑了一段路之后，才听到身后响起了枪声。我拼命跑，子弹在四周开花。我心里想：完了，这下完了！我们走运的是，晚秋时节白天短，夜幕和晚间的雾气大，能见度很小。突然，我一边跑着，发现身后响起了一发闪光弹。最初，我认为德国人是为了照亮这片地区以便能够更准地向我们开火，但是马上我又闪电般闪过一个念头：这是一颗火箭弹，告诉步兵在什么地方停下。

我是对的。德国人在离马奇卡特村不远处止步了。

我们稍作喘息后，放慢了步子，沿着乡间小道，向查耶蒂纳走去。一路上我把我所遇到的战士集合在一起。很快我就收集了大约三十名战士。我们坐在一个小树林里稍事休息。

我对战士们说：“你们听着！到现在为止，我没有指挥过这样少的部队，现在，你们归我指挥。没有我的命令，你们中的任何人不得做任何事情。”

就这样，那天晚上，我成了有一个排的游击队的排长。很可能，没有一支军队的最高统帅有过这样的遭遇。而在我们的游击战中，却发生了这样一些不寻常的事件。

在黑暗中，我们没有向导，走了好几个小时。快到午夜时，我们看到有亮光。我们走近才发觉从一座房子里传出歌声。我



断定，这是切特尼克，他们正为游击队的失败而欢庆。我的战士中有人建议袭击他们。

我说，“不，我们不袭击他们，我们得往前走，因为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任务。”

经过艰难的行军，我们到了查耶蒂纳。在那里，我们弄到了一辆卡车，很快不知从哪里又开来了第二辆。我们乘上卡车，开到帕利萨德。在贝尔格莱德的律师帕夫洛维奇的别墅里，我找到了卡德尔、兰科维奇、吉拉斯和其他一些同志。他们都心神不安，因为都担心我已牺牲。

我几乎快站不住了。我一坐下，就觉得疲惫不堪。对大批伤员的命运深为担心，我在沉睡之前告诉他们：

“同志们，你们听着！赶紧撤退伤员，今晚不会，但是明天一早，德国人就会来到这里。”

我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后来，我从缴获的德军档案中获悉，当天晚上，在德军第三百四十二师司令部里，召开了各团团长和独立部队指挥官会议，分派了第二天“在乌日策以南追击敌人”的任务。

艰难辛苦、令人沮丧的这一天就这样过去了，对于我们大家，对于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运动的领导来说，这一天有可能成为致命的一天。我自己可以说，几乎被打死在扎布奇耶村和留巴涅之间的那条泥泞的乡间小道上。最高统帅部和南共中央政治局的其他成员也都幸免于难。卡德尔在马奇卡特村遭到猛烈的轰炸，好不容易才保住了性命。他的随行人员中有几个人牺牲了。兰科维奇和吉拉斯在贝拉泽姆利亚附近，也遭到轰炸，在坦克炮火下死里逃生。洛拉·里巴尔也是在严峻的形势下，



在最后关头才保住了性命。他还没有到达，然而据说，他同德拉甘·帕夫洛维奇·希利亚一起在德国人鼻子底下逃跑了。

整整一天都在匆匆忙忙地撤退来自各个支队的人、伤员、难民、武器和物资。在这件事情上与其说是有组织地在工作，不如说是自发地在做。尽管条件困难、不利，在作出超常的努力的情况下，这一切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撤退伤员这一工作中，跟军队一起撤离的乌日策及其周围地区的妇女表现突出。印刷厂和《联共(布)党史》一书的铅字也用牛车运走。在最困难的时刻，在没有足够的运输工具来运伤员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忘记这本书，这是我们党组织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参考书之一。

尽管我们累得快站不住了，我们没有时间休息，因为要办的事太多，要解决的问题数不清。在过去的几天里，我们的工作缺乏组织性，有很大的自发性：后撤的部队沿途到处都有，把他们集合起来了，往往又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伤员都是匆匆忙忙撤走的，几乎是在德军坦克开到前不久才撤走的；难民情绪低落，惊恐不安，使得情况更加混乱。

我们在晚间召开的最高统帅部会议上讨论了十分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的所有这一切问题和其他重要问题。我们总共四个人开会：卡德尔、吉拉斯、茹约维奇(他受了重伤)和我。兰科维奇和里巴尔还在乌瓦茨河的彼岸，跟从各条战线上撤下来的部队在一起。

在会上，我们决定，尽早整顿秩序，对部队实行改编、加强部队战斗力并派到阵地上去，对伤员和难民进行照顾，组织好供应等事项。



在最高统帅部的这次会议上，我们通过了一项决定，立即派几位军事领导人和党的领导人到塞尔维亚西部去，与在那里坚持斗争的部队联系并改编和加强这些部队。我们把这项任务委托给以下同志：南共省委委员、塞尔维亚总司令部成员米尔科·托米奇、塞尔维亚人民解放总委员会委员尼古拉·格鲁洛维奇和弗拉达·泽切维奇神父。跟他们一起返回的还有乌日策地区的一部分领导人（武科拉·达比奇、维托米尔·奇沃罗维奇等人）。跟这批人一起走的还有赫德森上尉，他表示希望回到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那里，据说是为了向他施加影响，促成他同游击队和解。我满足了他的愿望，并同意他把电台带走。我之所以这样做，不是由于我对同德拉扎达成协议与和解的可能性存有幻想，因为我完全清楚，切特尼克已经最终地和无可挽回地替占领者效劳去了，而是简单地由于我不想同英国人的关系搞得很紧张。在科卢巴尔营的一百名左右的战士组成的一个连的护送下，这批人第二天晚上就启程去塞尔维亚了。几天之后，我们又把人数更多的一批人派回塞尔维亚。

派部队进塞尔维亚，这在当时是冒很大危险的。我们的这个决定没有经过仔细的考虑，我同意了那个决定，这是我永远不能原谅自己的。我得说，我之所以同意这一决定，是由于有几位同志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无论如何派部队进塞尔维亚，他们说，我们不应该把这片土地空出来，必须保卫人民不受恐怖统治毒害。战士们到了那里之后，占领军、奈迪奇分子和切特尼克不断像追捕野兽似的围歼他们，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又怎能保卫人民呢？他们在哪一个村庄都站不住脚，到了冬天，他们几乎全部被歼灭！



##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前夕

### 不吝惜弹药

十二月十二日晚，主持桑贾克作战的黑山支队司令阿尔索·约万诺维奇前来见我们。这是我与他的第二次见面，他不久就成了最高统帅部参谋长，我的亲密助手。我是在十月份才认识他的，他当时跟米塔尔·巴基奇、赫德森上尉和扎里伊·奥斯托伊奇少校一起来到乌日策。他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不错，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生气、能干、有军事教养的人，作为总参谋部军官，他掌握一定的军事知识，特别是在完成司令部作业、计划、组织和实施战术行动方面，遗憾的是，在战略问题上，他几乎一窍不通。

我把他狠狠地训了一通，他一声不吭，没有说一句辩白的话。

我告诉他，我们决定组建无产者第一旅，他的支队中的两个营将被编进该旅，我命令他的部队解放鲁多，我们将在鲁多组建无产者第一旅。

我一直在考虑，也许调他到最高统帅部来当参谋长是合适



的，尽管关于这件事当时我没有对他说过，也没有对其他同志说过。独立地去完成任务，去指挥部队，他显然是不胜任的，普里耶波列一仗最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但是，我当时认为，从事司令部的作业，贯彻执行我的想法和决定，他将是胜任的。我们最高统帅部里十分需要有军事知识的人，而除我以外，别人甚至连地形图都难看懂。令人遗憾的是，我的期望后来落空了，因为后来的情况表明，他连这一职务也胜任不了。

十二月十三日，兰科维奇和里巴尔从罗多伊尼亚来到弗尔尼亚克，同我们会合。

第二天，我们都留在屋子里，出乎我们意料，意大利人来了，我们几乎都遭了殃。一部分原因是天气寒冷，另一部分原因是近来比较平静，我们放松了戒备。我们估计，意大利人从普里耶波列出来的话，不可能奇袭我们，因为在普里耶波列附近我们有桑贾克的一个连。

然而，结果是我们错了。在十二月份的那个寒冷的清晨，意大利人离开普里耶波列，畅通无阻地开到了弗尔尼亚克村。米莱舍夫指挥的那个连的警卫排看到敌人就后撤了，并未向我们报告。

我们当时在屋子里。跟我们在一起的还有两个伤员：茹约维奇和克利亚伊奇。他们两人躺在一张床上，一直在谈论什么问题。一名警卫战士进屋时，我正好醒来，他走近我，低声说：

“外面有情况。下面听到有敲门声。”

我没有惊动别人，我走到屋外观察，看看有什么情况。天刚亮，半明半暗。雾气减弱了能见度，刚开始时，我几乎什么都看不见。由于什么都没发现，我生气地放下望远镜。在我的



眼睛适应了之后，我才看到，有一队人马正从下面往上爬，直向我们走来。我目不转睛地望着这支队伍，拿不准这是我们的部队还是敌人的部队。

我再仔细看，发现有人披着披肩。糟了，是意大利人！

我飞奔进屋，嚷道：

“走，快走！意大利人来了，就在屋子附近！”

所有的人一转眼都起身离了屋。

意大利人已经在附近。而我的那匹马——一匹漂亮的英国良种赛马——已备好鞍，因为我本来打算那天一早要骑它。鞍子上还挂着我的皮包，里面有一台照相机。

我冲着饲养员嚷道：“马！把马牵来！”他立即去牵马，但是被迫回来，因为意大利士兵已经到了马近旁。

我们的处境不妙。离我们最近的一个营在科萨蒂察，而大部分由青年人组成的乌日策连在德雷诺瓦，离我们大约二三公里。我们几乎得孤军作战了。我派通信员去找那个连，同时我们准备战斗。我们占据了公路上方的隐蔽处，从栅栏、井架、仓库、墙角的后面，对着敌人的方向开火。一时，我们把意大利人弄得张皇失措，我们得到了时间重新组织起来，我们相互掩护，朝北撤，撤向一座小树林。

意大利人用迫击炮打我们。<sup>①</sup>

我们往上撤，我们刚走不多远，就看见乌日策青年连赶来

---

<sup>①</sup> 摘自约·布·铁托：《战时回忆录》（一九七二年五月二日、十二日、十九日、二十六日和六月二日，《前线》杂志。）



了。不知道他们怎么很快就赶来了！肯定是跑着来的。

我对他们的连长留比契奇——当时是个青年人，现在已是将军——说：“占据这里的阵地，打退意大利人！”我虽这么说，但我知道，两个营的敌人在对付由青年人组成的一个连。他们都很年轻，几乎还是孩子，然而他们把意大利人打退了。

我们的这些青年人作战很英勇。各种口径的掷弹筒、机关枪和步枪，都开了火。意大利人也不吝惜弹药，因为弹药他们多的是。我们的战士子弹不多，但是他们打得准。<sup>①</sup>

---

<sup>①</sup> 摘自一九五九年五月八日与《青春报》代表的谈话（铁托：《为实现和平而斗争》，第十二卷）。





## 建立无产者第一旅

### 我问战士们有什么想法

我们没能顶住敌人的第一次攻势。就我们游击队的建制而言，我们当时只有游击支队，下分小队，但是同时已经组建了营。比如，瓦列沃支队已经划分为营。而克拉古耶瓦茨支队，也即舒马迪亚支队，以及克拉列沃支队也已有营的建制，虽然不这么叫。

敌人发动第一次攻势时，我们的一个基本弱点在于我们当时没有集中的指挥部。最高统帅部必须逐个指挥每一个支队。没有可以自上而下传递命令的军事单位，也就是说上下联系不够，缺乏协调。尽管战士们是勇敢的，是作了努力的，这个弱点严重影响战斗的结局。这是一个很宝贵的经验。当我们从塞尔维亚撤退到桑贾克的时候，我开始考虑今后的作战方式，考虑以何种方式组建部队。

我们没有那么多人来组建大部队，我们也没有时间来等待建立起那么多支队和营。我想，我们还是得着手建立具有正规形式的部队，即使人员少一些。我们建立了无产者第一旅，作



为完成战略性任务的作战部队，把它作为进一步建立正规部队的核心。我当时的目标是建立几个旅，关于师，当时还没有想过。

我们的部队撤离塞尔维亚时被打散了，但是各个支队多多少少还是在一起。克拉列沃营位于科萨蒂察。伊巴尔矿工连在这个营的编制内。克拉古耶瓦茨支队和贝尔格莱德支队位于诺瓦瓦罗什。我和最高统帅部迁到了德雷诺瓦，我们的部队还都在后面。当时跟我在一起的总共只有八名警卫。另外，跟我在一起的还有受了伤的茨尔尼〔斯雷滕·茹约维奇〕和菲恰〔菲利普·克利亚伊奇〕。我当时在考虑给这些部队以什么样的称呼。塞尔维亚的情况表明，由农民组成的游击支队更愿意在家乡作战。我注意到，从塞尔维亚撤退时，撤离的大多数是工人。在贝尔格莱德支队、克拉古耶瓦茨支队和克拉列沃支队中，大多数人是产业工人，尽管那里也有一部分觉悟高的农民子弟。于是我决心组建旅，并命名为“无产者旅”。

有一天，我前往科萨蒂察，去看望在那里休整的战士，并同他们谈谈，看他们有什么想法。我问他们：同志们，你们现在懂得了我们斗争的实质，你们是工人，你们清楚我们的斗争必须具有革命斗争的性质，我们的斗争不只是一场解放斗争。工人阶级在这场斗争中必须肩负起最重的担子，工人必须作出最大的贡献。因此，我想，我们应当建立无产者旅。你们是否愿意加入无产者旅？无产者旅将有铁的纪律，而这种纪律必须建立在你们的觉悟的基础上，那就是你们不仅是为反对法西斯而战，而且是为争取更加美好的未来而战。

这时，后来当上了将军，在解放时去世的帕维契奇上尉对



我说：统帅同志，我是伊巴尔矿工连连长，空军上尉帕维契奇（他曾经是旧南斯拉夫军队军官），请您允许我提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建立无产者旅，这有何意义？

作为旧南斯拉夫军官，关于无产者，他听到过很多说法，说他们是破坏分子和共产主义者。他是一个爱国志士，但是由于他以前所受的教育，他难以理解。我回答他说，我们现在团结的不只是无产者，不只是工人，而是南斯拉夫所有的爱国志士。在无产者旅中，现在在这个第一旅中，以后在第二旅和接着建立的其他旅中，将不只是有工人，也有农民和其他爱国志士，然而工人将成为这些旅的核心。由于他们能够最深刻地理解斗争的实质，在这场斗争中，他们理应起到主要作用。他们在斗争中必须表现出是最坚韧不拔的，他们不只是为自己而斗争，而且也是为农民，为解放全体人民而斗争。我说了，我们将给这些部队以无产者的称号，因为这使每一个战士有义务作出最大的努力，有义务作出榜样，让人看到应该怎样战斗。我们现在建立的是正规部队，而不是游击支队，是派到哪里就打到哪里的部队，而不是地方游击队。因此，它们将在各地作战，将在没有举行起义的地方作战，同时将播下友爱和团结的种子，因为在这些部队里有塞尔维亚人，也有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和其他民族兄弟。帕维契奇上尉说，“好，既然是这样，那我赞成！”

最高统帅部位于诺瓦瓦罗什，我们开了会，决定尽快建立无产者旅。同志们一致同意在鲁多镇完成这项工作。

鲁多是继乌日策之后，我们能让战士们稍作休整的第一个城镇。当时，黑山的两个营也已赶到鲁多。十二月二十二日清



晨，我们的部队在鲁多集合，我向他们演讲，无产者第一旅将起什么样的作用，我们的战斗前景如何。

在整个战争时期，无产者第一旅始终同其他无产者旅一起完成最重要的任务。它走过的是一条光荣的道路。无产者第一旅的建立表明这是我们的一个很成功的想法。无产者第一旅是我军的胚胎。<sup>①</sup>

---

<sup>①</sup> 摘自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就南斯拉夫军队建立九周年与米兰·日日利少将和米洛拉德·亚乌科维奇少校的谈话（铁托：《言论集》，第五卷）。



## 建立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

### 应当让人知道是谁、在什么时候 和以什么方式开始干起来的

在后来我们占据福查之后,我发现有些战士既不想当游击队,也不想成为切特尼克。我就说:称他们为志愿军!本着这一思想,我在一九四二年一月中发布了关于建立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和志愿军的命令。早在一月上半月,我就开始思考这件事。我们到达亚霍里纳时,就建立了第一志愿支队。

早在一九四一年,我们在希特勒的欧洲堡垒里建立了解放军并有一支人数不少的军队。在全国,我们约有八万名战士。

当时,我们已经同全国各地的指挥部取得了联系,因此,我们对于哪里发生什么事情是比较清楚的,可以做到统一指挥并下达任务。当时起义正席卷越来越多的地区,变成为一场人民解放战争。我们一九四一年时就是如此,应当让人知道是谁、在什么时候和以什么方式开始干起来了。任何人都无法否认我们的这些事实。

当敌人于一九四二年一月在波斯尼亚东部发动第二次攻势



之后，我们的主力部队突向南方，收复了以福查为中心的一片新地区。我们利用在福查的这段时间来进一步发展武装力量 and 人民新政权。当时确定了人民解放委员会的基本原则、它们的性质和职责，明确指出，这些原则适用于全国。同时，在我国的其他地区兴起了武装斗争，相继建立起新的游击队，扩大了解放区。

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觉察到我们的人民解放运动力量的增长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占领军的威胁，于是协调了行动，第一次计划进行大规模的联合行动，在卖国贼的大力帮助下，发动了第三次攻势。我们进行了艰苦的战斗，直到一九四二年年中。我们不仅击退了敌人的猛烈进攻，而且还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几个新旅。

同时，在波斯尼亚西部、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除了已有的部队外，又建立了一批新旅和别的游击队队伍。我认为，环境对在这些地区进一步扩大武装斗争十分有利，因此我于一九四二年六月底决定离开泽伦戈拉，向波斯尼亚西部进发。当时跟最高统帅部在一起的主要是几个无产者旅。在八、九月的这次进军中，我们摧毁了敌人的许多据点，解放了大片土地，同那些地方，首先是同达尔马提亚和波斯尼亚克拉伊纳的游击队联络上了。我们的到来，使已有的解放区大为扩大。十一月初，我们当时第一次集中了最大的兵力，解放了比哈奇，使它成了这个大解放区的中心。战后，我从审阅德国档案的历史学家那里获悉，德国人把这个解放区叫作“铁托国”。

由于军事上的胜利和游击队的壮大，改组游击队的条件已成熟了。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初，组建了头八个师，其中有五个



师编入头两个军，而其他三个师直属最高统帅部。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支队和志愿军这个称号改为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支队。<sup>①</sup>

---

<sup>①</sup> 摘自一九七五年五月七日在贝尔格莱德发表的《在战胜法西斯三十周年之际的回忆和展望》(铁托：《军事著作》，第五卷)。



## 游击队的海军

我们只是发布了命令，  
作了指示，仅此而已

一九四二年夏天，最高统帅部指挥几个战无不胜的无产者旅，从黑山到达普罗佐尔——利夫诺——格拉莫奇地区，廓清了从科尼茨到格拉莫奇的整个地区，格拉莫奇是在几天之前解放的。

最高统帅部设在格拉莫奇，要求各地的领导同志前来接受新的指示并汇报当地的局势。达尔马提亚的一批同志来到了格拉莫奇。

与这批同志一起来的有当时的上校，现在的将军什科尔皮克和他的儿子，一名年轻的海军军官。小什科尔皮克很年轻，对于怎样成功地在海上骚扰占领者，有各种各样的计划。开始时，我觉得他讲的话并不使人信服，但是，当我同他具体地探讨各种技术上的可能性时，我觉得，是在游击斗争的这个方面夺取胜利的时候了。

我们立刻下达了命令，建立游击队的海军。任命了司令部





人员，确定在波德戈拉设立基地。这是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其余的就都是下面的同志的任务。

在物质方面，最高统帅部能向我们的海军战士提供什么援助呢？什么都无法提供。最高统帅部只是发布了命令，作了指示，仅此而已。其他一切就听凭我们的同志发挥建设性的主动精神了，我们的英雄们几乎是赤手空拳，驾着木船，在我们蔚蓝色的亚得里亚海上与意大利占领者，后来是同德国占领者的铁甲军舰打仗。<sup>①</sup>

---

<sup>①</sup> 摘自《写在我们海军生日之际》一文（铁托：《言论集》，第七卷）。



## “比哈奇共和国”

### 真正的人民政权

最高统帅部和几个无产者旅，与塞尔维亚和黑山的战士们来到克拉伊纳以及一九四二年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克罗地亚的部队共同作战，这对于起义后来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战争第二年对敌人取得的许多次胜利，其中最有意义的是比哈奇战役的胜利，有力地促进了一批新的旅的建立，推动了这批旅组建成师和军。当时，大约有八十万敌军对付我们的十五万名战士，这一事实最有力地显示，我军具有多大的力量。

一九四二年岁末，比哈奇成了解放区的首府，解放区的面积几乎占战前南斯拉夫的五分之一，超过了比利时、瑞士等欧洲国家的面积。

老百姓称这一大片连在一起的解放区为“比哈奇共和国”，它的存在使得这个地区各个领域的活动都十分活跃。在这里召开了南斯拉夫反法西斯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妇女反法西斯阵线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军医代表大会，在这里还举办了党的和其他方面的许多训练班。在解放区建立了统一的政权体系。



人民政权同社会政治组织和军队合作，在解放区边缘地区抢收庄稼，组织生产服装、鞋类以及我军所需要的东西。

还在半解放区，甚至在敌占区开始建立得到人民信任的人民解放委员会。人民解放委员会越来越成为真正的人民政权，它除了向我们的部队提供支援外，还完成其他很多任务。因此，一九四二年秋天，情况表明有必要建立一个全国的总的政治机构。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比哈奇召开的历史性大会上，成立了我国各族人民的代表机构。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的组成为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真正的友爱和团结，为建立一种新的、比较公正的社会制度打下了基础。<sup>①</sup>

---

<sup>①</sup> 摘自贝尔格莱德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一日出版的《比哈奇共和国》一书的附录(铁托：《为实现和平而斗争》，第十七卷)。



## 奈雷特瓦之战

### 我们必须了解敌人的意图

这次战役开始于敌人在科尔敦发起的第四次攻势<sup>①</sup>，从科尔敦跟随我们一起撤退的大约有八万人，包括妇女儿童，他们想逃避形形色色的敌人的屠杀，逃避德国人、乌斯塔沙、意大利人、切特尼克。

早在科尔敦的卡尔洛瓦茨附近作战时，我们就预计，敌人在准备发动一场新攻势。我们得到各种情报。由于我们当时很了解在各条战线上的情况，了解柏林—罗马轴心处于何等状况，我们明白，正在酝酿某种重大行动。

当然，敌人在拟订自己的战略计划，我们也没有睡大觉：我和同志们在制订我们自己的战略计划。在这场战争中，我们

---

<sup>①</sup> 敌人的第四次攻势指的是德军、意军和伪军一九四三年一月至四月期间发动的战役，目的是为了消灭波斯尼亚西部、巴尼亚、科尔敦和达尔马提亚以及克罗地亚独立国其他地区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支队。——原注



已经见过不少世面，我们已经能够迅速地作出判断，敌人的每一个行动意味着什么，目的何在。敌人的行动表明，这一次不是要在狭小的范围内来包围跟随最高统帅部的部队，而是一次重大的行动，目的在于一举消灭我们的作战集群和最高统帅部，继而全歼我军。

因此，我们必须了解他们的意图。鉴于我直接指挥下的几个师在波斯尼亚西部和中部的广大地区作战，我们明白，敌人的意图是，把我们赶到不具备实施机动、逃避正面冲突的有利条件的地区，也即把我们赶往山区，赶往普罗佐尔、黑塞哥维那，继而赶向黑山。然而，我们的计划和敌人的计划就行动的方向而言，看来是吻合的。因为我一直在考虑，为什么我们要把那么多部队放在这些地区，我们应当把部队调到当时斗争尚未充分展开的地区。我们打算开赴黑山，继而向科索沃和梅托希亚，以及向马其顿进军，那里有可能动员大批新战士入伍。

因此，敌我这两个战略意图在某种程度上是吻合的。由于我估计敌人将对我们实行大包围，我认为，普罗佐尔是我们必须占据的最重要阵地。普罗佐尔过去在我们手里，但是在第三师开赴波斯尼亚中部之后，意大利人又把它占领了。我们必须把意大利人从普罗佐尔赶走，这一点我们成功了。同时，我们决定，派一个师经伊莫茨基前往德雷日尼察，切断通往莫斯塔尔的公路，而从波斯尼亚中部赶来的第一师，则应占领马克莲。无产者第二师则随同我一起从比哈奇前往普罗佐尔。

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战略计划的第一部分是如何结束的。我们消灭了意大利“穆尔杰”师，缴获了它的全部装备，包括火炮和其他武器，卡车和大轿车，缴获了他们所有的东



西。他们在奈雷特瓦河和普罗佐尔受了重创。特别重要的是，我们阻止了德军占领马克连。接着，巴尼亚第七师和达尔马提亚第九师与上述三个师会合。虽然我们在那里已有五个师，我们却未能向前推进，因为我们有四千名伤员和伤寒病号。由于伤员的关系，我们在那里又呆了三个星期。我们粉碎了敌人的进攻之后，本可以经由奈雷特瓦河上的几座桥，继续向前进军。但是，伤员怎么办呢？他们会遭殃。此外，我前面已经说过，跟随我们的还有大约八万难民。所有这一切造成了很大的困难，通常的军队所没有的困难。因为世界上很少有这样的军队——而我认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军队——把为伤员生死而战视为自己的任务。你们明白，这对伤员起了什么样的作用。人人知道，我们不会把他弃之不顾，听凭敌人处置，而是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抬着他们，拯救他们。非常幸运的是，我们从德国人那里缴获了许多卡车和大轿车，我们利用来运送伤员和病号。

奈雷特瓦河谷和拉马河谷的这场战斗进行了一个月的时间，如果从敌人发动攻势算起，则已有两个月了。

我们特别困难的是有四千名伤员和病号。我们没有粮食，因此倘若我们没有从意大利人那里缴获各种食品的话，我们的境况就很难想象了。我们首先保证伤员有吃的，剩下不多的食品再分给战士。但是，疲乏和饥饿使得许多战士筋疲力竭，常常因此而牺牲。我还记得，我们渡过奈雷特瓦河，我见有一名战士坐在一个地方，靠着一杆枪。我对他说：“同志，全都走了，我们是最后一批人了”。他不回答。我碰了碰他的肩膀，他倒下了。我仔细一看，他已死了，心脏已停止了跳动。而这样



的人不是少数。

我们这一胜利十分重要。我们向德国人表明，我们是懂得打仗的，我们能够击退他们，如果我们拥有他们所拥有的武器，他们早就被赶出我们的国土了。

在这场战斗中，敌人——德国人、意大利人和伪军——的兵力很强。切特尼克就有大约二万五千人。敌人总共约有九万人，而且装备比我们精良。我们当时只有二万战士，我们还得保护和拯救四千名伤员和病号。

渡过奈雷特瓦河以后，我们继续实施我们的战略计划：消灭切特尼克，收复奈韦西涅和黑塞哥维那的其他城市，强渡德里纳河，向桑贾克挺进，给部队补充新战士，等等。

三月下半月，我们的几个师在黑塞哥维那东部实施强攻时，打垮了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集结在那里的切特尼克，他们本想给我们以所谓的致命打击。在格拉瓦蒂切沃、奈韦西涅、克尔斯塔茨、乌洛格以及最后在卡利诺维克的战斗中，切特尼克的部队遭到重创。我们还缴获意大利人给他们的两门榴弹炮。

由于在这些战斗中遭到惨败，切特尼克再也不能恢复元气。他们的队伍人心涣散，四处逃窜。我们的这一胜利也标志着奈雷特瓦之战最后一个阶段的结束。

我们的部队稍事休整后，又投入了新的战斗。

在奈雷特瓦战役中，我们俘虏了一大批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其中包括德国人的一名营长，名叫施特雷克。当然，我们并没有把他们杀掉，因为遵循日内瓦战俘公约的条款。

尽管我们完全知道，德国人不仅杀害我们被俘的战士，而



且还杀害我们的伤员和病号，但是我们却没有把德国俘虏杀掉，因此我们建议交换俘虏，德国人立即接受了我们的建议。我们的三位同志<sup>①</sup>前去谈判，他们的任务是就交换俘虏问题进行会谈，从而使德国人承认我军作为交战一方的地位。我们只办成了交换俘虏，因而把我们的许多同志从刽子手的魔掌中解救出来，然后把他们分派到各个部队中去。

在这件事情上，我遭到斯大林的责难，我是通过共产国际向他报告的。我报告说，我们在同德国人交换俘虏，原因之一是饥饿威胁着我们，人们死于疲惫。他对我的答复十分粗暴，指责我们同敌人交换俘虏。我们同敌人交换俘虏，又能同谁去交换？我当时对斯大林作了简要的答复：如果你们不能援助我们，就不要干预我们，我们自己会设法处理自己的事务。一九四四年，我在莫斯科见到斯大林，他对于我作了这样一个答复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我当时望着他说：“斯大林同志，你处在我的地位的话，很可能你的答复会更粗暴。”他听了没有吱声。<sup>②</sup>

---

<sup>①</sup> 他们是科查·波波维奇、米洛万·吉拉斯和弗拉迪米尔·韦莱比特。——原注

<sup>②</sup> 摘自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在亚布兰尼察召开的纪念奈雷特瓦战役三十五周年的盛大集会上的讲话和祝词(铁托：《七八年言论集》)。





## 革命的命运

可以说，奈雷特瓦战役决定了我国革命的命运。在这场战役中，占领者德国人和意大利人联合起来，在乌斯塔沙军队和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切特尼克的援助下，对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发动了到当时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攻势。这是我们最光荣，同时也是最人道的一次战役。在这次战役中，德军和意军遭到痛击，而与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一起冲向我们的阵地的切特尼克被击溃，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再也恢复不了元气。

在这次攻势中，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什么也没得到，他们遭受了巨大损失，再次丧失了他们本来想占领的整个地区，因为我们留在这一地区的部队很快就收复了整个这一地区。他们惟一做到的是焚毁村庄，掠夺居民，杀戮百姓，迫使数万名妇孺老人离乡背井，逃进大雪纷飞的森林或者撤退到其他地区去。他们做到的是，使人民对他们的仇恨变得更深。

对于我们来说，反击敌人第四次攻势的特点是为拯救伤员而斗争。我们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措施来保护伤员。我们的战士从未对此表示不满。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很重要的精神因素，因为伤员们知道，我们不会把他们搁置一边。在某些情况下，为了救一个伤员而牺牲两三个战士，正是这一点更加提高了我军的士气。我们不仅抽调一部分战士去拯救伤员，而且还确定达尔马提亚第九师全师、第七师的一部分以及俘虏来抬伤员和



病号。这是很重的负担，但同时也是对这些同志的义务。当然，后果是严重的，因为这两个师的大部分战士从他们所抬的病号那里传染上了伤寒，结果使我们的突击部队的战斗力大为削弱。疲惫的战士往往一坐下就死去了。看到这种场面，是令人很痛心的。

跟随我们的老百姓尽管无能为力，还是极力帮助我们的伤员。我还记得一件事。我们渡过奈雷特瓦河以后，我遇到一位不过十六七岁的姑娘，她坐在一位濒于死亡的伤员身边。伤员的伤口流着血，但无法救援他。伤员显然要死了，守在他身边是徒劳的，我对姑娘说，走吧。但是，姑娘不肯把伤员留下不管，坐在他身边哭泣。这件事表明，我们的人民理解自己的职责，富有牺牲精神地救援伤员。

我们的部队，我们的全体战士，充满了无论如何必胜的信念。倘若是别的军队的话，可能投降了，不会继续打下去，而我们这里没有逃亡的现象。有的只是我们定能克服这些困难的信念。<sup>①</sup>

---

<sup>①</sup> 摘自为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日贝尔格莱德出版的《奈雷特瓦》写的文章（铁托：《为实现和平而斗争》，第十八卷）。



## 苏捷斯卡之战

### 只要我们中间还有人活着，敌人休想通过

当敌人的第四次攻势结束于奈雷特瓦河，当我们在这次战役中以胜利者的面貌出现以后，最高统帅部采纳了我的计划：向黑山进军，粉碎那里的切特尼克，改善政治形势，然后开向科索沃和梅托希亚，以便截断德国人同马其顿的联系，对于德国人的交通来说，马其顿是最敏感的。另外，我们认为，拿下莱斯科瓦茨和其他工业城市将十分有利，我们能够征集兵员，加强和扩大我们的几个旅和师。但是，敌人肯定觉察到了我们的计划，开始准备第五次攻势。<sup>①</sup>

五月底的一天夜里，我接到达尔马提亚第二旅的无线电

---

<sup>①</sup> 敌人的第五次攻势包括德国、意大利、保加利亚的军队和伪军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五日在桑贾克和黑山发动的战斗，目的在于消灭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最高统帅部主力作战集群。——原注



报。该旅的任务是占据上巴雷，阻止德国人截断米林克拉德的道路，我在那里的一次战斗中受了伤。达尔马提亚第二旅英勇地完成了任务，尽管在战斗中，他们的处境极其艰难。一位营长从阵地上给我一份报告说，他的营三分之二的人牺牲了，但是他们仍将坚守到最后一个人。他报告说：“只要我们中间还有人活着，德国人休想通过。”

我和最高统帅部转移到苏捷斯卡河的峡谷，第二天是我在解放斗争时期最艰难的一天，因为我面对这么多伤员束手无策。<sup>①</sup>

\* \* \*

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上，苏捷斯卡战役都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在这次战役中取得的胜利使得有关我们的斗争的真相得以传到国外，传到全世界，使人们知道谁在这里战斗。在此以前，南斯拉夫的斗争被神秘化了，被说成是切特尼克和鬼知道什么样的卖国贼在进行，我们则被迫咬紧牙关，既同德国人作战，又同意大利人作战，既反对保加利亚占领者又反对匈牙利占领者。

苏捷斯卡战役还表明了另一个事实。我们是在困难的条件下作战的，我们只有轻武器，弹药不多，我们必须爱惜每一颗子弹。我们要对付的敌人拥有最现代化的重武器，有飞机坦克，有医疗设施和足够的粮草。而我们吃的是野菜、草根和马

---

<sup>①</sup> 摘自一九五三年七月十一日在布里俄尼就七月十三日黑山人民起义日与铁托格勒电台台长的谈话(铁托：《言论集》，第八卷)。



肉，才能勉强维持生命，才能抗击越来越猖狂地向我们发动进攻的敌人。但是，在这里最终取得胜利的是共产党。是始终站在前列进行战斗的共产党员。共产党员中间的那种精神、团结和党的路线为所有的战士所接受，毫无例外，不论他们是不是党员。他们是战士，每遇战斗间隙，就发奋学习不多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以便在理论上武装自己，掌握能够战胜一切人的武器——马克思主义。今天也应该是如此。在经过许多年的平静岁月之后，我们年轻的一代应当了解，他们的先辈，战时的年轻一代是如何渴求知识，是如何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而他们是知道明天或许会牺牲的。

我们当时进行斗争，并不是为了将来为个人谋求高官厚禄。我们中间谁都不知道明天是否还会活着。然而，我们知道，我们是为什么而战斗的。

我已经说过，我们当时没有什么特殊的装备，仅有一些轻武器。就是这点武器也不是别人给我们的，而是我们自己从敌人那里夺来的。当时，一九四三年，在这一次大战役期间，没有任何人给过我们一支手枪，一颗子弹。

我们的斗争是大无畏的象征，鼓舞了许多国家的人民起来同殖民主义作斗争。<sup>①</sup>

---

<sup>①</sup> 摘自一九七三年七四日在坚蒂什特群众大会上的讲话(铁托：《军事著作》，第五卷)。



## 我在苏捷斯卡战役中受了伤

在第五次攻势中，我们的处境最为困难。我想，最困难的是在米林克拉德。我还记得，我当时说过：“我们要么全都牺牲在这里，要么设法从这里脱身。”抬着老诗人纳佐尔的意大利俘虏设法逃跑了，德国人从他们嘴里了解到我在哪里，因此不断向森林里打炮。

我当时还不知道臂上负伤。有东西击中了我的胸部，我以为击中了心脏。炸弹爆炸后，我抬起头来，问别人是否都活着，我站起来拿我的自动步枪。我感到手臂麻木。不过，我没有在意。过了较长一段时间以后，我觉得我的手臂完全麻木了，我对马尔科说了。我的毛衣紧，血积在里面。我察看了一下，见外套上有弹孔。我说：“你们帮包扎一下”。第二天或者第三天，奥尔加(米洛舍维奇大夫)才想起来看看我的手臂。手臂已经变紫了。后来，我再一看，发现还有一个弹孔……

后来，我们往山下走，普尔利亚陪同我，每当他想帮我一把的时候，他总是抓住我受伤的手臂。我只好咬紧牙，一再告诉他，站到另一边来。<sup>①</sup>

---

<sup>①</sup> 摘自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速记记录(弗拉迪米尔·德迪耶尔：《铁托传补遗》之二，里耶卡——萨格勒布一九八一年版)。



## 南斯拉夫人民解放 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敌人的第五次攻势使我们遭受了巨大的牺牲，这次攻势过去以后，我们的部队重新去完成自己的任务：解放乌斯塔沙和切特尼克在德军的援助下占据的领土。

我决定向波斯尼亚中部，向波斯尼亚克拉伊纳进发。我们在弗兰杜克至奈米拉之间强渡波斯尼亚河。我们是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在夜里渡过这条河的。河水很冷，我们得泅水而过，只有少数人骑马渡河。

为什么我主张开赴波斯尼亚中部？我们收到无线电报告，谈到轴心国的一员出了毛病。报告认为不排除意大利有可能不久就投降，于是我考虑：如果意大利投降了，而我们却只在这里跟德国人周旋，达尔马提亚的意大利人有可能携带武器逃跑。我下了决心，决意不让他们带着武器溜走。我特别希望我们的精锐部队第一师能得到尽可能多的武器。我们为此而前往那里。

当时并没有打算，并没有通过决定，要召开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在我们抵达亚伊策前，在佩特罗瓦茨波列我们就在考虑，



由于十一月二十九日快到了，再开一次会很有用。到了亚伊策，我们下了决心：最高统帅部和中央委员会决定在比哈奇会议的同一天召开人民解放委员会会议。我们立即着手这方面的准备工作，而这意味着邀请各个民族的代表和各个地区的代表前来赴会。是否能够来到，我们不可能作出确切的判断，但是我们知道，大部分代表尽管会遇到很大的困难，还是会来的。

国外反对我们的宣传很猖狂。莫斯科虽说是倾向于我们的，也不怎么样，因此我就不想像一年前在比哈奇那样向他们汇报，我们将举行第二次会议。我决心什么都不告诉他们，免得又遭非议。于是，我向他们没有报告任何情况，同时，我们却在准备开会。

开会的日子临近了，各地的代表团开始抵达。幸运的是，大部分代表都抵达了，只有一小部分代表未能突破敌人的封锁。也有个别代表牺牲了，但是多数代表还是抵达了。在亚伊策举行的这次会议，是在我们的斗争处于高潮的气氛下，在十分乐观的情绪下召开的，因为我们一到亚伊策，我就抽调无产者第一师去达尔马提亚解除意大利人的武装，派达尔马提亚第一旅去斯普利特，充当组编达尔马提亚大部队的核心。达尔马提亚第二旅在黑山与无产者第二师在一起，因此我们在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期间解除了意大利人的武装，几乎完全解放了达尔马提亚地区。

一句话，局势和条件使我们能够更加坚信，我们不仅必须建立立法机构，而且要是发展顺利的话，建立作为某种政府的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因为必须要有进行领导的某个执行机构。最高统帅部无法从事这些事务，因为军队越来越扩充，





最高统帅部的任务越来越繁重。<sup>①</sup>

\* \* \*

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是在我国的斗争十分激烈地进行的时候举行的。敌人的两次大攻势——第四次攻势和第五次攻势——刚刚结束，第六次攻势又刚开始。在这样的形势下，在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除了通过其他一系列十分重要的决定外，还组成了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它具有临时政府的性质，任务是采取一切措施，顺利地继续把战争进行下去，巩固人民政权并使之正确地发挥作用，组织解放区的经济，采取一切措施来捍卫人民解放斗争的成果，采取措施来缓和人民解放军所解放的地区的贫困状况，同我们的几大盟国建立联系，谋求南斯拉夫的现状得到承认，也即使人民解放运动和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决议得到承认。<sup>②</sup>

---

<sup>①</sup> 摘自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与《解放报》和萨拉热窝电台编辑的谈话(铁托：《言论集》，第八卷)。

<sup>②</sup> 摘自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铁托：《言论集》，第二卷)。



## 敌人空降德尔瓦尔

### 老百姓的表现英勇无畏， 令人难以置信

敌人的空降是在发起第六次攻势<sup>①</sup>后进行的。

我得先谈一谈当时的形势。当时，盟军即将在法国登陆。苏军进展迅速，已经抵达罗马尼亚。德国人担心盟军在这里，在亚得里亚海登陆。我们的人民解放军给他们造成很大的困难。由于在第六次攻势中，德军未能粉碎人民解放军，希特勒就想消灭最高统帅部，不惜任何代价把我打死或者活捉我。于是，就安排了这次空降。

对于希特勒来说，当时的形势十分不利，极其困难。他希望这次空降能成功，就如他借助于伞兵抢走了墨索里尼那样。

---

<sup>①</sup> 德国人于一九四三年九月二十二日至十月十四日在斯洛文尼亚沿海地区、克罗地亚沿海地区以及戈尔斯基科塔尔对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发动了第六次攻势。——原注



然而，这里结局就大不相同了。

五月二十五日凌晨，正在值岗的警卫员把我叫醒，说远处有飞机。我走出来用望远镜观看。我立即发觉情况有点可疑。

我发现这些飞机后，立刻把山洞下面一座房子里的同志们统统叫到上面来。我觉得这里面有鬼，要发生大事情。我是在这一天的前夕同卡德尔一起从巴斯塔西来到这里的。我们两人平时在巴斯塔西的一个山洞里工作。白天往往到德尔瓦尔来，我们每天晚上都回巴斯塔西。但是，五月二十四日晚上我们留在德尔瓦尔过夜，因为第二天是我的生日，我们想热闹一番。那天晚上我去了电影院，上映的影片是《卓娅》。我还记得很清楚。假使那天晚上我们回到巴斯塔西，德国人就倒霉了。我们就会位于空降地区以外，我们就能立即采取较有效的措施。情况就会好得多，而现在这样，我们就困难得多。

应我之召，同志们都来到了山洞。这时首先飞来了轰炸机，对德尔瓦尔狂轰滥炸了一番。随后，开始降下伞兵。当我看到伞兵降在山洞前面乌纳茨河彼岸的一片草地上时，我气坏了。因为十来天前，我曾对阿尔索·约万诺维奇说过，在乌纳茨河我们这一边部署几挺机枪，以防敌人派伞兵来。如果在那里修了两三个机枪工事的话，一个伞兵也降不到那个地区，一个都活不了。他们在空中就会被打死。但是，约万诺维奇是个怪人。他的想法是，有什么好害怕的？于是，他就没有这样做。因此，德国伞兵安全地在那里降落了。

德国人在德尔瓦尔市内横行，杀害了許多人，特别是青年人。他们在寻找我。那些天，德尔瓦尔的一位裁缝正在给我做一套元帅制服。伞兵别的没有找到，找到了被炸弹炸坏了的这



套制服。

老百姓的表现英勇无畏，令人难以置信。每一个德尔瓦尔人都知道我在哪里。每个伞兵都拿着我的照片。他们出示照片，挨个询问：铁托，铁托在哪里？没有人愿意提供任何情况。甚至连孩子也都如此。德国人没有马上打听到我们在哪里，不知道我们在山洞里。我们从上面往下都看得清楚。从山洞里无法突围，只有下到一条小溪的沟底才行。我们的一位同志，我的警卫，一个很好的青年，刚走出山洞，额头上就中了一枪。我操起枪想打，同志们把抢夺了下来。我往下瞧，看见德国伞兵开着我的吉普车在那里横冲直闯。

我们终于下到了小溪的沟底。我是第一个攀着绳子下去的。我的那条狗——“老虎”在我边上沿着小路跑着，它一边望着我下沟，一边汪汪地叫个不停。这条小溪的左边是一个死角。我在那里歇了一会儿。“老虎”奔到我身边，继续吠叫着。我抓住它的嘴，不让它叫。我几次掏出手枪，想把它打死，因为它暴露了我们，不过我还是未能开枪。这时德国人终于发现这里有人，于是开始向山洞开火。

我们终于撤了出来。我让一名战士，我的一个侄儿留在山洞里。如果德国人进了山洞，让他销毁档案和其他一切东西。德国人没有进山洞。我确信，在德国人占据这个山洞之前，我们的增援部队就会开到。因为我已派了通信员去利卡第六旅，让该旅迅速赶来。当时只有我的警卫营和军官学校在场，他们立即投入了战斗。但是，他们的武器不够。

他们一直坚持到利卡旅开到。利卡旅一到，局面当然就完全变化了。我们立即分两部分撤到山洞上面。我领着一部分



人，阿尔索·约万诺维奇领着另一部分人。我们立刻向沙托尔山进发。我领着一部分人在太阳还没有出来时就赶到了，阿尔索领着另一部分人则迷了路，十点或者十点半才赶到。

我们过了姆利尼什特，在一座小树林里过夜。我经过的那条路对面有一座牧羊人的小屋，小屋顶棚上堆放着干草。后来我才了解到，在这堆干草里藏着一个叫瓦西奇的家伙，他一直瞄准着我。但是他没敢开枪，因为他看见跟我在一起的还有别人。他若把我打死了，他也活不了。

后来，我们前往库普雷斯。夜里，英国人给我们空投了物资，有弹药、自动步枪等。路上，苏联科尔涅耶夫将军强烈要求我离开作战部队，找一个我能不受干扰地工作的地方。他说，情况变了，有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不能再在前线工作。最初，我不愿听他的。后来英国人斯特里特也要我离开前线。后来，我想到我们有维斯岛，我们到那里仍是在自己的领土上。他们建议我飞往意大利。我说，我不想飞往意大利。他们说没有其他办法，我得先去意大利，然后从意大利去维斯岛。最后我同意了。

那是我第一次离开作战部队。苏联驾驶员，一些很勇敢的人，夜间来到库普雷斯，我乘这架飞机走了。而部队继续向前推进，开往布戈伊诺和瓦库夫，并随后开往特拉夫尼克、波斯尼亚中部……

后来，我还曾乘飞机前往苏联，就解放贝尔格莱德时苏联提供援助问题，与斯大林举行了会谈。后来这些事你们都知道。在维斯，有我们的大批部队。第二十六师在那里。后来，坦克旅也开到了那里。



关于空降事件，我再说几句。派到德尔瓦尔去的是一些最凶恶的匪徒。大部分是被降职的军官，已答应他们，假如他们把我捉住或者打死，或者把司令部人员俘获，就可官复原职。在七百五十至八百名伞兵中，只有大约一百一十人生还。其余的人，统统都被打死了。

这是我们解放斗争中最重要的插曲之一。奈雷特瓦之战是艰苦的，但是我们打赢了。战时，我们在南斯拉夫进行的最艰苦的一仗是在苏捷斯卡，我们在那次战斗中牺牲了大约八千人。

然而，在这里的是整个南斯拉夫的最高领导。因此德尔瓦尔战役属于大战役之列，尽管敌军要比参加奈雷特瓦战役和苏捷斯卡战役的少。<sup>①</sup>

---

<sup>①</sup> 摘自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五日同德尔瓦尔区代表团的谈话(一九七四年六月一日《战斗报》)。



## 与盟国的关系

### 我军开抵索查河

从一九四一年起，西方盟国就从现场获得有关我们的情况。早在一九四一年十月，英国军官赫德森就来到我们解放区。但是妨碍传播我们斗争真相的主要障碍具有阶级性质：有人竭力想确保旧政权在南斯拉夫重建。伦敦的南斯拉夫流亡政府同所有的盟国都有外交关系，给我们制造了极大的困难。它把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及其切特尼克说成是在南斯拉夫抵抗法西斯侵略者的力量，还要求盟国援助他们。因此，一直到一九四三年年底，我们斗争的成果都被放在站在德国人一边反对我们的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的切特尼克头上。因此，需要作出极大的努力，来向全世界证明，在我国土地上是谁在流血反对法西斯侵略者。

我们就这样，一边作战并在军事上取得越来越大的胜利，一边又揭露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及切特尼克勾结占领者，指出南斯拉夫流亡政府不能代表人民。盟国中的一些有影响的人士逐渐地清醒过来了，他们越来越看清了南斯拉夫的实际情况



和事实上的力量对比。

这一切的结果是，一九四三年五月底，英国军事使团作为派驻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最高统帅部的第一个盟国使团空降到我们黑山的解放区。意大利投降后，英国又派来了新的军事使团，其中有美国的一名代表。一九四四年二月，苏联军事使团也抵达了德尔瓦尔。

一九四三年底，我们向中东和英国，稍晚些时候又向苏联派了军事使团，以便对我们这里发生的事情提供尽可能准确的材料。也就是说，我们也开始发动外交攻势。与此密切相关的是援助问题。就武器而言，在一九四三年年中以前我们只有我们自己从敌人那里夺来的武器。我们没有从任何方面获得过武器。到了一九四三年十一月至十二月举行的德黑兰会议上，盟国领导人才一致认为，应当向我军提供物质援助。一九四四年初，西方盟国开始大量运来援助，主要是从意大利运来的。通过意大利，我们还开始得到苏联的武器。这便于我们武装日益增多的战士。而大家都知道，我们当时已经有三十多万士兵。<sup>①</sup>

\* \* \*

当时，盟国不承认全国委员会，只承认最高统帅部。因此，我以最高统帅的身份可以同盟国商讨许多重大问题。这些问题是通过派驻最高统帅部的盟国军事使团以及经过我们派驻开

---

<sup>①</sup> 摘自一九七五年五月七日在贝尔格莱德发表的《在战胜法西斯三十周年之际的回忆与展望》(铁托：《军事著作》，第五卷)。





罗、意大利，后来还有英国的盟军司令部的我们的军事使团解决的。比如，在盟国的援助下，我们把二万五千多名难民，包括儿童，从意大利送往非洲。另外，又用飞机将我们的一万多名伤员送往意大利和马耳他。经与盟国达成协议，我们在巴里建立了一个军事基地，这个基地除了向我军提供给养以外，还负责上述事务。

以韦莱比特少将为首的我们的使团先是前往开罗，后来又前往伦敦，我们同盟国政界建立了最初的接触。通过我们的这个军事使团，我们使盟国公众充分了解了南斯拉夫的真实情况。另外，这也促成了同舒巴希奇先生的会晤，他是国王指定的伦敦新政府的组阁人。会晤于一九四四年六月十六日在维斯岛举行，在这次会晤中就舒巴希奇先生的政府与全国委员会的合作以及就国内有三人进入他的政府任大臣问题达成了协议。

在与舒巴希奇会晤之后，我在意大利会见了盟军最高统帅威尔逊先生以及其他军界领导人，我还会见了丘吉尔先生。与丘吉尔先生的这次会晤牵涉加速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府的问题，并商讨了与协同作战有关的一些问题。<sup>①</sup>

\* \* \*

我是如何在意大利会见丘吉尔的？当时盟军准备进攻法国南部，在意大利集结了大批船只，准备登陆。丘吉尔乘飞机从英国赶来。第二天，我就会见了他。我们当时详细地讨论了伊斯特拉、斯洛文尼亚沿海地区、的里雅斯特等地的命运问题。

---

<sup>①</sup> 摘自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铁托：《言论集》，第二卷）。



我要说，丘吉尔在这方面态度是很灵活的。他不想玩弄外交手腕，而是开诚布公地说：“你们将得到伊斯特拉，但是，的里雅斯特你们得不到。你们将获得的里雅斯特附近地区，但是的里雅斯特我们不能给你们，因为意大利站在我们这一边参战了，我们应给意大利一点地盘。”

我们还谈及普拉。丘吉尔说：“我们需要普拉，来对奥地利发动攻势，因为在的里雅斯特解放之前，这是我們所需要的一个港口。”我同意盟军可以利用普拉的机场以及从普拉到的里雅斯特的公路。就这个问题，我们当时进行了顺利的讨论并取得了一致意见。我当时想，以后可以加以改变，我们十之八九可以更快地打进的里雅斯特，一旦我们解放了的里雅斯特，这个问题那时就可以顺理成章地解决了。我也是这么做的。因此，我下令第四集团军强行军，开往的里雅斯特，放过里耶卡，从里耶卡边上经过，只在那里留下小部队，直奔的里雅斯特。因而，五月一日，的里雅斯特就落到我们手里。我军打到索查河边，在索查河上与亚历山大元帅手下的新西兰部队会合。

我们在的里雅斯特停留了一段时间，后来我军不得不撤离。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不少次讨论，因为英国人和美国人强烈支持意大利人占有的里雅斯特。后来商定，我军和意大利军队都不留驻的里雅斯特，而由盟军部队留在那里。我们把军队从的里雅斯特撤出来，大约撤到今天的边界上。你们知道，这后来成了一个大问题。<sup>①</sup>

---

<sup>①</sup> 摘自一九七四年五月二十四日在克拉尼布尔多向卢布尔雅那《劳动报》记者博格丹·波加奇尼克发表的谈话(一九七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战斗报》)。



## 南斯拉夫军队的最后几仗

### 我们成功的秘密

我们在离开塞尔维亚的全部时间里，从来就没有放弃过一个想法：一旦条件具备，我们必定重返塞尔维亚，我们认为，塞尔维亚是结束解放斗争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对于我们来说，塞尔维亚之所以重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众多的卖国贼在那里实行了残害百姓的骇人听闻的恐怖统治。第二，我们认为，通过我们所进行的斗争，我们在进行一场反对旧制度争取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的社会斗争，我们把塞尔维亚看作是我们民族大家庭的最主要组成部分之一。我们努力不让塞尔维亚成为南斯拉夫的旺代<sup>①</sup>，不让反动分子把它变成日后可能挑起可怕的内战的一个基地。因而，我们始终关心塞尔维亚的。

我们的同志曾几次考虑打回塞尔维亚去。一九四二年在坚

---

<sup>①</sup> 法国的一个省，法国大革命时，成为反革命分子的聚集地。——译注



蒂什特，我们的一些同志就有过这种想法，当时在敌人的第三次攻势中，我们被赶出了黑山。有同志建议，我们带领五个旅，开赴塞尔维亚。我当时坚决反对这么做，同志们立即表示赞同。我说，在塞尔维亚，我们不具备靠五个旅作战的条件，我们会被打垮的。我们会牺牲掉我们的精华——由政治上高度自觉、高度成熟的人组成的五个旅。我说，我们应当到能够扩编这五个旅的地方去，那就是波斯尼亚西部。

我们去了波斯尼亚西部，我们的设想和计划完全实现了。在那里，我们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我们扩充了这几个旅，新建了几个旅、师和军，投入反击敌人的第四次攻势。后来我们被迫撤退，我们率领五个师开赴黑山，敌人第五次攻势后，我们又到了波斯尼亚东部，我们的一些同志又产生了打到塞尔维亚去的想法。我又说，我们不去，因为条件不成熟。五个师仍然是不够的，因为对于德国人来说，这是最敏感的地区，德国人经由塞尔维亚同非洲、希腊和俄国保持联系。我说，他们会死守塞尔维亚，往那里派遣大部队把我们消灭。而我们如果在塞尔维亚打一场败仗，那将对我们今后的斗争造成极恶劣的影响。我认为，最好是我们再去波斯尼亚西部，特别是由于我已看到意大利人快投降了，因此我们必须靠近亚得里亚海岸……

一支军队开到一个地方，如果它不能使当地的居民足够地相信它的力量，那是最严重的一件事。那时，居民就会几乎敌对地看待这支军队，虽说不是把它看成是敌人，但是也不把它看成是兄弟。我们在战争中每当失利后，总是要设法迅速取得胜利。为了提高士气，必须迅速地打一场胜仗。这就是我们取



得成功的秘密所在。<sup>①</sup>

\* \* \*

一九四四年一月中，盟军由于大部分部队被派往法国，在意大利的进展迟缓。但是东方战场日益逼近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边界，因此对于希腊的德国“E”集团军群来说，存在越来越大的危险。为此，德国人于一九四四年年中在塞尔维亚对在那里的我军发起了强大的作战行动。当时，塞尔维亚的解放运动正蓬勃发展。

由于这一切，最高统帅部于那一年把作战的重点转到塞尔维亚，以解放塞尔维亚并与东方战场连成一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根据最高统帅部的决定，在上半年就从南斯拉夫的西部和中部向东部地区派出了我们九个最精锐的师，而在塞尔维亚已经有塞尔维亚的五个师在作战，另有三个师在组建。在黑山、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马其顿的土地上，仍有三十二个师和十来个游击支队在战斗。

这些情况使德军东南战区司令感到不安。他立即从希腊抽调第一山地师，并经由铁路调来第二装甲集团军。

我们的作战集群——第二师、第五师和第十七师，还有第二军的第三突击师把德国人彻底击溃了，歼灭了党卫军第二十一师，渡过了伊达尔河。

这个突击集群后来又转到科帕奥尼克，收复了布鲁斯、亚

---

<sup>①</sup> 摘自一九五三年七月就七月七日塞尔维亚人民起义日与贝尔格莱德电台编辑的谈话(铁托：《言论集》，第八卷)。



历克山德罗瓦茨和拉兹博伊纳，并朝着特尔斯特尼克、克鲁舍瓦茨、库尔舒姆利亚和普罗库普列方向继续作战。

从七月十九日至八月二十八日，德国人在巴比奇山、科兹亚克、奥兹伦山、托普利察和亚布拉尼察地区对我塞尔维亚第二十一师、第二十二师、第二十三师、第二十四师和第二十五师，发起了猛烈进攻。参加作战的还有保加利亚的四个师，德国的几个配备有坦克的警察营，还有奈迪奇分子的塞尔维亚志愿军的四个团以及切特尼克的所谓冲锋军的四个大队。我军第二十一师、第二十四师和第二十五师于八月四日与第二师、第五师和第十七师组成的作战集群在科帕奥尼克会师，一起进入反攻，解放了塞尔维亚南部莫拉瓦河左岸地区，直到克鲁舍瓦茨和莱斯科瓦茨。第二十三师解放了索科巴尼亚和博列瓦茨。

第一师和第六师在兹拉蒂博尔对保加利亚部队的阵地发起猛烈攻击后，彻底消灭了保加利亚占领军，并在迅速行动中解放了乌日策，又于九月十八日攻克瓦列沃市。

第一军和第十二军继续作战，解放舒马迪亚的农村和城市，到达奥布雷诺瓦茨——科斯马伊——帕兰卡——拉波沃一线，在那里同苏军一个摩托化军会师，这个苏军摩托化军是按照我一九四四年九月访问莫斯科时同斯大林达成的协议从保加利亚开来的。从那里，我们的这两个军和苏军一起朝着贝尔格莱德方向采取作战行动，并于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日最终解放了这个受苦受难的城市。

一九四七年，阿·克鲁季科夫在《苏联伟大卫国战争》一书第一百三十三页上写道：“在南方，红军成功地发动了攻势，



于十月把打击指向蒂萨河和多瑙河之间地区，目的在于使匈牙利退出战争，转而反对德国。这一作战行动的结果是，苏军同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接上了头，并一起解放了贝尔格莱德。”

这就是苏联和情报局领导人<sup>①</sup>今天想进行歪曲的事实真相。事实就是这样，而不是现在他们描述的那样，说什么是他们解放了我们。

在我们上述几个军朝着塞尔维亚和贝尔格莱德展开作战行动期间，我军在全国各地都发动了强大攻势，在部分地区采取了防卫行动。第十四军在塞尔维亚东部作战。这个军解放了莱斯科瓦茨，在保加利亚第二集团军<sup>②</sup>的援助下解放了尼什，并朝着科斯梅特方向继续作战，解放了许多地区，包括米特罗维察。第二军解放了整个黑山，并把作战行动扩大到波斯尼亚地区。第八军解放了整个达尔马提亚的中部和南部地区，包括沿海岛屿，以及黑塞哥维那。第十五军的马其顿部队解放了瓦尔达尔河以西的马其顿，该军的其他部队与第十六军一道解放了瓦尔达尔河以东的马其顿。

当红军抵达我国时，我们的武装力量已经是这样一支力量：有五十一一个师组成十五个军，还有根据全国委员会八月十五日法令组建的民防军，另外还有各有两个旅的两个作战集

---

① 指接受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发表的情报局关于南共状况的决议的各国共产党和各国的领导人。——原注

② 保加利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站在德国法西斯一边，鲍里斯国王政府被推翻后，才向德国宣战。这里的“保加利亚第二集团军”系指保新政府的军队。——译注



群，有十六个独立旅和一百三十个大大小小的游击支队。八月中，我们已经有一个坦克旅，它是在西方盟国的援助下在非洲组建的，有一个战斗机中队，这也是在非洲组建和接受训练的。

这些事实最雄辩地驳斥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一九四八年说什么我们的游击队发生危机的无聊断言。苏联领导人和西方最喜欢称我们是“游击队”，就是不称我们为正规军队。

经过四年多时间，我们饱受苦难的国家最后终于重新完全获得解放，我们的解放革命力量作出了巨大牺牲，进行了英勇奋斗。

在一九四五年的最后几次战役中，我们的武装力量在整个战场上共有八十万战士，编为十七个军、五十二个师、二十三个独立营和一百零七个游击支队。衡量我们作战活动的价值的准绳不能是看我们的战士穿得怎么样，有什么样的武器，有多少和有什么样的技术武器，而是在于我们在战争中对付了敌人多少个师，在于我们能够给敌人多少打击和什么样的打击，最后在于我们拥有多大的兵力。

为了说明问题，我列举几个数字，用来比较。一九四四年底，我们对付的德军就有二十五个师，加上保加利亚、匈牙利和伪军的力量，我们对付的是四十多个师，五十八万人。同一时期，德国人在意大利总共只有二十七至二十八个师，大约三十五万人，对付盟军二十四师，两千辆坦克和五千架飞机。我认为，就贡献来说，我们不是负数，而应是正数。这种比较也适用于东方盟国。<sup>①</sup>

---

<sup>①</sup> 摘自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庆祝南斯拉夫人民建军十周年大会上的报告（铁托：《言论集》，第二卷）。





## 苏联的援助

### 给一个军

一九四四年九月我第一次会见斯大林，当时我从维斯岛前往莫斯科。我想就下一步作战活动进行会商，并要求苏联政府提供一个坦克旅供我们支配。为了解放贝尔格莱德，我要求一个坦克旅，其他什么都不要。我之所以有这个要求，是因为我们除了有一个配备有英国“斯图亚特”式坦克的旅之外，没有别的坦克部队。而我们需要苏联“T-34”型那样的重型坦克，或许还需要其他一些武器，需要一点飞机等等。

斯大林当时当着我的面打电话给在索非亚的托尔布欣元帅。斯大林对他说：“铁托在我这里。他要求我们提供他一个坦克旅。你那里有坦克吗？”我听着他打电话，我听见托尔布欣作了肯定的回答。斯大林就说：“给一个军！”也就是说，他下令派一个军开赴贝尔格莱德，同我们的部队一起解放首都。

另外，苏联还以援助的名义给了我们一个坦克旅、两个航空师和其他各种重武器。这有助于武装参加我们队伍的日益增多的战士。



从一九四四年年中开始并一直持续到年底的解放国土的最后战役的第一阶段中，我们解放了达尔马提亚和沿海岛屿、黑山、马其顿、塞尔维亚全境、黑塞哥维那和波斯尼亚的大部分。当时，苏军已到达南斯拉夫边界。根据在莫斯科达成的原则协议，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和苏联政府就苏联某些部队进入南斯拉夫东部领土并参加解放南斯拉夫这一地区达成了协议。解放贝尔格莱德的战役是我们两支军队战斗合作的巅峰。<sup>①</sup>

---

<sup>①</sup> 摘自一九四五年五月七日在贝尔格莱德发表的《在战胜法西斯三十周年之际的回忆与展望》一文(铁托：《军事著作》，第五卷)。



## 与巴尔干诸邻国的关系

### 要做的事有的是

兄弟的保加利亚党的路线在解放斗争问题上始终是不正确的。从文件中可以看出，它没有任何适合政治发展各个阶段的深思熟虑的策略。相反，往往完全丧失路线而强调不符合这一路线的口号。例如，他们要求保加利亚人团结起来为争取彻底的政治大赦和取消集中营而斗争，呼吁保加利亚人民准备投入坚决和果断的斗争，而忘掉了涉及路线的一些基本口号。保共在自己的文件中，在有的地方谈到要立即推翻现政府，把占领者赶出国。但是，在实践中没有朝着这一方向做任何工作。

没有采取任何切实的措施来赶走侵略者。号召人民和军队准备将来从事某种斗争。今天在执行希特勒的命令，充当占领南斯拉夫、希腊和阿尔巴尼亚的工具的军队，往往被称之为保加利亚人民的希望。不去呼吁军人拒绝服从并转到被占领的国家的解放军方面去。根本就不奉行发展这样一支军队的方针，而是充满了幻想，以为整个军队在“决定性关头”会转到“人民一边”来。



整个文件没有一处号召举行全民起义，以把保加利亚从德国魔爪中解放出来，从文件中也看不出曾经发出过这样的号召。

党倡议建立祖国阵线。祖国阵线建立了领导机构——有四个党参加的全国委员会。但是党自己就害怕祖国阵线扩大。

在马其顿问题上，祖国阵线是这样陈述自己的立场的：“为了避免犯新的历史性错误，求得马其顿的牢固和平，祖国阵线提出‘马其顿属于马其顿人’的口号”。“这一口号将结束巴尔干国家之间的矛盾。制止敌人的任何分裂活动，我们也反对马其顿完全归属于任何一个巴尔干国家。惟一的解决办法是建立一个完整的、自由和独立的马其顿。唯有这样一个马其顿才会不再成为产生纷争的因素，而成为巴尔干各国人民之间的一个可靠而稳定的单位。”

不仅仅根据这一文件，而且根据最近从保加利亚传来的报告来判断，可以看出，那里的游击运动得到人民群众的谅解并有条件发展，祖国阵线如能奉行正确的政策，它很快就会得到人民的谅解和支持。保加利亚党目前的政策是不会取得积极成果的。它对军队所采取的态度，只对德国侵略者有利，因为它不去破坏保加利亚反动政治和德国占领者压迫其他国家人民的这一工具，反而寄希望于这一支军队有朝一日全部转到祖国阵线一边来。这样的政策是不符合保加利亚民族的利益的，是不符合一个进步、民主的保加利亚的利益的，相反，首先符合占领者的利益，其次符合保加利亚国内外想在保加利亚加强自己的反动地位的那些集团的利益。

就我目前所知，保加利亚的情况现在正在改善，无论是在



组织游击支队方面，还是在执行党的路线方面，都是如此。我确信，凭着您<sup>①</sup>在保加利亚同志中间的崇高威望，你们定能使局面完全正常化，从而在这几个兄弟党之间得以进行最密切的合作，我们对于进行这样的合作，始终具有强烈的愿望。

希腊全国委员会的一位代表——他是希共中央委员——前来找我们的全国委员会。他随身带来了我们现在寄给您的这份文件，从中也可以看出，希腊共产党的路线是十分动摇的，在一定意义上是宗派主义的。按照我的看法，这在很大程度上促使希腊的解放运动陷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因为英国和其他盟国人士对希腊解放运动很不友好。不能说希腊党没有取得巨大的成绩。它深深扎根于广大群众之中。它建立了很大的武装力量，但是人民的这些斗争力量过多地在与国内的反动集团较量，而从事反对占领者的实际斗争却要少得多。此外，我担心，希腊党接纳的党员过多，因为他们说，他们有二十多万名党员，另一方面，我认为，它又没有成为指导希腊其他民主力量的领导力量。首先存在党内出现各种偏差的危险性，因为思想水平过低，其次存在它孤立于其他民主力量的危险性。

希腊代表来时，我们的马其顿代表团跟泰波也一起来了。在谈话过程中，我们看出，马其顿人和我们的希腊同志们之间的关系很不友好。他们彼此指责对方。马其顿人<sup>②</sup>组建任何马其顿的游击队。他们说，希腊人甚至不允许讲马其顿语，不承

① 指格·季米特洛夫，下同。——译者

② 指责希腊人不让在希腊马其顿指爱琴马其顿。——原注



认希腊存在马其顿人少数民族问题，等等。另一方面，希腊人指责马其顿人从应受审判的希腊难民中搜罗马其顿人。我们尽力平息这些争吵，对我们的马其顿人施加影响，不让他们现在提出希腊马其顿人归属于南斯拉夫马其顿的问题。我个人得到的印象是，希腊同志们在希腊的马其顿人问题上确实采取了不正确的态度，我将施加影响，来纠正这种态度，而又不给希腊的解放运动造成损害。

在阿尔巴尼亚，情况发展得很好。已经建立十二个旅和许多游击支队：整个阿尔巴尼亚南部已经解放，与我们的人民解放军有着最密切的合作。阿尔巴尼亚党是一个年轻的党，但是发展很快，因为在领导岗位上有一批十分富有牺牲精神的年轻人。我们在那里始终派有两名代表，现在我们打算向那里再派一名更强一些的代表，他将更有助于把我们的经验传授给阿尔巴尼亚并加强联系。<sup>①</sup>

---

<sup>①</sup> 摘自约·布·铁托一九四四年七月五日自维斯岛写给格·季米特洛夫的信。



## 与保加利亚的关系

### 承认自己可耻

现在我再谈谈一九四四年十月我从莫斯科回国的情况。当时，我在罗马尼亚的克拉约瓦稍作停留。我在那里呆了几天，然后才去伏伊伏丁那。有一天，保加利亚祖国阵线政府的代表特尔佩舍夫以及还有一位将军——我想，他叫托多罗夫——来找我。他们提出了要求，希望让他们的部队也能在我们的领土上同占领者作战。

我得说，我不太高兴。我知道，我们的人民对于保加利亚占领军在塞尔维亚和马其顿的所作所为是多么愤慨，我担心可能出现各种过火的行动。但是在莫斯科的时候，有人以某种方式对我说了，假如保加利亚参加进来的话，那将是一件好事。还说，现在的保加利亚军队已经不再是法西斯军队，而是祖国阵线的军队。出于道义上的原因，应当这么做，这在政治上也是影响很好的。因此，我就同意了。我们同意他们的某些部队参与对德作战。于是，他们的某些部队参加了马其顿和塞尔维亚南部的一些战斗。后来，又从那里调到斯雷姆前线。在那里，



保加利亚部队战斗了几周，后来撤到匈牙利领土上，在那里，与苏军一起向前推进。

我还想谈一谈阿尔巴尼亚人民解放军的某些部队按照共同协定参与在我国领土上的战斗的问题。它们与我们的部队一起，在马其顿西部、科索沃、黑山以及后来在波斯尼亚，同德国人、阿尔巴尼亚民族阵线分子同切特尼克作战。后来，也是根据协定，它们返回了阿尔巴尼亚。<sup>①</sup>

\* \* \*

他们[特尔佩舍夫和托多罗夫]请求我，作为最高统帅和当时的政府——全国委员会——主席，同意以前受法西斯指挥的保加利亚军队，现在跟我们一起参与解放我们尚被占领的部分领土。他们说，他们承认感到羞愧，他们的人民上了当，他们的军队参与这些作战行动会对他们很有用。我对此表示同意，于是保加利亚部队就同我们的部队一起参加了这几次战斗。请看保共中央当时对这件事是如何说的，他们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日的来信中说：

“你所组织和你所领导的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不仅为我们四分五裂的祖国的解放，而且对在巴尔干半岛沉重打击希特勒强盗和把他们赶出巴尔干，立下了丰功伟绩。南斯拉夫各族人民，首先是英勇的塞尔维亚人民，率先揭竿而起，同希特勒德国坚决展开了人民解放斗争，给被奴役、被压迫的各国人民

---

<sup>①</sup> 摘自一九七五年五月七日在贝尔格莱德发表的《在战胜法西斯三十周年之际的回忆与展望》一文(铁托：《军事著作》，第五卷)。





指明了走向自由的道路。受欺骗、受掠夺的我国人民受到你们光辉榜样的鼓舞，并向你们学习，同希特勒和他在保加利亚的代理人展开了武装的游击斗争……

“对于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尤其是对于塞尔维亚人民和马其顿人民，我国人民自感有罪，因为听凭保加利亚的法西斯掌权者把保加利亚变成德国侵略者的据点，把保加利亚军队变成希特勒在巴尔干的宪兵，并对正在争取自由的各国人民犯有一系列暴力和出卖行为。我国人民深深感到卖身投靠希特勒的保加利亚掌权者对自由战士所犯有的种种可怕的暴行和出卖行力，竭尽所能来尽可能彻底和尽可能迅速地抹掉刚刚成为过去的这一切，并为同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建立起永恒的、牢不可破的友谊以及兄弟般的紧密联盟开辟道路……我们永远感谢你们所给予的支持和兄弟般的援助，使我们第一批游击支队能够在我国建立。”

请看，这就是季米特洛夫同志领导保共中央的时候保共中央写的信。<sup>①</sup>

---

<sup>①</sup>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日在莱斯科瓦茨举行的纪念南莫拉瓦第一旅的大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一日《战斗报》)。



## 战争的尾声

### 我们一直作战到五月十五日

在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日贝尔格莱德获得解放之前，我们已有五十三个师，有海军和空军。战争结束时，我们有八十万人的武装力量。

这里我还要谈一件重要的事情。我们现在把五月九日作为胜利日来庆祝，这完全是正确的。然而，在这里我得说，我们到一九四五年五月十五日才结束对德国人和伪军的战争。一大批敌人，有德国人、乌斯塔沙、切特尼克、白卫军，麇集于斯洛文尼亚，麇集于奥地利边界附近。我军被迫与他们作战，一直打到边界，而且不仅是打到边界，还阻止了绝大部分敌人逃跑到奥地利境内。驻巴尔干德军总司令勒尔将军直到最后还想这么做，以免落到我们手里，以免对他指挥下的部队在南斯拉夫犯下的暴行承担责任。但是，由于我军包围了这一群敌人，他们无路可逃。经过激战，他们被迫投降。我们俘获大批德国人，缴获了他们的全部武器。被俘的还有乌斯塔沙、奈迪奇分子、切特尼克、白卫军，总之，有形形色色的叛徒。有一部分



人越过边界逃跑了，但是大部分人被俘了。就这样，我们被迫又打了六天仗，才把自己的国家从敌人手中最终地解放出来。

可见，实质上，我们是自己解放了自己的祖国的。战争接近结束时，我们得到了比较多的援助，因为以前不存在获得援助的条件。事情就是这样，这是历史真相。<sup>①</sup>

---

<sup>①</sup> 摘自一九七五年五月五日在贝尔格莱德发表的《在战胜法西斯三十周年之际的回忆与展望》一文(铁托：《军事著作》，第五卷)。

# 新南斯拉夫时期



## 新南斯拉夫

### 我们树立团结和友爱

我们的新南斯拉夫是怎样的一个国家?都说它是民主联邦南斯拉夫。应当很好地认清它的本质。而我们党员首先必须理解这一深刻的实质,因为共产党员在战争年代曾经率先战斗在最危险的前列,现在也应当带头建设真正的联邦南斯拉夫。为此,我们拥有的是存在着多个民族的联邦南斯拉夫,我们有克罗地亚族、塞尔维亚族、斯洛文尼亚族、马其顿族、黑山族,还有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那里生活着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和穆斯林。但是,倘若我们现在走一条阻力较小的道路,让每一个民族靠损害别人在自己范围内建立一个强大的联邦单位,克罗地亚、塞尔维亚,等等,那就错了。我们是在建立一个国家——南斯拉夫,在这个国家里每一个民族都享有自己的权利和完全平等。实质还在于:我们在建设一个由各个民族,由多个联邦单位组成的强盛的南斯拉夫民族国家。

第二个问题,第二项任务——南斯拉夫各民族的团结和友爱,也是以此为基础的。我们应该捍卫的正是这样的国家,正



是这样的南斯拉夫。分裂的因素总是存在的。正因为如此，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其他省的共产党员都必须成为维系这种团结和友爱的纽带。他们必须是一切统一成为一个整体的因素。共产党员必须发扬国际主义的深刻意义。热爱自己的民族，不管是克罗地亚族还是塞尔维亚族，并不意味着否定我们的整个国家——南斯拉夫。相反，热爱自己的联邦单位也就意味着热爱坚不可摧的南斯拉夫。因此，我向你们，塞尔维亚的所有共产党员，而通过你们也是向南斯拉夫的所有共产党员说，你们必须制止任何沙文主义。民族沙文主义的旧遗产还没有被根除掉。我们还只是刚刚开始根除沙文主义。这个或那个联邦单位是否想得到这个或那个村庄，这不应当成为问题，因为它们是属于全南斯拉夫的。的里雅斯特不仅是斯洛文尼亚的，也是南斯拉夫的。里耶卡不仅是克罗地亚的，也是南斯拉夫的。贝尔格莱德不仅是塞尔维亚的，也是南斯拉夫的。就应当这样来看待这些事情。

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就很清楚了。每个人不论他在什么地方通过自己的工作，通过自己的努力，你们都会给居于我国领导岗位的我们许多的帮助。我们的这种愿望并不是出于我们想把你们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记在自己的功劳簿上，而是因为我们把这看成是继续发展的唯一出路和保证。有一个内部统一的、强大的南斯拉夫，有南斯拉夫的平等公民，我们将会巩固世界上一切爱国力量对我们的同情和钦佩，并把对我们的这种感情提到更高的程度。

对外是统一的和强大的，也就意味着为我们国家的安全创造了条件。拥有强大的军队是不够的，尽管这一点是非常重



要。还必须要思想上的一致。在旧南斯拉夫，我们曾经拥有强大的军队，认为这个军队之所以如此迅速地瓦解是因为带领作战的是一帮腐败的将领，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原因还在于这支军队不是统一的。军队的弱点产生于：第一、领导软弱；第二、民族之间存在纷争。现在我们建立了军队，并用一切技术兵器装备军队。但同时应当武装我们的人民，让我们的人民意识到需要团结，需要友爱相处，需要让克罗地亚扎戈尔耶的克罗地亚人为在马其顿边界上所发生的情况分担忧愁，塞尔维亚人为在伊斯特拉发生的事情献计献策。总之，大家都应该认识到现在在南斯拉夫在我们各族人民的生活中，或许也是在各国人民的生活中出现的历史性转折点。共产党员应该这样做，应该这样去认识任务。<sup>①</sup>

---

<sup>①</sup> 摘自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于贝尔格莱德在塞尔维亚共产党建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塞尔维亚共产党建党代表大会》，贝尔格莱德，一九七二年版)。



## 资产阶级反对派

### 敌人的旧营垒

我们在南斯拉夫所走的是一条新的道路，一条建立比较公正的内部制度的道路，一条创立真正的人民民主、社会正义和民族平等的道路。这是我们的新国家的基石。自然，这从根本上同过去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反对派代表着一切旧的东西，代表着过去当政的那些人。那些在过去曾经执政，压迫南斯拉夫的各个民族，阻挠社会正义，践踏劳动群众的人组成了反对派。反对派就是这样一批人。我们的处境很好，因为我们代表着进步事业。人民赞同这种进步事业，人民赞同我们缔造的这样一个新南斯拉夫。而反对派想要恢复那些在旧南斯拉夫存在过的制度。但是，在南斯拉夫，极少有人想复旧。

我不把我国的这一“反对派”称为反对派。一个国家里的反对派在某些策略问题上持不同的意见，它想搞得更好一些，它对制度或者对政府采取反对的立场。我们这里的反对派不是这样的。它没有提出过任何一种比我们在人民阵线纲领中提出





的主张更好的主张。它根本就不存在纲领。这不是反对派。这是那个人民敌人的旧营垒，他们想开历史的倒车，而车轮将向他们自己驶去，自然将把他们压得粉碎。

当一个国家处在南斯拉夫所处的那种形势下的时候，应该拿出一切力量，以便使国家尽早地站立起来，大人和孩子不至在冬天冻死，在经历这一可怕的时期之后会出现好日子的时候，——“反对派们”对这一切并不关心。对他们具有吸引力的事情，仅仅是能否重新掌权。

然而，人民并不这样看。“反对派”假如以为人民群众只对它抱有希望，那就想错了。不仅在我们这里是这样，而且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只不过在南斯拉夫这种情况表现突出而已。对我们来说，反对派不是某个特殊问题。它是微不足道的，并且不可能阻碍我们。

有一天，大约有三十六名民主党的代表来到我这里。这个党的领袖，正如你们所知道的，就是格罗尔，他脱离了自己的支持者。到我这里来的是农民、从前的议员、民主党的部分成员。他们在贝尔格莱德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会后就来到我这里，我同他们交谈了两小时，我看不出在他们同我们之间有任何区别。他们和我们都在人民阵线内。他们都在各地人民委员会中工作，从事恢复我们的国家的工作。我问他们，我们人民政权有没有错误行为。他们说，有，但这不是出于恶意，而是出于无知。在这些民主人士身上我看不到在格罗尔和他的小集团那里见到的那种东西。格罗尔周围的“民主人士”不想看到任何积极的东西。他只看消极的事物，并且经常用这些消极的事物来攻击我们。而真正的民主派看到积极的东西，并且把积



极的东西和消极的东西区分开来，而对消极的东西，他们说让我们共同来消除和纠正。

格罗尔的反对派，只要还有外国的支持，就可能生存，而一旦外国拒绝给予援助，它就会自行消失。因此，对我们来说，它不是问题。

---

<sup>①①</sup> 摘自一九四五年十月二日与波兰记者的谈话(铁托：《言论集》，第二卷)。



# 一 党 制

## 他们的民主不适用于我们

在这里，我还想就我们的民主、我们国家的民主化讲几句话。我知道，外界这次也会像以往那样地认为：这仍然是一党制。这个一党制是无论如何也不会从他们脑海里消失的。他们始终强调这一点，并且不论谁来到南斯拉夫总是在这一点上责难我们。我们千百次地对他们进行解释，为什么这不是一党制，为什么在我们这里不可能有在他们那里有的东西。按照我的看法，在我国的发展阶段以及由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和方式，这一点看上去就像有人制造了一辆新型汽车，然后套上了马，用马来拉汽车一样。他们的民主不适用于我们：这是封建制度以后的旧式民主，诚然，这种民主曾经是好的，但它本身已经过时了。它是形式上的民主。而在社会发展的目前阶段，在二十世纪，人们要求更前进一步，要求民主成为不是形式上的而是真正的民主，要求民主具有物质基础：不仅仅是意味着人有骂街的权利，而且意味着人要有可能得到吃的、有钱买东西、获得就业、文明发展、人人平等，等等。今天，我们



有许多许多的事情要做,但这些事情再也不可能像在西方那样并且按照西方的那种制度去做。

我们向他们解释了我国内部性质的、我国特殊条件下的许多事情。我们向他们解释,我们这条道路取决于我国的特殊情况和我国人民的思想水平。我们向他们解释说,我们数百年来一直被分裂,我们一直是在长期的战乱中生活,我们始终在战斗和自卫,使各种各样的占领者无法向西方推进。在他们有可能得到发展的时候,我们却手中握着刀枪,于是我们成了颇有尚武精神的人民。一句话,我们还没有能够建立一个由这些各个不同的民族组成的、在各方面都是统一的国家,虽然这些民族是完全相近的。我们向他们解释说,在我们这里,人们的意识中还有很多旧的残余,还有很多在西方的现代文明社会中已不复存在的各种不良现象,而我们必须运用某些强制手段来疏通民主意义上的发展。我和我们都对他们说,我们首先要解决民族问题,这在我国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因为在我国曾经有过民族仇恨和民族之间相互残杀的斗争。还应该通过法律和行政手段采取有力措施,来制止沙文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民族沙文主义的不良倾向继续扩散。虽然这一切不能称之为民主的道路,但是,如果大多数人民愿意走这一条道路,那么这也是一条民主的道路,因为民主毕竟是多数人的思想反映,而不是少数人的思想反映。我们对他们说明了许许多多的基本道理,但他们不愿理解这些道理。当然,我们还将继续向他们作解释,然而,最好的解释将是我们的现实、我们的进步、我们的发展。

有个外国人有一天对我说,西方的进步力量,特别是工人阶级,抱着极大希望关注着南斯拉夫,因为他们对苏联感到失



望，说“苏联始终不断地助长和强化一小批人的专政，他们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也同样感到失望，因为资本主义世界不可能让工人阶级参加管理生产，参加分配国民收入，等等。一句话，资本主义制度是工人阶级难以忍受的，正如目前东方的制度也使他们难以忍受一样”。他告诉我说：“惟独你们这里是例外，现在我们正瞧你们。”对此，我说：“你们看，如果社会党的领导人以及某些个人指责我们实行一党制，并说他们讨厌这种制度，说这种制度不好，并且说我们还成熟，还不能进行社会主义运动或者进入社会党国际，那么就应当向你们提出这样的问题：那好，为什么在你们所推崇的这种民主制度下，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你们经常退出你们在其中掌权的政府，次数数不胜数呢？你们曾经掌过权，在你们根本还没有开始把属于工人阶级的东西交给他们的时候，你们就已经下台了。为什么？因为你们所推崇的这种民主，实际上是企业主、大资本家的专政，而不是民主。那里存在的民主是：你可以有饿着肚皮在市里闲逛的自由，谁也不会关心你有没有面包。一句话，你是摆脱了一切，但是也丧失了你们生存所必需的一切。这样的民主，我们不需要。这一点，请你们思考，然后再来批评和指责我们的这种所谓的一党制，它决不是那样的一党制，而是我国劳动者的联盟，是一种比过去在任何国家有过的联盟水平要高得多的人们的联盟，因为人们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必要性有统一的认识，有思想和行动的统一”。这是那种包括全体人民在内的“一党制”。而一小部分人——占百分之几的微不足道的少数人——不可能成为一种权威的力量来要求我们现在为他们创立某些新的党。



对于指向我们的、很可能现在还会提出的各种各样的批评意见，我想说的就是这一些。我们不左右观望，我们不是在做实验。当然，我们是在勇敢地向前迈进。我们不是进一步退两步。我们是在向前进，只不过时而有点偏离方向，如果我们看到我们有些事情考虑不周的话，我们本可以更迅速地向前迈进。事情就是这样。

因此，我们这个议会要反映出当前我国国内的情况和我们联邦制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在我国已经完成了经济自治和政治自治的最充分的权力下放，但是，在我国，正是在这种权力下放的基础上，我国各民族能够最完好地、最成熟地、最健康地牢固凝聚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南斯拉夫，达到一个更高的阶段。这种权力下放使我们得以建立一个更高水平的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我国的劳动者、我国的公民努力取得的伟大成就。在四年战争的过程中，在战后的年代里，他们为了建设更美好更幸福的未来做出了超人的努力。<sup>①</sup>

---

<sup>①</sup> 摘自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在贝尔格莱德选民大会上的讲话（铁托：《言论集》，第八卷）。



## 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

### 我感到痛心

问：您作为一个革命家曾经历过不少艰难的时刻。其中之一就是与情报局的冲突，当时您和南斯拉夫所有的共产党员一起经受了新的考验。在您看来，这场斗争对于各国共产党和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答：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当他所信仰的一切和他所信赖的一切都化为泡影的时候，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这是完全能够理解的。需要镇静下来并且好好地思考，所有这一切可能意味着什么。我应该说，我反复思考过许多问题。我难于下决断。然而，我感到十分痛心，特别是考虑到，我们在一场残酷无情的浴血斗争中为了自己并为了我们曾经看作圣地的苏联做了能做到的一切之后，竟收到了那些盛气凌人的信件<sup>①</sup>，我们党和我国的领导竟然遭到责难。因为我们的人

---

<sup>①</sup> 指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五月四日、五月十九日和五月二十二日致南共中央委员会的信件。这些信件被收入《南共中央委员会的信件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信件》一书，于一九四八年在贝尔格莱德发表。——原注



民在倒下去的时候，嘴里还喊着斯大林的名字。你们知道，这不仅仅是一种打击，而且是沉痛的打击。我仔细地想过，事情会往何处发展？这一切会造成什么后果。那时，我第一次说到：这里是有值得为其活着、为其斗争的某种东西的，而一个人不抛弃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思想，他就仍然是一名共产党员，是一名为争取权利和争取在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和在各共产党之间建立平等关系而斗争的战士。我在复信的初稿中就写进了这一点，这就是在信的最后谈到的关于平等关系问题和社会主义今后的发展问题。早在那时我就是这样理解的。只是格拉斯和其他几个人后来在修改我的复信时把这一点删掉了。但是，原稿还在我这里。

当然，那时我感到痛心，因为我酷爱俄国人民。我毕竟在那里工作过六年，经历过和饱尝过许多痛苦。后来，我还是随着革命而活下来的。对我来说，革命是我迄今的全部生活。十月革命不是一般的革命，那个国家的人民是极其优秀的人民。我的许多同志同样也在那里呆过，然而，他们并不像我那样深深地为苏联人民的生活所打动，他们对这一点的感受稍有不同。所以，他们找到我并问道：“现在怎么办？”我对他们说：“没关系。现在才值得活着，才值得战斗。我们必须反对这种做法，我们必须坚持自己的立场。假如我们意识到我们没有做任何事情导致他们现在对我们的曲解的话，那么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必须坚持到底”。我没有说错。我们有大多数人的支持。屈服的仅仅是个别人，是一些软骨头，比如原参谋长阿尔萨·约万诺维奇。他从来就不是共产主义者。他过去曾迫害过共产党人。





至于那些我们派往苏联进修的青年，其中某些人认为那里是他们的未来。他们留在那里更多的是出于这一考虑，而并不是由于他们在思想上对我们丧失了信任。某些人也可能是这样。但是，那些从这里逃跑的人则是一群软骨头，这些人出于他们个人的野心，想出人头地，想自封为反对派，从而为自己谋取某种利益。

当时是很艰难的。那时我们通过了决议，我不前去布加勒斯特<sup>①</sup>，也不去基辅<sup>②</sup>。我懂得此行将意味着什么。我早就活够本了，我可以去，也可以死在那里，倘若这样做是有益的话。但是，我知道这是无谓的，而只会导致一场悲剧。

我想到一件事，这件事我是顺便提一下，早在准备这项决议和会议期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个正青云直上的年轻工作人员马舍托夫来见我。他来到乌日策街我的办公室，交给我一封短信——现在我已想不起这封信是谁签署的——邀请我和我的同志们一起去基辅出席会议。我心里想：我去基辅或是

---

① 铁托指的是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情报局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内状况的决议》，这项决议在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八日公布。约·维·斯大林坚持要南共派代表参加会议，但是南共中央在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日的声明中申明，它不能派代表参加议程不为它所接受的会议。南共中央重申自己的立场：由南共中央和联共（布）中央直接接触来解决一切分歧是惟一正确的途径，取消情报局会议上讨论《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内状况》的议程。——原注

② 这里是指苏联代表提出的建议，即在布加勒斯特会议召开之前（一九四八年六月底），情报局先在乌克兰（基辅）聚会，他还暗示斯大林有可能参加会议。——原注



去莫斯科，这和以后去布加勒斯特有什么两样？这首先使我发生了怀疑。我说：不，我不去。我说，我们被指控有罪，叫我们去是坐被告席，可是我们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正是在那时发生了这样的事。在我的办公室的墙壁上挂着两幅巨像：列宁和斯大林。而在马舍托夫进办公室前不久，挂着斯大林像框的钉子脱落了，像框掉了下来，落在书柜上，靠在墙上。这个家伙很快就发现了这一情况，他以为是我取下了像，但还来不及把它藏起来。然而，这完全是一种巧合。

可见，曾经想了种种办法，要我们到那里去。我们没有去，我们这样做是完全正确的。当时是十分困难的时刻。

问：根据我的记忆，苏联大使是在萨格勒布向您递交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信的。

答：是的。

问：这件事给您留下的印象如何？

答：噢，当时是很不容易的，我在那里的一座别墅里接见他。我站在桌后，靠着桌子，读这封长信。我感到很不好受，我极其气愤，火冒三丈。随后，我坐了下来，但没有让他坐下。我只是用俄语对他说，我们将“研究并给出答复。完了。再见”。他转身就走了。

我立即坐在桌旁，一口气写成了那封很长的复信。我回到了贝尔格莱德，在旧王宫里，我和同志们商讨了这封复信，而在场的有茹约维奇，以及多少有些动摇的其他一些人。

问：您那时对斯大林说，“不行”。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回答。铁托同志，今天当您回顾这些事件时，是否可以说，在战前年代共产国际对待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态度所出现的种种困难



中就已经存在着误解和与斯大林政策冲突的苗头了？

答：不。我不想说是这样。因为斯大林对我是很不错的。可以这样说，他是想用某种方式把我套住。我想起了四六年在莫斯科的一次会谈。在场的有科查·波波维奇和兰科维奇，我们去了好几个人。已经是深夜了——斯大林平时是在夜里工作的——我们来到他的别墅，他们政治局的全体成员都在那里。斯大林情绪很好，突然抓住我的腰把我举了起来。他望着我，问道：“你身体好吗？”我答道，身体健康。他说，“望你保重身体，为了欧洲，你应当保重”。随后，我们围在他旁边，有人说：“斯大林同志，您健康强壮，您会长寿的……”。而对这样的话他说道：“不，我清楚自己的健康和自己的身体状况。”

但是，事隔不久，四八年交换信件之后，我闻悉，斯大林在一位美国人面前说道：他不喜欢我那种固执的态度。

问：您是什么时候第一次见到斯大林的？

答：在一九四四年，当时战争即将结束，我第一次去苏联。我最初几次见到他是在个人会谈时，当时会晤了好几次。斯大林总是在夜间十点到十一点时把我叫去，因此我在他那里有时要一直呆到第二天早晨六点钟。

问：是什么时候您第一次感觉到存在着某种不信任或误解？

答：是在四七年，当时他们开始责备我们对他们在这里的专家抱敌视态度。因此，我看出这有点与那个故事相类似：狼责备羊羔，说它把水搅混了，尽管羊羔是在狼后面喝水的。那时我就感到事情有点不对劲。

问：有一次您谈到：不尊重本国和本国人民的人，是不可



能尊重别人的。在当时以及在当前世界上霸权主义的欲望的实质是否就在于这种不尊重态度？

答：在今天也还是如此。

问：我想向您提个问题：与情报局的冲突在国内，在我们国家内的影响究竟怎样？

答：正是由于我国人民的团结，我国人民无条件地接受当时我们庄严宣布的政策，这对于我国的内部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显然，就是在今天也还多少存在着那一时期留下的残余；在我国仍有这样的人，他们不能正确地评价那时我们的立场。还有些人由于我国目前国内的某些困难而认为，要是我们采取另外某种态度的话，可能会好一些。这些人想的是，生活中的一切都能轻松地过去，他们认为，那样困难就会较容易被克服，因为那是一个大国，等等。但是，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说，不可能实行这样简单化的政策。我们必须争取使我们同苏联的关系平等，社会主义的发展也要求保持这样的关系。这不仅适用于我们同他们之间的关系，对全世界，对所有国家，也都是普遍适用的。任何时候都不能允许充当别国的卫星国，或者屈服于人。

这并不意味着不热爱苏联，不热爱苏联人民。这只意味着，愿意同他们保持平等关系，尽管苏联是一个大国。

问：今天在我看来，这仍然是一场争取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不是吗？

答：是的。这是一场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一场争取像在我们这样一个国家内发展社会主义的斗争，在我国，各种因素不可能像在苏联一样，而必须使之适应本国特定的条件。尽管



如此，就是我们自己也不总是估计到了一切应该预料到的事情。

问：我们那时选择了自治道路，这条道路在一九五〇年成为法定的道路并开始实现。这无疑是当代工人运动中的新事物。

答：但马克思主义科学并非新事物……

问：实行自治的这种思想在我国是如何形成的呢？

答：我们坚持将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尽可能多地运用到自己的实践中去，自己的生活中去。那时我们在各个方面都存在许多困难。我们所考虑的是怎样使我国劳动者具有更大的动力和干劲。除非使劳动者有可能今天就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否则没有别的办法，虽然那时我们还缺乏物质基础。但是，让劳动者现在就来创造这种基础。这就是使我们更迅速地发展和使劳动人民广泛的创造精神得到发扬的基本因素。<sup>①</sup>

---

<sup>①</sup> 摘自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二日与贝尔格莱德电台电视台记者的谈话(铁托《军事著作》，第五卷)。



## 同苏联的关系

### 我将开诚布公地把一切都告诉你们

无论谁说什么，无论人们怎样议论，我们的国家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我们的国家不威胁任何人，我们的军队至今也从未威胁过任何人，将来也不会威胁任何人。尽管我们在各种国际讲坛上为实现我们国家的正当要求以及为使属于我们的东西为我们所有而进行了徒劳无益的斗争，虽然我们没有取得我们所希望取得的并且是我们有权取得的东西，但是，自从战争结束之后我们开始和平建设自己的国家以来，我们一刻也没有想过要用武力夺取任何东西，或者去威胁任何人。我之所以要说到这一点，是因为在对我国进行攻击的当前阶段，苏联和其他东方国家想把我国说成是侵略国家。难道一个被孤立的小国，在它的对手具有巨大的优势的时候，特别是当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能够走上侵略的道路吗？而且它没有任何理由这么做。它是不可能的，这一点任何人都是清楚的，而正是因为这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以它更加不可能这么做。

我们是在自己的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而我们在这条道路



上却开始受到阻挠。但是，在当前这个时期，当我们已经顺利地走过我国五年计划的前一半路程的时候，情况表明，采取经济封销以及其它手段来反对我们，这种种方法并没有奏效。于是，对我们施加了更加沉重的压力，采取了更加恶劣的方法。结果又怎样呢？最近，在布达佩斯上演了最新的一幕。我在后面还要谈到这一点。而我现在只想强调指出，一个小国，特别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有人打它一记耳光，它决不应保持沉默。不管他是谁，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威胁一个小国的人民，他们在不久以前的反对法西斯占领者的战争中流过不少鲜血和献出了不少生命，他们决不容许别人毫无根据地诽谤和侮辱他们。任何人，不论他是谁，都休想仅仅由于这样一个国家的人民对于任何侮辱和诽谤不会沉默而是用真正的事实保卫自己，就以战争胁迫这个国家的人民。

打我们的耳光，侮辱和诽谤我们，用最下流的语言诋毁我们，而我们对此却必须沉默不言，有谁有这种道义上的权利来要求我们这么做吗？当然没有人有这种权利。因此，我们是这样看待事情的：我们有权说，捏造就是捏造，谎言就是谎言。我们由于捍卫了真理，可以平静地展望未来，而无论已经发生什么事情。你们知道，作为自由的人民，为了正义和真理，宁可光荣地在斗争中牺牲，而决不屈服，决不俯首听命，决不看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伟大原则被践踏而置之不理。

现在，我要对你们谈一谈关于我国与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情况。当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致我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一封信第一次攻击我国的时候，你们不要认为，我们很轻松，只是简单地说：“我们不再听你们的了”，就此了事。



不是的，我们对这封信件再三考虑，而且被这封充满谎言内容的信件搞得目瞪口呆。但是，在我们的复信发出之后，又来了第二封信，一封更加恶毒的信。我认为，你们是赞同这一复信的，因为复信的处理是正确的。这就更加使我坚信，这里面涉及许多比信中实际援引的那些更糟的事情。第三封信就足以清楚地证明，他们之所以如此错误地批评我们，其目的并不像信中所说的那样，这只不过是作为达到另外目的的一种手段而已，这种另外的目的就是：把我们置于一种从属的地位，使我国变成它们的一个附属的省。而这是我们决不能容忍的。今天，我将开诚布公地把一切都告诉你们，就像在上帝面前忏悔那样，我们说过些什么，是怎样说的，以及我们是怎样提出问题的。对斯大林，对莫洛托夫，以及对苏联其他领导人，我们总是说：“同志们，我们是和你们生死与共的，只要有必要，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将同你们在一起，而不论我们必须为此作出怎样的牺牲。”我们对他们说，南斯拉夫各族人民是他们最可靠的同盟者，而他们对此回答说，这种说法在过去的战争中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已经反映出来了。此外，这还表明什么呢？虽然我们通过行动使他们相信我们所表示的一切，情况表明他们更多相信的是他们在这里从白卫军和其他堕落腐化分子中间搜罗来的普通间谍，而不是我们，我们中间的许多人为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科学思想，为了宣传苏联而进行了斗争，而蹲过多年的监狱。这在共产党内是一种什么样的道德，它的领导人竟然更多地相信普通的阴谋分子和腐化分子，而不信任那些把自己的整个生命献给了工人阶级的斗争，献给了为劳动人民美好未来的斗争的人们？不幸的是，事实正是他们不相信我





们，而相信那些分子，结果事情现在闹到了何等地步！

如果我们今天来回顾一下我们自己所走过的道路，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确实没有什么可羞愧的。我们尽到了真正国际主义者应尽的义务，我们尽到了受过国际主义精神熏陶的人们的职责：我们捍卫过并且捍卫着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科学，反对一切修正主义和一切偏离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现象，而今天想这样做的确有其人。特别是在最近时期，你们已经看到，这些信件究竟有没有根据，或者，真相是不是就这样：来信中的那些提法说明，真相被掩盖起来了，而信件却以堂堂正正的面目出现。

情报局决议<sup>①</sup>被通过了。为了达到目的，他们还动用了其他党，这就是说，他们利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这种最先进的思想不仅应该在物质方面而且在道德和精神方面改造人类——来达到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称其为社会主义的那种目的。

---

<sup>①</sup> 指《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内状况的决议》。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情报局的会议上通过此项决议。决议指责南共领导“在国内外政策的基本问题上”犯下了一系列错误。南共中央拒绝这所有指责；一九四八年七月举行的南共第五次代表大会赞同南共中央所采取的这种立场，据理指出，联共（布）中央的信件和情报局决议中的批评是不确切的、不正确的并且是不公平的。共产党情报局（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是一九四七年九月底在波兰西部名叫斯克利亚斯卡·波伦巴的小温泉场召开的会议上成立的。在这次成立会议上通过了决议，决议指出情报局的任务是“组织经验交流，并在必要时，在相互协议的基础上协调各国共产党的活动”。情报局最初设在贝尔格莱德，后来转移到布加勒斯特，于一九五六年四月解散。



以后情况又怎样呢？

在事经一年半后的今天，如果我们看一看，当时为反对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什么，事情又是怎样发展过来的，我们就会看清，我们对最粗暴的攻击所作的回答是平心静气的，是希望他们会认识他们自己的不对。如果你们看一看，我们在这方面迄今所写的东西，你们就会看到，使关系紧张的不是我们而是他们，你们也会看到，我们已经做到了我们所能做的一切，你们还会看到，在他们打我们耳光时，我们只不过是挡住他们的手，不让他们打我们的耳光。我们并不想使事情尖锐化，因为，我们认为，他们总有一天会清醒过来，看到自己所走的是一条错误的道路。然而，实力蒙住了他们的眼睛，因为他们有着强大的实力，所以他们允许自己干那种社会主义国家任何时候都不能允许自己干的事情。

按照共产主义的道德，实力的概念并不具有任何权利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中起决定性作用，而共产主义道德应该决定所作所为是符合共产主义道德的。他们走上了另一条道路。我们能够对这一切沉默不言吗？我公开地说，我们决不能沉默不语。假如我们只是为了轻松地生活而随波逐流和低头屈服，那么，不论是我，还是我们大家，都不成其为共产党人，不成其为革命者了，因为，在今后的革命发展中，处在那样情况下，可怕的悲剧就会发生；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一种与社会主义道德毫无共同之处的观点就会确立起来。

我们接受了这场斗争，但是，这不只是我们的斗争，这也不仅仅是我党和我国的斗争，而且是整个进步世界的斗争，是



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斗争。如果重走他们所走过的道路，就是说，靠红军的刺刀带来自由——这实际上形同受奴役，只不过是另一种形式而已——那么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科学也就被断送了，而建立起的所谓新的社会关系同过去的社会关系也就没有多少区别了。我们接受了这场斗争。而接受这场斗争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要为一种不仅对社会发展的当前阶段，而且对遥远的未来都具有重大和不可估量意义的事业而斗争。甚至即使我们大家都要在这场斗争中死去，这是已经超越我国疆界并将会进一步发展的一种事业，因为这是真理。真理将取胜，虽然他们的电台更加猛烈地诽谤和诬蔑我们，真理正日益迅速地在东方和在西方为自己铺平道路。

请原谅，我有些生气了，而你们必须承认，我生气不是无缘无故的。现在，我想尽力用几句话来向你们说清这件事的发展过程。你们已经看到，他们从第一封信起就说我们站在孟什维克的立场上。当我们向他们作了回答之后，他们又说我们像托洛茨基分子。我们知道，托洛茨基带来了多少危害，我们知道，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正确地作出评价的话，他的工作是有害的，至于在他之后所出现的那种情况，那是另一回事了：有多少正直的共产党人在托洛茨基主义的名目下受到了迫害，尽管他们与托洛茨基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当他们看到这一点没有奏效的时候，于是他们开始逐个宣布我们是间谍，一会儿说这个是间谍，一会儿又说那个是间谍，企图用这种方式在我们党内制造矛盾，分裂我们的党和国家的领导。

我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清算了这一切。会上表现出来的团结一致和磐石般的坚定，是国际工人运动中极为罕见的。但



是，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声音——会上代表我党的二千三百名代表是从全体党员中以最民主的方式选举产生的——对他们并不具有权威的意义。他们并未停止用谎言来攻击我们，恰恰相反，他们越陷越深。他们开始谈论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谈论南斯拉夫的民族主义偏向。他们以前称呼我们为“同志”，而现在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不是称呼我们为“同志”，而是把我们称作“狂暴的法西斯分子”。

头脑健全的人，特别是有马克思主义头脑的人都知道，容易理解和看到，这是他们所做出的一种不可思议的愚蠢行为。大家都知道什么是法西斯主义。他们自己还解释过法西斯主义的定义。法西斯主义有其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德国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曾是大资本家的思想根源，他们打着新的，然而实质上是最反动的形式——阶级合作制度等旗号，来奴役这些国家的人民。没落的中间阶层成了法西斯主义思想的群众基础，这种法西斯主义思想成功地把这一阶层引到占领者阴暗的意图和奴役其他国家人民的方向上去了。而我们这里法西斯又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已经消灭了法西斯主义。那么，这种新的臆造的东西又从何而来呢？这不过是一派愚蠢的谎言罢了。其次，法西斯主义有自己的意识形态，帝国主义的、占领者的意识形态，法西斯主义的意思就是说：“只有我，除了我再没有任何人”。法西斯主义就是种族主义。倘若我们对这种东西稍加探究和分析，那么就会看到，法西斯主义的这种特征究竟谁能对号入座，不过，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是同我们有关系。再次，我们没有想过要侵占任何国家。我们并不会因此说，我们对自己已经很满意了。但是，我们是以热爱全世界各国人民的



精神教育自己，教育我国全体人民的。我们珍视其他国家人民的文化和成就。我们充分肯定其他各国人民在文化、科学和技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如果他们所取得的成就越大，我们对这些成就的评价就越高，我们不会忌妒他们。这一切能称得上是法西斯主义吗？这不过是愚蠢的胡言乱语，不屑一听的言词，如同第一封来信中不值一驳的东西，以为缺乏经验的人们会相信谎言就是事实。难道能够把我们这些为了消灭法西斯分子和法西斯主义而真正贡献出一切的人称为法西斯主义吗？根据又在哪里呢？我们是否把政权留在资本家的手里了呢？没有，我们剥夺了他们的权力。在我们这里，政权在工人阶级的手里，别人的东西，我们一概都不取，而我们所想的仅仅是，首先让我国各族人民享用我国的财富。我们希望为我国各族人民建设更美好的、社会主义的未来。而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法西斯主义；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民族主义，总之，对于他们来说，这一切都是不正确的。但是，这还不是一切。在最近时期，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逐个地称我们为间谍，而是开始把我们整体都称为间谍。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大家是一致的，而且我们人数很多。对于他们来说，我们所有参加过西班牙内战的战士都是间谍，而且我们全体都是间谍。对于他们来说，明天，我们的整个军队，后天，我国全体人民，都将统统被称作间谍。我可不知道我们向谁从事间谍活动，又是为谁从事间谍活动。

在这方面，有些东西完全走了形，有些东西被大加歪曲，以至对于我们来说，根本就是不能理解的。他们从哪里弄来这一套，他们要这一套又有什么用？难道他们果真认为别人都相



信他们所编造的东西吗?我不相信他们是这样想的。但是,他们不得不仓促行事,以便至少使某个魔鬼相信,以便把我们同其他国家人民隔离开来,以便在苏联人民和人民民主国家人民面前,在世界工人阶级面前解释自己的敌对行动。但是,进步人民仍然会认识到什么是真理。而我们将不倦地、不间断地进行斗争并证明,事实真相就是事实真相,谎言就是谎言,我们决不允许任何人侮辱我们,无论他是谁。

他们以为,他们在这里放开手脚用棍棒鞭子抽打我们和刮我们耳光,而我们在联合国却会蜷缩在椅子上并沉默不言。我们为什么沉默不言呢?我们说话,不是说给西方反动派听的,因为他们也不是好东西,而是因为这样做是惟一正确的办法。我们有责任讲清楚,他们说的是一码事,实际反对我们又是另一码事。我们有权保卫自己的国家,并且不让我国人民陷于孤立,否则那时我国人民会陷于更大的困难境地。我们决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我们将来在一切国际会议和讲坛上也将如此按原则办事。如果苏联在某个问题上做得对,我们就同它站在一起。如果它做错了,搞两面派,那么我们会说清楚是怎么回事。

我向你们说,如果我们自己不能迫使他们尊重最基本的道德观念,那么我们必须在全世界面前说出和证明他们言行相背。这就是我们斗争的实质所在。我们必须争取世界上每一个进步的人,使他决不相信我们是工人阶级和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叛徒,全体进步人民必须了解我们为真理和正义在世界上取得胜利而进行的伟大的、历史性的斗争。为此而活着,是值得的,如果需要,为此而死去,也是值得的。



现在让我们回到布达佩斯的审判案<sup>①</sup>上来，这一审判案是历史上罕见的最骇人听闻的事件，可能也是至今从未发生过的事情。类似的审判案有过，类似的欺骗方法也有过，但是，像这次审判案那样不道德和粗暴，则是前所未有的，因为他们所做的这件事是这么愚蠢地安排好了的，类似这样的事件在历史上从没有过。

为什么苏联需要进行这起对拉伊克及其他同志的审判案呢？比如说，为什么他们不在苏联组织这种审判案呢？他们无论是在苏联或者是在任何一个东方国家都是很容易做到这一点的，答案也是相同的，这就是自我控告。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首先是在匈牙利这么做了。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被告之一布兰科夫居然一开始就声称赞成联共（布）致我党中央委员会的信件。大家都清楚，布兰科夫是一个普通的窃犯和盗用公款者，关于这一点过去已经提到过。这个骗子曾想打出所有类似于他的那些人的旗帜，而他们靠这些人来围攻我们国家，可是，为什么现在这个骗子却被放在被告席上来扮演这种角色呢？还有，为什么拉伊克坐到了被

---

<sup>①</sup> 指一九四九年九月在布达佩斯进行的对拉伊克·拉斯洛的审判案，这次审判是根据捏造的罪名——拉伊克在“美帝国主义者”和“铁托法西斯集团”的帮助下，同某些领导人一起准备在匈牙利进行反革命活动和建立资本主义——将这位匈牙利共产党党员和政治局委员处决的。拉伊克审判案是东欧国家一系列捏造罪名的审判案中的第一起，其目的也是要使南斯拉夫威信扫地。一九五六年，拉伊克和匈牙利其他共产党人恢复了名誉。——原注



告席上呢?我认为,无须使什么人确信这样一点,即我们与之打交道最少的人恰恰是拉伊克。我们与之打交道最多的人是拉科西、福尔高什以及其他的人,而拉伊克则呆在一旁,一声不吭。

他们不止一次到我国来,他们那时说,我们是他们的典范。他们说,他们到了罗马尼亚,看到情况不妙,而他们来到我国是为了看看应该如何做,等等。在有他们的政治局委员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他们就是这样逐字逐句地谈的。

他们说,罗马尼亚的人民阵线和工会在他们看来不行,而在这里一切都相当出色。早在那时他们就是带着别有用心意图来的:他们想引我们上钩,想让我们放弃赔款,公开提出要我们原谅他们。我问道:为什么呢?福尔高什解释说,我们应该原谅他们,因为他们需要建立军队。而我回答说:同志们,你们要清楚,你们完全可以和平地工作,你们可以和平地从事发展,而赔款你们是要给我们的,因为霍尔蒂的军队使我们国家蒙受的损失实在太大了。我们需要赔款,以便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重大的损失,此外,如果我们很好地武装起来了,那么你们也不必害怕什么。

他们对我的这一回答很不高兴,我向他们解释说:同志们,你们知道不知道,我们经历了多大的困难,我国人民还在作出多大的努力?请你们想一想,你们的法西斯分子给我们造成了多少损失。所以,现在请你们帮助我们。好吧,如果你们愿意的话,那就不要把这种赔款视为赔款,而把它看作是一种援助,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它,因为这是我们迫切需要的。然而,他们那时来是为了可耻地欺骗我们,是想让我们正式同意放弃赔款,那时他们手里就拿着石头,准备用它来砸我





们。可是，我们并没有放弃赔款。此后不过一个月，他们就同其他人一起通过了反对我们的那项无理的决议，把我们叫做“托洛茨基分子”，并且说了其他一些捏造出来的话。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是谁导演了布达佩斯审判案呢？根据我们从其他人而不是从拉伊克那里得到的情况，拉伊克确实起初在南斯拉夫问题上动摇不定，尽管他在同我们的人打交道时总是态度傲慢，生怕有人要说他对待我们的人的态度是友好的。他之所以动摇，是因为他不喜欢对南斯拉夫采取这样的方法，但又害怕说出来，因为他胆子不大。由于这种动摇，他一九四八年到莫斯科去“改正错误”。我不知道是在什么地方对他进行这种“改正错误”的工作的，但是他是去了莫斯科的，当他回国时，他成为外交部长，而不再是内务部长了。他原先的内务部长的职位由另一位部长担任了，便于后者能够组织对拉伊克的审判案。因此，这一切都是在莫斯科策划好了的。拉伊克被捕后，同布兰科夫一道又被送到莫斯科去“改正错误”。在那里，用他们所拥有的某些方法让他们两人准备好出席这一审判案。

你们已经看到，在那里他们想办的一切都办到了。用什么方法能使人们尽可能多地控告自己，这一点我不清楚，但是有某种奇特的方法，这是肯定无疑的。在这方面，他们需要的是对南斯拉夫进行恫吓。然而，在这次审判案中，除了提到的那些受到诽谤和诬蔑的人名外，甚至连这些人名也不都是确切的，所有一切都不过是一般的谎言罢了。整个这次审判案和在审判案中提到的一切，都是卑鄙的谎言和天大的无耻行径。除此之外，还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这一审判案必然成为国际工人



运动最大的污点、最大的耻辱，然而苏联却利用了这一点作为撕毁同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签定的友好互助条约的所谓理由。

你们只要看一看，他们给南斯拉夫的照会并且用布达佩斯审判案来解释这一照会，在这一点上表明他们是多么不明智。苏联是苏联，匈牙利是匈牙利。那么，为什么苏联必须断绝同南斯拉夫的友好关系呢？非常清楚，因为那里组织这一审判案的目的正是把它作为一种新的恫吓手段。你们是否看到，在这一种事情上暴露了今天在诽谤我们的那些人的赤裸裸的真面目。就是说，这一审判案是一种针对我国的蓄意制造的可耻行径，想在今天或在明天把我们说成是侵略者和法西斯分子，说成是威胁世界和平的人，等等。后来的情况，你们都知道了：他们通过报刊和电台广播不断地大肆渲染同一种内容，企望某些人会因此而受到某种影响。<sup>①</sup>

---

<sup>①</sup> 摘自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塞尔维亚军事演习结束时在托波拉的讲话（铁托：《言论集》，第四卷）。



## 关于我国的真情实况

### 播下微风，收获风暴

你们大体上知道导致波兰事件<sup>①</sup>和匈牙利事件<sup>②</sup>的原因。我们有必要追溯到一九四八年，当时南斯拉夫第一个给斯大林以有力的答复，当时南斯拉夫说，它希望保持独立，希望根据自己国内的特殊条件来建设自己的生活和社会主义，它不允许任何人干涉它的内政。那时并没有发生反对南斯拉夫的武装干涉，因为南斯拉夫是团结一致的，并且由于我们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已经消灭了反动派的主力，形形色色的反动分子已不能

---

① 指一九五六年六月，波兹南车辆工厂的工人举行示威游行，以及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在波兰经济和政治体制方面的一系列变革。另外，波苏之间的国家关系的某些问题，其中包括苏军留驻波兰境内的条件以及其他问题得到了解决。

② 指一九五六年十月底在匈牙利爆发的示威游行，要求改变政治和经济体制，与苏联建立平等关系。党的领导与人民的情绪相对立。并请求苏军镇压骚乱。这引起了更大的不满，示威游行转变成反对社会主义和苏联的反革命暴乱。



进行挑衅。我们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磐石般团结一致的共产党，它经受了战前时期和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锤炼，我们也有了一支强大的和经过锻炼的军队，而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显示这一切的人民的团结。

当关于我国的真相大白于世，同那些在那项不体面的决议通过之后与我们断绝了关系的国家关系正常化时期到来之后，东方国家的领导人表示，希望我们不再提起对我们所做过的事情，希望我们不咎既往，我们同意了，这只不过是为了尽快地改善同这些国家的关系。但是你们后来就会看到，对于那些今天又重新开始诽谤我们的国家的、在东方国家以及某些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中居于领导地位的某些人们，确实有必要提醒一下，他们在以往的四五年里，甚至更长一些时间里，对南斯拉夫所做的事。当时南斯拉夫只身对付强大的宣传机器，当时我们不得不在各个方面展开斗争，来维护我们人民革命的成果，维护我们已经开始建设的社会主义基础，总之，我们要洗雪他们想用各种各样的诽谤加在我们身上的耻辱，我们要证明真理在哪里。我们应当提醒他们说，当时也就是这一些人用一切可能的方式责难我们的国家，说它是法西斯国家，说我们是嗜血成性的人，说我们正在消灭我国人民，说我国劳动人民不支持我们，等等。今天他们又想把波兰和匈牙利事件的罪责加到我们头上，我们应当提醒他们，叫他们记住这一点。现在我只希望告诉你们，我们必须根据整个这一事态的发展情况来看待匈牙利事件。

根据苏联的愿望和倡议，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正常化了。斯大林死后，苏联新的领导人看到，由于斯大林的原因，苏联处



在一种非常困难的境地，不论是在外交政策还是在国内政策上都是如此，而且由于他们鼓吹并强行推行斯大林的方法而在其他人民民主国家里也是如此。他们认识到所有这些困难的主要原因在什么地方，所以他们在第二十次代表大会<sup>①</sup>上谴责了斯大林的行为及其政策，但是他们错误地把整个事情当成是个人崇拜的问题，而不是斯大林的方法和实践的问题。

我们从一开始就说，这里不单是一个个人崇拜的问题，而是使个人崇拜得以产生的方法或实践的问题，我们说，根源就在这里，应当不断地和坚决地根除这些东西，而这也是最难以办到的事。根源何在呢？在于官僚主义机构和领导方法，在于忽视劳动群众的作用和愿望以及某些西方和东方国家的党的其他领导人，他们对抗民主化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而且他们曾经对斯大林制度的巩固出了不少的力，他们今天还在努力恢复这种制度，使它继续占据优势。根源正在这里，需要纠正的也就是这种情况。

至于说我们，在同苏联的关系方面，我们已经走得很远了。我们已经改善了这种关系，签署了一系列经济协定，这些协定

---

<sup>①</sup> 这里是指一九五六年二月在莫斯科举行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大会由于通过了大会的决议和对斯大林的内外政策的批判而标志着开始同最恶劣的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畸形决裂。这次代表大会接受了关于通向社会主义的不同道路的论点，促进了为克服教条主义观点所进行的努力。代表大会还确定了同南斯拉夫关系正常化和友好合作的政策。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尼·谢·赫鲁晓夫揭开了斯大林搞的几次清洗的真相，此后，为无辜受害的共产党人恢复了名誉。



对我们很有利，是根据很有利的条件签订的。还通过了一项宣言和一项声明，前者是在贝尔格莱德通过的，<sup>①</sup>后者是在莫斯科通过的。<sup>②</sup>实际上这两个文件不仅对我们两国关系，而且对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都具有意义。

当我们在莫斯科草拟关于我们党的关系——主要是关于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和苏联共产党之间的关系——的声明时，这方面遇到了一点困难。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未能完全一致，但仍然通过了一项声明，在我们看来，除了南斯拉夫和苏联以外，这项声明还适用于更广泛的范围。我们一直提醒说，那些以前曾经在南斯拉夫引起这样有力反抗的倾向，在所有国

---

<sup>①</sup> 指《贝尔格莱德宣言》(一九五五年)，因为这项宣言，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与苏联和其他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恢复了正常关系。《贝尔格莱德宣言》是苏联和南斯拉夫两国政府在以尼基塔·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党政代表团访问期间，于一九五五年六月二日在贝尔格莱德签署的协定。宣言的主要内容为：通过协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发展两国之间的全面合作并进一步使相互关系正常化。这项宣言消除了一九四八年情报局决议通过之后在苏联和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中出现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为保卫世界和平而发展国际关系以及在平等基础上进行合作的原则和条件。

<sup>②</sup> 指《莫斯科声明》，这项声明是在以约瑟普·布罗兹·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代表团在苏联逗留期间于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在莫斯科签订的。这项声明基本上肯定了《贝尔格莱德宣言》中的观点：同意在各个国家中社会主义发展的各种不同道路的观点，及在平等和自愿的基础上进行工人阶级政党之间合作的观点。这两个文件对于整个国际工人运动具有重大意义，因为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被否定了。一九五六年二月召开的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这方面和在非斯大林化方面给予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推动。



家都是存在的，有朝一日也会在其他国家中表现出来，那时就将更难以纠正了。

你们知道，赫鲁晓夫曾到这里度假。那次我们在这里举行了会谈，在贝尔格莱德又举行了更为充分的会谈。由于我、兰科维奇同志和普察尔同志被邀请前往克里米亚，我们应允了，并且在那里继续进行了会谈。我们看到，对于其他国家，事情更麻烦，因为苏联领导人对于其他国家持有另外一种态度，也即他们同这些国家、同波兰、匈牙利等国的关系有一种错误的和有缺陷的看法。

然而，我们对于这一点并不悲观，因为我们看到，这不是整个苏联领导方面的态度，而仅是部分人的态度，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把这种态度强加于另一部分人。我们看到，那些主张朝着民主化的方向更加有力、更加迅猛地发展，主张摒弃一切斯大林主义方法、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建立新的关系的人，仍然有可能通过内部的演变而在苏联领导机构内取得胜利。我们看到，朝着这一方向的发展也将会出现在对外政策方面。从某些迹象上，从会谈中，我们看出，后一部分人并不软弱，而是强硬的，但是这种朝着进步方向，朝着摒弃斯大林主义方法方向出现的内部发展还受到一些西方国家的阻碍，它们通过自己的宣传和不断重弹有必要“解放”这些国家而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和妨碍这些国家之间的关系迅速地发展和改善。因为苏联认为，由于这种对内政的干涉已经在电台宣传，用气球运送物品等方面已达到了相当大的规模，假如他们完全对这些国家不问，而且让它们，比如说，得到像南斯拉夫那样的地位，那就会产生不好的结果。他们担心，那时反动势力将在这些国家里



获得胜利。换句话说，这意味着，他们对于这些国家的内部革命力量没有足够的信任。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所有后来这一切错误的根源就在于对这些国家人民的社会主义力量没有足够的信任。

当事情发展到你们都知道的波兹南事件<sup>①</sup>的时候，苏联人中间对我们的态度发生了一种突然转变。他们开始变得冷淡起来了。他们相信，这一事件应归咎于我们南斯拉夫人。是的，我们之所以有罪，是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因为我们还是我们，是因为我们建立了一个目前这样的南斯拉夫，因为它的活动的影响正扩展到我国境外。即使我们并不希望这样，我们的国家仍然在起作用，而且活动得非常积极和有用处。

尽管有各式各样的迫害，但是波兰依然留下了一个以哥穆尔卡为首的领导核心，他们在第八次中央全会上，有力地掌握了局面，果敢地给新方针，给实现民主化、同时也与苏联保持良好关系的方针定了调，坚决地抵抗对他们内政的干涉，因为这一切，必然存在的反动势力才未能抬头，而这种势力是一直希望一旦在共产党人之间发生冲突时能够出头露面的。由于苏联领导人的深思熟虑和采取了及时停止干涉的态度，波兰的情况现在已相当稳定，而且发展得相当好。

我不能说，波兰的这种与我们十分相似的积极发展，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中引起了某种欣喜。不，不能这样说，

---

<sup>①</sup> 铁托是指一九五六年六月波兹南车辆工人的示威游行，他们要求提高工资。示威游行变成了同保安机关和军队的武装冲突，由此引起了全国的抗议集会。





这种积极的发展受到了批评，不过是在私下、在他们中间受到批评，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也公开受到批评。在这些国家中，波兰甚至还没有得到它在已经同意了波兰的态度的苏联领导人那里得到的那种支持。在社会主义阵营某些国家的那些领导人中间，甚至在西方的某些共产党中间，波兰并没有被谅解，因为斯大林分子仍然在那里掌权。

当有那么一名历史学教授在法国讲课，称南斯拉夫是帝国主义的阴险的代理人，当法国共产党中的掌权人物在可悲而困难的时刻也在千百万人民面前提出如此严重的责备的时候，难道这能够成为社会主义事业会在将来正确地发展的保证吗？不能。对于这些不负责任的堕落分子的这类粗暴攻击，其责任在于那个党的领导人。

又如，恩维尔·霍查写了一篇关于南斯拉夫的文章，虽然没有点南斯拉夫的名，但是打击的目标是南斯拉夫和波兰，在文章中他坚决地谴责了走自己的道路的倾向和按照自己的具体条件的发展，他甚至反对赫鲁晓夫和苏联其他领导人已经承认了的东西——走向社会主义有各种特殊道路……

当我们在莫斯科的时候<sup>①</sup>，当然也曾谈到波兰、匈牙利和其他国家。我们说，拉科西政权和拉科西本人没有资格来领导匈牙利这个国家，来促进内部团结；正相反，他们只能导致严重的后果。遗憾的是，苏联同志不相信我们的话。他们说，拉

---

<sup>①</sup> 铁托是指一九五六年六月以他为首的南斯拉夫代表团在莫斯科的逗留，当时签订了《莫斯科声明》。



科西是个老革命家，他为人正直，等等。

说他是老人，这确切无疑，但是还不止这些。说他是正直的，就我所知道的，我可不能证实这一点，特别是在拉伊克审判案和其他一切事情发生之后。我要说，这些人不是正直的人。苏联同志们说，他是个聪明人，说他会获得成功，并说他们不知道在那个国家里还有别的什么人可以依靠。正是由于我们的政策，无论是国家的政策还是党的政策都反对干涉别国内政，而且为了免得再一次同苏联同志发生冲突，我们并没有充分地同苏联领导人争论要把像拉科西和格罗这样的班子排除掉。

当我去莫斯科的时候，人们很奇怪我为什么不取道匈牙利。正是由于拉科西我才不愿意取道匈牙利。我说，我不打算取道匈牙利，即使那样会使旅程缩短三分之二。当那个国家里共产党队伍本身表现出越来越不满的时候，当他们要求拉科西下台的时候，苏联的同志这才意识到，事情不能就这样继续下去，他们同意撤换拉科西。但是，他们犯了一个错误：没有同意也把格罗以及其他那些在人民心目中威信扫地的拉科西追随者都撤换掉。他们提出的条件是，只有保留格罗才能同意撤换拉科西。而这是一个错误，因为格罗同拉科西丝毫没有区别，他奉行同样的政策，他同拉科西一样负有罪责。

我们现在能够做些什么呢？我们看出，事情并不太妙。当我们在克里米亚的时候，格罗“碰巧”也在那里，而我们“偶然地”遇上了他。我们同他进行了会谈。格罗谴责了以前的政策，并说那是一种错误的政策，承认他们曾经诽谤过南斯拉夫，总之，他表示忏悔，并且要求建立良好的关系，答应以前



的错误都要纠正，再也不会回复到旧的情况了。我们希望表明我们不记前嫌，我们不是心胸狭窄的，所以我们同意同格罗和即将准备到南斯拉夫来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代表团举行会谈。我们希望同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建立关系。

但是，事态的发展已经远远地超出了我们的预料，无论是格罗的来到南斯拉夫还是我们所发表的联合声明都无济于事了。匈牙利人民要求罢免这些人和过渡到民主化的道路上去。当格罗率领的匈牙利代表团回国以后，格罗由于已经处于困难的局势之中而重又显露出自己往日的面目。他把当时还只不过是在举行游行的几十万游行称为暴徒从而几乎侮辱了全国人民。请想一想他的愚昧到了何种程度，他又是什么样的一个领导人吧。在这样一个危急的时刻，当一切都在混乱之中，当全国人民都在不满的时候，他竟敢用“暴徒”这个字眼来称呼人民，而这些人民当中有很多，甚或是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和青年。这就足以点燃火药桶，引起爆炸了。于是，冲突就发生了。

现在的问题不在于去调查是谁开的第一枪。格罗请来了军队。在游行还在进行的时候请来了苏军，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请别国的军队来教训自己国家的人民，甚至枪杀，这是重大的错误。这一举动更加激怒了人民，因此发生了自发的暴动，在这场暴动中，共产党人发觉他们自己，事与愿违地与各种反动分子站在了一起。反动分子混在这场暴动之中，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难道那里没有许多霍尔蒂分子吗？谁改造了他们呢？难道拉科西能够改造他们吗？

我们大家都清楚，霍尔蒂在匈牙利有强大的法西斯势力，



有“卐”组织，其他形形色色的反动分子，纳吉·费伦茨的信徒们，等等。总之，有很多人不赞成共产主义，他们不仅反对拉科西，而且总的来说，也反对社会主义。所有这些都混在一起了。过去，尽管国外召唤他们进行暴动，尽管他们从国外得到援助，这些反动势力是不敢妄为的，而且只要他们感到党团结得如磐石一般，他们也就没有力量和胆量起来反抗。但是，一旦看到党分裂了并且一大批党员起来反对拉科西集团和过去的残余了，他们便立即插足进来了。

这些反动势力在两三天内很快地暴露了它们的真面目。由于在全体人民反对过去政策的暴动中，那时的领导没有表示愿意消除那些激怒匈牙利人民的因素，从而开始沿着具有匈牙利一切内部特殊性的真正的匈牙利开展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事情急转直下，反动势力开始日益得势。这个反对一个集团的正当的造反和暴动变成了一个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苏联的暴动。在反革命分子已把局势掌握在自己手里之后，参加这次暴动队伍的共产党人终于无可奈何地发觉他们参加的斗争不是为了社会主义而是为了恢复旧制度。他们发觉他们事与愿违地处在这样的一种境地了。

西方充分利用了苏联的干涉。迫不及待地进攻埃及<sup>①</sup>的帝国主义利用了这种干涉。他们正是在匈牙利悲剧的这个阶段进攻埃及的，他们进攻埃及，相信苏联难以抽身而不能干涉这次侵略。这样，在匈牙利再次掀起了斗争。苏军得到了增援。纳

<sup>①</sup> 指一九五六年十月英国、法国和以色列进攻埃及。



吉逃跑了，同时一个新政府建立了。我可以对你们说，我知道这个新政府的人员，并且在我看来，他们是一些匈牙利最正直的人。他们在拉科西时代受过迫害，进过监狱，并且真诚拥护有一种新的发展。你们已经读过的卡达尔宣布的纲领本身表明了这一点。但是，苏联的干涉削弱了整个纲领，因此这个政府的处境十分困难。

现在有人问，苏联的干涉有无必要？第一次干涉是不必要的。应格罗的请求而进行的第一次干涉是绝对错误的。第二个错误在于：负责人士只是坐等第二次干涉，而不是采取他们后来在苏联进行第二次干涉时所采取的行动——那就是，成立一个新政府并且发表一项宣言。如果他们当初建立了新政府并发表了这样的一项宣言的话，工人和共产党人原可以从反动分子当中脱身出来，从而会比较容易摆脱危急的局势。

在我谈到苏军的第二次干涉以前，我必须说，匈牙利国内的形势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你们已经看到了有关这一局势的许多消息——以致那里显然会有一场可怕的屠杀，一场可怕的内战，而在这种屠杀和内战中，社会主义有可能被完全葬送，第三次世界大战会因而爆发。因为苏联政府不会容忍来自西方的干涉和霍尔蒂分子以及原先的反动派重新当权。

这些反动分子做了些什么呢？我前面已经说过，他们很早就暴露出了真面目。事情已经很明显，他们在上层越来越多地占了上风，他们下令禁止使用“同志”这个词和必须摘掉红星。当一个共产党员不能说出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否则就会被处死的时候，以及共产党员被吊死的时候，这一点就很突出。如果说这类事件只发生过一次，如果说他们所吊死的是一个人所



共知的专横的警察，那么还可以说发生这类事件是一群人自发闹事的结果。但是，他们在大街上到处抓人杀人，只要他们是穿黄色皮鞋的话，因为警察是穿黄色皮鞋的。其次，他们破门入户杀害共产党员。所有这一切都是野蛮的法西斯反动暴徒们干的勾当。

纳吉政府并未采取什么行动来制止这一切。它一直在电台上哭哭啼啼呼救求援，而没有展开斗争，并用某种方式表示要制止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决心。它没有那样做，而是发表了宣言，宣布退出华沙条约，宣布独立，等等。似乎这就是当时最重要的事情，似乎它的退出华沙条约有什么意义。

现在有许多人问了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苏联军队的第二次干涉呢？我们已经说过并且将继续这样说：我们反对干涉，反对使用外国的武装力量。但是现在哪一种祸害比较轻一些呢？是混乱、内战、反革命和一次新的世界大战呢，还是已经在那里的苏军的干涉呢？如果是前者的话，那将是一场大灾难；如果是后者的话，那将是一件坏事。倘若这会挽救匈牙利的社会主义，那么，虽然我们反对干涉，我们可以说，苏联军队的干涉是必要的。但是，如果他们该做的事情早一些做了的话，那么就不会有军事干涉。因此现在我只能这样说，第一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情况中最为严重的事，而第二种情况——苏联军队的干涉——也同样是坏事，但却是必要的，如果它能够保住匈牙利社会主义，也就是说能够在那个国家里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能够导致世界和平，那么终有一天这将成为一件好事，但是条件是：一旦那个国家的情况稳定和平静下来以后，苏联军队必须马上撤出。



我们向苏联同志们提过这一看法。我们没有隐瞒什么东西。苏联同志们表示，那时他们的军队将会撤走。应该懂得：苏联现在也处境艰难。他们的眼睛现在已经睁大了；他们发觉投入战斗的不仅是霍尔蒂分子；而且还有工矿企业中的工人。

我坚信，匈牙利境内所流下的鲜血和匈牙利人民所作出的可怕牺牲，将会产生积极的影响，而苏联的同志们，会清醒地看到，迄今所发生的那种事情再也不能那样干下去了。

我们所痛心的，也是我们大家所痛心的，是社会主义遭受了一次可怕的打击。社会主义威信扫地。而你们是否还记得，我们常常提到，这种方法只会使社会主义威信扫地？我们确实说过些话。而我现在并不是要大家洋洋得意，兴高采烈地说：“我们早就告诉过你们，这样做不对。”如果他们要想扭转那里的形势，不是用匈牙利的方式，而是用一种和平的、共产主义的方式去扭转局势，那么他们就应该批判消极的东西，倾听群众的呼声、党员的呼声，以及全国人民的呼声。

南斯拉夫脚跟站得很稳，它至今已经经受过多次打击，因此来自国外的这些诽谤是不会使它离开自己的道路的。尽管我们还不能完全满意于我们的国内发展状况，但是我们将努力使我国人民尽可能得到满足，不管我们现在和将来怎么样，我们一定要加倍努力开展活动。

有一次，我对苏联同志们说，即使斯大林尚在人世，这也是会发生的，如果他活着的话，这甚至会发生得更早一些。对此，他们并不否认。我们无权告诉他们应该这样做或那样做，我们只能指出他们的这种或那种行动可能造成的错误和消极的后果。我相信，匈牙利事件可能是最后一次悲剧，促使苏联的



同志们以及仍然对此熟视无睹的其他各国的领导人，尽最大努力来避免在其他国家中发生与目前匈牙利情况相同的那种局势。

在东欧的一些国家里和党内，某些领导人说，这种事是不会在他们那里出现的，他们说他们有一个强大的组织，一支强大的军队，一批强大的警察；他们说他们的全体党员已经知道了全部情况；他们说他们能够控制整个局势。格罗也说过同样的话；拉科西也说过。但是这对他们有什么用呢？如果他们不改变他们所使用的方法，如果一旦人民起来反抗的话，那是丝毫无济于事的。他们一九四八年以来所播下的种子，现在得到了收获了。他们当初播下的是微风，而现在收获的却是风暴。

匈牙利的这些事件使我国也存在的各种各样的人物和分子受到一点鼓舞。他们为数不多，但却大放厥词。他们有些人惟恐天下不乱，他们想的是从中渔利。我从未说过，我们已经完全消灭和改造了乌斯塔沙分子、切特尼克分子和梵蒂冈的那些顽固不化的支持者们。我始终认为，只有人民团结一致，才能防止他们在我国作任何尝试或干成什么事情。今天，人民和党的团结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必要，但是，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害怕在我国有可能发生什么事。因为，南斯拉夫毕竟不同于匈牙利或其他任何国家。我们是用自己的鲜血，经过解放斗争，完成了我们的革命的，我们在革命期间已经彻底清扫了我们的房子。因此，我们是不存在这种危险的。

我不想说，我们的人民感到百分之百的满足，我们这里万事如意。事实上连我自己也不满意。然而，南斯拉夫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我们有前途，而且在我们国内劳动人民时时都





在创造更远大的前途。还有什么使我感到不满意的事呢？你们会记得，我去年作了一个报告，我在报告中指出必须改变我们投资政策的方针。我坚信，领导经济的人们会理解这一点，而且我们应当首先认真地关心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在这方面，已经有了某种转变，市场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稳定，物价的飞涨已告结束，这种飞涨会引起通货膨胀，然而并非我所期望的一切都已做到了。我们现在再次决定要更加有力地制止一味搞建设的倾向。我们现在必须重视提高生活水平，同时加强我国的国防。这两件事是优先要办的事，我们一定要关心这两件事。

现在我想谈谈有关在我国存在的各种分子的情况。他们的想法是这样的：“现在匈牙利情况严重，霍尔蒂分子以及梵蒂冈和其他分子将会在那里得势，这可是我们的一个机会。”照他们来看，南斯拉夫将再度被孤立和围攻，他们将有可能在南斯拉夫比较顺利地地进行活动。现在仍然有这种分子，但是我要说，他们是完全错了。因为，我们的党内虽没有八十万党员，但是我们有大约六十万党员、干部，他们曾经在革命和斗争中经受过考验，他们不是带着各种追求地位的和其他的倾向参加我们党的，他们都承担着建设我们国家的重任。他们始终懂得及时阻止试图在我国策划阴谋的任何人。

在我们的国家里有着拥有六十多万盟员的共产主义者联盟，有着拥有七百万盟员的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这七百万人都是自觉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他们有自己的纲领，并且知道他们朝着什么目标前进。这七百万人任何时候都可以发表他们的意见，如果他们认为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如果他们认为我



们不能再把这样大量的资金投入基本建设方面,或者如果他们认为这件事或那件事是必要的话。当然,无论是我或者是我们的全体领导人,任何人也无权违背我国各族人民的愿望,那就是:用今天可能达到的速度来建设我们的国家。

你们知道,当你们每天碰到这些问题时,当你们看到一个又一个工厂建成而明天就会产生使情况得到好转的结果的时候,当你们还看到要保证扩大只需要再追加数百万第纳尔投资的时候——与你们仅仅看到这一些事情的时候,那么你们多少是忽视了其他东西——忽视了我们的人。你们仅仅看到的是工厂而没有看到人!

显然,我们的处境仍然艰难。我们的对外贸易有很大的逆差,这种逆差现在还继续在增加,虽然在过去一年半期间,我们签订了一些相当有利的协定,首先是同苏联签署的一项协定,我们以非常有利的条件,即以百分之二的利息获得一笔大宗贷款。其次,我们已经签订了关于德国支付赔款的协定。捷克斯洛伐克已经勾销了,即抵销了一亿美元,而与匈牙利之间的债务将要根据其可能来解决。由于签订了这一些协定,我们已经缓和了建设方面的困难。最后,我们已经以信贷的方式从美国获得总值约为一亿美元的小麦和某些原料。我们的状况并不像某些人希望把它说成的那样困难。粮食和面包将不会短缺。

在我国,市场有点混乱,因为人们太不注意设法使市场有充分的供应,尽管在这方面全国存在着非常有利的条件。例如仅拿贝尔格莱德来说,这个城市近郊有潘切沃沼泽地带,那里有适宜种植蔬菜的极好条件。有许多县和其他一些公社能为市



场生产大量消费品，但是它们并没有生产这些东西。又例如，今天是从卢布尔雅那运蔬菜到科帕尔去。这是一种什么政策？而过去科帕尔是向的里雅斯特提供蔬菜的。在我们的国家里存在着一系列这类不好的现象。

我多少有点离开了我所谈的话题。我希望告诉你们，从前途是社会主义还是反革命这样的角度来看匈牙利当前的事态发展，我们必须保卫卡达尔的现政府，我们必须帮助它。我们之所以应该帮助它，是因为它的处境十分艰难。我们必须反对所有那些现在正在不负责任地把全部过错归咎于俄国人的分子。是的，苏联的同志们没有及时发现和纠正拉科西政权的错误，没有让那些得到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信任的人们能够执政，他们应当对这些情况负责。因为谁也不能把某个领导人强加给一个国家的人民。这是办不到的事。

在波兰，局面已经开始稳定，但并不十分稳固。同样的分子也在那里活动，他们是反对波兰同苏联有良好关系的。你们知道，那些持有反动观点的波兰人是愤恨俄国人和苏联的。必须把波兰人民同不仅愤恨苏联而且总的来说还憎恨社会主义的反动派区分开来。因为波兰的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人有着远大的眼光，并且知道他们可以从苏联得到什么支持。比如，如果没有苏联的支持，波兰人就很难保住奥德—尼斯河边界，而德国人是从来没有承认过这条边界的，他们想把这条边界再要回去。总之，在这方面所需要的是互相帮助和支持。

同样，我们必须同波兰政府和党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尽我们能力来帮助他们。我们必须同波兰同志们共同反对无论东方国家的还是西方国家的其他党内的这样的倾向。



南斯拉夫不能只顾自己，它必须在各个方面作出努力，但是决不用从内部破坏这些国家而在那里招致消极的滥用权力的现象的办法，而是要在思想方面，通过接触和交谈，以便使新的精神获得胜利。不应该回避公开地批评这些党内的不良的现象。你们已经读到了《战斗报》上的那篇文章，在我看来，这篇文章作为第一篇文章是写得不坏的，但是它还不够充分。有关这个问题还需要强调。向我们的盟员解释这个问题，是你们共产主义者和在基层工作的领导人的责任。

现在，让我简略地谈谈埃及遭受侵略的问题。你们已经读到了关于我们在联合国所采取的态度消息和我就这次侵略事件发表的声明<sup>①</sup>，你们也读到了我们的报纸。然而我还是想回顾一下情况。当我在访问印度后的归程中第一次会见纳赛尔时，他向我谈到了他们在埃及的一切困难的确切情况。埃及是一个不发达国家，缺乏工业，生活水平十分低下，并且没有任何强有力的内部组织，即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党。纳赛尔说，埃及的领导人都是这样一些军人，他们上台以便为本国人民服务，为人民争取自由，保卫它的独立。当他陈述所有这些困难时，看来这些困难确实是很难克服的。

后来，第二次，当我们访问埃及和开罗时，我们又进行了会谈，并且看到这些困难是艰巨的。但是，我们注意到那个国家的人民已经开始觉醒，它已经开始有了民族觉悟。由于长期

---

<sup>①</sup> 指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发表的谴责以色列、英国和法国政府侵略埃及的声明。



被占领和法英殖民主义的行径，这个国家的人民从前受到压迫并且处于麻木状态。我们看到，若是有和平，纳赛尔和他的班子在执行他们艰巨的任务的时候，他们是可以依靠人民的。

我曾向纳赛尔公开表示我的担心，我说我无法相信帝国主义者会让他们有和平，因此他必须小心行事，不要给帝国主义者丝毫可能得到任何借口来干预中东事务。当然，我不能够详细告诉他应该怎样做，而只能指出可能酝酿成熟的那种危险性。我告诉他，他应当知道帝国主义者是不择手段的，他们目前并没有放弃他们的野心，他们认为埃及——世界这一地区最强大的国家——对于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在非洲和亚洲的属地来说是最危险的，埃及的强盛和发展可能促使帝国主义者和殖民国家阻挠埃及旨在发展它自己的努力。

我们的看法，我在同纳赛尔举行会谈时表明了这种看法，这就是，他们应当首先加强内部，建立一个内部政治组织，建立一支强大和巩固的军队，从经济上提高自己，争取获得他们可能获得的贷款，让人民立即看到新政权的成就，使他们感到生活有一定的改善。这就是我们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而他们欣然接受了。

早在第一次会见时，纳赛尔就已经对我们说，他们将不得不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因为埃及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是不能允许外国人在它自己的领土上来管理运河的。当然，他们有充分的权利把它收归国有，只是要选择适当的时机。当把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的时候，英法这两个殖民大国反应很强烈，发出了付诸武装进攻的威胁，以阻挠收归国有的行动。但是，由于联合国，战争的第一次威胁被阻止。当时通过了一项决



定，要求进行谈判以便使这个问题得到和平解决。尽管如此，还是发生了突然的侵略。埃及最近遭到以色列的进攻，后来又遭到了英法两国的进攻。

整个这次侵略可能是早有准备的，而发动进攻的时机选在发生令人遗憾的匈牙利事件的时候。他们对匈牙利的动乱表示欢迎，因为他们自己已经准备好了。英法两国把以色列的侵略作为说明它们必须保护苏伊士运河的一个借口。

这是同殖民国家过去发动的传统侵略没有任何差别的最典型的侵略。这是完全相同的。在我看来，发动这次侵略的人今天已在后悔，因为他们没有得逞。他们原以为：第一，他们会在几天之内毁灭埃及，推翻纳赛尔；第二，有这样一种心理状态在世界上占优势，那就是人们将不会出面干预，联合国将不会谴责他们，因为他们在这个组织中会得到多数票。然而他们的算盘打错了。情况恰好相反。埃及没有被毁灭，虽然它遭到巨大的损失，它的军队打得漂亮，侵略者没有能够占领整个苏伊士运河，尽管他们还在继续开火。埃及人民并未像艾登所预料的那样推翻纳赛尔。在英国本身，工党对侵略和政府的政策采取了一种非常激烈的反对态度。在联合国，绝大多数国家都声讨这种侵略行动，为埃及建立一支国际警察部队的工作现在正在进行，我们也表示愿意为这支部队提供我们的部队。也就是说，埃及人自己要求这样做，所以我们大概也会派出我们的部队。

这次以色列显示出它是大国的一个工具，因此它构成了对和平的威胁。不错，在阿拉伯人当中，存在着对以色列的强烈的反感，因为将近一百五十万阿拉伯人被赶出世界这个地区，



这些人现在是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生活着。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不愿意缔结和约，也不愿意就把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看待作出保证，即它们不承认它。它们现在继续不承认，但是这并没有给以色列发动侵略的权利。在任何情况下这都没有给它这种权利，正如英国人和其他的人希望把事情说成是这样。

阿拉伯人是否会承认以色列，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和平谈判和说服，取决于自从停战以来所产生的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的解决。在我看来，最可悲的是法国社会党人现丑，并再次表明他们是那些企图不惜代价来维持旧的、传统形式的殖民主义的集团的忠实仆从。他们的脸上将永远洗不清这个污点。他们希望通过对埃及的侵略不仅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而且在其他中东国家获取利益。他们认为这次冲突定会蔓延到其他阿拉伯国家，从而会加强他们的殖民地位。英国人以为，在占领苏伊士运河之后，他们将在中东牢牢地站稳脚跟，在打垮埃及之后，将能保障他们在中东的利益。可悲的是，这场侵略竟然在法国议会得到了大多数议员的支持，而只有共产党人和一小部分社会党人反对它。

这样，它就迫使我们谨慎小心。因为，这已经表明所谓西方民主的维护者——法国和英国——光是在口头上主张和平、正义和民主，而实际上它们是一旦有机会就可能导致极端反动和侵略行径的温床。我确信，正是因为以居·摩勒为首的法国社会党人奉行的这种政策，总有一天不幸的法国人民会不得不付出代价。

我们希望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帮助法国人。我们对纳赛尔说，我们认为要法国人离开阿尔及利亚是困难的，而且最好还



是用法国同阿尔及利亚之间建立联盟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当我们访问法国的时候，我们对法国的领导人也谈到了这一点。“与其每天花费十亿法郎来维持你们现在驻扎在阿尔及利亚的军队，倒不如把这笔钱的半数用来提高那里的人的生活水平，用来修筑道路和建设其他工程，这样阿尔及利亚人民就没有什么可以反对你们的了，他们也就不会拒绝同法国结成联盟了。与其一天花费十亿法郎，即一个月花三百亿法郎，你们倒不如走这条道路为好”。

法国某些领导人承认这样做是对的，可是另一些领导人则说，那样法国的威信就成问题了。难道他们现在就有威信吗?!他们已经在全世界面前丢尽了脸。全世界都谴责法国政府的行动，侵略的行动。

问题还没有澄清，还不清楚他们的目的何在，他们将做到何种程度。我怀疑派遣国际警察部队这件事是否能够顺利地进行。英国人很可能会这样希望：他们的一部分军队可以以警察身份留在埃及，然而，无论是根据联合国章程还是因为他们是侵略者，这样做都是不可能的。他们不能留在埃及。埃及决不会赞同这样做，任何正直的人都不会同意这样做。他们永远可以找到某种借口来继续他们的侵略行径。由于苏联政府较强烈地过问这件事，他们才有点紧张并开始仔细考虑。

我们必须比迄今任何时候都要更加用我们的一切力量来维护世界和平。南斯拉夫是非常活跃的，在联合国中积极地发挥作用。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将尽我们的所能来维护世界和平。绝大多数人民是不希望发生战争的。如果说世界上有人珍视和平的话，我认为那就是我们各族人民，他们希望和平，为





的是能够在和平条件下来建设他们的更美好的生活。在过去的一次战争中以及在从前的几次战争中，我们受尽了苦难，我们付出了许多鲜血，因此我们有理由要尽我们全力来为维护世界和平而斗争。但是，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越出了我们一国的疆界。

我们的国家是团结的、巩固的、磐石般一致的。现在的问题只是在于尽量改善我国人民的生活。我们的团结，这种磐石般的一致和沉着冷静，这种对世界上发生的哪怕是最严重的事件保持镇静而毫不慌张的态度，这种冷静的判断，对于我们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我们决不能允许各种各样的人物、形形色色的分子大放厥词。人民和群众应当从下而上地制止他们发言，防止他们散布分裂的言论。

如果你们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我们愿意随时为你们效劳，我们始终可以向你们讲清有关的问题。当然，有的时候有些事情是不能谈的。你们不应当认为我今天什么事情全谈了，因为我不能这样做。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是可以告诉你们的，那就是我所没有讲的事也是很重要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积极方面的事。今天，南斯拉夫在世界上起到一种受到重视的积极的作用。<sup>①</sup>

---

<sup>①</sup> 摘自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在普拉向伊斯特拉共产主义者联盟积极分子发表的演说(铁托：《言论集》，第十一卷)。



## 实行自治

### 我们意识到，我们会遇到 足够的艰难险阻

现在，国民议会在审议社会主义南斯拉夫最重要的一项法律草案——《关于劳动集体管理国营经济企业和高级经济联合组织基本法》的草案。这项法律的通过，将是国民议会继通过《关于生产资料国有化法》之后又一个具有最重要意义的历史性行动。生产资料转到国家的手中，这还没有实现工人运动的行动口号：“工厂归工人”，因为“工厂归工人，土地归农民”的口号，并不是抽象的宣传性口号，而是其本身具有深刻含义的口号。它包含着在公有制方面的，在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方面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全部纲领。因此，如果我们真正地在建设社会主义，那么这一口号是能够并且必须在实践中来实现的。

我们制定的关于把工厂企业等交给劳动集体管理的这项法律，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必然结果。这是我国的人民政权在坚定地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的继



续。实施这项法律的条件已经部分地成熟了。我国的劳动集体时刻都在表现出他们的成熟性,表现出他们通过英勇努力来完成计划任务的高度觉悟。

为什么我国劳动人民在竞赛中,在提前完成计划任务方面会表现出这种热忱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呢?因为我国劳动人民清楚,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只有依靠他们自己,他们付出劳动所取得的成果是对他们有利的。我国劳动人民现在坚信,我国人民政权对他们是充分信任的和关怀的。另一方面,我国劳动人民正用实际行动表明,他们准备克服他们工作中的任何困难。因此,我国劳动人民正在作出这样的努力,正在以如此高昂的热情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坚持生产出尽可能多的各种产品,正在以如此巨大的毅力建设新的工厂、新的工程、新的铁路等,他们表现出他们对自己工厂的热爱,从而坚决用全部力量通过革新改进生产工具。难道说这样的劳动者没有能力来自己管理自己的工厂吗?当然,他们是有能力管理的,而加入工厂、矿山和其他企业的新工人将会向自己的同志学习。

可能有一些人认为这项法律为时尚早,工人还不能掌握管理工厂和其他企业的复杂技术。凡是这样想的人,都是在欺骗自己,因为如此看待这个问题意味着对我国劳动人民缺乏信心,意味着漠视我国劳动人民的巨大创造力量,我国劳动人民的这种创造力量正是通过管理工厂将会得到发展,因为这项法律将为我国的劳动者更多地开创他们的未来和我国整个社会的未来的前景。因此,这项法律的提出,不仅不是过早了,而是晚了一些……

过去有些人,现在始终还有这样的人,曾经认为而且现在



仍然认为，生产资料的管理问题，只要任命最优秀的工人担任经理厂长或者管理人员就能够解决了。这固然是一件好事情，因为我们把我们可以信任的人，劳动人民的国家可以信任的人放到这些职位上。通过这种由劳动人民自身的队伍中选拔出来的工人厂长，人民的国家可以对于企业的经营进行更好地监督，这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这样的厂长也能够更好地懂得工人的需要并且能够更多地关心工人和关心国家的即人民的财产。这曾经是在国家掌握生产资料时最迫切的措施。当然，如果我们希望避免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可能由此产生的许多弊端，那么就不能停留在这一点上。这是其一，而其二是通过这种方式“工厂归工人”的口号并没有实现，同时国家经济职能消亡的思想也不可能通过这种方式得到实现。

正如我已经所指出的，我们这次会议正在讨论的这项法律草案，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进一步发展是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的，但是，这项法律并未完全解决问题，因为仅仅是向共产主义迈进了一步。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并没有完全停止起作用，但是它们不再是国家专有的职能了。这些职能随着劳动者被吸收参加管理而日益变弱。劳动者是逐步地而不是一下子全部管起来，这就是说劳动者作为生产者正在取得管理生产的权力。为什么劳动者是逐步地而不是一下子全部管起来呢？这一过程将会延续多久呢？不可能对这一过程究竟将延续多长时间作出答复，因为这取决于各种情况，取决于文化发展的速度，也就是说，要对工人实施全面的教育，以便使他们在各个方面都有能力为了社会的利益而成功地管理工厂、矿山、交通运输等。做不到这一点，工人就不可能实行核算和监督。没有文化



的提高，工人就不可能获得管理方面的充分技术知识。另外，还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速度，等等。

劳动者的文化提高对于我们尤其重要，这是最困难的问题之一，因为，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来看，我国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我国的工业现在刚刚起步。因此，经济管理的所有职能转到劳动人民手中的速度快慢取决于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快慢。而这又是首先取决于工人本身，取决于他们对于尽可能迅速地 and 尽可能多地生产消费品的关心程度，取决于工人对厉行节约的关心而不是浪费……

为什么我把文化发展的必要性放在第一位？如果我们看看旧南斯拉夫产业工人的人数有多少，而今天产业工人的人数有多少以及将来产业工人的人数有多少，那么就不难看出问题的关键所在。今天是谁正在进入工业企业和其他企业？是农民。因此，今天有大量的农民、半农民和半工人进入企业，必须首先把他们培训成工人，然后才能把他们培养成工人管理人员。这既不是一件短时间所能完成的工作，也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这是应当以最严肃的态度、极其耐心地 and 精力旺盛地来从事的工作。在教育这些新工人方面，我们现在和将来都要做不少的工作来清除大部分工人存在的有关工人的职责、有关工人对国家的即人民的财产的态度等等方面与工人不相容的思想观点。

我们只要举出以下事实就清楚了。我们正在我国最落后的地区，如波斯尼亚、桑贾克、马其顿、科索沃和梅托希亚、利卡、黑山等地，建设和开始筹建许多工程，甚至是最大的工程项目。而迄今为止，在这些地区，仅有很少的工业，或者几乎



没有工业。是谁将要在这些工厂、矿山以及其他企业中工作呢？是来自这些落后地区的农民。这些落后地区的贫苦农民应该到这些工厂和矿山去工作。他们应当从数世纪以来祖祖辈辈过着最低水平的文化生活和物质生活的贫苦农民变成有觉悟的工人，成为他们自己和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的美好生活的建设者。这将不会是一个轻松的和迅速的过程。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因为今天我们在把一个半农民半工人培训成为有觉悟的、守纪律的产业工人这项非常艰巨的工作方面，已经有了不少的经验。必须作出巨大的努力来实现这一目的，同时必须坚定地向着这些半工人证明，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中，他们不仅正在成为工业、采矿业等的生产者，而且正在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必须向他们讲明，在他们进入这些工厂、矿山以及其他企业的同时，也就成为这些企业的所有者。他们的那一小块贫瘠的土地永远也不可能使他们过一个真正的人的生活，而工厂、矿山以及其他企业才能够保证他们过上比他们的祖先美好的生活！为什么有必要把半农民半工人变成有觉悟的产业工人呢？之所以必须，首先是因为我们正在建设为数很多的工厂和企业，正在开发越来越多的新矿山，总之，我们正在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工业化，以便使它更加富强，以便使我国还没有开发的财富造福于全体公民，从而使人民能够利用这些财富，等等。为了使这些工厂、矿山等能够动工，我们需要有能够掌握新技术的工人。半农民是无法掌握这种现代技术的，因为他们更多地想到的是他们那一小块不毛之地，而没有想到，现在我国的现代生产资料已经不是资本家的私有财产而是我们整个社会的公有财产。这些生产资料已经不再是由资本家或者由他们



的待遇优厚的忠实的职员和官僚来管理,这些职员和官僚只关心资本家的利益和从工人那里榨取尽可能多的利润交给资本家,同时这些官僚也因此分得一小份。今天,在我国,这些工厂、矿山和其他企业将由工人自己来管理。他们自己将决定怎样进行工作和工作多少时间,他们将懂得他们为什么劳动,他们的劳动成果将如何使用。为了在全国各地,包括最落后的地区,都能够这样做,必须把半农民提高到有觉悟的产业工人的水平,他们将认识到他们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责任和权利。

由上可知,在一个落后的国家中,例如在我国,在建设共产主义的道路上存在着非常艰巨的困难。那么,现在怎么办呢?我们是否要等到全体工人都成为同样地聪明和有能管理企业的人呢?当然不是,因为这样我们就必然会无止境地长期等待下去。只有在管理的过程中,在劳动和管理的不间断的过程中,所有的工人才能取得必要的经验。他们将不但熟悉劳动的过程,而且会了解自己企业的一切问题。劳动者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学会运用核算,才会懂得应当用多少原料和节约多少原料,才会知道他们的劳动消耗在什么上面了,即他们的剩余劳动用在何处以及如何使用。他们将会知道他们企业的积累有多少必须作为整个计划积累的一部分,他们可以用多少其他的剩余产品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他们还必须懂得他们能将劳动生产率提高多少以及用多高的速度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等等。他们还必须彻底懂得劳动纪律,因为从劳动人民将经济管理的责任承担起来的时刻起,劳动纪律的问题就成为他们首要的责任问题。

尤为重要的问题是,劳动集体的委员会必须使劳动力的配



备尽可能地合理化,不能容许在他们的企业中存在不必要的和非生产性的劳动力,即不允许在行政部门出现过多的官僚,因为这样只会增加生产费用而减少他们企业的利润率,这将给整个劳动集体造成损失。必须学会区别对待专门人才的需要和多余的、行政性的、非生产性的机构之间的差异。

把工厂、矿山等交给劳动集体管理,就能够使得一种名为官僚主义的传染病无法在我们的经济部门中传播。这种传染病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轻易地从资产阶级社会中传来的,成为过渡时期的一种危险病症,因为它像水螅一样把它的触手伸向各个方向,妨碍和阻挠正确和迅速的发展过程。官僚主义之所以是社会主义的大敌,正是由于它不知不觉地渗透到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而人们一开始对它还没有认识。那种认为官僚主义在我国并没有开始扎下根的看法是错误的。官僚主义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的各个机关、国家机构和经济部门中去了,但是,我们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已采取了使其不能得逞的一系列措施。在这方面,仅仅采取搞运动的措施是不够的,而必须不断地开展斗争和教育人民……

在新的条件下,即在劳动者参予管理经济的条件下,工会的作用有了一些改变,因为现在工会的职能主要地是针对工会工作中的最重要的问题——教育劳动者和全面提高劳动者的文化素质。工会的工作要针对新工人即过去的农民。工会要在党的领导下通过自己的顽强努力,尽快地使新来的工人,也即过去的农民,提高到最有觉悟的产业工人的水平,尽快摆脱小农的旧习气,成为对待生产资料,对待工厂、矿山,对待社会财产、劳动都具有新的、社会主义的态度的工人。这些新工人必





须尽快地受到教育，从而成为勤劳不懈的、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者，成为全体劳动者的美好幸福生活的建设者。

由于工人参加管理企业，即参加管理整个生产，工会在保护工人利益方面的任务削弱，因为现在工人是通过工人委员会以及生产管理委员会自己在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因此，这也就便于工会发挥它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它需要保护工人的利益；另一方面，它同样又得照顾到人民国家和整个社会的利益。由于工人逐渐熟悉管理生产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诸如积累、生产费用以及过去必须由厂长本人、以前的管理机构和工会去解决的各种各样的许多困难问题，工会在这方面的的工作也就比较容易做了。无论如何这将大大有利于巩固工厂、矿山和其他企业的劳动纪律。

这项法律草案表明，劳动人民是用最民主的方式来行使他们的管理职能的。在工厂、矿山和一切企业中，职工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直接选举产生工人委员会。这些工人委员会和由工人委员会成员在他们之间选举产生的管理委员会，必须取得工会的全面支持。为做到这一点，管理委员会必须包括企业中的职工工会的成员，这样，他们也就承担起他们应负的管理责任，而不再是作为不负特殊责任，不承担相应职责的咨询机关。

这项法律是我们至今所制定的最富有民主性的文件之一；就其内容而言，这项法律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的现实……

从现在起，生产资料——工厂、矿山、铁路——的国家所有制将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高级形式。国家所有制是公有制的最低级的形式，并非像苏联领导人认为的那样是最高



级的形式。

这一点正是我们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这是国家职能消亡的惟一正确的道路。

让情报局分子们记着吧，他们诽谤性的责难决不能损害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光辉道路！

另一方面，我们这项有关劳动集体即我国的劳动者参加管理国家经济的法律，对于在哪里有真正的民主的问题，是在我国呢或者是在被大肆赞扬和歌颂的西方民主国家呢，乃是最有力的回答。在我国，民主是建立在最广泛劳动群众享有的物质基础之上的。群众感到他们正在使用这种民主来为我国全体劳动人民建设美好和幸福的将来，对于那些大谈我国没有真正的民主，说我国是一个警察国家，等等，以及津津乐道我们物资匮乏和我们少这缺那的西方人士，这就是一个回答。诚然，我们确实还缺乏许多东西，因为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资金，还不能生产出足够的消费品以及使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和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的足够的其他东西。但是，我们目前正在为实现这一目标的道路上迈进，我们将是为了所有的人而实现这一目标的，不同西方国家仅仅是为了少数人……

我们意识到，我们将会有无数的艰难险阻，在我国工人克服由于我国的落后所产生的一切困难之前，我们的境况将是如此。但是，我们可以坚信，我国劳动人民将胜利地克服重重艰难险阻，因为他们意识到社会主义建设是他们自己的事业，而且只有依靠自己顽强的、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创造性的努力，这一切才能实现……

……已经在管理着自己的合作社的农民们，从现在起即将



自己管理工厂的工人们，今天他们已经真正地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了。<sup>①</sup>

---

<sup>①</sup> 摘自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六日在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第二届国民议会第一次非常会议上所作的关于把国营经济企业和高级经济联合组织交由劳动集体管理基本法草案的报告(《铁托领导南共联盟四十年》)，贝尔格莱德，一九七七年版)。



## 自治十周年

### 工人不再是雇佣工人

问：在战后工会恢复十五周年和我国工人自治十周年之际，我们请总统同志就工会在过去十五年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就今后其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特别是在生产者自治的发展中的基本任务谈谈自己的看法。

答：当我们实行工人自治时，我们当然也为工会确定了重大的任务。我们意识到，我国的工人并未继承一个业已形成的工人阶级的特点。我们考虑到，由于新的劳动力不断地从农村流入工业，因此工会必须特别重视这些新工人。在这十年期间，在教育和改造那些从农村进入工业并带有旧观念残余的人们方面，工会确实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工会成功地完成了把他们改造成成为有觉悟的工人的任务，并在这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随着工人自治的实行和迄今的发展，雇佣关系的基本因素已被消灭，但是，在这一时期，这些因素中的某些因素仍没有被彻底克服。然而，我国的工人由于把生产者的作用和管理者



的作用结合为一体，他们日益在摆脱这些残余，并随着日益直接地参加计划、分配、贯彻报酬政策而会更多地摆脱这些残余。因此，工人不再是雇佣工人，而是自觉的生产者，他在我们的社会中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之一，是今天我国整个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因素。工会将来也会大大促进使生产者地位发生根本的变革这一过程。

问：您请给我们谈一谈，应当怎样看待这一已经具有广泛规模的过程，特别是工会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

答：我们将进行斗争，我在这里当然是指工会，来反对那种实质上是追求建立市场垄断地位的经济中的联合形式，比如某些烟草工业企业的联合情况就是这样。我们要反对这种现象，决不允许出现这种现象，我们将鼓励那种将使生产得以完善和成本得以降低的合作。我们需要的是这样的联合，而不是在市场上形成卡特尔和促成垄断地位。我们必须从一开始就看到和防止这样的消极倾向。

建立尽可能多的小型企业，使它们同大型的专业化的企业进行合作，这是一件好事。这样的做法应当得到公认。现在有许多大企业生产那些不应生产的东西，这就提高了生产成本。但是，已经有些企业在建立小型经济组织或者确定同现有的小型经济组织进行业务合作的方针。我们就以克拉尼的“火星”公司为例。它现在把某些产品的生产转移到有更多的劳动力和存在着其他有利条件的地区。这些企业为“火星”公司制造零件，但它们都是完全独立的，设有自己的工人委员会。“火星”公司和这些企业之间的关系将是纯粹经济性的，相互的义务也将确定下来，而价格则以市场价格为基础，这些小企业不受歧



视。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途径。

用行政方式在经济部门进行联合，如果不进行精确的经济核算，如果集体不大情愿同其他企业发生业务关系，也不会产生好的效果。如果企业表面上联合起来了，但是实际上小企业却附属于大企业，没有任何权利，那么这种联合几乎不会产生任何效果。比较正确的做法是，企业走生产专业化的道路，这使它们能够提高产量和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成本，这些专业化的企业在学习成品时进行合作。如果较小的专业化企业仅仅与一种成品有关，这是不好的。专业化企业最好是接受若干工厂的定货。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就不会成为一个工厂的附属物，而拥有自己的独立性，有可能进行大批量生产，从而生产出成本较低的产品。比如，有可能和有必要这样来发展克宁地方的工厂，就是让它生产许多工厂所需要的各种型号各种规格的螺丝钉。但是，由于对专业化的必要性认识不足，一些企业主要是生产自己所需要的螺丝钉，而它们的这些机器只有一个月时间投入生产，而其他十一个月则停着不用。这实际上意味着，那里所投入的固定资产没有被利用，而是被闲置、被冻结。

问：铁托同志，我们都知道，您对于培育人道的和民主的社会主义关系，特别是对尊重劳动人民的权利，给予了极大的关怀。您现在请就这一问题向工会会员和积极分子谈一谈看法？

答：关于劳动关系方面的某些问题的情况，我往往是从工会得到的。我总是花费相当的时间来研究这些材料，因为这些问题确实使我非常感兴趣。当我读到坏的事例，我力求只要有可能不管是在哪里都要发表自己的看法，而对我来说最好的机



会是在集会上这样做。我利用一切机会来提出自己对这一切情况的想法，而这实际上是我们领导班子的想法。工会的任务是对这些事情及时发出警报，一旦发现某些不良现象，就马上发动工人开展斗争去消灭这些现象，而不必等待，看我们将做出什么决定。工会应当敏锐地进行干预，特别是对待侵犯工人在企业中的权利的现象。同时，工会始终应当想到在它们身后有人民政权和我国的现实法律，只要涉及不良现象，工会就有责任加以干预，并加以制止，不论牵涉到谁。因为这些不良现象会给我们造成巨大的损失，会造成工人情绪不振和引起乱批评，而以后会被某些人加以利用。诚然，这种人为数极少，但是，假如这类现象反复出现，他们就能够在他们的观点来对工人施加消极的影响。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做到让职工自己来决定劳动关系方面的一切问题。如果有人游手好闲，如果有人不愿意劳动，那么职工就会把他解职。

正如我所强调指出的，在这一切方面的问题正是在于生产关系的根本改变。今天，工人越来越意识到，他不再是处于雇佣关系之中，而是自由的生产者。因此他同社会的关系也不同了。现在不仅生产而且他的生活水平的提高都取决于他自己。而在企业中的生产者本身之间的关系也在日益发生变化。在这方面的消极现象越来越少，现在将完全消除。不会再出现从前的那种情况了。比如说，企业中的经理或其他某个领导人出于个人动机而不是出于真正需要，就把某个工人从一个岗位调到另一个岗位，从较好的岗位调到较差的岗位，以使用这种方式迫使他离开企业。类似这样的有害行为，如果在某些地方还出



现的话，那就必须加以消除，因为在像我们这样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是不应有这种行为的。

问：您是否可以就企业和公社的关系问题向我们谈谈您对工会的任务的看法？

答：在我谈到劳动集体与公社、与更广泛的共同体的关系时，我经常考虑到工会在发展这些关系中所起的作用和产生影响。这些关系不可能避开工会的活动而发展。比如说，有的公社把企业仅仅看成是自己资金的来源，即可以从那里把资金拿来而用到其他方面，同时又不考虑企业本身的利益。然而，工会这时就要制止这种现象，工会应该拥有尽可能大的权利和可能性来发挥这种作用。认为，工会今后在公社，在同生产者院的合作中将会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你们肯定都会记得，在实行工人自治时曾经有过这样的意见：认为在工人委员会成立之后就不再需要工会了。而实践恰好表明，工会不仅不是多余的，而且它的意义和任务越来越重要。诚然，可能有人会把业已加强的工会作用称之为工团主义，就像那时把我们的管理民主化称之为无政府主义一样。事实上，正如对经济部门无政府状态的评价是不正确的一样，这类指责也会遭到同样的命运。<sup>①</sup>

---

<sup>①</sup> 摘自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七日在贝尔格莱德与《劳动报》社长和编辑的谈话(铁托：《为实现和平而斗争》，第八卷)。





## 自治的根本问题

### 让自治者也管理收入

问：在您看来，什么是作为社会关系的自治的根本问题？

答：让自治者最终不仅管理自己的劳动，也管理收入，以使自治者成为将能够正确地进行分配和再分配的人。而目前尚没有做到这一点。

问：您认为，在像南斯拉夫这样一个多民族的社会中社会主义自治的特殊意义是什么？

答：我把社会主义自治看作是一种强有力地发挥作用以使内部紧密团结的因素。多年以前，我曾经考虑过，在多民族的国家里要形成长期紧密结合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然而，我认为，我们有着一个方向，即自治的方向，它将会成为捍卫南斯拉夫作为统一的国家的一种力量。

问：尽管您近来多次谈到关于当前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情况和关于它在日益发展的自治条件下的作用，但我仍想请您再谈一谈。

答：在今天，当应该充分实现自治价值的时候，当工人阶



级应该享有宪法所保障的全部权利的时候，当一切财富的生产者成为我国社会基本因素的时候，共产主义者联盟面临着复杂得多的形势。然而，也正是由于这一切，更值得更加积极地发挥作用。正因为如此，我才建议进行一定的改组，使党的组织适应当前自治者社会的需要。共产主义者联盟必须在各个地方、在各个领域里发挥作用，然而，它不再是某个发号施令者，而是作为正确指导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因素发挥作用。这就比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定提得更高一些，六大决定，共产主义者联盟将只是某种指导力量。而我可以这样说，在不久以前，即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以前，这种指导作用还非常薄弱。

然而，我现在在视察一些地方的时候看到各级组织正在适应我们的需要。一些拥有数百名以至上千名盟员的共产主义者联盟的组织并没有充实的党内生活。它们偶尔召开会议，会上两、三人发言，不过是某些人表示同意，某些人表示不同意，仅此而已。

共盟组织都必须在各个方面开展活动，研究各种问题，使所有的盟员都参加到其中来。这首先适用于生产部门的共盟组织，它们的作用必须在更广泛的社会范围内表现出来。其他群众性组织也一样，它们不能只满足于做一些思想工作。它们必须更多地从事思想政治提高的工作。

我必须说，对共盟盟员的思想教育工作相当死板。尤其是各大学里的共盟盟员应当更加注意在这方面的问题。<sup>①</sup>

---

<sup>①</sup> 摘自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二日与贝尔格莱德电台电视台记者的谈话(铁托《军事著作》，第五卷)。



## 米洛万·吉拉斯事件

### 冲向洞开的大门

我想谈一谈我们为什么要召集这次全会，谈一谈我们必须召开这次非常全会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当然，首先要指出的是：如果是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如果谈的是那些并不涉及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的小事情，那么我们会采取其他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了。然而，由于米洛万·吉拉斯同志<sup>①</sup>的文章具有不是依据六大的精神来贯彻六大决议的

---

<sup>①</sup> 米洛万·吉拉斯(一九一一——)，曾攻读哲学和法学。一九三三年以共产党员的罪名被判处三年苦役。期满后曾任南共贝尔格莱德地方委员会委员，南共塞尔维亚省委委员。在南共第五次代表会议上(一九四〇年十月)被选为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四一年参加人民解放战争；为最高统帅部成员。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五四年期间曾任部长、南共联盟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民议会主席。一九五四年一月在南共联盟中央全会上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后被开除出南共联盟。由于从事敌对活动，一九五七年被判处九年徒刑；被剥夺职务和奖励并勒令退休。他成了反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南斯拉夫的敌人。他在国外发表过反对南斯拉夫和反对共产主义内容的几本书和一些文章。



性质，由于这些文章具有这种性质，而使得本来只能由新的一次代表大会解决的、关于共产主义者联盟和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的重大的内部问题，被提交公开讨论，即被提交给非党群众讨论了。很明显，所有这一切所引起的后果，使我们不得不召开这次全体会议。

米洛万·吉拉斯同志的文章是他个人的作品，是他个人的意见。人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他是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何以我们不早些采取措施呢？这样不是可以不动声色地、较少震动地使问题得到某种解决吗？

如果这样提出问题，那我就必须承认：我们在这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是有责任的。因为吉拉斯同志很早写了这些文章，并且在今年秋天他曾经有一次问过我：“老大<sup>①</sup>，你对我写的文章有什么意见，你在这方面有什么想法？”我回答说：“有一些事情我是不同意的，但是基本上还是好的，所以我想这些还不足以成为你不写的原因，继续写吧。”我当时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他的文章中也谈到了我们中间很多人已经谈过或写过的事。

只是在以后，在十二月份，当我读到这些文章时，我才发现吉拉斯同志已经走得太远了。当时我发现，在这些文章中他实际上在攻击共产主义者联盟，我不想谈论各种理论上的错误观点，这方面让卡德尔同志来谈，我看出这里面的问题是要取

---

<sup>①</sup> 原文为“老年人”、“年长者”之意，是南斯拉夫游击队及党内对铁托的尊称。——译注



消共产主义者联盟并且破坏纪律，是有可能使我们党的团结和我们国家的团结蒙受巨大的损失。在这一点上我是没有看错的。要是我们看错了，那倒好了，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没有看错。所有这些造成的后果表明是非常严重的，这不仅对我们的联盟，而且对我们整个国家都会产生无法估量的后果。

不能说，吉拉斯同志的这些文章没有受到过个别同志的批评、严厉的批评，不能说，个别同志没有对他谈过根本不同意这些文章的意见。这一点他们自己会来讲的。而我，当我看到，吉拉斯同志在个别接触和交谈中受到批评之后，继续沿着这一方向继续走下去，不仅如此，他还在自己的文章中使问题更加激化，我想讲一下，当时我不在贝尔格莱德，而在斯洛文尼亚病，当时我不得不激烈地和严厉地作出反应，我要求在我们共产主义者联盟核心领导层解决这个问题之前，立即停止登载他的文章。

吉拉斯同志在他的最后一篇文章在《新思想》杂志上发表以前，就知道了我反对的意见。但他迫不及待地把它发表了。他这样做想达到什么目的呢？我能猜想到，事实上问题在于他想利用这篇文章使我们，使他在《新思想》杂志上所攻击的那个“集团”在道义上不可能以平等的地位来争论或有某种充分的权利来反对他的一些思想论点和其他论点，他的这些论点抨击了官僚，或者说得好听一些，在消除我国的官僚方面，他冲向洞开的大门。

我不想在这里讨论或者谈论这篇文章；这篇文章居心叵测。对我来说，这并不重要。对我来说，重要的倒是他以前所写的东西。这些东西后果如何？他想达到什么目的？我必须立即



就指出：如果我说所有这一切都是完全有意识地做的，而且事先就考虑到这样的行为会给我们共产主义者联盟和我们的国家，会给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什么样的后果，那就使人感到太尖锐和太严重了。我认为，正是由于对我国发展的实质不了解和对由此而可能产生的事情不了解，促使他继续写文章，虽然我们已经表示不同意他的看法。

他极为仓促地，以一星期内写三篇文章的速度在《战斗报》上发表文章，这是不是某种独创的新理论？是不是关于我国发展、关于我国现实情况的发展的新思想？同志们，不是的。今天我们有些同志问我们：“可是你们为什么要攻击他？为什么要召开非常全会？有些事情你们自己也谈到过。”我回答说：是的，这里是有我和卡德尔的看法和说法，也有其他许多同志的想法，这些想法我们都在会议上公开地谈过。我是第一个谈到关于党的消亡、关于联盟的消亡的问题的，然而我并没有说过只要经过六个月、一年或是两年就可以办到，而是说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只要最后一个阶级敌人还能兴风作浪，只要我国公民广大群众还不具有社会主义觉悟，那么共产主义者联盟就不可能消亡或取消，因为共产主义者联盟要同它在革命时期对革命的胜利负责一样对实现革命的成果负责。共产主义者联盟必须存在，而且不仅要存在，还要在思想上更加强有力，并意识到它本身应起的巨大作用。

这不是什么标新立异的事，而现在谈的是关于吉拉斯同志在他的思想方面，或者像他自己所说的，在他的“哲学”观念方面所阐述的问题。当他提到在我国发展过程中确实反映出来，并被利用来在冲破官僚制度方面和日益完美地形成我国社



会生活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那些确凿的事实时，他在自己的那些“哲学”议论中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呢？他想以此来掩饰他所宣扬的主张，即取消共产主义者联盟，复辟资本主义，而这已不是以前那样的资本主义，而是资本主义形式，因为在西方的民主形式中必然也有一般的社会形式。

他向我们宣传的不是新型民主，也不是社会主义的民主，而是抽象的民主，这种民主本身似乎就足够了，而实际上是无政府状态。

对我们来说，民主是何物呢？对我们来说，民主就是达到主要目标——社会主义的手段，社会主义本身就包含着最民主的统治形式，因为没有社会主义就不会有真正的民主，而没有民主也就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宣扬和描绘为民主而民主，而且是西方式的民主、形式主义的民主，这就是倒退到旧社会制度形式当中，而不是像吉拉斯同志所说的那样向前进。为什么？他那里所写的东西，我们已经在许多修正主义者和最出名的改良主义者的著作中看到过。因此，他不能在他的“哲学”议论中自称似乎他在继续进一步发展我国的民主，而我们这些同志，这些老共产党员实际上却在阻碍这种迅速的发展，因此应当用某种方式把我们清除掉。按照他的意见，我们是机会主义者，而实际上，我们在革命的社会发展观上，却同他所写的东西完全不同，犹如天壤之别。因为他倒退得很远，所以我不想在此深究：这里是否有观点的混乱之处，因为实际存在着两种极端。但是改良主义的、修正主义的那种极端在他的文章里尤为明显。

在这里，有一件事使我感到不安。我为我们党的许多党员



的政治思想水平低得难以想象而感到不安。他们认为这是进一步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一步推进我国现实生活的一种什么新理论。这使我感到突然和震惊，这也是应当令每一个有觉悟的共产主义者感到不安并使我们不得不用另一种眼光来看待联盟中共产主义者的内部生活的最主要的东西。

那么，由此而出现了极大的混乱，这是毫不奇怪的。我必须坦率地对你们说，如果我不是看到简直像南方大雪块开始从山顶上倒塌下来那种极其有害的后果，那我是无论如何不会向同志们建议召开全会的。说实话，我认为只要读一读十二月间南通社《参考资料》上的外国通讯社的报导，就足以看到我国社会主义现实的所有一切反对者是如何迅速地利用了吉拉斯的这种理论，又是怎样为这种理论而兴高采烈的。他们说，很明显，民主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原来的想象，因为今天已有一位理论家能够采取这样一种立场，他说绝对必须取消这，取消那，于是，正如他们在那里所写道的，南斯拉夫已接近于西方的民主。确实，存在南斯拉夫接近于西方民主的现象，但不在内部制度的问题上，而是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合作问题上。

吉拉斯同志为什么会同与他已共事十七年的老同志们分手呢？吉拉斯同志始终有机会在我们内部发表他想发表的意见，甚至发表超过他的文章的意见。我们全都了解他，我们相互间也争论过。我们彼此开玩笑，而一个人在开玩笑时是什么话都说的。但是，这些问题在我们内部从来也没有以后来公开发表的那种形式讨论过。他在此以后仍认为没有必要在执行委员会甚至在书记处的会议上说明自己计划朝这一方向来写文章。当然，我们不会同意他这样写，如前所述，这只有代表大会才能





解决，而决不能通过舆论界或报纸来讨论解决。让那些从某些腐朽的自由主义动机出发来捍卫自由表达思想的倾向的人不要奇怪。我们从来，特别是在一九四八年以后的近几年中，都没有阻碍过自由表达思想，但这些思想必须有分寸，必须是共同讨论的结果，必须是进步的、先进的、推动我国现实向前迈进的思想。

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谁要是想象他能像凤凰那样从自己头脑里产生最成熟的思想，那他是自欺欺人，这样的事是不会有的，我们迄今为止都是集体地工作的，除了集体工作、互相交换意见、彼此激烈争论以外，别无他法，只要大多数人认为是最正确的，就应当采纳。这个原则以后在我们共产主义者联盟中也应当坚持下去。共产主义者联盟与其他一切团体和党派不同之处正在于这一点，在于共盟有这样的纪律，那就是凡是大多数同志认为是必要的，那就是成熟的和最好的。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全知全能，我们中间谁也无权利自称是这样的人。谁也不可能超越并凌驾于众人之上，我想，吉多[吉拉斯]也没有多少理由自称可以这样做。因为他置身于我们现实生活之外，他不知道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质意义，他也不懂我们的法令，不了解制定我国法律所经历的一切麻烦和艰难，不了解我国法律制定的依据，不懂得我们是在同什么东西进行斗争，不懂得我们是如何艰难地获得目前所有的东西的，对一切困难和痛苦的历史，他都知之甚少。

吉多同志从未像我们已故的基德里奇同志以及那些被他宣布为官僚主义分子的人那样在日常工作中呕心沥血地工作，因为他认为这是平凡的、琐碎的事务主义者的工作。但，这正是



社会主义的发展，这正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这正是真正的工作。社会主义正是由这些工作构成的，而不是由我们中间的某一个人，具体地说就是吉多同志臆造出来的某些抽象思想构成的。社会主义决非如此。谁不了解我国发展的实质，谁就不能从哲学的角度正确地描述和阐释我国的现实情况。而吉多同志却不是这样。我希望他自己会来说明这一点。

此外，从第六次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来看，他在自己的文章中还坚决反对在布里俄尼岛上举行的第二次全会的决议，当时我们谈到了我国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异己的、被歪曲的、倒退的和过时的形式和观点的危害性。他也背离了二中全会的决议。

这就促使我们必须而且只能在全会上来解决问题。当然，我不想去说明吉拉斯同志的议论中的矛盾之处；关于这一点，就让卡德尔同志来谈，他将对这一问题作一个报告。我想在接着讲之前先着重说明一件事。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许会证明我刚才就我们的态度所讲的话是对的，我说过，我们没有足够的警惕性，但并不是完全没有警惕，而仅仅是在一定程度上警惕性不够。我认为，早些时候来解决这个问题是困难的，在吉拉斯白纸黑字，一意孤行地向公众说明自己的观点以前来解决吉拉斯同志及其观点的问题是困难的，因为人们难以理解，会认为这是集团内部某种争夺权力的斗争，因此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当时在他的第一批文章发表以后就已经提出了吉拉斯同志以及他能否留在联盟领导岗位上的问题。

我认为，现在才传到外面去要好一些。让大家从中看到我们的民主的作法，看到我们的民主的宽容态度，假如你愿意的



话也可以说，让大家看到，我们已经等到不能再等待的程度了，但是，事情一旦发展到了顶点，就要说：停止吧，让整个中央来表态，在这件事情上该怎么办，有什么想法。我认为，这样做毕竟不会造成很大的恶果，而一切已经发生的恶果，完全是由于吉拉斯的过错而产生的，而无论如何不是由于我们的罪过而产生的。

有一个情况是非常有意思的。在吉拉斯的文章中以及他的所有观点中，令人触目的是，他一字不提工人阶级，似乎工人阶级不存在似的。也就是说，他根本不谈工人阶级这个我国整个革命前的准备斗争、革命斗争以及革命后的我国建设事业的主要代表，而在其“哲学”议论中却把过去的资产阶级剥削者、过去的大臣、过去的资产阶级宪兵同觉悟的工人等同起来，他把所有这一切等同起来，在他看来这一切现在都是一回事。

这样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就会导致无政府状态，导致无法想象的可怕境地。因为，如果我们允许这样做，那么在一年内就不会有我国的社会主义现实，我要说的是不必经过流血的斗争，我国的社会主义现实就不存在了。这种观点以及这些思想在我国流行的结果就会是这样的情况，因为我国还残存意想不到的残余和各式各样可能的观点。这一点现在再清楚不过了：在很短的时间内，在这几天内就有人开始蠢蠢欲动了，国内的反动势力以及一切动摇分子和不健康分子已经开始抬头，更不用说西方的反动势力了，他们认为，吉拉斯在我国举起了民主的旗帜。

当然，我并不怀疑绝大多数共产主义者的觉悟，但也有成千上万这样一些人，他们扩大了动摇分子和各种冒险分子的队



伍，并带来了巨大的危害。这不仅使我国的威望受到损害，而且使我们不得不重新去争取过去已经取得的东西。

吉拉斯同志正是没有看到这些后果。我认为，作为我们党内长期的领导人，他有充分的时间来考虑这会造成的结果，就像他有时间考虑其他事情一样。现在有人问道：他确实是如此无知呢，或者另外有什么背景？我提请全会来判断：这是不是有意识地、有系统地准备消灭最革命的因素？正是他们在我们队伍中传播社会主义的意识。

由此可见，正如我前面所说的，他恰恰忘记了体现这一切事物的工人阶级，他根本不提工人阶级。这是不是企图分裂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这是不是下意识地或者有意识破坏我们的社会主义联盟队伍的团结？在我脑海里出现了这些想法，而这是应该加以澄清的，因为现在已经出现了这样一种倾向，很多人都在说：工人能做什么？他们什么也不能做，他们不是什么理论家，他们有了自己的工厂，就让他们和从前一样在工厂里做工吧，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他们现在还管理着工厂。现在众多咖啡馆里的清谈家、政客、各种编辑部周围的人士、某些文学家等等，不约而同地都出头露面了，他们来自小资产阶级队伍，来自于某种原因早就不该留在我们的队伍里而应该被驱逐出外的那些人的队伍。可见，这些人将成为今后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和社会主义发展的、我国社会主义现实的优秀人物。

为什么我从吉拉斯的文章中看见了修正主义，这是不难猜到的。我想你们大家也都看出了这种修正主义，而我简直难以相信吉拉斯会没有看到这一点。这里的问题是不惜用任何代价



实行民主的问题，提出与伯恩斯坦对目的的提法完全吻合的提法——这最好由卡德尔同志来谈——以及其他许多提法的问题，这些提法在西方得到了某些修正主义集团不同寻常的赞赏。而吉拉斯同志没有看到这一点，没有看到这就是修正主义，而且是最坏的一种修正主义，即改良主义的机会主义，而不是他想在自己的文章中所提出的那种革命的物力论。这里毫无任何革命物力论。这只不过是把历史的车轮拉向倒转，而不是推向前进。请原谅我，我必须用极其严厉的措词来表达，这一切表明吉拉斯同志脱离我们并不是为要更迅速地向前进，而是拚命地倒退到旧时代去。

现在的问题只在于：他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是否看到这一点？如果他是意识到的，那就是说他早就在考虑这件事了；如果他没有意识到，那我们希望他有一天会确信这一点。

从吉拉斯的文章中可以觉察到的影响具有各种不同的性质。其中有一种影响我已经提到了，即他脱离了眼前的现实，脱离了自己的同志，找到了另外一伙人，他有这样的另外一伙人；其次是西方的影响，出国旅行，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影响，只不过不是我国的现实、我国革命的历史和历史上一般革命经验的影响。

有人说，革命有自己的逻辑，有许多事情是会再现的。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在革命初期，在武装冲突时期，当广大群众发动起来的时候，革命就比较容易地向前推进；当群众起来破坏那些过时的东西、陈旧的东西、给他们带来难以忍受的生存条件的东西的时候，这种动荡就少得多或者是罕见的，而跟不上革命的车轮这种情况几乎是极个别的。



但是，在革命和平发展时期，即在武装冲突和革命胜利之后，成为这次革命代表者的人们碰到斯齐拉和哈里白德的各种各样的暗礁，那时情况就变得非常艰难，特别是当事情不是像某些人所期望和想象的那样轻易而迅速地进行时，一些软弱者便垂下双手，他们扔掉武器或者要求事情进行得更为迅速，而根本不问这是否有可能，并且寻找各种借口、理论和哲学来指责社会改造的这种缓慢发展。

具体地说，这就是吉拉斯同志事件。他是对于我们痛苦的现实，对我们繁重的工作，对我国社会主义现实的发展感到厌倦的那些人之一。他在这里如坐针毡，陷入自相矛盾，与其本性发生矛盾，于是，他现在寻找其他的借口，毫无根据地责备我们，说我们是进一步迅速发展的障碍。什么地方有过这样的革命，革命的领导者在这场革命中如此大胆地消灭了他们昨天所做到的而今天已认为不合时宜的东西，以便创造某种新的、更好的东西呢？什么地方又有过这样的革命，革命的领导者在这场革命中如此勇敢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以便像在我国这样使一切事物向前发展呢？没有！那么他为何自称有权谴责他所说的“一潭死水”，他向那里投进了一块石头，以便掀起波浪，促使事情更迅速地向前推进。

我不知道给我们这些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加上什么保守和机会主义罪名的这种想法是从何而来的。显然，这是不了解我们所从事的事业的结果，是不了解我们所从事的事业的结果，是不了解在我们这样一个落后国家的发展，即在一个大多数居民具有各种各样想法的落后国家内最先进的社会制度的发展受到历史制约的结果。这就是说以无视的态度对待这一切。



当然，那时他所写的一切东西归根结底都是司空见惯地冲向洞开的大门，尽管关于这一点其他同志已谈过。我同意，关于这一点我们也谈到过，但是当我们谈到关于共盟的消亡，或者关于党和国家的消亡时，我们从未说过这将是明天、后天或是过一、两年的事，而是说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个过程将是艰难的发展过程。

在由于吉拉斯的文章而引起的整个这一事件中，显露出的具有积极意义的惟一点是，这件事使我们和我们许多人头脑清醒过来，使我们大开眼界，这就是，看到了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的东西，但是，我们也不相信有这么一大批人，他们，特别是吉拉斯同志，认为我国已经消灭了阶级敌人。吉拉斯认为，没有阶级，没有阶级敌人，现在大家都一样。而正是吉拉斯事件却表明了，我们这里的阶级敌人是多么危险。阶级敌人仍然存在，这一点在吉拉斯的文章发表以后就可清楚地看到，在共产主义者联盟中也有阶级敌人，他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表露自己。有积极意义的是，我们必须更多地考虑，使任何一个人都不要以为阶级敌人及其消灭的问题只是武装斗争和结束这一斗争的事情，而是只要存在社会主义建设，在我们进入最高阶段即共产主义之前，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切可能的敌对势力将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反对我们，为我们设置障碍，如果注意到还有来自西方的种种影响，尤其如此。

诚然，吉拉斯同志一向对青年寄予特别巨大的希望，而他在这里却力图取消青年。青年也不需要！这是明摆的事。既然要取消共产主义者联盟，而只留下一些共产主义者，他们可以成



群地在酒店饭馆，在各个角落和屋里争吵，那么他必定也要取消青年团，这是不言而喻的。

他甚至也不让工会在我国有立足之地。我想听一听他是怎样来说明这是正确的，我们都知道，我国的工会还肩负重大的任务，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工会的任务是要帮助在生产者中间扩大社会主义意识。

我想在这里用几句话来说明我对吉拉斯同志所犯错误的看法。这是有关我国整个团结方面的重大错误，而在国外也给我们带来危害。在结束讲话时我要强调这一点，但是现在我也可以说，我认为，如果我们共产主义者联盟盟员，我们和我们的全体盟员现在陷入了另一个极端，并且如同在尖锐的革命斗争时期那样行事的话，那是绝对错误的，不仅无益而且是有害的。因为我们今天已经如此强大，以致可以完全用另外的方式，用新的方式，用我们的方式来进行反对这种企图的斗争，并且不赞成将那些犯错误的人，甚至犯有极大错误的人加以消灭，而是使他们能够认清自己的错误，并且今后尽力工作，以便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他们所犯的错误。

我知道吉拉斯同志就是这样的人。我认为他是一个必须并且应该认清自己所作所为的共产主义者，如果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他就应该接受一切批评和党给予的任何处分，然后继续工作，而不致离开建设社会主义的人民队伍，而只有继续工作，才有助于弥补他给我们的国家和共产主义者联盟所造成的损失。

我想谈到这里为止了，我希望这次讨论应采取这样的方针：吉拉斯在这里不是批评的惟一目标；批评也应当针对我





们联盟内外目前的整个状况。我必须说明，在吉拉斯事件之前就有许多材料和证据，说明应该更坚定地反对那些想在民主的外衣下危害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目前这些人由于吉拉斯的文章便以为中央已发生分裂，而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了。这次讨论应该沿着这样的方向进行：我们要使这些人不能得逞，尽管发生了给我们带来巨大损失的这种不幸事件，但我们毕竟不应当犯新的错误，陷入另一个极端，而是应当通过一些决议来使我们能够顽强地向我国制度进一步民主化的方向前进，并且在一切情况下决不改变我们进一步正常地向社会主义、向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方针。但愿这不致成为某种警报，使人们以为现在又得改变我们的方针，因为我们在贯彻这一方针犯了错误；我们应当沿着社会主义建设的民主化道路前进，但是要更加警惕和更加谨慎，使我们以后不会再说，我们又一次瞎了眼。<sup>①</sup>

---

<sup>①</sup> 摘自一九五四年一月十六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南共联盟中央第三次非常全体会议上的讲话(铁托：《言论集》，第九卷)。



## 不结盟政策

### 团结第三世界

问：现在，请允许我提几个国际政治方面的问题。在冷战时期，出现了不结盟政策这一概念。您是这一政策的倡导者之一。请你对我们谈一谈，这种思想是如何产生的？

答：就我个人而言，在万隆会议<sup>①</sup>以及通过潘查希拉<sup>②</sup>决议之后，我产生了这种想法。我曾经仔细地考虑过这个问题。我感到这还不够，觉得这更多是宣言式的东西。我曾经说过，我们在这方面必须再前进一步。我看到的不仅是亚洲国家和非洲

---

① 万隆会议于一九五五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四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来自亚洲和非洲的二十九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这些国家宣布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歧视，赞成共处政策，支持新解放国家的独立斗争。

② 和平合作五项基本原则，是印度和中国在一九五四年提出的，而万隆会议（一九五五年）强调了五项基本原则的意义。所谓潘查希拉的基本原则是：尊重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平等和共处。



国家，而是更广泛的范围。因为，存在着两个集团：早就建立的西方集团和东方集团。在我看来，作为一种抗衡力量，东方集团必然会出现。这一点已经开始通过联合国反映出来了。在联合国内很难通过一些好的解决办法。联合国成员国大部分国家都处于这两个集团之外。我认为，这些集团之外的国家毕竟应该通过某种方式联系起来。不是要具有作为第三集团的某种组织形式。但是，所有那些反对划分为集团，而赞成在万隆通过的原则以及后来又在贝尔格莱德<sup>①</sup>加以补充的原则的人士和国家，应该以某种方式联合起来。总而言之，我考虑过，我们应该通过某种方式把第三世界联合起来。

贝尔格莱德会议、开罗会议以及卢萨卡会议的思想传遍全世界，这些思想甚至在集团国家内部也起着作用。如今，集团之间的对抗缓和下来了。如果你们记得，在贝尔格莱德会议上，我们整夜开会，以便商定并通过决议：派一个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而另一个代表团赶赴华盛顿，要求他们至少见见面并举行会谈。那时，我强调指出：“ONLY MEETING, ONLY MEETING”(只有会谈!)。我们长时间做了努力，做工作，促使他们开始相互会谈，紧张局势稍有缓和。即是说，我们当时就有使世界缓和的思想。不结盟政策的想法就是这样产生的。<sup>②</sup>

---

① 指一九六一年九月一日至六日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的第一次不结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

② 摘自一九七二年五月十二日与贝尔格莱德电台电视台记者的谈话(铁托《军事著作》，第五卷)。



召开这次会议<sup>①</sup>的想法是我们，即纳赛尔总统、苏加诺总统、恩克鲁玛总统和我提出的。就是说，我们四个人是会议的倡议者，而后来其他人也同意举行这次会议。这就是说，我们把这一想法告知了后来出席贝尔格莱德会议的其他国家元首，理由是在当今混沌的国际形势下举行这样一次会议是极其必要的。当然，那时我们并没有料到，会有这么多的国家的代表参加这次会议。而在今年四月，当我和纳赛尔总统在开罗会谈时——我同纳赛尔总统在这些问题上合作得很好——我们取得了一致意见，认为召开这次会议是必要的，哪怕只有少数几位国家元首会同意我们对于当今国际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应该采取什么方式的观点。然而，结果却完全是另一种样子，我们怀着极其满意的心情可以这样说，我们的预见说明我们过于悲观了。

在我看来，贝尔格莱德会议开了几天并通过了决议，会议是开得非常成功的。会议的成功出乎我们意料。当我们召开这次会议的时候，我们并不认为，在一切方面都会存在一致的观点，但是，我们设想，这次会议将会在最主要的问题上，即对保卫和平的斗争，在为制止新的世界大战进行努力方面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问题上会取得一致意见。在这方面观点确实是一致的。当我就会议的筹备问题致函一些国家元首的时候——纳赛尔总统也这样做了——我还表示了自己的想法，认为在这次会议上不应该讨论各种地区性的问题，不应该涉及某些国家的相

---

① 指第一次不结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



互争端，因为在这方面每个国家都存在一些自己的问题。使我们感到特别满意的是，我们可以说，不仅在全体会议上，而且在秘密会议上，大家都坚持了这一点。全体与会者最后通过了和平呼吁书和不结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宣言，这就是最好的证明。我们并不存任何幻想，以为在个别问题上绝不会有不同的观点。曾经有不同的观点，但是，我们坚持尽最大的努力使不同的观点协调起来。因为，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某些特殊问题。其中许多国家还存在着同其他国家，特别是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问题，所有这些都应予考虑。尤其应该考虑到不久以前刚获得解放的国家，这些国家在经济方面和其他方面，在它们的对外政策方面，以及在它们的内部发展方面，还同从前的宗主国有着联系。<sup>①</sup>

问：在科伦坡举行的第五次不结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的筹备工作已经就绪。从第一次会议在贝尔格莱德召开至今已有十五年了。总统同志，您认为，不结盟国家在迄今的活动中最重要的成就是什么？

答：我认为，我们可以自豪地回顾一下从一九六一年贝尔格莱德会议至今所走的道路和所取得的成就。由许多国家组成的一种运动和一种新的政策，会如此迅速地确立起来，并且变成一种国际力量，而没有这种力量的参加，世界性的问题就不可能顺利地得到解决，这在历史上是很少有这种例子的。仅仅

---

<sup>①</sup> 摘自一九六一年九月十日在萨格勒布与《团结报》社长的谈话(铁托：《为实现和平而斗争》，第十五卷)。



在十五年的时间内，不结盟国家的数目不断上升，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第一次会议时为二十五个国家，而在去年在利马召开部长级会议时增加到八十三个，肯定会有更多的不结盟国家出席科伦坡会议。

在这里，我只提一下不结盟取得的一些重大成果，这些成果体现了作为国际关系积极的发展动力的不结盟政策的不可替代的革命作用。

不结盟国家对确立积极和平共处原则做出了许多贡献，并且推动了在对所有国家人民同样安全以及所有国家平等参加解决国际问题的基础上缓和紧张局势。

在世界和平面临最严重的考验的某些时刻，不结盟国家为避免出现最严重的局面作出了重大贡献。比如，一九六一年，当冷战的逐步升级有可能把世界推向一场新的灾难的时刻，不结盟国家施加了建设性的压力，使对抗转为谈判。类似的情况是在一九七三年十月中东战争时期，当时根据不结盟国家的提议派出了联合国部队，从而阻止了战争的烈火在这一地区的蔓延。

属于不结盟国家的伟大功绩的是，没有使整个世界划分成集团，而某些国家与地区摆脱了外来的统治和集团争夺。

不结盟国家对加快各国人民和各个国家摆脱殖民主义以及各种形式依附的解放进程也施加了决定性的影响。对于多数国家的人民和国家来说，不结盟已成为有组织的行动和加强这些国家和人民的独立的行动纲领。因此，几乎所有的新解放的国家都赞成不结盟，这是可以理解的。

不结盟国家是发起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行动的国际因素。



它们为解决当前整个世界面临的我们时代的这一中心问题提出了原则，确定了范围。

不结盟国家通过自己的全部活动为使人们认清如下问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问题是：在事实上相互依赖的世界上，应建立什么样的国际政治关系和国际经济关系，以及应怎样为建立这样的关系进行斗争。不结盟国家不仅是一支道义和政治的力量，而且是一支日益增强的物质力量，要是没有它们作出这样的贡献，今天的世界将会是另一番情形，而且在每一个方面都会更加贫困。因此，不结盟不是受到时间和空间限制的现象，而是当代人类的长期需要。

问：您认为，使不结盟政策对世界大部分地区具有吸引力并使这一政策得以有力地确立的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

答：我们首先必须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世界上居于优势的各种条件。势不可挡的解放潮流和各国人民要求解放的愿望的增强使国际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是殖民体系的瓦解和大批新的独立国家的建立。涌现了一系列有关各国人民之间和各国之间政治和经济关系的新问题。有相当一部分的新兴力量倾向于向新的社会关系发展，倾向于已经成为世界性进程的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势力坚持用一切手段阻碍或延缓这种积极的进程，因此也就开始了冷战。

接着，很快就形成了以美国和苏联作为两种支配力量而起特殊作用的两个集团。然而，同时人们也强烈地意识到，世界的前途、和平和各国人民的安全不能建立在围绕某些大国而把各个国家划分成为集团的基础之上。在这样的情况下，各国人民的解放进程也具有了替代按集团划分世界的新出路的性质。



如果我们回顾一下自一九五六年开始以来所发生的事,即从我同尼赫鲁和纳赛尔签署了布里俄尼宣言以来,经过不结盟国家贝尔格莱德会议以及以后的事件,我们会看到,这种要求独立的愿望在不结盟运动中日益明显表现出来并加以具体化。这首先是因为这一政策的目的和原则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最进步的愿望。

不结盟政策的吸引力从一开始就表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相信,它们奉行独立政策的愿望和它们在国际关系中的平等主体地位之所以能够最好地得到实现,正是因为它们属于不结盟运动。

这一政策的普遍性和生命力还表现在:即使是某些集团国家也表示希望同不结盟国家保持密切的联系和合作。这在客观上也影响到不结盟政策在新的地区得到确立,并导致逐步地克服集团的划分。

目前正在讨论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对待那些希望参加我们的运动的国家的要求。我在这方面赞成采取比较灵活的态度,特别在对待列席国方面。对于正式成员国来说,应该坚持严格的标准。但是,我认为,也应该使其他某些愿意改变自己政策的国家有可能接近不结盟。这对我们来说是重要的。正如你们所看到的,不管对不结盟施加了什么压力和进行了何种攻击,我们的思想正日益深入到集团国家的人民中去,因为各国人民理解并接受不结盟。

很明显,这种发展会引起来自各个方面、特别是来自主张按集团划分世界的人的反对。他们首先试图贬低不结盟。随后就攻击不结盟是不道德的,因为它不倾向于任何一个集团,而





据说是在建立自己的一个某种特殊的集团。以后出现的就是另外一类指责。这就是说，一些人说，不结盟国家不够中立，另一些人讲，其缺点是把集团与集团等同起来。还有一些人说，如果说不结盟在冷战时期还具有意义的话，那么在当今缓和时期就没有理由存在了，等等，不一而足。

无须强调指出，这些指责是多么缺乏根据。然而，他们无法减少不结盟作为对任何具体问题采取独立立场的建设性政策，作为以整个世界统一利益为出发点的政策的价值。

不结盟政策和不结盟国家的建设性作用如今毕竟得到了许多方面的承认。甚至还得到了过去经常攻击它的那些人的承认。

但是，压力和讹诈并没有停止。随着科伦坡会议的来临，这种压力和讹诈还在加强。某些大国得以在某些不结盟国家之间制造障碍和混乱。有人企图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破坏不结盟国家的团结。有人提出各种条件，提出会议应该采取的立场。但是，任何人都不能使不结盟国家脱离它们自己选定的道路，科伦坡会议也将表明这一点。

问：总统同志，您是否能回顾一下在同不结盟国家国务活动家初次会晤时的某些情况。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布里俄尼会议和贝尔格莱德的第一次会议以前的那些会谈。

答：二十年前，就是在这里，在布里俄尼，尼赫鲁、纳赛尔和我一起开过会。具有重要意义的思想就是在这里产生的。当时的国际局势十分严重。冷战有变为热战的危险。我们讨论过我们能做些什么。我们决定，应该致力于使所有不在集团内的国家团结起来。这一点反映在我们三人当时在布里俄尼签



署的一项简短的宣言之中。这也就是为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第一次不结盟国家会议采取行动的开始。

当然，我们当时还不能想到这件事后来竟会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会有这么多的国家团结起来。即将举行的科伦坡会议的东道主班达拉奈克夫人也曾经是贝尔格莱德会议的参加者。不幸的是，我的大多数朋友、不结盟政策的倡导者——尼赫鲁、纳赛尔、恩克鲁玛、苏加诺和其他几位朋友——今天已离开人世了。

但是，我们在布里俄尼所设想的，及后来在贝尔格莱德所阐述的东西逐步地实现了。

最初的情况就是这样。今天，我们可以说，我们在发展我们的事业和加强不结盟国家在世界上的作用方面走过了苦难的、然而却是极其成功的道路。

对于和我一起致力于这项活动的同代人的任何回忆都是使人无法忘怀的。比如，我还记得我同尼赫鲁的会谈情景。在我第一次访问印度期间，在一九五五年一月份，我曾出席过在马德拉斯近郊举行的国大党的一次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集会。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千百万的人民群众以极为关注和赞许的态度听取了尼赫鲁和我的演讲，当时我们谈到了要为自由和独立以及为各国之间的平等关系而斗争。尼赫鲁在会上公开谈到了，印度必须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从第一次会晤以来，我和尼赫鲁进行了非常密切的合作。使我感到高兴的是，尼赫鲁——一个伟大国家的一位伟大领袖——和我，我们相互有很深的了解。

问：总统同志，我国的革命以及我们决心实行社会主义自



治制度、南斯拉夫联邦内部各民族的平等关系，对南斯拉夫采取这样的对外政策活动有多大的影响？

答：南斯拉夫在对外政策上决心奉行不结盟的根源来自解放战争，甚至可以追溯到我们在战前的革命运动和反法西斯运动。如果谈到不结盟政策的实质——这首先是为争取民族独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内部发展和平等的国际合作而进行的斗争——那么，在我们的革命的各个阶段，这些原则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显然都是得到体现的。在我们所有较重要的文件、决议或讲话中都体现了这些原则。

早在人民解放斗争时期，我就强调指出，每个民族都享有成为自由的民族，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以及成为与其他民族平等的民族的不可剥夺的权利。我们也是在这一基础上与我们的所有同盟者建立关系的。我们坚决地抵制了外来的一切发号施令的企图，反对了瓜分南斯拉夫的计划，抵制了使它屈服以及限制它独立自主和自由的发展的计谋。我们从来都拒不同意把我们当作任何人棋盘中的小卒。

一九五〇年，当我们制定工人自治法的时候，我们的出发点是：我们的社会主义自治发展和独立的对外政策的方针是完全一致和相互依存的。

南斯拉夫国内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同我们在国际关系中所赞同的原则相一致的。换言之，我们在实践中是在实现各个民族的完全平等，而不管民族人数的多少；我们在发展自治制度；我们在为加速发展不发达地区而进行斗争；我们通过协商制定所有决定，等等，而这一切基本上也同样是我国对外政策中的原则。



总之，国内的自治和国际关系中的不结盟乃是独立的南斯拉夫的完整的政策。

问：总统同志，是什么鼓舞您，使您个人坚信不结盟国家生命力和未来呢？您对这一政策在今后的年代里有什么看法？

答：如果希望有长期的世界和平和合作，那么除不结盟政策外别无其他选择。我一向担心，事态发展要是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的那样，就会导致新的灾难。我认为，应该有尽可能多的人民和国家积极参与制止帝国主义和其他的图谋，那么就不会爆发新的战争。

我向来反对战争，赞成通过和平方式，通过谈判来解决一切问题。我亲身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我知道人类为这两次大战付出了多少代价。这两次大战吞噬了千百万人。几十年所创造的一切都毁于一旦。所以，反对战争的这种情绪是如此深刻地留在我的心底。

正如我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确立了终身为之奋斗的方向那样，我在这里也决心为人类以另一种样子组织起来而斗争。我曾经深信，世界必须改变，我们不能容忍如此不公正的各种关系。这就是我主要关心的事情之一。当然，我从来不抱幻想，认为这一切都将是一帆风顺的，不会发生矛盾的。所以，我们必须创立一种运动，它将为克服这样的状况而斗争。

自然，这样的一种趋向妨碍那些想使现状保持不变的人们。但是，我们关心的是斗争，关心的是始终信守共同制定的原则。这在将来也不会是轻松的。还会经受许多令人失望的事情。但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使人们失去信心。可以肯定，坚韧不拔精神是十分重要的，并且将会带来成果。当然，坚韧



不拔的精神应该建立在深刻的信念之上，坚信这是今天应该在世界上占优势的惟一正确的原则。

请你们看一看，这次将会有多少国家参加科伦坡会议，而这对世界今后的发展将意味着什么。当然，我们必须捍卫我们的团结，这是我们斗争胜利的条件。我知道，我们将会珍惜这种团结，而这一点会具有重大的意义。我同样相信，我们今后将会有更多的有组织的活动。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不结盟国家始终有足够的积极性。或许，我们必须在这方面进行自我批评。<sup>①</sup>

---

<sup>①</sup> 摘自一九七六年六月三十一日在布里俄尼向南通社记者发表的谈话（一九七六年八月一日《战斗报》）。